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高申鹏 译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

EZRA F. VOGEL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最近十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观点更为公允，更加符合史实，方法更为得当；更能清晰而简捷地抓住问题要领，对中心主题的把握亦更得心应手。

—— [美]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鞭辟入里而明晰易懂，又能不偏不倚。抛开弗朗茨·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不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傅高义教授的这本著作，是迄今为止美国社会学家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问题的最为精彩的作品。

—— [美] 理查德·M. 普里弗 (Richard M. Preffer)

(傅高义教授的) 研究得益于广东与香港地理位置的邻近，使他有幸亲身接触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和其他人士，获得在众多有关中国的书籍中绝无仅有的人性尺度，从而使本书成为兼具可读性和可靠性的非凡之作。

—— [美] 斯坦利·卡诺 (Stanley Karnow, 《华盛顿邮报》)

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218-05824-5



9 787218 058245 >

定价：48.00元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高申鹏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11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 ~ 1968) / [美] 傅高义 (EZRA F · VOGEL) 著；高申鹏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6
(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218 - 05824 - 5

I. 共… II. ①傅…②高… III. 广东省—概况—1949 ~ 1968
IV. K92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723 号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 ~ 1968)

著 者 /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译 者 / 高申鹏

出 版 者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 510102
责任编辑 / 倪腊松 崔肇钰
整体设计 / 卢小雅 + 何 筠
责任技编 / 周 杰 黎碧霞

总 经 销 /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 各地书店
印 刷 /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5.5
插 页 / 4
字 数 / 380 千
版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5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18 - 05824 - 5
定 价 / 4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 - 37579604 020 - 37579695】



2006年6月7日，傅高义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学术演讲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 1737 CAMBRIDGE STREET • CAMBRIDGE, MA 02138 • TEL: (617) 495-4048 • FAX: (617) 495-9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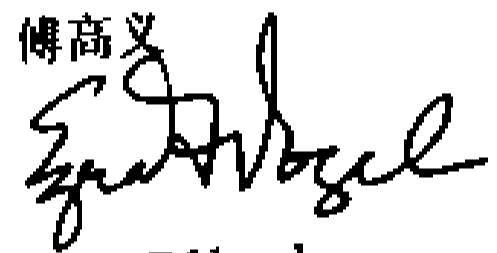
Ezra F. Vogel, 
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授权书

我于1969年写了一本关于解放后广东省二十年变化的书：
“CANTON UNDER COMMUNISM”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现在我委托高申鹏博士将此译成中文, 以便于在中国大陆
出版发行.

傅高義

傅高义



Ezra F. Vogel

2005年8月4日

出版说明

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是当今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有名的“中国通”。他对中国有着深入而持久的观察和研究，具有“中国先生”的美誉，甚至对中美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都具有独到的影响力。

有趣的是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傅高义先生选择广东开始了他对中国的研究，他在香港隔岸而观，收集书籍、报刊资料，几乎读遍了当时广东方面出版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上游》（广东省委杂志）等报刊，同时对从广东到香港的人进行访谈，并最终撰写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一书，阐述了从1949—1968年这20年间在广东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而激烈的政治运动，以及广东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虽然他当时不能到广东实地考察，但已经很靠近广东，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使他的研究颇为客观而真切，以至于他在时隔38年之后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中道：“当我翻回我在1969年写的这本书时，我惊讶于书中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耄耋之年，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虽然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的叙述、他的观点并不完全能为我们所接受，但足资参考借鉴，且《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确实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有关广东的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并叹服他对于新中国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广东的城市和农村的熟悉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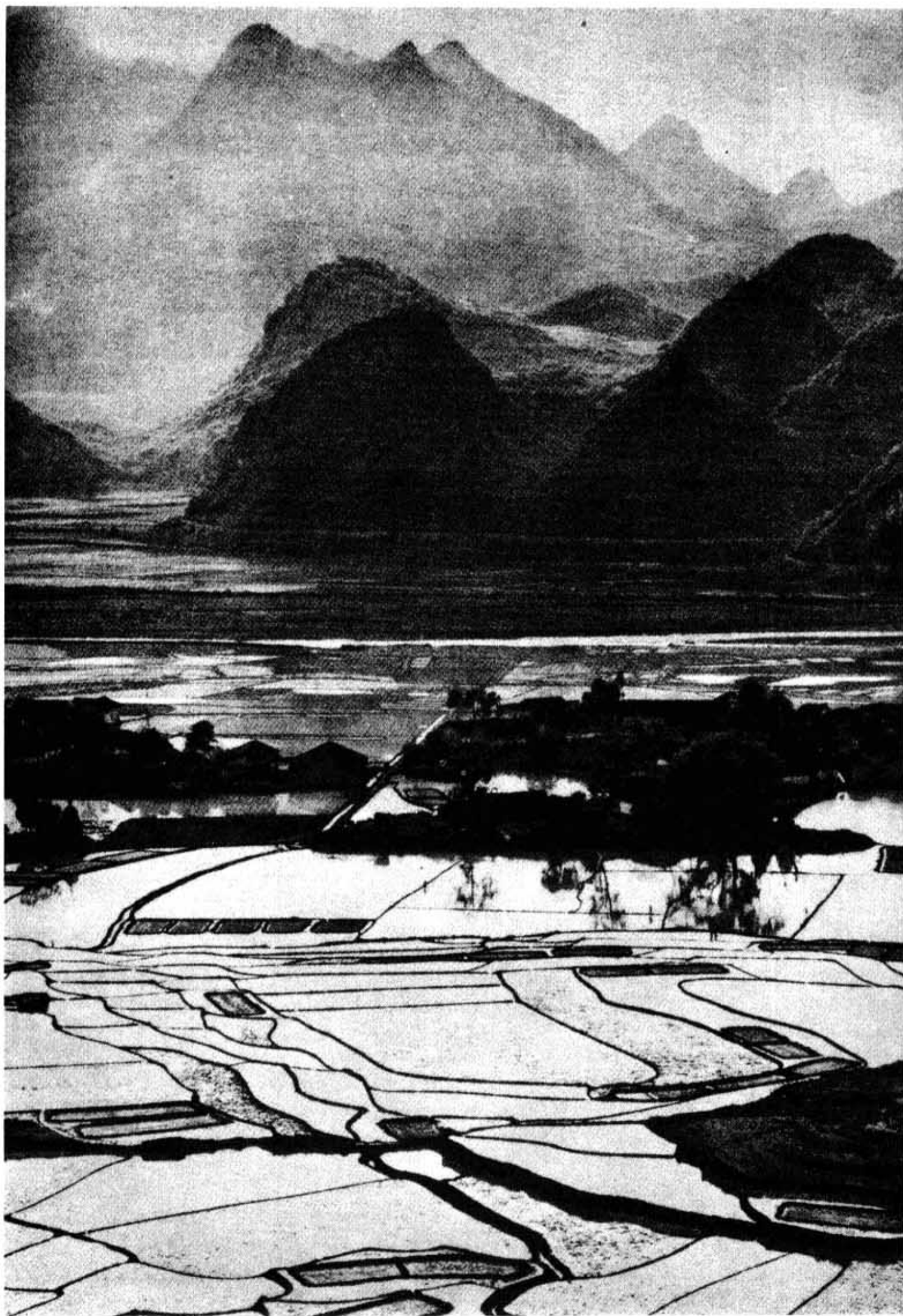
更看到了一个西方学者的严谨学风及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他便受到了当时广东省领导的邀请，自1980年，傅高义先生首次访问广东之后，每年至少访问广东一次。他参观访问了当时所有14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3个经济特区，走访了广东100个县中的70多个，包括一些贫困县，并采访了30多个县级官员。所到之处，无不待之如友朋，坦诚交流，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量资料。傅高义先生也因此完成了他研究中国研究广东的第二部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我社在1991年经授权出版了该书中文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傅高义先生的这两部书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能让我们较为清晰而完整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艰难曲折的伟大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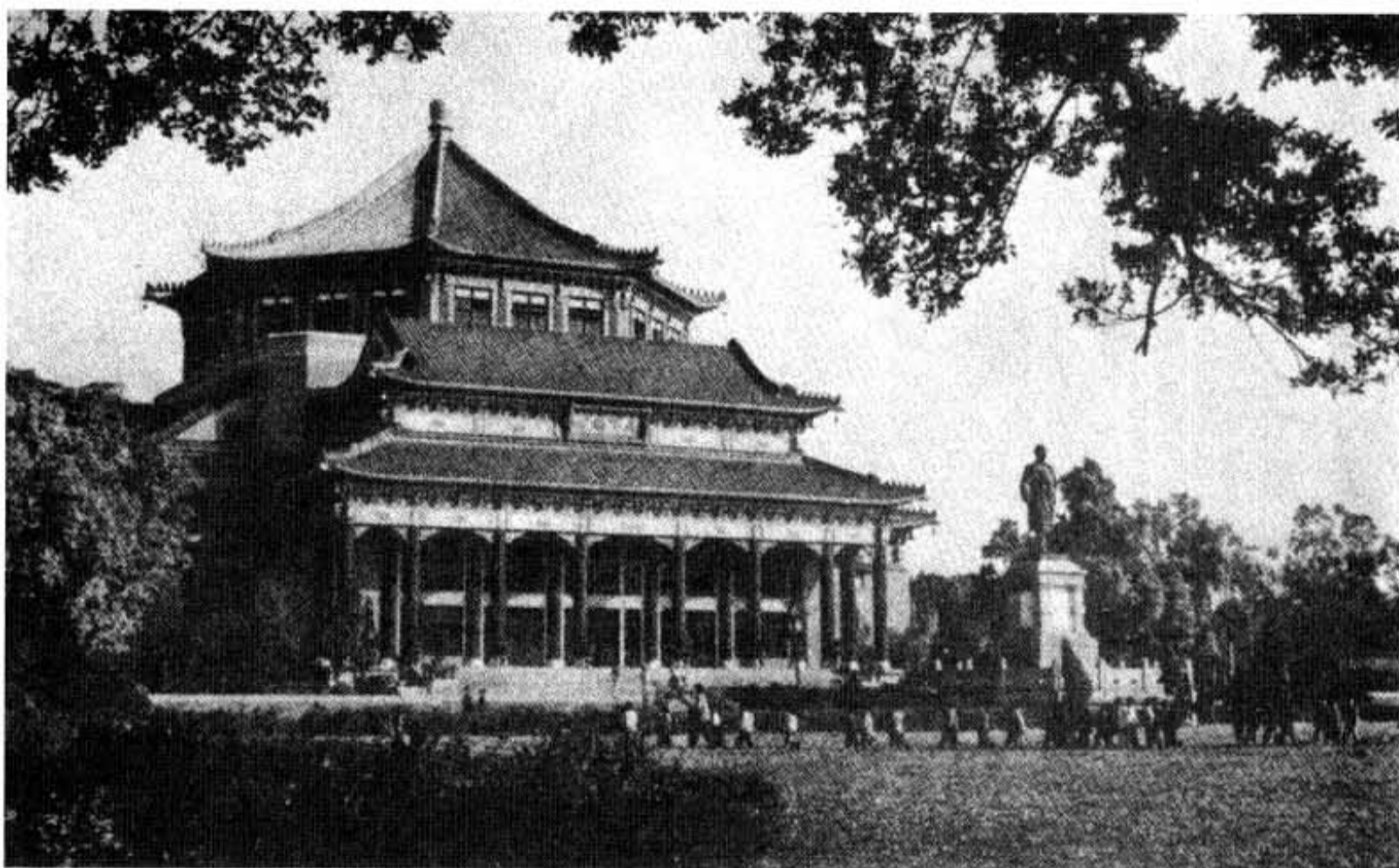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傅高义先生关于《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两书的授权，并在此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版和再版这两部著作的中文版，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编者

2008年1月



春耕时节的广东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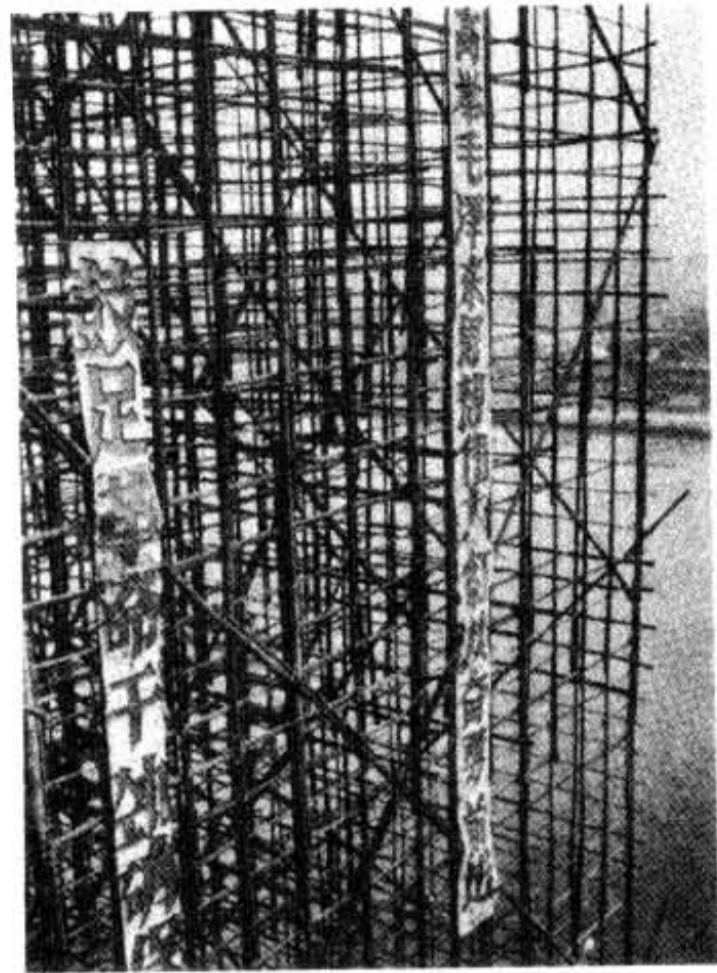
中山纪念堂，当时广州最大的室内会议场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前广州和珠江边的最高建筑——
爱群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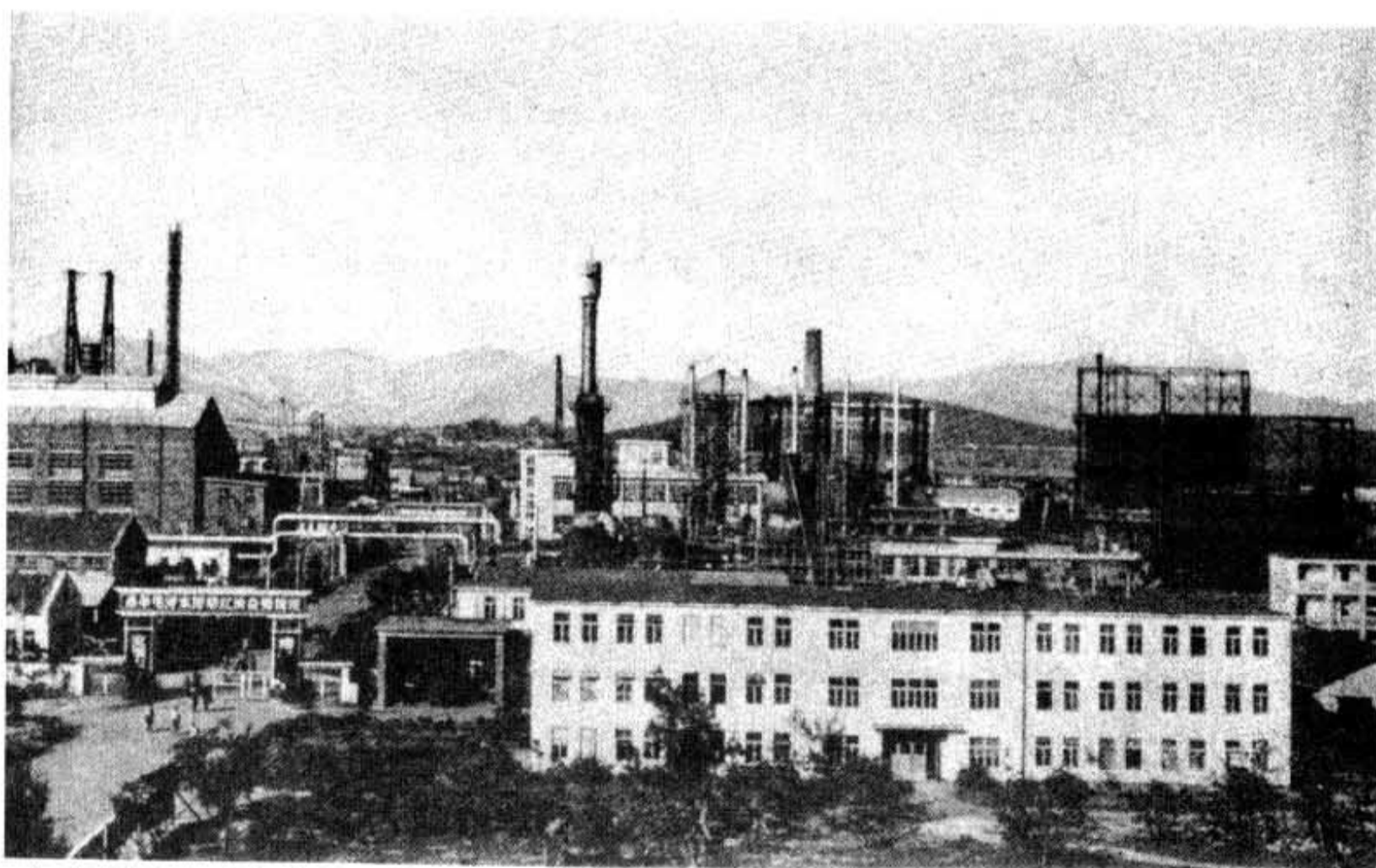
1967年初正在建设中的一座27层的新
建筑，上面悬挂着“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的标语



沿珠江边的广州商业中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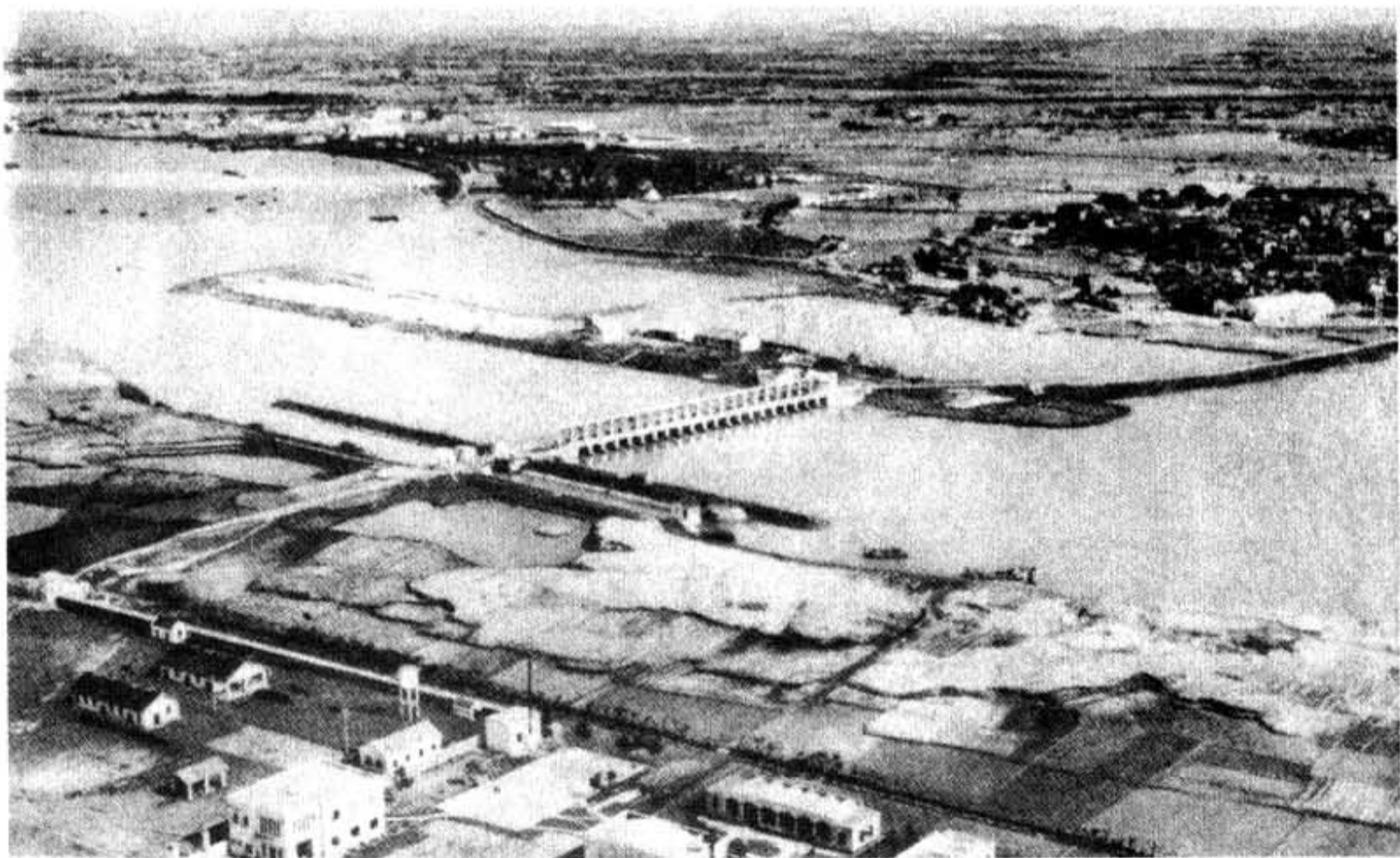
位于南岸的广州主要工业区



广州化肥厂，大门上方悬挂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前进”的标语



由寺庙改造成的公社大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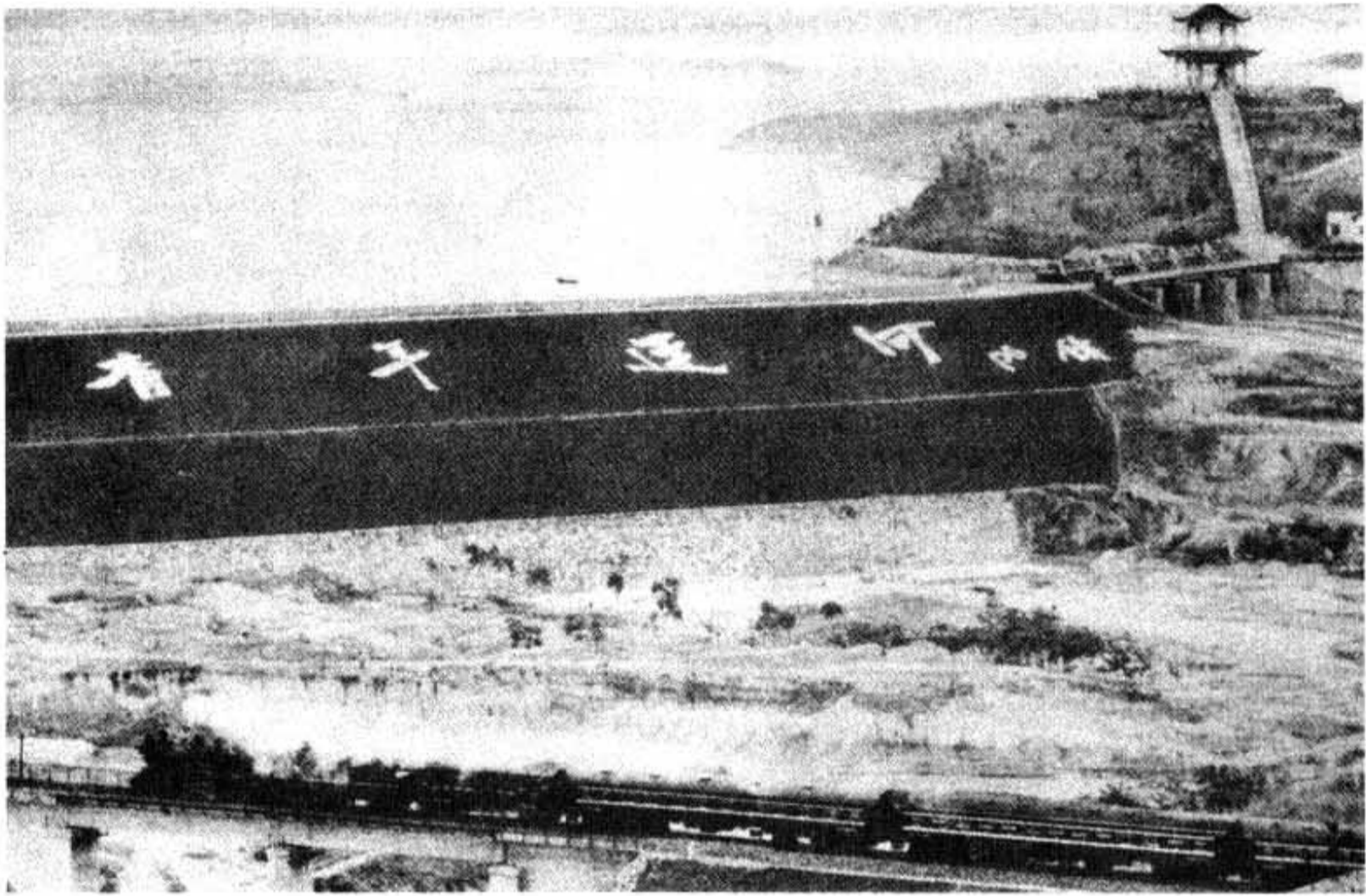
欣欣向荣的公社所在地



典型的新型公寓楼房（韶关）



1965年2月，区梦觉、李坚真、陶铸、陈郁、赵紫阳和王首道在广州领导了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建成的广东工程——青年运河，名称署名为陶铸题写



广州东北部的大学区



叶剑英



方方



朱光



曾生

序 一

我36年前撰写的英文著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译本的问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倍感欣慰。由于该书中详细地涉及了地方主义等问题，故诸如此类的出版物难以面世。今天能出版拙著的中译本，深深领悟其深远意义。在此我深谢我的朋友高申鹏先生为中译本所作的极大贡献和付出的辛勤的汗水。高先生具有长年生活和工作于广东的丰富经验，十分谙熟广东情况，并获中山大学博士学位，因此方能非常称职而出色地完成此项工作。

1969年，当我完成该书的时候，还处于“冷战”时期，也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年后，基辛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离开哈佛大学教职不久），应毛泽东的邀请访问中国，开始为恢复中美关系奔波。

20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学者寥寥无几。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中美间的敌对关系也随之形成。中美两国的爱国主义情结都很深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当时由于反对洋奴，大学里或研究机构无法公开、客观地研究美国。相形之下，美国的亲中知识分子却不像中国的亲美文人所遭受的排挤那样深重，但是当时在美国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也存在同样的压力。在冷战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下，中国知识分子若公开学习和崇尚美国，简直如阳春白雪。而美国大学里的当代中国研究者也有类似的问题。

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对中国的研究，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状况。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美国政治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败北于台湾，所以我

们不要花很大的力气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是我们专门学当代中国的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到了50年代后期，多数美国文人已经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将会长久存在，应该是培养研究当代中国情况的人才的时候了。美国基金会同意并支持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但是面临的问题是由谁来教授和培养人才，苦于既无师又无徒的尴尬局面。这时，一些大学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他们已经分别学习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因此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当时费正清选拔了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费正清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我任副主任，1972年费正清离任时，我便成为他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接班人。

1964年我开始执教鞭于哈佛。1961年至1963年我在哈佛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今天回顾起来，我们的规模虽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很少见。由于敌对关系，也难以赴中国内地寻找资料。对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中国研究者来说，当时最佳之地首先香港。香港很开放，中国的报刊基本上都有，所以资料还是丰富的。而这些资料大都是从香港之邻的广东转道而来。1962年，陶铸让一些人从广东渡至香港，因此给了我们这些外国学者与来自广东的人们交流与谈话的良机。虽然其中不乏偏见之谈，但还是有很多客观理智的智者之见。一些判断失误在所难免，我们外国学者也极力辨明是非，做到实事求是。

1963年夏季，我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其间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也有一些美国特工人员从事收集中国情报的工作。而我们这些学者在研究目的和角度方面却迥异于那些报刊记者和特工人员。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研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

却没意识到我们研究的重要性。

在赴香港前，我个人本来希望能够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在香港收集广东资料可说是比较多，但是详细的地方资料却很难收集到。所以到香港后，我便决定撰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的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当时由于我中文水平的限制，虽然读了一些中文资料，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但是理解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南方日报》自1949年至1963年我基本上都有，所以我认为当时我的研究还是有很好的基础并有很可靠的资料来源。由于文化背景、国家制度的不同，对于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中国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不能充分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在香港时，与一些从广东移居到香港的人士交流过。其中一位叫陈仲文（Edward C. M. Chan）的年轻人在此我特别言及一下。他本来是香港长大，1949年作为一名爱国青年，离港赴广州，做了一个小干部。由于被划为右派，后来便回香港与父母同住。1966年他来到哈佛做了我的助手。我们历时四年，每天阅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并讨论报刊文章的内容及内容的背景与含义，也包括各次运动的来龙去脉。

1964年我返回哈佛后，决定将广东历史研究从1949年起延伸到至1969年我完成该书稿写作的时候。所以1969年写完了这本书就谈了20年的历史。

我初次访问中国内地是1973年。当时我有幸参加美国科学代表团，也趁机在广州小住几日。但当时尚未得到在中国研究的机会。我和我的夫人艾秀慈（Charlotte Ikels）于1980年得机在中山大学访问并生活了两个月。其间，我同许多人进行了难能可贵的交流。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很保守闭塞的状况，没有真正的开放，所以我所需要的一些资料也很难弄到，难以进行真正的研究工作。1980年初，我有幸参加美国麻省和广东协会的活动，有机会和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人士交流，并得到他们（特别是省经济委员会）善意的大力协助，为我的广东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1987年我赴广东在那里一住便是七个月，我充分利用宝贵的时光，进行了脚踏实地的深入研究。返回哈佛后，我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

广东》便问世了。

我自 1964 年至 2000 年执教于哈佛大学，其间撰写过几本书。以我个人之拙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完成《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的写作，我还是满意和欣慰的。当然时过境迁，在今天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大背景下，如果重新撰写，资料收集会便利许多，有些地方可以得到补充，但是我认为也并不存在很多更改的必要。

今天拙著中文版出版，使广东人能够阅读本书，了解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广东，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而更加期盼的是来自广东读者的判断、批评和指正。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傅高义

2005 年 8 月

序 二

一本 38 年前的书到了今天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还将要以中文译本面世，这对书的作者来说确是莫大的乐事。

当我翻回我在 1969 年写的这本书时，我惊讶于书中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在那个时候，外国人研究中国和撰写著作都是在中国大陆境外进行的。20 世纪 60 年代里，就在我开始致力于著作这本书时，正值“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在那年，中苏边境冲突的爆发致使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促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基辛格（Kissinger）1971 年对中国的访问。但是，就还在 1969 年时，美国人是不允许前往中国的，极少数被允许访问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也被很严格地限制着。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可靠数据，除了我们能看得到的报纸外，在中国也没有多少出版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最适合西方人停留的地方便是香港了。少数香港人被允许进出中国内地，这给我们带来了中国内地的新闻，尽管不总是非常可靠。同时，还有一小群人是从内地来香港闯世界的。1962 年 5 月，有很多人聚集在边境处要求离开中国内地。在这个紧张的政治形势下，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曾给数千人放行，让他们前往香港，这些人也带来了关于广东生活的一些信息。

我的专业是社会学而不是政治学，我意识到不同的省份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其研究首都北京，还不如选择下面的一个地方。在香港，关于广东的信息很充分，比起有关其他地方的信息来得多，我于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广东。

在香港，我们接触到了大量的日报，有广东省委机关下属的《南方日报》，广州市委下属的《广州日报》等。此外，我们也从较为开放的《羊城晚报》中得到很多信息。我还与一些曾在广东居住的人聊过天，但

我知道，如果我谈到政治问题，我将很可能得到一个定型的答案，但要是问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倒是可以得到真实得多的描述。而在对比了很多不同的人的谈话后，我也能够勾画出一幅广东实况图了。

再后来，我雇请了一个助手，陈仲文（Edward C. M. Chan），一个很聪明的香港年轻人。在北方的共产党员南下帮助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前，他曾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前往广州工作。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批评后，他对他的工作便不再如从前那样有激情了。1962年5月，他抓住了一次机会回到香港。他虽然是一位低层的同志，但却有着一个机敏的好奇心。在两年里，我们每天阅读着《南方日报》，并一起深入思考为什么某种运动会发生，而运动本身对于当地人来说又是意味着什么。他告诉我北方的同志与广州本地同志的各种关系，还描述了官方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方法。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绝好的教育，让我知道了该如何读好中国报纸，如何在字里行阅读懂真正的意思。

在比较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土地改革运动的异同后，我看到了中央与地方的各种关系，也了解到中国国内对如何建立新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些不同观点。

这本书是西方第一本研究中国一个地区发展的学术性著作，而在我之后，其他的年轻美国学者还就其他城市撰写书籍。肯·立伯多（Ken Lieberthal）写了天津的发展，林恩·怀特（Lynn White）记录了上海的故事，关于武汉的是出自高英茂（Kao Yingmao）之手。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在香港开始研究中国的还有很多其他西方学者，如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和迈克·奥克森伯格（Mike Oksenberg）、汤姆·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安德鲁·南森（Andrew Nathan）、迪克·所罗门（Dick Solomon）、怀默霆（Martin Whyte）、苏珊·瑟克（Susan Shirk）、安德鲁·沃特（Andrew Walder）、吉恩·奥伊（Jean Oi）、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dsen）、黛柏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乔纳森·安戈（Jonathan Unger）、安妮达·陈（Anita Chan）、孔杰荣（Jerome Cohen）、柏纳·法罗立（Bernard Frolic）、培里·林柯（Perry Link）、斯坦·罗森（Stan Rosen）、迈克·兰顿（Mike Lampton）以及我的太太艾秀慈（Charlotte Ikels）等。香港成了一

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的培训基地，尽管我们是在北美和其他各地的大学教书，但我们都聚集到香港开始我们的工作。很多资深的学者如莱绅·湃（Lucian Pye）和鲍大可（Doak Barnett）、阿兰·怀廷（Alan Whiting）等也曾在香港停留过一段时间，指导和激发过年轻学者们的研究。由美国基金会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也曾资助过我们，为我们能完成研究提供了一个“智力家园”。

1961年，裴泽（John C. Pelzel）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林白（John C. Lindbeck）就邀请我开始研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里，西方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研究过现代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20世纪50年代里，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在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状况。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攻击了很多对共产主义过于温和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员。任何人只要一讲共产主义的好话，就会被怀疑与共产党人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在此环境下，因为担心被怀疑对共产主义过于温和，大学里对开设任何有关中国大陆的新课程都很谨慎，基金会也谨慎地考量着资助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直到1960年，麦卡锡（McCarthy）参议员已经失去了他的影响力，而很多大学也意识到了他们需要研究中国。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很多美国人还是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需要多加认识。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过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培训，于是人们开始在各种学科中努力寻找一小群学者，并对其进行培训。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这之前我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我被哈佛大学邀请参加了对中国语言和历史的研究，从1961年开始持续研究了两三年。在那期间，美国福特（Ford）和梅隆（Mellon）、卡内基（Carnegie）等基金会大力支持我们的研究，实际上，哈佛大学还从美国空军方面获准继续研究当代中国。

我在1961年前所接受的培训正适用于我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在哈佛大学读社会学时，我的导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教授就

曾告诉我经常尝试着系统化地思考经济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思考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同时还要明白致使社会变革的源流在哪里。我们之前研究过的不少不同的社会可以提供比较。此外，我也在约翰·斯皮格尔（John Spiegel）博士和佛罗伦丝·克拉肯（Florence Kluckhohn）博士那里学到采访的方法。他们教授我应该如何提出合适的问题来帮助人们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如何在跟随故事本身的同时紧跟受采访人的思路。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曾研究过另外一个社会——日本。如此深入了解日本的经验也让我看到了不同社会间如何处理问题的联系。我从中知道，不能把官方说法当作是事情的全部解释，而应该常常探究更内在的关系以及更深层次的态度。我认识的日本正值其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便也就可以成为对比中国后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参照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我还需要了解苏联的情况。在众多关于苏联区域研究的优秀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可能就是哈佛大学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教授的《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我也因此把这本书取名为《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我曾参加过中国普通话的培训。尽管在与广东人交谈中，普通话并不是很管用，但我知道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在以后它将比广东话更有用处。尽管我的普通话还不是很流利，但当时我已经能够进行自己的采访了。后来，在语言上我也花了工夫继续学习。

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当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时，我们不会迷信于毛泽东的话语，也不会完全听信在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在1959年之前，从关于“大跃进”的大量报道中，甚至在中国媒体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跃进”带来的很多严重的问题。我在1969年出版的书中称当年的“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因为在那年，我就看到了“文化大革

命”中的很多问题，虽然当时的北京领导层并不公开承认。在总结时，我谈到了在帝国时代仅下至城市层面的中国政治构架，却在紧接着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公社化，已经延伸至这个社会的乡村基层了。

尽管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的诸多问题，但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些研究过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大部分都非常希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他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机会之前的经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我们年轻的学者们从我们的大学和美国基金会中得到了很好的资助。费正清教授和裴泽教授，以及在童年时代曾随父到中国传教多年的林白博士，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并鼓励我们继续研究下去。

这本书出版时是1969年，我当时还不曾想象过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变革。我虽已尽力透彻地研究，但我还是没想到就在我完成中国研究后短短几年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就进行了如此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我相信我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研究，以及后来在80年代初首次得以自己进入中国的观察学习，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基础来理解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变革。

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今天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也正反映出今日中国的变化，比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甚至包括80年代，是更加的开放。

我很感激我的朋友高申鹏，他很勤勉地为我这本将近40年前的书作出准确的翻译。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一些年长的中国人回忆起他们当年的经历，同时也为年青一代的中国人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看到他们的祖国是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Eugene Vogel in cursive script,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高申鹏' written vertically below it.

2007年8月

(陈植荣译)

英文版前言

作为一个对外界长期封闭的大国，中国承载了一种特殊的神秘感，而中国革命的意志，辽阔的领土，还有对伟大事业的追求又使这种神秘感得到提升。中国因此激起我们感情上的一种反应，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希望和恐惧的反省，却不是对中国本身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偏见，把中国诠释为一个伟大的胜利者，又或者是一个残酷的失败者；是一个危险的野心家，又或者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是一个暴君，又或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独裁者，或者是民主家。反共主义者看到的是背叛，共产主义者察觉到斯大林主义的痕迹，而浪漫主义激进分子认为是真正的革命精神。政府分析衡量的是敌对力量，媒体报道的是内战原因，而学者发现的是自己概念性想法的实例。

这本书是一位学者尽力抛开自身西方学术偏见，去了解中国本来面貌的代表作。不愿满足于将超过七亿中国人笼统地概括起来，我选择关注中国的一个地区。选择广州及其周边的广东其他地区作为讨论对象，是因为这些地方是西方学者最可能接触的。广东毗邻香港，中国和西方人在两地穿梭频繁。外国可以收听到广东的电台，报纸、杂志、图书和文件都有外流的渠道。书中的材料得益于阅读绝大部分广东官方机关报《南方日报》，还有对曾经在广东居住过的人进行的采访，而这些被访人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20年里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过的。

我尽力将这些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领导的社会政治历史的材料在本书中重新构建。之后，我想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领导者创建的不同组织的架构和功能。然而，调查的最主要来源并不符合高标准的客观性。流亡在外的人倾向于夸大自身所知，将他们已经忘记的事情重新阐述出

来，在自身的问题和观点基础上泛泛而谈。共产主义领导者的大众媒体基本上是用来引导方向和鼓动群众寻求支持，而不是记录事实。内容上大多是宣布计划，而不是报告结果，就算是报道结果，也大多是报喜不报忧。虽说如此，有时在事件发生多年以后官方媒体会对错误做出纠正，也会对其中的问题加以指正，这样的措施给受害者提供了平反的机会。尽管对事情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我却对这些来源的共同性感到吃惊。不同的阐述之间并不相悖，反而是互相补充。不同的只是一部分是来自官方的说法，另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声音。

本书的主旨是了解广州以及由广州管治下的广州城郊地区的情况，但是相信读者跟笔者同样想知道的是，这个地区对全中国来说有何代表性。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下定论，除非其他领域的研究有所发现。虽然这本书是对地区研究的首个出版物，但是其他的研究也即将问世，例如有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对唐山的研究，高英茂（Kao Yingmao）对武汉的研究，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上海的研究，维克托·C. 福尔肯汉姆（Victor C. Falkenheim）对福建的研究。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得出几个假设性的结论。在中国，不仅各个地区的民俗迥异，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也有差异，尤其是在郊区。1949年以后这些差异有所缩小，但并没有消失。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比起来，广东更为独立，变化万千，受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经验所影响。虽然广东人比起西方人跟外界接触的程度依然很有限，但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过着更都市化的生活。虽然对外国的认知并不完全准确，但广东人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对西方的了解更加真实和及时。

除了一些地区性的特征以外，共产主义领导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一套综合的计划应用到全中国。广东的官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将基本政策和计划跟本地情况相结合。很难说广东人跟全国各地的人反应有什么异同，而有证据显示广东人的基本反应能够代表其他地区的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所说的基本政策、计划和变化是应用到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引述一句在中国很有名的新闻报告话语，就是：“广东1949年后的历史跟全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全国采用相同的政策、推动力和计划，而且获得同样的效果。”

如果这本书能被中国人所阅读，读者会因为本书是集体劳动结晶而感到欣慰，尽管本书署名的只是一个作者，反映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我们几年来为这项研究紧密合作。陈仲文（Edward C. M. Chan）的付出超过了研究助理的程度，他既是一位有耐性的老师，让外国人明白复杂的中国政策，也是一位积极的研究员，热衷于研究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前引导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启蒙老师裴泽（John C. Pelzel）教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不厌其烦地帮我安排研究事宜，为我提供博学和无私的建议。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用自己特别的精力、决心和学术政治才能从头到尾慷慨地支持本项研究。所以本书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本书的研究受益于当地、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集体智慧。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提供了一切研究所需，包括懂得尊重和私隐的工作人员、一个好的图书馆，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踊跃的智力协助。还有其他三位为本书成形提供了协助的人：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Klein）、约翰·林白（John Lindbeck）和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除此之外，我还得益于跟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汤姆·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西德尼·比尔曼（Sidney Bearman）、孔杰荣（Jerome Cohen）、艾尔·克雷格（Al Craig）、拉尔夫·克罗伊齐（Ralph Croizier）、莫尔·高德曼（Merle Goldman）、大卫·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谢文孙（Winston Hsieh）、艾里斯·约菲（Ellis Joffe）、查尔斯·纽豪瑟（Charles Neuhauser）、德怀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艾德·罗德（Ed Rhodes）、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霍姆斯·维慈（Holmes Welch）、莫里斯·维尔斯（Morris Wills）、尤金·吴（Eugene Wu）、怀默霆（Martin Whyte）和学生们的讨论。约翰·林白（John C. Lindbeck）、维吉尼亚·比格斯（Virginia Briggs）、陶乐茜·贝维特（Dorothy Blewitt）和珍妮·斯莱文（Jeanne Slavin），耐心而且快速地处理大量行政上的琐事。奥利弗·郝梅思（Olive Holmes）女士为我解除疑惑，指引了手稿印刷的方式。

本书最早的启发得益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事会联合委员会的社会和人类学副委员会赞助的研讨会，以及学术团体美国理事会。联盟

研究所和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为本研究献出宝贵时间和资源。关于共产主义下的中国这一议题的小型非正式研讨会一直以来是本研究新观点的重要来源。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的著作《苏维埃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为本书提供了仿效的榜样。除了当地的同事以外，我曾受到以下人员的鼓励：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李马援（Marion Levy）、陆思礼（Stanley Lubman）、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白鲁恂（Lucian Pye）、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艾力克斯·艾克斯坦（Alex Eckstein）、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马思乐（Chalmers Johnson）、鲍大可（A. Doak Barnett）、茱莉·豪（Julie Howe）、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安东尼·迪克斯（Anthony Dicks）、希尼·刘（Sidney Liu）和林则·吴（Lin-tse Wu）。在进行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我受到帕米拉·麦科尔（Pamela McCall）、玛丽·锡（Marie Sieh）、露西·杨（Lucy Yang）、理查德 K. C. D（Richard K. C. Diao）、S. T. 梁（S. T. Leong）、弗朗西斯·舒瑞（Francis Hsieh）、希拉里·约瑟夫（Hilary Joseph）和南希·埃云（Nancy Evan）的得力相助。希尼·贝尔曼（Sidney Bearman）、范塞德、莫尔·高德曼（Merle Goldman）、罗伊·霍夫恩兹（Roy Hfheinz）、艾里斯·约菲（Ellis Joffe）、菲利浦·琼斯（Philip Jones）、陆思礼、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Klein）、黎安友（Andrew Nathan）、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和安妮·奥尔洛夫（Ann Orlov）通读全文并为修改之处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所需的资金。

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一直对我经常出国和彻头彻尾地埋首工作十分体谅和有耐心。

（黄洁华 译）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序 一 / 1

序 二 / 1

英文版前言 / 1

壹 导 言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 3

帝国秩序 / 4

混乱 / 7

共产主义的兴起 / 8

第一章 共产主义前的广州 / 11

南方边疆 / 11

地理环境 / 12

商业传统 / 15

广州人的多样性 / 19

市政当局：现代组织的构建 / 22

革命的摇篮 / 30

贰 建立新秩序

第二章 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1949—1952年 / 37

“后解放区” / 37

当务之急：平稳过渡 / 40

共产党干部的整合 / 45

干部的录用和训练 / 49

镇反 / 54

驱逐外国人 / 62

调整教育、工业和商业机构 / 64

创造收入和财政稳定的条件 / 70

改造知识分子 / 75

秩序的恢复 / 81

第三章 中央控制：土改的遗产，1951—1953年 / 83

土改运动的开始 / 86

南方抵抗的原因 / 91

南北冲突的激化 / 96

从妥协到纠正 / 99

一竿子插到底 / 111

第四章 经济控制：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年 / 114

广州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 116

迅速改造的负担 / 120

思想准备：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 121

粮食准备：“三定”运动 / 126

组织准备：乡政府 / 130

农业合作化运动 / 134

广州的工商业、手工业、个体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144

社会主义新秩序 / 160

叁 适应新秩序

第五章 缓和：右派插曲，1956—1957年 / 167

基层官员的看法：战线过长 / 168

高层官员的看法：矛盾 / 171

攻击的焦点：干部作风 / 173

“大鸣大放”，1957年5月1日—6月8日 / 175

精英反对的本质 / 178



- 管理干部的恢复 / 185
- 1957年夏、秋，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 188
- 整顿地方主义：海南岛与大辩论 / 196
- 浪漫主义情结的终结 / 201
- 第六章 乌托邦：“大跃进”，1957—1960年 / 203
- 跃进准备：纠正右倾保守主义 / 206
- 跃进准备：分散化 / 208
- 跃进准备：农业生产 / 211
- 发动：1958年初 / 217
- 地方机会的负担 / 223
- 现实主义的微光 / 226
- 乌托邦的尝试：公社，1958年秋 / 227
- 应对最初的农村问题：整顿公社 / 236
- 应对供应问题：统筹全局 / 242
- 1959年秋：跃进的复活 / 245
- 1960年春，最后的喘息：城市公社 / 250
- 梦幻的破灭 / 252
- 第七章 重建：恢复工作及其后果，1960—1965年 / 254
- 1960年中期：对迫切危机的特别回应 / 254
- 1960年末至1962年：收缩 / 258
- 社会主义的管理和“资本主义”的让步 / 269
- 1962年春：放泄阀 / 274
- 激进化与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年 / 278
- 信念与实践的分离 / 300
- 第八章 政治复兴主义，1966—1968年2月 / 303
- 主要参与者的策略 / 303
- 1966年秋：红卫兵的发动 / 306
- 1966年12月—1967年1月：冲击党的首脑机关 / 309

1967年2—5月：过渡到军管 / 311

1967年夏：群众武斗 / 314

1967年9月—1968年2月：最初的政治重建 / 317

经济抵制的政治策略 / 321

地方主义的复活 / 327

今后的任务 / 329

第九章 对社会的政治征服 / 332

附录 A：朱光《广州好》（50首） / 336

附录 B：表格 / 349

附录 C：资料来源缩写 / 363

人地名对照表 / 365

名词术语对照表 / 368

译后：二十年与十年——傅高义与广东研究 / 375

壹 导言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承受着胜利的负担。22年来，共产党的革命一直在进行斗争、谴责政府的腐败无能。随着胜利的到来，共产党从革命中走出，成为负责维护秩序、克服自世纪初以来困扰历届政府的一切困难的统治者。依靠半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他们开始统管比历来统一的政治单位多得多的入口；依靠尚未延伸到大多数乡村的小规模政治基础设施，他们试图把稳定带到广大的乡村；依靠小规模的宣传机器和大量的文盲人口，他们努力把同样的大众文化传布到由不同语言、文化和自身利益联结而成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团体；依靠有限的资本与极少量的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追求实现建立一个强国和更高生活水准的雄心；依靠有限的军事实力，他们藉此回应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崇高地位的爱国期待。坚持颂扬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形态，他们竭力谴责中国所急需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脱离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依靠党的军队和党，他们努力使这个饱受长期内战苦难折磨的国家实现统一。

当他们执掌权力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已历经考验，但在面对相对缺少经验而又复杂的管理、教育、生产事务时，他们却是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们作为浸透着激昂民族主义的一代在混乱的社会中长成，这些领袖人物来自社会较有特权的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认同于下层社会。他们的使命不是把政治作为天职，而是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作为一项事业。他们白手起家，他们自豪、机智、坚定，必要时冷酷无情。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和使命感。他们决心根据他们的理想，扫除过去，改造社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面对着各种尖锐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帝国秩序

在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前，持久可行的政治秩序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尽管多个世纪以来它已历经了许多变更，但中央作为核心的惯例已持续了两千多年。在帝国时代，帝国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结构特征，非常适合在交通、通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统治庞大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其惯例的发展、改进，非常适合其有限的的能力。甚至于从广袤地域所收取的有限的国库收入，只能使帝国政府支持几项大的公共工程和首都上规模的建筑，而一般的地方管理仅限于维持中央统治所必需：征收国库收入和防止严重的混乱。相应地，千百万人口可以由几万名官员来统治、管理，官员人数少，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遥远的地方政府。

帝国政府不能指望对人口直接或公平地征税。因为，少量的官员不能够对当地农业产出的收成作出有意义的估算，农业税只能根据对当地人口以及土地面积大小、土地质量的估计来厘定。因为官员们不能够对工商业活动作出公平的评价，他们只能对大宗财产、较易接近的工场作坊征税，在一部分商业道口、重要的山川要道设卡征税。为了征税，政府必须依赖吏，相应地，他们也只得对地方掌权者作出让步。通过安置当地的掌权者，允许地方统领、吏和官占有相当大、有时数目不定的一块地方收入，政府并没有使用大量的税官而征收了大量的收入。

传统的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的乡村或城市的事务。地方社区的权力默许给了当地宗族、乡村、行会、兄弟会和秘密会社。政府甚至并不试图干预这些地方社区组织的事务，除非事情太大而直接涉及政府的声望和权威。政府可以建议，可以树立榜样，可以遏制地方活动，可以有选择地打击，但它不能管理甚至是监督一般的社区事务。

政府并不期望对每个地方的管理都做到公平正义。它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权利，甚至不能逮捕那些伤害他人的人。它集中力量于最关键的

问题上，即那些威胁削弱其自身权威、引起严重混乱的问题上。政府对有组织的活动比个人活动更严厉，对待政治事件和批评要比个人事件更严厉。尽管政府官员自身甚至不能维持最低程度的秩序，通过掌管特定团体内的每个人，要求他们相互间举止适当，并通过给予宗族、乡村和行会领袖对他们下属民众的行为以特别的责任，而把少数官员的影响最大化。^① 负责统治、管理的官员不可能处理他们所听闻到的所有案件，但他们可以通过宣传某些重要的案件来警告、阻止可能的违法者。中央政府不可能向每个地方提供足够的军队，但可以把他们部署在战略要地，使之反过来能够控制、监督地区武装力量、乡村自卫武装，从而强化少量军队的效力。

历代统治者承认秩序不可能单纯凭借武力来维持，他们利用半宗教化的哲学——儒学，将其普及和制度化，为政府的权威提供道德支持。儒家著作的中心围绕子女对父母的忠诚，同理，推广到个人对国家的忠诚。政府通过确保这些信条得到广泛传布，遏制竞争性的哲学，有助于灌输尊重权威，削减对政府权威进行公开挑战的可能性。

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来训练自己的官员，更不用说普通的百姓，但它有卓越的考试制度来向国家输送聪明睿智、训练有素的人才，保证他们有同样的背景。考试不仅检验人才的能力，而且检验其对政府的忠诚与服从；也不仅仅根据考试本身的内容来考核，而且要考察其长年学习背诵儒家经典的熟练程度。尽管政府不能直接开办许多学校，但官僚职业生平的吸引力、考试的重要性，有助于保证地方私人学校培育人材，提供学生参加政府的科举考试。尽管中国为语言、文化所分隔，但录用考试使用官话，保证了所有的官员可以相互交流。考试制度不仅在没有官方学校的情况下为政府提供了能干的官员，而且还为当地提供了一个追求上进但未能成功的应试者的人才库，这些人都接受了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训练，他们和官员们有着同样的背景和语言，为官员们处理他

^① 这些传统的组织称为保甲，类似的组织是里甲。保甲的成员相互监督保证彼此的良好行为，里甲则负责向官员交纳税收。参见萧公权：《乡村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瞿同祖：《清代中国的地方管理》（Tung-tsu Chü: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under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们治下的地方问题结成了一个有用的联系网络。^①

尽管交通、通讯设施贫乏落后，但高级官员有办法保证地方官员代表帝国朝廷的利益。一个官员只有通过多年的服务验证其忠诚后才可能被委任为地方的高官。他到一个地方，得常给朝廷报告，朝廷拿这些报告和他的前任及巡察的御史的报告相比较，并且和与他官衔相当的其他地方的官员独立呈报的报告相比较。为了限制其和当地人串通合谋违背政府的利益，不仅禁止官员在其家乡的省份做官，并且，一般不允许官员在一地任职超过三年。^②

这样的政府制度对于用有限的权力手段控制大而且相对稳定的社会是适当的，但它严重不适应经济现代化的任务。政府狭隘的见识、实质上的保守思想使它不能发动或指导现代的发展，它脆弱的权力迫使它遏制竞争。即便是希望变革的官员也只能是阐述他们的方案、理想，因为他们缺乏实行改革的组织基础。

不同地区间的联系、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对于现代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权力基础脆弱的官僚国家视之为威胁。有选择地阻挠困扰、公开抨击那些有可能成为反对力量集聚点的精神上、组织上的领袖，通过这样的机智政策，政府遏制了对其权力最严重的挑战，但这样也扼杀了其现代化的潜力。独立的财富积累常受到寻求税源的官员的侵害，尽管与一些官员串通一气可能会是短暂的商业成功的捷径，但官员的轮换使这样的串通合谋不能持久，也使对基础产业的投资无法获得长期的回报。从长远看，商人们发现，与买官或是为其子女提供传统的经典教育为做

^① 接受官方传统训练的地方的文人学士并不是正规的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但通常在其所在地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声望。这类学者官员倾向的地方领导人是西方学术感兴趣和讨论的对象。如张仲礼：《中国绅士：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i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费孝通：《中国绅士》（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② 关于传统制度的不同描述，参见赖肖尔、费正清、克雷格：《东亚文明史》两卷本（Edwin O. Reischauer,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M. Craig,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2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8, 1965）；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trans. H. H. Gert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斯普林克尔：《满洲中国的法制》（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2）；巴拉兹：《中国的文明与官制》（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官铺路相比，投资于产业扩张无利可图。但这样的教育，假如不能使他们做官，也不能使他们从事于企业商业活动。总之，传统的政府更多是妨碍而不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个制度精致且整合完美，但却严重地不适应现代社会，难以过渡为一个更具活力的政治结构。

混 乱

向现代工业时代过渡时，那些已先从封建制度过渡到官僚体制的国家落后于新近才过渡到封建制度的国家，这似乎是个矛盾。封建国家过渡到现代的优越性在于其地方社区高度稳定的政治组织。像西欧、日本境内的一些小的独立的封建国家，由于其牢固的基础结构，使之能够引进新的技术、教育来发展产业，而在中国，政府组织对地方社区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在封建时代的西欧，独立的城市是新的发展的中心，而在中国，超越于乡村、邻里之上的基础结构为政府官僚体制所监督、遏制。当西欧、日本的一些封建小国联结为民族国家时，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结构。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有效地削弱了地方社区稳定的基础结构，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动者只能从头开始创立地方管理的基础结构。

从19世纪末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上反反复复地失败。即使在帝国的权力处于巅峰的时期，泛政治组织填补了地方社区内部和地方社区之间帝国政府下层的权力真空。帝国政府在兴盛时期，可以控制、限制这些组织，但在19世纪帝国政府衰败时，这些组织变得强大而大胆。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结果，业已存在的泛政治、泛军事组织开始扩张，新的组织到处涌现。随着组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更为成功的军事领袖手中，豢养军队的“军阀”成为政治机器，他们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培植小的掌权人，和其他地区的军阀结盟。军阀个人引进改革，并试图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的军事努力要求加强征税、征兵和对反对派的无情镇压，这一切限制了他们的声望及其对政治合法性的诉求。因为国家广袤、军阀众多，他们无耻的野心使武装冲突几乎

连年不断，因而无法达到稳定的权力平衡。

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前叶，国民党领导了统一国家最成功的奋斗。在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创办了一所国家军事学校，成立了现代政党组织，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情感。他们的军队北伐，暂时统一了国家，在温和的军事成功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然而，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军事支持的基础，国民党实际上受惠于商人与军阀，因而丧失了实行他们所倡导的许多改革的力量。他们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丧失了绝大部分民众的支持，重新统一国家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的兴起

1927 年，当共产党首先想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时，遭到了国民党的驱逐，并几乎被摧毁，这是个不明智的计划。但反复的失败使他们尝试另一种模式，它最终导致了更为根本的制度变迁。在城市夺取政权尝试的失败，这使他们转向农村和山区。国民党和军阀并不能控制中国全部，这使共产党能够在割据的“根据地”建立其地方基层组织，通过土地改革、减租，而获得当地农民的支持。在根据地的漫长岁月中，共产党逐步从全国各地吸收士兵和党员，在长期的训练后，这些人被派回其家乡发展他们的政治网络。

和俄国的革命者相比，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的过程更为漫长，更为艰苦。布尔什维克通过突然的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长期、激烈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一点一点地征服了全国。因为中国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在创造中获得政权，以在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治结构为依托，并逐步把它推广到全国。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改朝换代。每次都先是敌人被打垮，疆界恢复，权力巩固。一旦掌权，新王朝的创立者着手简化、改革规章制度，革除官僚的恶习，录用能干而忠诚的新人。早期的共产党人完成了这一切，并且做得更多。新王朝依照帝国的体制运转，他们依赖传统的政府机构和儒家哲学。儒学，体现着传统的贵族统治的理想、和谐、尊老和

修身养性。1949年，一种来自外国的崇尚斗争精神、劳动光荣、尊重工农、有意识的行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儒学。新的结合有赖于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的基础和更为雄心勃勃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理想，而对革命斗争的广泛参与使之成为可能。

普遍而强烈的痛苦和不满情绪激起了广泛的参与。在20世纪初中国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人们拥有或获得权力并不是因为德行，他们用一切手段毫无顾忌地追求私利。因而，和更为稳定的社会中有德行的领导人相比，穷苦的人更容易和他们的领袖产生分离，但这种分离并不是自发的运动，而是职业革命家领导的结果。革命者的热情不是建立对客观现实的描述或对未来能力的保守估计之上。他们通过有效的宣传机器，以个人的经历来说明中国困境的原因，礼赞普通人，激起普通人对未来的梦想来煽动其激情。

从本质上讲，革命的热情是建立于短暂的情绪兴奋之上而不能持久的。因而，当共产党掌握权力时，他们必须把热情转化为严格而有效的组织。当共产党面临曾倾覆他们前任的严重问题时，1949年高涨的乐观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被搁置于一边。在本书中，我将描述共产党在以革命的热情和乐观主义灵活地创建新秩序时，他们在头二十年中是如何统治管理的。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头二十年中，共产党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从而统一了国家，控制了社会，开始了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物质生产。这些是其领袖最为关心和重视的，并且是理解他们经常变动的目标和狂热行动的意义线索。

为了建立可行的政治秩序，他们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如何转换革命作风以适应复杂的管理任务？在掌握权力时他们如何克服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混乱局面？他们如何重新组织城市的生活，平息农村的混乱？他们如何控制经济，为经济发展制订计划？他们如何处理广州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为了长期的目标而暂时牺牲群众的利益时如何保持群众的支持？他们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们应怎样处理商人和知识分子离心的问题？如何处理

过于中央集权的僵化和强硬的政治控制？如何应对经济管理中的错误？如何克服自私冷漠和道德沦丧？这些是共产党的领袖关心的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负责广州和广东省管理的官员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待这些问题。这些官员处于来自北京的指示和广州城乡的现实状况之间。在他们来广州工作的故事开始前，有必要弄清他们来到时广州的情况。

第一章 共产主义前的广州

“广州人……性格顽野倔犟……早在汉、唐以前，这里一片蛮荒，这里的人许多是从北方涌来，他们彼此毫无关系、居无定所。”^① 19世纪一位北方人这样说。在北方人的心目中普遍存在广州人文化落后的观念。即便是热爱乡土的广州人也不得不承认北方平原的文明在扩展、传播到广州和广东其他地方之前已高度发展、繁荣。

南方边疆

至公元前8世纪，居住在广东的土著部落有苗族、黎族和瑶族。这些土著人被文明程度更高的北方人驱赶到边缘，至今，在广东的西北部特别是海南岛还可以发现他们的遗迹。南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败的部落、国家或政治派别南逃的历史。公元前775年，姬姓部落的一部分从长江流域迁移到广东，他们带来了定居的农业文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广东最大的一支文明部落是壮族，他们明显是从西边迁来的一支傣族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国成功统一全中国、建立官僚体系的国家之前，壮族及其后裔——越人一直在广东居统治地位。但到了公元前111年后，汉朝完全征服了越人，将其组织到汉朝的地方政府体系中，才使广东地区处于北方的牢固控制之下。

北方的汉族人同化了当地的越人，由此所致的融合形成了现代广州文化演进的基础。从北方穿越山区来到广州的道路艰难曲折，直到最近

^① 托马斯·泰勒·米都斯：《中国人及其叛乱》（Thomas Taylor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Stanford: Academic Reprints, originally published, 1856），第87页。

几个世纪之前，南迁相对来说并不频繁。^① 因此，广州文化不时为来自北方的以及外国商人带来的新因素所丰富、充实，但它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它有自己的语言、文学、音乐、习俗及认同感。

地理环境

越过位于亚洲大陆东南角的广东西北部的山区，南迁者发现了高产的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除了长江、黄河流域，珠江水系形成了比中国其他地方都要富饶的肥沃地带。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广西两省之间延伸的开阔平原的东南端。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城一直是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同时也是广州府的所在地。广州是 Canton 的中文名，在 16 世纪，由于外语中对广东这一名字的讹用，在西方语文中将广州命名为 Canton。

直到 1936 年连接广州和武汉的现代铁路粤汉线通车前，主要的交通运输线路是水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铁路运输才比水路运输更为重要，1956 年，32% 的货物装卸还依靠水路运输。数条大江在广州的汇合使广州成为沿江以及 1 500 英里的沿海地带唯一的出入口，广东的海岸线占中国海岸线总长的 1/4。汇合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西、北、东三条大江总长约 1 200 英里，珠江及其支流的水量为广东地区水量的将近一半。三条大江中最长的西江由几条小的支流汇合于广西的梧州而形成，西江和北江在广州西北部 30 英里处汇合，而后分成许多支流，其中包括流经广州城中的珠江。在广州城东 10 英里处，东江汇入珠江，而后流入海湾。西江可以航行 2 000 吨的船只，北江、东江可以行驶较小的沙船，广州便利的交通使其可以通过水路通达省内的大部分地方。珠江口西南角 65 英里处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其东南角广州以南 75 英里处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

由于其中心位置，广州一直是重要的政治中心，是府衙，有时是省府的所在地。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时期，两广总督统辖广东、广西，巡

^① 关于南移的历史，参见哈罗德·韦恩斯：《中国向热带挺进》（Harold J. Wiens, *China's March towards the Tropics*, Hampde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54）。

抚分别管制广东、广西。根据传统的模式，1949年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南方局第一书记负责管理广东、广西，省长分别负责广东、广西两省政府。1961年，中南局重组，广州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整个中南地区的首府，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河南，总人口接近两亿。

广州交通便捷，早就成了对外贸易的中心，几十年来，中型的远洋船只已可以停泊于黄埔港。近一个世纪以来，使广州成为可以进出最大型远洋船只的现代港口的计划一直在讨论中，但由于淤沙问题严重而没有实现。1949年前，广州可以停泊5 000吨的大船，共产党将其扩大到1万吨。因此，广州已成为连接内外贸易的重要门户。

珠江流域由于富饶肥沃，养活了大量的人口。但在19世纪，广州地区的人口增长和聚集已超出了广东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必须进口粮食。大量的水道、充足的降水、温暖的气候有利于水稻的种植。20世纪50年代中期，可耕地的2/3是水稻田，1/3是旱地，水稻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五4/5。温暖的气候使广东在中国其他地方普遍种植双季稻之前早就双季种植，并且，广东双季种植的比例比其他任何省份都要高。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问题不是缺水，而是雨水太多，水灾频繁。年均降水量75英寸，一年降水100英寸也很平常。过度雨水的危险最大是在八九月份，一场台风24小时内降水可多达12英寸，对农作物造成严重危害。水患的严重性使国民党及后来的共产党在接近北江、西江源头的山区建筑水坝。持续的问题使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堤坝，特别是在1961年后，引进了大型的水泵站系统用于排灌。但流入三角洲最长的西江要流经几百英里非常平坦的地带，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望靠建设水坝来消除水患。

广州位于北回归线以南20英里，夏季平均气温83华氏度，平均相对湿度89度。冬季温暖，几乎无霜，平均气温48华氏度，可以长年出产应季的蔬菜以及香蕉、柑橘、菠萝等亚热带水果。雨水充足，池塘众多，很适于养殖广东人所喜爱的鹅、鸭，鸡和生猪的产量也很大，但因为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较小，限制了大型牲畜的增长。在三角洲的许多地方，生产两熟稻谷的水田在冬季被放干，用来种植第三熟，通常是种植马铃薯。

三角洲地区大约 2/3 的地方是地力肥沃的冲积土，但在省内的其他许多地方则土地贫瘠，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土壤酸性，缺乏有机质，钙、镁等矿物质已被冲刷走，肥料难以改良天然的不足。尽管三角洲地区富饶肥沃，但省内其他地方产出贫乏，大米的种植面积被经济作物所取代，人口日渐增多，20 世纪初以来，粮食短缺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尽管三角洲水患严重，省内其他许多地方水量却太少，严重干旱的年份，粮食短缺的问题则更加严重，1943 年因当时交通运输设施运力不济，广东西部发生了大饥荒。

三角洲地区的肥沃土地以及商业机会为其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奠定了基础。1949 年，仅广州的人口就超过 100 万，三角洲人口的 60% 大致集中于广州，以及三水、顺德、佛山、江门、石岐和惠州等城区。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1953 年，三角洲地区每平方英里人口 1 700 人），为了服务于当地人口，三角洲的许多地方种植蔬菜、水果、茶叶、花生等经济作物。1953 年的人口调查中，三角洲农业人口平均每平方英里 16.5 人。尽管广东的许多地方人口稀少，1953 年广东人口总数却达 3 670 万，占全国 6.1% 的人口生活于占全国面积 2.8% 的土地上（人口资料见附录 B 表 1、表 2）。

蔬菜、水果的丰富充足，促成了食品加工业，它不仅供应三角洲地区、香港，一些产品还用于出口。如 1956 年，地方工业产出中，食品工业占 42%，纺织工业占 12%，机器和金属业占 11%。广东是最大的水果产地，一些水果用于出口。其土壤、气候也有利于种植纤维类作物，如大麻、黄麻、亚麻、棉花，这些作物可以支持适量的轻工业；广东的西南部是中国稀少的橡胶产区之一；广东还是中国最大的蔗糖产地，1954 年，中国 40% 的糖产于广东。沿海的盐田可以供应食盐出口和满足当地的需要，但盐田少得可怜的回报已迫使人们想把它们变成农田。广东北部大量的森林造就了中型的造纸工业，但森林储备的逐渐消耗使共产党必须在广东实施大面积的森林再造计划来保障木材供应和进行水土保持。^① 广东海岸线漫长，有沿海小島 730 个，大量的淡水池塘使广东成为

^① S. D. 理查德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森林》（S. D. Richardson, *Forestry in Communist Chin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中国最大的渔业产地，渔民人口超过 50 万。三角洲地区有许多人生活在船上。

适度的资源使广东可以发展水泥、玻璃以及砖材等工业。20 世纪早期，三角洲地区丝绸业发达，但后来随着世界丝绸业的大萧条而衰落了。广东确实有一些矿藏，如铁、锰、钨、钛、锡、铋、金、银等，但这些金属不易开采，采矿设备也不发达。日本人曾在海南岛开采铁矿石，但日本人走后，当地人并没有积极开采，尽管在“大跃进”期间曾试图恢复。但原煤的严重短缺抑制了广东重工业的发展，中国运输设备的限制使广东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获得大量原煤。

20 世纪，广州人曾一再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中心。他们制订了一个又一个方案和计划，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公路，建立电厂，开发矿藏，来促进工业的发展。然而，把广州建成工业城市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在共产党到来之前，这里经常性的政治动乱足以使中外商人对长期建设和工业发展项目的投资沮丧、失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而不愿冒投资于不确定的长期发展的风险。确实想投资于工业的华南地区的中国人被吸引到香港，因为那里政治更加稳定。1949 年共产党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些广州工业化的旧梦有可能实现，可梦想很快由于新的原因而再次被推迟——因为国家对经济布局的优先选择，共产党担心其军事方面的脆弱，以及这座城市的“资产阶级”本质。^①

商业传统

广州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当时一小部分罗马商人来到广州。唐朝（618—907 年）时，许多阿拉伯商人定期来广州，不仅和东南亚，而且和中东地区有相当规模的贸易。广州东部有一个小镇还

^① 关于广州地理环境更全面的描述，参见梁仁采：《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孙敬之编：《华南地区经济地理》（北京，1959）；《珠江盆地经济地理》，见《地理知识》第 5 期（1959 年 5 月 6 日）；西奥多·沙巴德：《中国改变的地图》（Theodore Shabad, *China's Changing Map*,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6）；《Nagel 百科全书，中国部分》（*Nagel's Encyclopedia-Guide, China*, New York: Cowles Education Corp., 1968），第 1170—1207 页。

以“波罗”命名，以纪念马可·波罗的到访。广州的贸易经历过盛衰起伏，但在南宋（1127—1279年），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角色被福建泉州的阴影所覆盖，因为泉州更接近都城杭州。12世纪后，阿拉伯商人失去了组织远洋航行的能力，广州的对外贸易急剧衰落，直到16世纪西方人的到来才重新恢复。^①

在这几个世纪中，广州人非常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而与外国人保持了尽可能少的人身和文化接触。葡萄牙人作为首先到广州进行贸易的西方人，早在1517年就抵达广州，但未获准住进广州。直到1557年，当地的官员觊觎贸易的丰厚利润，作出安排，使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葡萄牙人在澳门附近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接触广州居民的危险。

当英国人第一次到达广州，他们在作贸易安排以把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也遇到这样的困难。直到1685年，康熙皇帝已牢固地统一了帝国，才开放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1757年，乾隆皇帝将所有的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使外国人远离京城，当时英国人是主要的贸易力量。从1757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经过广州，这是一种特别而经典的贸易繁荣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在从事大量而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的同时，极大地限制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接触。外国人只能和官方批准、许可的代理人——十三行进行贸易往来，十三行组成一个垄断性的行会组织——公行。外国人不仅不允许进入广州城，而且被限定在特别规定给外国人的地点——“商馆”。即使在商馆，外国人也只有在贸易季节才可以停留，只有某些中国人才被允许进入商行代理处所在的区域。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曾被禁止学习汉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指定的翻译员来工作。尽管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交往接触受到限制，但大量的丝、茶、瓷器从中国内地运来出口，进口的货物如银锭、武器、弹药、玻璃等从外国的船上卸下，贩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②

^① Edward Bing-shui Lee: 《近代广州》(Modern Canton) (上海: The Mercury Press, 1936); Ng Yong-sang: 《广州: 羊城》(Canton: City of Rams, Canton; M. S. Cheung, 1936)。

^② 关于广州的西方贸易的经典研究，参见马士: 《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3 vols. Shanghai, 1910-1913); 斯坦利·莱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Stanley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illiam Mullin & Son, 1950); 费正清: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英国人发起鸦片战争是为了取消贸易上的限制。在特别的条约安排下，他们成功地打开了几个新的口岸，即使在打败中国人后，他们仍不被准许进入广州城。直到1857年，外国人才实际上进入了广州城，而后只作比例上的限制。然而，外国人获得了胜利，他们就自动和广州的其他地方分隔开，他们将珠江中的一小块平坦的沙地变成一个小岛——沙面，他们在沙面建立商馆、住所。1932年的数字可以显示进入的外国人对广州日常生活影响的程度，当时，外国居民人数接近其高峰，在这座人口过百万的广州城中有外国居民894人，并且大部分住在沙面。^①

广州人和西方人对他们各自传统的自豪感，以及和外国人的分隔降低了西方对当地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广州方方面面的大量描述，反映了西方人不能超出肤浅的观察及自己生意上的纠缠去理解中国的商业制度，更不用说其社会生活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样，大部分广州人对西方夷人的社会生活也没有一点好奇心。

中国人无疑正确地估计到外国的渗入将会削弱中国摇摇欲坠的政治结构。和中国人接触的少数西方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当地人团结一致抵抗他们的入侵^②，后来促进了异端思想的发展。外国的影响是半宗教的革命组织太平天国的思想来源之一，太平天国的领袖来自广州附近。外国的思想使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广州人深受触动和启发。

脆弱的政治结构还使广州沉沦于所有汇聚临时来访者的大贸易中心都有的种种罪恶之中。广州成了卖淫、赌博、鸦片的中心，在高度商业化而几乎没有政府控制的环境下，为了给西方的水手、商人及中国商人提供机会，这些罪恶以空前的规模发展、增长。

对外贸易还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为了满

^① 《广州指南》（广州：广州府，1934），第16页。

^② 参见魏斐德：《大门外的陌生人》（Frederick Wakeman, *Strangers at the G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易劳逸：《中法战争期间广东的排外骚乱》（Lloyd Eastman, "The Kwangtung Anti-foreign Disturbance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Papers on China* 13:1-31,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59）；爱德华兹·罗兹：《广东的民族主义和仇外》（Edwards J. M. Rhoads,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Papers on China* 16:154-197,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2）。

是对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小物件的需求，手工作坊大量涌现。然而，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挥霍于富有商人精致讲究的生活中，或是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对外贸易的一个间接但同样重要的结果是广州人的海外移民。一半以上的海外华人来自广东。尽管早在和阿拉伯贸易的时代以及明初中国人的海上探险时期，中国人就到达东南亚各国，但在清初的大部分时期，移民是非法的，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新的机会以及日渐增加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到广州的外国商人为了他们的海外企业而吸收劳工。和到东方的西方人不同的是，广东人并不是为不安分的探险精神所驱动。大部分到国外学习的中国人来自广东^①，但只有极小部分广东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其教育。绝大部分移民到国外并不是想游览或学习，而是因为他们贫困，想挣钱带回去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②因为很少有妇女移民海外，大部分男人保持单身或是返乡结婚。在海外，中国人仍然生活于相对隔离的社区，在那里，他们仍沿用自己的语言和习俗。移民们仍心向中国，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移民，而且认为他们的后代也是中国人。与其他到美国的移民的后裔如美籍意大利人、美籍爱尔兰人或是美籍日本人等的第二代不同，中国人的后代是“海外华侨”。

共产党把 1/5 的广东居民划为“海外华侨”，因为他们曾生活于国外或生于国外，或是获得海外亲人的经济支持。海外华侨带回广东的更多是财富和物质生活舒适的东西，而不是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社会生活。散布在广东广大乡村地区，那些生活更富裕、祠堂更堂皇、房屋和公共建筑更精美的村庄都是和海外华侨保持特别紧密联系的。少数华侨信仰了外国宗教，放弃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到来对外国的技术、科学研究的精神、对现代专业组织以及对外贸易出口都作出了贡献。不管他们如何或为什么而移民，生活在东南亚、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华侨很快成了当地的商业阶层，这些中国人和他们在广东的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络，使广州当地的商人无须和西方人接触就可以开展

^① 罗香林：《香港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东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1964）。

^② 参见甘瑟·巴斯：《苦力》（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对外贸易。

尽管广州人、北方人、外国人对于“广州人的性格特征”可能观点不同，但对于这些性格特征的本质都有一个普遍一致的看法。广州人有一致的思想、感情模式，这一模式源于他们长期的商业传统。广州人是善于处理世俗事务的人、精明的讨价还价者，长于技术，批评直率，勇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敏捷、活泼，擅长掌握新的技巧，但这些技巧总的来说是商人的技巧、小手艺人的技巧。他们是长于为自己的利益而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者，而不是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尽力而为的有组织的人。上海成了大型工商企业的中心，而广州仍然是独立的小商人、小手艺人的大本营。

广州人以他们的聪明、敏捷、世俗务实、技术技巧而自豪，而北方人、外国人则批评他们自私、急躁、粗鲁、缺乏节制。共产主义改变了其表达自豪和蔑视的词语。北方人开始称呼广州人是资产阶级，而上海商人则称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相比之下，上海是更为高贵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主义下，广州人不可以强调其资产阶级的本质，但他们强调他们“更先进”，更熟练地掌握科学技术，因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虽然共产主义改变了争论的词语，但改变不了长期的商业经验对广州人的深刻影响，以及广州人和北方人之间的相互情感。

广州人的多样性

就像广州人趋向于把所有的外来人称为“北方人”或“外地人”一样，外来人也笼统地把当地人称为“广州人”。事实上，广州人的组成是多样的，他们彼此不懂对方的方言，习俗差异也很大。由于他们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方移民潮，差别很大的广东乡村并没有为同样的大众教育、大众传媒所覆盖，结果，广州人习惯于多样性，即便没有西方人，广州人也是世界性的。

尽管从北方来的一些移民最后同化于当地人，但有一群北方人——客家人，仍保留着明显不同的生活习惯。客家人早在4世纪就从北方平原开始向南移，后唐时他们向南到了福建，在南宋（1127—1279年）和

元朝（1271—1368年）时，一些人移到了广东的东部。尽管这些在广东的客家人逐渐吸收了广州文化的因素，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因为早期的移民及其后裔已定居于最肥沃的河谷地带，较为弱勢的客家人大部分住在山区，比较贫困。^①

17世纪后期，清初的统治者出于安全的考虑，肃清广东沿海，许多客家人移到广东西部，和当地人的冲突特别严重，偶然的小冲突往往引发大规模的战事，太平天国就主要是客家人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尽管太平天国发起的战役大部分不在广东，但与此同时（1856—1862年），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战斗非常普遍，估计有50万—60万人被杀。^②现在广东的100多个县中有15%，主要是山区，几乎全是客家人，另外50个县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大部分年轻的客家人讲广州话和客家话，尤其是在广州地区，客家人被迫和广州人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虽然客家人和广州人彼此通婚，但两者中的许多人都不赞成。尽管其他的广州人认为客家人贫穷而少有文化，而客家人自己却认为他们是更为讲究、更为精明的北方人。

尽管客家人是广东人中最大的一支少数民族群，其他的人和广州人也不相同。讲福建话的人和福建附近的人口有关，他们长期占据广东东北部的韩江地区，靠近古城潮州（因此通常被称为潮州人），新来的人则在汕头附近。汕头发展迅速，鸦片战争结束后成为通商口岸。此外，几百年前，一些讲福建话的人从这里移民到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因此，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的语言、文化密切相关。最近以来，作为城市化大趋势的一部分，大量的潮州人和讲福建话的人来到了广州。

清朝时代，许多满族士兵为检查地方军事力量而来到广州。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许多满族士兵和他们的家庭留在了广州。但直到1911年，才允许他们和广州人通婚。自此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互通婚，融入了当地人口之中。尽管许多人还继续说满语，也没有广州口音，但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讨论》；哈里·法兰克：《穿越华南》（Harry A. Franck, *Roving through South China*,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op, 1925）。

^② 罗万（音）：《19世纪中叶广东的械斗》（Lo Wan, "Communal Strife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Kwangtung," *Papers on China* 19:85-119,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5）。

实际上他们已部分同化于当地人。

一些几百年前来广州的阿拉伯人和当地人结婚并留在了广州，许多人已同化于当地人，但中国共产党曾统计出广州大约有3 000名伊斯兰教徒，主要是早期阿拉伯商人的后裔。

尽管有一些客家人生活在船上，但还有一种与之不同的船民——疍家。虽然现在疍家人讲广州话，后来共产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安置于岸上，但他们仍保持相对独立，与其他人群不同。虽然没有清楚的证据说明其来源，但有些人认为他们和蒙古人有关，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马来人和广州人的混合。^①

中国的人口调查资料没有明确人们的种族背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资料，广东3 200多万人口中，当地汉人2 500万（主要是广州人和潮州人），客家人400万，疍家人300万，黎族20万（主要在海南岛），瑶族10万。^②

实际上这些人在体质上并没有多大不同，和非中国的文化相比，其主要群体（广州人、客家人、潮州人）的文化差异也不大，但“对于小差别的自我陶醉”使群体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大部分少数民族群的年轻人讲广州话，它成了广东的混合方言，普通话和当地的方言在官方学校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但潮州人、客家人以及讲普通话的人在家里仍继续用自己的方言。

除了这些主要的族群外，即使在广州人本身也还存在更深一层的语言、文化障碍。因为，许多村庄、小镇和附近社区相对分离，在几个世纪中，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习俗。例如，四邑（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县）人，尽管和广州相距不远，但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方言，一个普通的广州人几乎不可能听懂。

在农村地区，这些人常常是彼此相对分离的，在广州城这样一个融合周围地区的熔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相互影响。在广州，除了通常住在岸上而从事捕鱼业的船民，少数民族群的人一般没有明确的住处和职业

^① Wu Yueh-lien:《山南的船民》，《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期，第613—665页，1936—1937年。

^② 《南支那年鉴》，1939年，第59页；《广州史》，1940年。

的分隔。在广州，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和他们当地兴起的特殊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某些饭店，如潮州饭店与广州当地的饮食风味特色大不相同。客家人喜欢当兵、从事建筑业。彼此的障碍并不能妨碍他们寻找喜欢的职业、住在哪里及相互通婚。这些障碍并不是刻意维持着，但对于同一背景的人，友谊和信任要容易得多。

因为丰富的多样性，“广州人”一词也有多种意义。对于非广东人来说，广州人有时就意味着广东省的人，但更普遍地说，广州人是指享有帝国时代广州府 14 个县的语言、文化的人。由于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有这种文化，因而，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但对于纯粹的广州人来说，客家人、潮州人还不是广州人。

市政当局：现代组织的构建

与 12 世纪后欧洲繁荣的独立城市相比，广州直到 20 世纪仍然是国家管理机构的一部分，但没有明确哪级政府来负责市政管理。在帝国晚期，有好几级政府的衙门都在广州。总督及其下属人员管理广东、广西两省；巡抚及其下属人员则只负责管理广东一省；粤海关监督（外国人称之为 Hoppo）及其下属直辖于北京，是独立处理外国人和对外贸易事务的当局；广州府衙负责管理广州附近的 14 个县，还有两个县衙——番禺和南海，广州是其中一部分；还有驻军和驻军提督（a garrison commander）。然而却没有单独的市政府。

两个县的管理当局负责市政事务，但只是监督征税和维持治安秩序而已。为了维持治安，县令将广州分为 36 个区。20 世纪初以后，他们向每个区派出警察，督促邻里相互监督、举报非常事件。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帝国政府开始承担一些急需的城市建设项目，但这些开创性的努力规模太小，为时太晚。

由于缺乏更为积极的政府，几个世纪以来，一些私人邻里组织、行会、宗族组织、乐善好施者以及同乡组织承担了城市事务的责任，在西方城市这是市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些组织，在强大有力时，他们为其成员的小孩捐资办学，主持法庭审理违法乱纪的案件，并提供健康、福利、

婚礼、丧葬等服务。行会形成了自己的度量衡标准，决定街道的位置，并组织救火消防队。这些组织规模有限，也没有上级机构监督他们的行为。

直到共产党接管之前，这些在广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并不是追求具体经济目的或政治目的的特别组织，而只是基于同乡、同校或同姓等广泛的私人联系。行会关心经济事务和行会成员广泛的个人事务。即使是在较大的商业组织中，个人的关系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大部分商业机构没有大量的专业的、有技术的或从事管理的人员，即使雇用这样的职员，也不是单纯地根据是否能胜任，而是根据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简单地说，商业机构中的人员有两层，公司中的高层人员和老板有着血亲或友谊的关系，而低层职员因为不是通过亲密朋友的关系雇用的，所以不被管理方信任，只给予很卑微的职位。

20世纪初，一些基于亲戚朋友关系的团体开始转向更专业的组织。一些杰出的商人团结一致成立商会，为他们各人关心的经济问题提供急需的协调。尽管商会承担了超出西方城市商会所担当的政治责任，但西方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更积极，商会是一个更为专业的经济组织。同样，政治团体基本上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组成，这时也开始扩大其网络，吸收来自其他地方而目的相近的人。例如，尽管孙中山早期创建的革命组织几乎全是广州人，但孙中山在日本时，联合了来自湖南和其他地方的人一起进行政治讨论，后来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总而言之，团体组织不再只根据地方上的广泛联系，而是根据具体的政治利益。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动乱，对任何想根据专业能力来吸收新成员的组织的接受能力作出了严格的限定。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一个适当的可以共同接受的习俗、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人们不能寄托于主要根据能力而雇用的人的帮助。在这样一个秩序和道德已经崩溃的国家，没有“君子协定”或可接受的游戏规则来缓和极度的竞争。可以理解一个组织的创立者希望新成员和他有特殊的私人关系，以防背弃和叛变。因此，组织不可能建立科层制的人员结构，根据能力录用新成员，指派具体的职责，依据其表现而提拔。

20世纪初，广州建立官僚科层结构取向最严肃认真的尝试和最重要的制度突破是在1921年成立了市政府。当广州市政府成立时，中国的许多城市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但广州市政府选择这个时间成立，是由于决定推进一项长期拖延的工程：拆除城墙。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广州的城墙重建过许多次，最后的一次修建完成于明代，大约是1380年。1563年，城墙向南扩展，包括了所谓的“新城”。1649年，也就是在清初，整个城墙包括了一个大约长2.5公里、宽2公里的地区。城墙平均高25英尺，厚43英尺。包括新城和旧城之间的四座城门，也只有16道城门。^①长期以来，战争技术的进步使这些城墙作为防卫的手段已陈旧过时，1857年英国人和法国人攀越过城墙，已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而对城市中便利交通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必须经过有限的城门出入的妨碍。19世纪80年代，在进步总督张之洞的指挥下，在城墙外沿江地带建设了一小段江边道路，显示出了新路建设的价值。1911年后，孙中山的一些亲密伙伴开始启动一些建设工程，最后，在1918年，他们中的一员——广东省省长胡汉民成立了市政公所，完成了城墙拆除，并建设了新的道路。

尽管较早的时候曾做了一些预备性的工作，但拆毁城墙的主要工作到1919年6月才真正开始，到1921年才完成。因为，城墙由砖石构成，必须一块一块地搬走，工程巨大。虽然通过出卖满族人的资产、把道路使用权出租给香港的公司、要求对财产和税务进行重新登记以及对从新路中获益的地方征收特别费而获得了一些资金，但市政府还得举债来支持这一项目。

曾经是城墙的地方已经建成了新路，这反过来刺激了其他道路的建设。几年之内，广州开始看起来更像一个现代城市。机动车辆的数目并没有陡然增加（12年后，即1933年，广州仅有公私机动车辆890辆，公共汽车103辆），但新的建设确实便利了商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军阀、孙中山、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所引起的混乱并没有阻碍实质性的建

^① N. B. 丹尼斯：《中国的条约口岸与日本》（N. B. Dennys,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857）。

设，正如下面列表的新铺道路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① 这些数字显示了新的意义，因为道路在以后的过程中加宽了。

广州的新路建设

年份	长度 (米)	年份	长度 (米)	年份	长度 (米)
1919	6 678	1925	2 174	1930	23 576
1920	4 215	1926	4 377	1931	26 501
1921	5 865	1927	2 501	1932	26 592
1922	1 612	1928	2 073	1933	18 969
1923—1924	2 201	1929	2 592	1934	4 250

1921年，省长陈炯明^②认为市政建设的进步要求有比道路建设更广泛的项目。孙中山渴望建立一个样板的城市管理来拓宽其政治支持的基础，从而成立了广州漫长历史上的第一个市政府。市政公所曾是负责处理经济支持、监督、计划、财产征用以及城墙拆除、道路建设的行政管理的专门部门，它成了一个核心，围绕这个核心而组织了第一个市政府。除了吸收市政公所的人员，市政府还获得并迅速扩大了警察武装，警察早在1902年就由清政府启动。以前由在广州城内的两个县（南海和番禺）征收的部分税款后来直接转付给广州市。还计划在市中心建立政府大厦。广州市原有旧警察管辖的面积是35 794亩（大约6 000英亩），但

① E. B. S. Lee, *Modern Canton* (《近代广州》), p. 172.

② 关于陈炯明，参见薛君度：《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1878—1933》（Winston Hsieh,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a warlord: Ch'en Chiung-ming, 1878 - 1933", *Papers on China*, 16:198 - 252,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2）。

这将在未来的3年内扩大到92 000亩。^①

第一任市长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学习公共管理，为这个角色做准备。当孙科在1921年初为组织政府而起草当时的市政条款时，他梦想的计划更多的是基于西方公共管理的教科书而不是中国的政治现实。^② 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和教育六个局成立，最初的六名局长中，三人曾在美国留学，两人在日本留学，另一人在法国留学。

广州的现代化是从市政府开始的，虽然市政府幼稚、混乱，缺少资金支持，以及官员的空想不切合政治现实，但它可以提供必需的中枢协调和创始作用。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混乱，但从1921年市政府成立到日本人入侵广州前的17年中，商业、工业和公共服务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1925年的联合抵制之后，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再也没有恢复到抵制前的高峰水平，然而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广州的商业继续繁荣。1921年12月的人口报告显示人口数是788 000人，但到1932年达到1 123 000人。早在1903年已经建立了电话服务，1925年引进了自动拨号系统，尽管1927年的广州公社造成了破坏，然而电话服务继续增长。电力照明开始于1901年，其所有权在英国人手中，1909年转交到广东省。1933年，开办了一家新电厂。第一座跨越珠江的大桥1929年开工，1933年完成。粤汉铁路1936年最后完工，在广州城北的西村沿铁路建成了新的工业区。无线电广播于1929年引进。还制订了港口长期发展的计划。1935年，建成了木材码头和一个新货栈。1931年建成了一个新的过滤水厂。成立了土地局来监督、分配土地的使用，并开办了几个公园。下面的列表关于建设的资料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增长。^③

① 关于广州市政府成立之初最好的描述，参见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广州：商务印书馆，1922）。另外，参见《广州市市政报告汇刊》，1924年。后来的发展综述，参见E. B. S. Lee：《近代广州》，Ng：《广州：羊城》。关于孙中山和地方主义者的不同趋向，参见沃尔特·E. 高莱：《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崛起，1920—1924》，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6年。（Walter E. Gourla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Rising of Chiang Kai-shek, 1920—1924”）

②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广州：商务印书馆，1922）。

③ E. B. S. Lee: *Modern Canton* (《近代广州》), p. 172.

广州 1924—1934 年建筑审批情况

年份	许可数	估计建设成本 (单位: 百万美元)
1924	2 484	-
1925	2 542	-
1926	2 332	-
1927	2 264	4.4
1928	2 540	5.7
1929	4 325	8.0
1930	4 003	11.4
1931	5 292	36.8
1932	5 543	21.1
1933	5 585	25.1
1934	3 241	9.1

教育的发展和建设的发展一样得到有力的推动。专家被派往美国和其他地方学习现代的方法。广州市只开办小学，中学和大学留给省里去办。1928年开办了第一所市中学，到1933年又另外开办了两所。1921年，广州市接管了45所一至三年级的学校，但到1928年，已有67所小学，到1934年有99所。市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从1927年的80万美元增加到1933年的250万美元。虽然广州努力争取，但还不能达到普及公众小学教育水平的目的。

政府行为的扩张、发展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当地人的预期，引起反抗。小商人担心政府的现代工厂可能会将他们排挤出商界，店主、饭店老板反对给他们添麻烦的新公共卫生规定，因为新建设而被迁居的人由于生活不便以及神秘的风水被破坏会给他们带来厄运而产生怨恨。那些想建新房或开新店的人为新的规定要保证私人建筑不影响将来道路的拓宽而困扰。如果街道上的一排建筑物和街道中心的距离相等，那么，新的建筑物也必须和路中心保持同等的距离，但在建筑物和道路中心距离不等的路上，新建筑不可以像现存的靠道路最近的建筑物那样靠近道路中心。

即使靠近道路中心的距离没问题，所有的建筑也必须获得市政方面的预先批准也是件令人讨厌的麻烦事。

为了维持秩序，必须雇用大量的警察以取代传统的邻里和行会自卫组织。警察的费用占早期市政预算的一半，为了把维护公共安全的开支减到最少，诚实正直未经检验、文化水平低下、有时还有特殊习惯的农村孩子被招来做警察，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可想而知。

那些追求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扩张政府活动、城市建设和公共安全的人士必须和开发广州、为军事冒险做准备的孙中山、军阀进行竞争。在市政府成立一年的时候，高级官员的薪水下降了10%，下级官员的薪水下降了20%，除了公安局外，所有的助理局长都被解职。^① 政府不仅加重了居民高额的税务负担，而且实际上征用的财产没有补偿，还强迫富人“借”钱给政府。政府以高标价出售垄断权、种植销售鸦片、转包税收征收权。^② 由于税收和货物的销售一样，不是基于单一的物价体系，税负的额度可以讨价还价和受到操纵。这样的做法产生腐败，不得人心，而政府没有其他办法对付逃税，甚至无法对付拒付电费的行为。由于没有关于收入和商业成交量的适当资料，没有有效的征税基础机构，除了从其触角可及的地方榨取资金外，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一个英国人曾申请开办一家剧院，遭到拒绝，因为根据治外法权，如果他拒绝交税，没有适当的办法给予制裁。在英国领事馆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后，允许该英国人购买了这家剧院，但必须以一个当地中国人的名字进行登记，以负不纳税时的责任。

因为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履行诺言，信任上的分歧导致一些对政府的抵制。例如，孙科曾向因道路拓宽而迁居的人承诺给予赔偿，但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履行诺言。^③ 尽管某个官员是诚实的，但老百姓也无法保证他能长期留任，履行责任。从1922年夏到1932年夏，市长的职位易手12次之多，通常都是战争胜利的结果。

对民众的情感缺少考虑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抵制。1923年，寺院和

① 黄炎培：《一岁之广州市》（广州：商务印书馆，1922）。

② 弗兰克：《穿越华南》（*Franck, Roaming through South China.*）。

③ 同上。

庙宇被认为是迷信的象征而直截了当地被征用了，并设立了小的奖项鼓励民众举报没有申报的寺庙和寺庙财产。寺庙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中标者，哪怕最高的中标人就住在寺庙中。结果没有获得多大的收入，却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市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开支来建立公共厕所，而并没有考虑到缺少公共需求的实际。

广州市政府成立之初是由没有实际经验的理想家来领导的，他们试图把制度化的民主准则和现代工程结合起来，而不愿对实际上的政客作轻微的让步。他们最初毫不理会政治支持的问题，后来却迅速而完全屈服于政治现实，这是他们天真的理想主义的明证。

1949年，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更为全面综合的方案，一个更加巩固的权力基础和更大的动员群众的能力。早期的市政府由于资金有限，缺少市政管理的先例和经验，惰性大，它的目标也是有限的。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商业活动，而共产党以前的市政府只发动了几个专项工程。共产党完全消灭了鸦片和卖淫，而早期的市政府只是限制鸦片的贩运、试图把卖淫限制于珠江的小船上。尽管早期的市政府不是道德或智慧上的楷模，但它建立了市政管理的准则，在教育、经济和公共服务领域创办了拓荒性的基础工程。在1949年共产党到来之前，官员和老百姓都获得了公共管理的经验基础，从而大大地减轻了任务的艰巨性。

1921年建立的政府结构是一项基本的制度革新，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混乱中沿用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在半独立的陈济棠的统治下进入全盛期。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日本人的联络委员会指挥傀儡政府，但政府的形式实质上并没有改变。1945年后，傀儡政府的官员被清洗，但政府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

因而共产党在广州继承了一个稳定的政府框架。这个框架和西方的现代城市官僚体制很相似，但其功能还很不适应。官员通常是对处理公共事务或具体问题缺少经验的书斋学者。他们缺少维持行政独立所需要的权力，最后屈服于把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认为忠诚比个人能力重要的商界、军界强有力的派系集团。政府形式上是现代的官僚科层结构，但其精神则不是。

革命的摇篮

尽管中国没有贵族作为连续性政体的基础，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很年轻的，因为民族国家的意识要求一种觉醒，这种觉醒只有在和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能产生。历史上，中国对周边地区处于支配地位，成为中国人就是成为文明人。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是说采用民族主义形式的情感，它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毫不奇怪，由于和外国人的直接对抗，以及和海外中国人的密切联系，广州首先产生了一些民族自我意识的骚动。从1839年到1927年，广州人实际上处于每次重大的改革和革命运动的前沿。他们的抵抗点燃了鸦片战争的炮火，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是广府人，1898年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康有为是广府人，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也是广府人。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反抗及反抗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应外国侵略而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觉醒，其采取的形式是激烈而分散的反抗，缺少规划和政治目的。到1949年，反抗成熟，一方面有意识地使用群众组织和群众呼吁来很好地组织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建立起组织严密的政党。

到19世纪末，早期组织的对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分散反抗已转变成具体的改革和革命方案。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孙中山是一个怀有梦想和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苏联人的指导下，才开始建立一个更为巩固、细致的组织基础。在认识到巩固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后，他建立了第一所真正的国家军事学院——黄埔陆军军官学校。20世纪20年代，在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他开始认识到群众组织的实用价值，由于这种认识，他和他的伙伴对群众进行系统而有重点的宣传工作。在呼吁群众支持时，排外成了有力的基石，成为形成强有力群众组织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早年困扰孙中山的难题——如何才能既具备有纪律的组织又有广大群众的追随，通过严格的纪律将国民党官员中的秘密精英和下层群众组织区分开来而得

以解决。

1923年，孙中山和共产党结成联盟后，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及其后继者的领导下服务。例如，毛泽东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是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而蒋介石则是校长。

中国共产党开始时是非地下性的政治讨论团体，例如，1920年，军阀陈炯明想领导广东的教育现代化时，他毫不犹豫地邀请已宣誓成为共产党员的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1923—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倾向集中精力于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群众宣传运动。^①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但运动规模不大，不足以支持其他地方的活动。因此，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利用他们认为成熟的机会。从1923年到1927年，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在广州，年轻的共产党人也被吸引而集中于广州。他们还集中于广东东部的海陆丰地区，这里一名富有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基地，这个基地一直持续到1927年。1927年春，国民党回应初期共产党在内部产生的威胁，杀害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则想发动一场起义。考虑到他们地方组织的力量，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广州。^②

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共产党占领了广州市政府，但在3天内被国民党击败，国民党进而处决了几乎所有和起义有关的人。正因为

^① 参见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Ch'en Kung-po,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 Institute, 1960）；韦慕庭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在华顾问文献》（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e,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关于中国最近的历史，参见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O. Edmund Clubb,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关于广州公社的讨论，参见：《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支那满洲》（东京，Shin Kōsha, 1934）；《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Shih Yu-li 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故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瞿秋白：《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28年，未发表资料，见于胡佛图书馆）；关于当时战斗的细节，参见《纽约时报》1927年12月12—18日，20—22日；本杰明·史华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兴起》（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ing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哈罗德·依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广州是早期成功的革命基地，由于广州起义明显操之过急，导致了革命活动实际上的绝迹。1927年后，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其他地方。

然而，共产党组织在广州起义之前吸收的许多广州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得以逃脱，并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广州的共产党人转移到共产党的主要中心上海，或是江西的农村根据地，后来到了延安。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来在广东各地建立农村苏维埃。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海南岛就建立了一个革命基地，一直持续到1949年，虽然有时他们得转移地点以躲避国民党以及后来的日本人。但总的来说，从1927年到1937年，单独的游击队活动是不成功的。

由于日本人对广东的占领，国民党政府转移到粤北山区韶关附近，再到中国的西部，共产党的抵抗运动有了新的机遇。早在1935年，广州的各大学中就有了学生组织。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后不久，学生领袖转到农村，呼唤抗日情绪，成立地方游击队基地。最大的成功是在沿东江的客家农村地区。在这里，山区、水路和靠近海岸为游击队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经过这里的日本人的主要交通线成了有选择的被破坏和袭击的对象。^①

从全国来说，共产党在广东的游击活动，在1937—1949年进入全盛时期。共产党的领导着力于吸引有责任心、有聪明智慧的干部，以及同

^① 关于广东游击队的生活，参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南革命史迹》（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故事》；杨向奎：《红色赣粤边》（北京：国家出版社，1962年）；伊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no. 8: 161~183, no. 9: 149~181 (Eto Shinkichi, "Hailu-feng," *China Quarterly*, no. 8:161~183, October-December, 1961, no. 9:149~181, January-March, 1962)；《海陆丰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华商报》（1949年8月8日、10日、13日、26日、27日、30日，9月30日）；《不倒的红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南方日报》（1951年7月1日，9月3日；1953年5月29日；1957年7月15日）；《群众》（香港，1947—1947年）；《正报》（1946—1948年）；《香港大公报》（1957年8月11日）；《当代背景》no. 103 (*Current Background*, U. S. Consulate, Hong Kong)。关于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经典叙述，参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关于共产党在中国西北的其他记述，参见查尔摩斯·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权力》(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唐纳德·G·吉林：《农民民族主义》(Donald G. Gillin, "Peasant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269~289, February 1964)；马克·A·塞尔登：《延安共产主义》(Mark A. Selden, "Yenan Communism" Ph. D. Dissertation, Yale, 1967)；关于华南早期的农民运动，参见罗伊·霍夫海因兹：《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农民运动》(Roy Hofheinz,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Peasants Movement*, Ph. D. dissertation, 1968)。

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共产党所用的“干部”一词指他们的组织分支中的国家官员，干部不必是党员，“干部”一词口头上的意思是任何管理者，他们甚至不为国家所雇用。）他们吸收农民参军、入党，和农村的贫农组织建立联系。他们种地、开办小型工厂生产必需的物品。他们向日本人、国民党渗透，以防其意外的袭击，并获取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他们寻求富人的捐献，但捐献和被迫交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他们毫不犹豫地越界过线。他们还果断地没收“不义地主”的粮仓，或“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财物。广东的游击队根据地和北方主要的根据地相比是很小的，北方的根据地不仅更大，而且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政府系统、学校 and 小型工厂。和北方游击队一样，广东的游击队已习惯于长年在山野流荡，崇尚艰苦朴素、反对官僚主义。游击队的生活高度注重安全，自我牺牲、英勇无畏、献身奉献的品质比行政管理、技术或文化事业上的技巧要重要。这样的经历并不利于他们为在1949年后所面临的任務做准备。

即使在游击队权力的巅峰期，共产党争取群众支持的努力也为其力量的现实所限。因为过于广泛而直接地宣传共产党是危险的，会引起日本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对游击队基地的注意，可能会招致袭击和清剿。因此，共产党保持小而秘密的组织，而群众处于革命运动的外围。游击队运动由受教育的、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的革命家领导，而一般的成员则通过值得信赖的亲戚朋友的介绍而被吸收。

可以肯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香港，由于英国人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可以直接公开发行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但主要不是以共产党或是共产主义方案的名义，而是以统一战线的合作者的名义，向广大的民众进行呼吁宣传。他们选择抗日爱国，以及后来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迫、地主的剥削、官吏的无道作为主题，这些主题撞击了民众的心弦。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政治和经济的混乱所扰乱，而权力和财富却到了狂妄自负的军事冒险家和无耻的商人之手，掌权者对一般的民众少有善行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因此不难发现有不少虽不参加革命却能接受革命运动的同情者。

在广州公社的痛苦经历后，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革命而谨慎

的。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尽管共产党在北方开始赢得有意义的胜利，华南地区的共产党仍不敢冒险过早露面。他们继续偶尔用游击队的袭击和不停的宣传来骚扰国民党，但并不进行公开的战争。有一小股东江游击队去北方加入了主力部队，而大部分地方武装在等待时机帮助解放广东的主力部队。

到1948年末，共产党军队在北方赢得了几场决定性的战役后，国民党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然而直到1949年初或年中，共产党的军队才大举快速南下。一旦这一局面明朗，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统治就崩溃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迅速赢得对共产党的胜利，而牺牲了健康、长期的经济、政治政策。由于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而在战争中陷入困境，国民党失去了对民众、经济，最后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的统治。在广州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中，国民党政府大体上成了一个发布空头命令的政府，其领导人发布虚伪的计划方案的通告，对官员提出道德要求，宣布解决日益严重的黑市、勒索、走私、通胀、低工资、卖淫等问题的新计划。

国民党开始时的革命热情反映了其致力于中国富强的决心，但由于没有巩固的组织基础，它的宣言越来越成为脱离现实的幻想、空话。^① 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的革命家能否从国民党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① 关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日子，参见鲍大可：《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的中国》（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1961）。

貳

建立新秩序



第二章 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 1949—1952 年

新的征服者总是要花几年的时间使中国处于控制之下，共产党也不例外。通常决定性的战役在北方展开，而广州是最后一个被共产党控制的城市。三年的征战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之后才被占领。

“后解放区”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政策宣言通常根据共产党控制时间的长短将地方划分为三类：“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到1949年，大部分老解放区已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地方的经济问题；到1949年，新解放区已在建立政治控制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还刚刚开始。

因为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对这一地区占领时间的长短，并且由于交通通讯设施不完善，因而很难迅速把权力集中于北京。在接管的过程中，整个国家被分为六大行政区，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每个大区都是党的军队组织在接管的过程中建立的，例如，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南区的所在地位于武汉。在武汉，林彪及其战友开始制订计划由军政向民政过渡。

在新解放区，内战的结果尚未明朗时，政治重建已经开始，当时严密的军事控制是必要的。到广州被占领时，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认为，随着内战的结束，一旦建立起他们的政府，可以放松一下严密的控制。然而，在接管时，广州是彻底的组织混乱，共产党在这里碰到了他们在其他新解放区所遇到的所有的基本问题。他们必须清除反对派，整肃城

市、乡村和沿海。他们必须吸收、训练新人员，扩大他们的组织结构。他们必须开始在金融、商业、工业、交通、教育和文化等一切领域建立秩序。

到广州被征服时，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接管城市的程序，从新解放区得到的经验对于他们接管广州是有益的。接管时广州的混乱无序使镇反和重建相当困难，但至少问题是熟悉的，解决的模式和其他地方一样。因为广州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共产党在东北第一次占领大城市地区的经验特别有指导意义。负责解放和组织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和组织城市中有经验的人员，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年轻干部。广州的最高领导叶剑英在北京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事实上的广州市市长，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金融经济方面的官员；广州的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曾在上海军管会任职；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曾在哈尔滨工作。^①

尽管广州的计划已提前做好，但共产党以这样的速度征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对于在广州所要担负的巨大负担没有充分的准备。仅在一年前，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曾估计要花五年的时间征服华南地区。和其他后解放区相比，广州有坚强的游击队组织，1946—1948年间，地方游击队的领导和在香港的一些重要左翼知识分子建立了工作联系。游击队本应有助于建立地方的支持，但最后他们存在的好处是有疑问的，因为许多游击队员认为他们对担任广州的领导职位有专有权，这不符合他们的能力，或者不符合北方南下征战的领导的意图。

^① 《南方日报》1951年6月13日，1952年12月31日。关于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参见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约翰·W. 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John W.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詹姆斯·唐森：《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参与》（James Townse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S. B. 托马斯：《共产党中国的政府与管理》（S. B. Thomas,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3）；白鲁恂：《中国政治的精神》（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体制和政治权力》（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理查德·所罗门：《中国革命与属地政治》（Richard Solom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ependency*）。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研究指南资料，参见小霍华德·柯奇：《当代中国：研究指南》（Howard Koch Jr., *Contemporary China: A Research Guid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1967）。

共产党已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批领导人员和游击队，但他们严重缺乏能够处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员。最后，他们遣散了大部分以前的国民党政府职员，因为始终对其忠诚有顾虑，而且旧官僚的工作作风和他们非常不同，因而不好指挥。然而，在替代旧官僚的人员被训练出来之前，旧官僚大部分仍留职。从短时间来看，他们必须依靠有经验的国民党干部和支持共产党的革命青年，在共产党军队的指导下形成这两个群体的联合。

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的士兵、政治工作者都意识到镇反和政治控制的问题，但他们关于轻重主次的概念反映了儒家的传统。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①可以肯定，他们拥护支持的道德品质比传统的理想更为艰苦朴素，更谦虚谨慎，更有生气与活力。首先，共产党的道德品质意味着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和群众结成良好的关系。共产党的领袖认为，决定他们最后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是他们的普通士兵抵制城市舒适生活的能力，真正保持了禁欲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服务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的官员缺乏适当的道德品质。他们决定纠正这一切。

在共产党的军队到达后解放区时，他们已经经过多年的道德和纪律的训练。解放初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为群众服务、对群众友爱的准则，是最为人们熟知、最为经常重复的口号或调子。毛泽东努力克服传统的士兵地位低下的形象，把“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改为“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通常民众心目中对官员是最没有好感的，官员被看做是骄傲、傲慢、脱离实际、过于讲究形式、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人。但共产党中的许多人在设想解放后的社会时，很自然认为（新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秩序是大致一样的，只是他们自己处于上层。问题是多年的道德训练是否能使干部抵挡得住新的职权带来的诱惑。

^① 关于“干部”一词更全面的解释，参见傅高义：《干部的“正规化”》一文，《中国季刊》1967年第29期，第36—60页（Ezra F. Vogel, The 'Regulation' of Cadres, *China Quarterly* no. 29:36—60, 1967）。

而刚解放时的挑战还不是干部是否能抵挡住诱惑。胜利的激动及困扰于管理上的细节有助于短期内保持干部的品德。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共产党是否能得到民众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指导，使学校开学上课，工厂运转如常，政府开门办公，总之，他们是否能提供平稳的过渡。

当务之急：平稳过渡

当共产党的军队接近广州时，其领袖希望一举摧毁或俘获华南地区的所有残余敌人。如果此举成功，镇反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因此，策略是切断国民党的退路。^① 关键的因素是速度。华南的战役有时被称为“脚的战役”，因为疲惫的共产党士兵所担心的不是国民党的抵抗，而是前进的速度。国民党的策略本质上是防守的，避免直接对抗，尽可能进行破坏。不管共产党的军队向广州进军如何迅速，使国民党感到惊讶意外，但国民党有充分的事前准备，在共产党到来前设法逃离广州。

1650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掌权时，广州曾抵抗达10个月，征服者最后突破城墙，为报复他们的长期抵抗而屠杀了大约6000名当地人。^② 1949年，尽管国民党成功地炸毁了军火库、珠江大桥及一些机场设施，但共产党在广州的地下党挫败了其炸毁电厂和其他设施的企图。^③ 广州在没有受到重大破坏的情况下转交到共产党手中。

国民党军队离开的当日，正如最后一条广播消息所说的，广州“一片死寂”^④，好像在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广州到处都是关于共产党政策的谣言，国民党的宣传人员充分利用北方南下的难民，宣扬共产党的“暴行”。曾经历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军阀间的战争、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军阀陈济棠的征服、蒋介石对陈济棠的取代、日本人的轰炸和占领等一系列事件的中年人，对此持谨

① 《纽约时报》1949年10月13日。

② 曹开甫（音）：《“三藩”之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Tsao Kai-fu, *The Rebellion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against the Manchu Throne in China, 1673 - 1681*.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1955）。

③ 《广东的解放》，广州新华书店，1950年。

④ 《纽约时报》1949年10月13日。

慎小心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态度。

1949年10月13日，共产党的军队疲惫不堪地抵达广州。当晚他们睡在郊区的马路上。次日，他们整装进行解放日大游行。他们鼓励民众沿着一条主干道参加游行，从此，这条街道被命名为解放路。大部分民众没有出门致敬，而是贮备一些食物留守家中，好几天都不出门。尽管他们热切关心眼下的人身安全及在共产主义下不可预知的未来，但他们主要的感觉是轻松的，因为这座城市是在和平中易手的。

当共产党军队进入广州时，他们发现城中一片混乱。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匆忙离开，逃向海南岛，国民党的高官和商人已飞往四川或香港。一些隐藏起来的国民党走卒可能继续留下。一些下层社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匆忙逃离的时机，掠夺被遗弃的家庭、商店及弃置于路上的货物。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民防武装继续进行小的破坏和阻击，目标是街上戴八角帽或着绿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通货膨胀蔓延，广州城内到处都是流浪汉，双方的军队都大肆征用当地的粮食供应。不仅离去的国民党带走了大量物品，广州还必须供应追击海南岛逃敌的共产党军队的补给。

处理这些混乱的组织方法主要是军事占领。混乱无序要求军事管制，并且，共产党也从未考虑过改变方式。共产党带来的管制人员都是军人，但共产党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已政治化，这在军事史上是少有的。其军事的作用总是从属于政治目的，政委被派往每个军事单位。广州关键性的领导都是军官，但他们都受过长期的政治理论训练，有长期处理民政问题的经验。虽然普通士兵的政治理论比较肤浅，但他们至少自参军入伍之日起就经受连续不断的政治训练。

接管之初，军事管理委员会是负责统管军事、政治责任总体运作的机构。刚开始，它是个巨型机构，包括一整座办公大楼。它统管军事、党、政府、经济、教育、文化等所有事务。起初，干部们日夜工作，许多人就睡在办公室。刚开始，所有不同级别的人——士兵和文职人员职衔等级上没有区别，只是根据他们被分配执行的工作进行组织。高级干部因应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只列出几条准则，几乎没有时间慎重考虑。10月17日，广州解放4天之后，军管会正式开始运作，它不仅负责管理

广州，而且负责管理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

军管会逐渐向社区的政府组织、经济企业派出工作组指导活动。一开始，工作组定期向军管会报告情况，但几周后，工作组融入他们派驻的单位中，并从军管会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几个月后，军管会权力削减，成为一个高层的协调机构，从前的办公室几乎是人去楼空。此后，除了发布震慑那些可能的暴力反抗者的命令、征用外国财产，或围捕反革命外，军管会还把实际的操作留给政府，党和经济企业只起间接的作用。这些机构建立时，整个组织是高度灵活的，几乎是没有任何正式的通知，人们可以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实际上，6个月内尚未真正形成组织结构。^①

尽管组织结构高度灵活，但权力高度集中于每个组织中身兼多职的高层领导手中。出于地理上的考虑，工作组被分派到广西省、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的工作组从党的工作组中分出。例如叶剑英，他是军管会的负责人、党的华南局的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市市委第一书记、广州市市长，他还是许多临时委员会的成员。

10月21日，正好是接管一周后，军管会派出工作组接管政府机关。因为解放日的大规模游行民众十分紧张害怕，于是组织了一次新游行，庆祝“政府回到人民手中”。10月21日，15万观众观看了壮观的游行。

游行的兴奋激动与共产党前往接管政府时所发现的世俗和混乱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的工作组通常先分为政法事务、金融与贸易、教育与文化、公共工作等几个主要的委员会。然后这些委员会又被分为几个更小的工作组：“（以政府的局命名的）接管委员会”或“（以工厂命名的）管理委员会代表”。当他们出现在各自的办公室时，他们发现官僚机器令人悲观失望。由于国民党的官员或逃走，或躲藏，许多办公室是空的。国民党已拿走了最重要的记录，即使有记录剩下，也是凌乱不堪。情况最好的，也不过有些大胆留下的国民党低级职员可以解释办公的程序和文件。事实上首要任务就是努力找到靠得住的、肯合作的前国民党政府职员，把他们集合起来，保证其不受打击，鼓励他们回来工作。

^①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1日。

尽管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军管会之下接管政府的某个局，但在如何组织他的部门上有相当大的权力空间，他，或是他所在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就有权决定国民党政府的哪个职员可以获救，哪个支持共产党的年轻人可以录用。在迅速找到可靠的人的压力下，诉诸值得信赖的朋友或熟人的帮助是很常见的，这一程序和组织合理化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僚程序形成鲜明的对比。

委员会的负责人无论工作技巧和招募能力如何，都无法回避严重的不连续性和混乱。采用的临时政策后来不得不取消，雇用的人员也不得不遣散，一个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和另一委员会的命令相矛盾。由于没有固定的分工，工作组成员不是被训练成专家，而是成为能执行任何命令的多面手。但由于缺少章法，就只能按需而为。因为认识到不断的变化，执行的规章、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以及政策说明都被认为是临时性的。有关官员不受条例、规定的约束，有权随意进行更改。

最棘手的任务可能是公共秩序问题，这一任务落到公安局的头上。因为警察工作的性质，除了最底层的警察，国民党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无人敢留下。因此，必须动员士兵在街上巡逻，把愿意合作的年青人集中起来，帮助组织邻里防止不守秩序的机会主义分子趁火打劫。

政府的许多工作被分给民政局。民政局负责使市民间保持合作，在以后的几年中，民政局的工作逐渐分到几个新成立的局中，但在接管之初，它实际上负责所有涉及公众的事务。在公共安全工作方面，民政局依赖年青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是共产党事业的同情者，在工作上帮助支持干部和党员，但不具有党或政府官员的资格。）他们以小群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向各邻里间传送消息，使当地居民相互合作。

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学生群体最能也最乐意起这样的作用。许多学生同情共产党的事业，甚至在接管之前，一些学生被组织起来在香港的共产党学校学习、训练。这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机会。理想主义的学生要为中国利益而工作，有事业抱负的学生则意识到他们的活动能开创未来，他们都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召唤。

这些学生常常是匆忙地组织起来，他们向公众发出的号召并不总是准确或一贯的，但他们的主旨是清楚明白的。人们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工作，那些合作的人受到奖励，抗拒的人被迅速处理。政府由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但在毛泽东的“新民主”的概念下，其他社会阶级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商人、知识分子、妇女、青年、工人、农民将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些对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将被处理”，但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必担心受到报复。那些犯有轻微过错的人如果坦白交代将获得宽大对待。但“罪行”和“过错”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说明，甚至在领导的思想中也一样，许多市民仍然保持谨慎。然而，这些基本信息的一再重复和对军人、警察作用的约束确实大大有益于鼓励市民的合作，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应有的谨慎。

民主党派、各行业、宗教界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领导人被召集到一起，出席了由负责既定的工作路线的政府机构召开的一系列的座谈会（官方说，许多1949年以前存在的政党被允许和共产党共存。实际上，他们已没有权力，吸收成员也有很大困难。所有其他的党派都被称为“民主党派”）。在这些座谈会上，对政府目标非常熟悉的高级领导解释主要的政策路线并征求建议。尽管政府的领导并不准备采纳任何建议，但他们并不确知许多领域该如何前进，因此，毫无疑问，他们寻求建议是真实的。当然，这些座谈会还有助于动员对政权的支持，例如，一些最支持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妇女、青年、劳动者在各自的座谈会上都要求表达观点和看法。

在公开发表的陈述中，政府的领导力图回避具体的承诺，因为他们认识到环境的可变性及不履行诺言所致的疏远，但他们热切希望赢得民众的合作。一些领导尽管对未来还不明确，但他们鼓励各界民众相信自己会遭到特别的考虑，不必担心遭报复，甚至会获取一个高级的职位。

吸收党员比录用政府人员的进展更缓慢、更谨慎，因为党要求更高的可靠性。党在混乱无序的初期十分谨慎，党员的名字到解放几个月以后才宣布。所幸的是，党的建设相对没那么迫切，因为尽管政府必须立即发挥作用，但后来由党的领导机关所做的监督工作在当时是军管会执行的。因此，尽管党需要进行自身建设，但在初期，这只不过是选择人员、建设自己的组织。甚至在党开始监督政府时，政府还必须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后来，工作正常化，党可以更密切地监督政府。但在初期，

不仅政府有许多独立的权力，而且政府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本身是党员——比和他们相对应的党的机构的成员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最迫切的问题是接管大型的政府企业，防止对关键性的工业、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的继续破坏。在私人部门，主要的任务是鼓励必要的商业，特别是工厂保持运转。尽管军管会派代表去主要的经济企业，但在经济领域，忠诚相对较为次要，与行政领域相比，技术更为重要，因此也较少人员调整。

尽管混乱无序，但在接管后的关键几周内，共产党仍做了必要的工作保持经济运行。珠江大桥直到1950年11月才完工，^①但渡口服务在解放之后就立即得到扩展以满足需求。对广州南岸的供电服务也几乎是立即恢复。广州南岸铁路交通的缺口一个月内消除。接管后的几周内没有发生其他重要的破坏。由于缺少人员和物资供应，许多小工厂不能开张，但主要的工厂和设施处于运行之中。也许，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仓促逃离和获得适当的食物供应以及共产党的能力对平稳接管都同样重要。虽然共产党自身还不稳定，但毫无疑问，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和他们行动的果敢、迅速，却使接管容易了许多。

虽然共产党到广州没有带来具体细致的计划，但他们确有一个总的看法。他们想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想尽快这样做。正如他们在经常重复的口号中所说的：“三年恢复，十年发展。”但政府的日常行为是对面临的迫切问题、时机以及来自上面的指示作出回应。必须维持公共安全，开展对经济、教育机构进行控制，需要征收适当的税收，动员知识分子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支持政权。为了完成这一切，发展他们自己的人员计划、重组现存的干部、吸收录用和训练新干部是绝对必要的。这些任务在解放前已经开始，在解放初期继续大步开展。

共产党干部的整合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充分反映了其人口中语言、文化广泛的多样性。日本侵略者加速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纪律使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26日。

党内的合作比党外更容易，但并不是说消除了党和政府内的文化障碍。

在广州，有四大群体被整合于一个工作组之中，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队武装，来自广州、香港的地下党和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前国民党官员。

南下工作队是在广州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其自身是一个成分迥异的人组成的群体。它包括在红军中长期服务久经考验、忠诚负责的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们曾在反抗日本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战斗过。一些领导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工作队中也有像叶剑英、朱光这样的南方人，他们曾在北方长期服务，可能会促进广州人和北方人之间的沟通。它还包括对管理经济事务有经验的领导，但不是在延安，而是在更发达的东北地区。但这些有特殊资格的人大体上不能充分满足需求。南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主要是从北方大学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接管南方时，他们在新解放区作为干部，工作上经过简短的训练。尽管他们成分不同，但南下工作队成员至少在两点上存在共同之处：他们有高层知识分子的背景，他们来自北方因而普通话流利。

广东游击队武装也是一个成分十分不同的群体。他们包括来自游击队组织活跃地区的不同族群的人：潮州人、海南岛人、客家人。尽管不是同一族群人，但他们实际上都是经受了严峻考验的没有受教育的农民，这和北方人形成了对照。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山区。尽管他们勇敢、忠诚，所有的干部努力表现得相互尊重，但游击队还是常受到其他干部的轻视，被称为“土八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进城，比其他群体更易受到城市诱惑的影响。他们因为粗鲁、“山头主义”，不愿接受更多组织的纪律而受到批评。但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们多年的牺牲、经受考验的忠诚也是不可忽视的。

广州地下党的人数比进城的游击队的人数要少得多，其成员除了源于当地人外，总的来说和南下工作队很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香港或广州的学生团体中吸收的，在香港接受特殊的训练，而后派回广州在华南分局的指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华南分局在香港，后来移到广东东北部。尽管年轻，但他们有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地方语言、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优势。因此，他们经常能和上级打成一片，提拔相当快。然

而，他们与地方的联系及对地方的认同却很不够，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紧张，他们还被地方游击队所轻视，认为这些年轻的崛起者没有在真正的斗争中得到足够的锻炼。

当然，从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最熟悉市政事务，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许多基层理想主义的干部所反对的。留下来的国民党官员可能职位低下，处于值得共产党信任的圈子之外，但他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是急需的。允许留下的国民党官员有时被降级，前途不定的忧虑使他们谨小慎微。

基本的文化差异导致群体的对抗和交流上存在基本问题。许多地方干部多年未曾接触普通话，即使学了，本地口音也很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和来自游击队武装的“乡下人”的差距比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的差距更大，因为他们不曾在一种单一的大众文化之中整合。对游击队的轻视可能被一时压住，但到20年后仍未消散。

共产党干部和以前的国民党官员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互相仇视的敌人，处于生死搏斗之中。接管之后，共产党的干部被告知要和以前的敌人一起工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敌人的手下工作。许多群体都怀有怨恨，但其中最强烈的也许是被各方面所忽视的游击队。他们的怨恨明确而集中地体现在从北方传下来的不满的口号中：“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老革命要通过学习和纪律约束，才能接受在打败敌人后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甚至可以当他们的手下。

从前的国民党官员和革命的共产党之间的紧张状态给领导出了一道敏感的难题。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员，要维持广泛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很明显有必要在政府中容纳一些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同情者。但是，一些国民党的残余还在搞破坏，尽管共产党政府保留的前国民党官员经过了安全检查，给予了特殊的培训，但无法证明他们和破坏分子之间没有联系。他们有忠诚上的风险，因为忠诚是很难评估的，领导者难以区分犯罪分子和没有犯罪的人。有任何严重的骚乱，特别是随着没有忠诚风险的新人员被培训出来，公安部门的官员就会施加压力要求消除安全风险。从政府中撤除官员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它影响到他们及其朋友

的士气。许多共产党干部曾鼓励他们的国民党朋友出来在共产党政府中帮忙，但当这些朋友被遣散时，他们也困惑不安，因为他们把朋友引到了麻烦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的忠诚也受到责难。清除可疑分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问题，即使那些未被清除的人也遭到不断的怀疑、调查和歧视。

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余部和忠诚的共产党的融合产生了许多困难，但广州的问题最为严重。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广州毕竟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的所在地，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前再度成为其首都。不管怎么说，许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的负责人是因为他有能力获得以前的国民党的追随者的支持，毫无疑问，共产党认为，在广州有必要得到一些国民党余部的支持。

这些不同干部的融合是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完成的。尽管干部们开始和其他背景的干部交朋友，但基本的解决方法不是通过友谊，而是通过纪律。早在1950年4月，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已经启动，^①期望所有的官员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那些不能尽快学会普通话的干部升迁提拔的机会受到限制。为了避免引起对族群之间分裂的注意，这很少被直接提及，但间接对其问题的考虑在非正式的讨论中却占去了大量的时间。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求每个人讨论整个社会的需求。族群之间利益的一些问题，通过考虑怎样才是对组织整体有利而得到解决。

因为这些不同群体的成员分布于不同的单位，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尽管大量的游击队武装来到广州，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鼓励回到他们家乡，即使那些留下来的通常也是由广东省政府机关吸收（处理和农业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到广州的市政组织机关。从国民党政府保留下来的人员被安置于政府的技术性岗位上，但通常不允许其参与共产党的事务，或担任其他有权的职位。和当地人的联系归于会讲当地方言、更熟悉当地情况的广州人之手。但最高权力的职位通常掌握在那些曾在北方工作的人和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并且已经能完全熟练掌握普通

^① 《南方日报》1950年4月4日。

话的广州人的手中。

还有，所有这四个群体的干部并不能充分满足现存政府和党的需求，更不用说提供迅速扩编所需要的人员。当局必须设计出一个能在短期内训练出大量新干部的方法。

干部的录用和训练

1950年初，当地政府大约有700名干部，这个数目到1952年扩大到几千人^①，并且比较大的扩展是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在这几年中，一直在继续努力寻找发现、培养训练足够的、具备必要能力的和忠诚的人。大部分新干部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识字，愿意学习，受国民党组织的污染最少。

成为一名干部的途径是在做学生时成为一个“积极分子”。共产党总是利用“积极分子”扩大宣传，而这种宣传在解放初的那段时间最为集中。积极分子被组织起来演戏、唱歌，就政府努力向公众或特殊的群体所传达的各种消息作演讲。督促消费者必须避免黑市，购买公债，把钱存入银行不必担心生活费用上升而使货币贬值。鼓励老师使他们的课程和政府的政策相符合，工人必须成立工会，家庭妇女组成街道委员会。年青的积极分子宣传这些信息，那些宣传得最好的由党或青年团给予“培养”，鼓励他们读某些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或政府政策，考虑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这段生活比过去所看到的或以后再看到的更令人兴奋。在这最初的几年中，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达到顶峰，他们热情地辩论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观点看法，如何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很明显，他们在新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社会满足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及自尊自信的感觉。作为拥有远大前程的聪明智慧的年轻人，他们希望得到好的职业机会。那时，他们不需要或不要求物质回报。他们自己的满足感、同辈人的尊重、上级的表扬，以及意识到将来工作的机会——尽管还不确定，这已经足够了。

^① 《南方日报》1950年7月20日，9月20日。

为了给普通中学和大学中登记的积极分子以更高层次的政治训练，1950年1月23日，寒假一开始广州就组织了为期4周的特别班。这些班在城内及郊区各地举办，吸引了大量人员前来注册登记：东城区1300人，南区1282人，西区1510人，北区960人，中区1247人。^①从短期来看，这些班的毕业生能够更好地起到积极分子的作用。并且这些课程训练还为从毕业生中选拔干部提供了一个人才库。此外，为非学生的其他积极分子——年轻工人、家庭妇女组织了小规模培训计划。^②

青年积极分子走向成功之路重要的第一步是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③团员。青年团选择更有前途的年轻人，给以鼓励和训练，但并不承诺给以工作，甚至没有永久的团员资格。不履行其诺言的青年团员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可以简简单单、不声不响地在25岁时自动退团。这比一个党员要容易得多，如果他是一名党员，党要么容忍他的平庸，要么通过麻烦而令人沮丧的程序将其开除出党。到1950年1月，广州的青年团员扩大到2700人，到1950年5月4日，第一个青年节，团员人数接近5000人。^④团员的吸收主要集中于学校、政府机关和工厂。但1950年夏，为了准备土改，团员的吸收扩大到包括广州周围的农村地区的青年。^⑤尽管团员进一步入党的过程要慢得多，但是到1950年8月仍有大约320名青年团员被选拔入党。^⑥成为团员、党员是激发青年的强有力目标，也是使被选中的积极分子更有纪律、更有政治智慧的一种方法。

大多数成为干部的青年都经历过从表现积极到通过专门培训而走上岗位的过程。在最初的几年中，培训计划的内容很多，主题很广泛。有全日制班、业余班、轮训班、专门学校，甚至还有为达不到一般学生水平的人而设的补习班。^⑦还有一所重新训练已经成为干部的南方人的专门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月7、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3月2、27日。

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4月成立，其前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沿用至今。——译者

④ 《南方日报》1950年1月10日，5月4日，8月6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6月17日。

⑥ 《南方日报》1950年8月16日。

⑦ 《南方日报》1950年2月7、9日。

学校。^①最有特色的训练方案是全日制的集中学习班，时间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学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全力投入学习。这些集训班包括两种：一是为产生新干部而设的“干部培训班”，另一是为已经在工作的干部而设的“轮训班”。

干部学校对于训练和甄别干部是有益的。在决定录用时很难对申请人的背景作出评估。中国的教育还没有标准化，在战争年代，甚至一个训练机构内的训练方案年年都不同。许多青年人的能力是从自学和个人经验中获得的。训练时机的不同不仅很难依据青年人的背景来评估他的能力，而且难以根据他现在的表现来评价他的潜力。干部学校的入学政策宽松，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判断学员的能力和潜力。因为学员通常一起住在宿舍，经常进行小组讨论，可以根据其专业能力、政治态度和个人习惯进行判断。正如科举考试中的成功的生员为旧时的官员选拔提供了一个人才库一样，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在稍低的层次上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人才库。

总的来说，干部培训学校要比为现任干部而设的轮训班规模要大。最大的干部培训机构是南方大学，南方大学位于以前中山大学的所在地，专门培训18—30岁的年轻人。1950年初，大约有600名学员在广州市财税培训学校受训，而1950年1月，南方大学的第一学期登记的学员超过4000人。^②在南方大学，学习财经方面课程的学生最多，而文化教育、行政管理课程的学生的人数也比较接近，还有工会、少数民族工作等课程。^③尽管在广州工作的大量干部在南方大学受到培训，但广州只是更大类型的教育链条上的一环。广东低层的管理干部在全省各地接受培训，一些高层人员则被派往武汉和北京接受更专门的培训。^④到1953年、1954年这些学校开始稳定时，他们已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学生，为其从事政务或党务工作提供了必需的最起码的标准化背景。

训练班是由省和市政府的较大分支机构组织的，为其机构已经录用

^① 《南方日报》1950年3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日，3月4、11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7月17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3月30日。

的人员提供更专业的训练。接受训练的人或是旧政府留下来的人员，或是上级领导亲自选拔的特别有前途的年轻人。通常这些班级大约有10名至60名学生，他们的目标更专，比干部培训学校的技术要求更高，因为选择已经完成，要接受更高的政治标准的培训。

但即使是在训练班也没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训练。共产党政权太新了，无法准确预计各个部门的需求，更不用说每个人准确的专业工作。并且，甚至连根本的政治态度、“政策意识”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共同基础。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政权可能认为所有进步学生都有这样的共同基础，但在1950年，最基本的共产主义著作和最基本的政策说明都得从头教起。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用基本的识字训练代替基本的政治训练，因为这样基本的训练是必要的，也因为这样的训练不能为他们的具体工作做好准备，所以和在帝国时代一样，官员们要在工作中学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他们所学习的和工作中需要知道的没有差距，因为缺少大量的专业教员，高级干部自己做了许多讲授工作。虽然这些课程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训练，但还很不够。为了提高他们的“政策意识”和技术水平，毕业学员还将继续参加定期的学习。

在某种程度上说，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训练中会和其他工作相冲突。年轻的干部从工作中下来学习、领导干部从工作中下来讲课并不总是能够按计划进行，因为对他们还有其他的要求。同样，行政工作的压力以及像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压力，常常迫使学校甚至在训练计划完成之前就派学生到这些运动中工作。因为缺少人手，训练不可避免地中断、流产或改变，而训练计划还不稳定，也不可能精确计划。

虽然在用干部学校作为甄别手段、鼓励各部门领导在选择可靠的人方面作了相当努力，但干部的需求量巨大，工作的压力不可避免地要求使用那些不合要求的、政治忠诚可疑的干部。直到1952年，有了更多的干部，这些人才被大量解职。与此同时，干部的态度和工作在每周的学习会上得到“纠正”（干部、党员、青年团员人数的数据参见附录B中表3、4、5）。

但学习会并不总是适当的。1950年初，与在广州市的党政机关中建立更合理的组织结构的计划相关，一场小规模整顿运动发动起来了，使

人数和标准符合实际需求和容纳能力。例如，党的华南分局使用的干部还不到700人。^① 因为需要人手，清除的人并不多，总的来说，只作口头上的抨击。运动批评干部的贪污、“官僚主义作风”和工作表现差，但到1950年6月，运动达到高潮，矛头指向“躺在荣誉桂冠上”的干部，即以前的游击队。游击队不能很好地适应办公室工作。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缺乏对常规工作应有的基本态度，对连续不断的艰苦工作及脑力劳动所要求的知识活动缺乏尊重，他们还易于沉湎于城市生活的享受：食物、女人、酒、赌博。在整顿中，他们过去的贡献受到表彰，但也受到警告，其地位只能依据现在的最大贡献而获得。许多人因为不能胜任城市中的管理工作，而被派回农村去担任对他们更为合适的农村的、较低声望的职位。

干部犯错误的事多发生于城内的各区，而不是在市这一级，整顿之后接着是解放后的第一次重要的管理重组。重组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个区大约要有10万人口，从而对市区组织的控制更为严格、更为有效。尽管区一级还保留着管理上的便利，但已没有独立的权力，1950年6月，28个区合并为12个，这样至少他们的人员结构更充足些（区级的重组，参见附录B，表6）。^②

1951年初，文化教育局书记马骏的事例充分说明了把骄傲自大、独立不羁的共产党领导整合到官僚科层制结构和日常事务中的难度。他的上级起草、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不经商量就擅自更改。别人告诉他过于冗长的讲话已使听众厌烦，他则回答：“革命的第一课是训练落后分子。”当告诉他听众难懂他的口音，他回答：“如果听不懂，就听着。”人们害怕去他的“三宝殿”，他威胁其下属如果不立即服从命令，就把他们开除出青年团，或开除其工作。^③ 马骏的傲慢受到批评，并因此被解除职务，但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太大，几周后他又有了地位相当的职位。许多年后党才有效地使许多聪明卓越的人服从纪律。

① 《南方日报》1950年4月11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6月24、28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12月30日。

镇 反

共产党政权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时，面临许多困难，但最为关键的是公共安全，为此，赢得市民的合作，开始有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① 广州的和平接管是当地居民的福音，然而因为国民党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广州必须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人员和间谍，他们可能利用附近的香港作为活动基地。尽管没有国民党士兵人数的公开记录，但广州市警察筹备部的公告中说明他们处理了 14 880 例无家可归或无工作可做的前国民党士兵，^② 足以反映问题有多严重。共产党官员并不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因为这样会迫使国民党隐藏和抵抗，但他们也不能轻易地将这些以前的士兵重新整顿转化为民用技术人员。往最好处说，他们是不稳定因素、不满分子。往最坏处说，他们是破坏分子。

基本的问题是很熟悉的，但作用正相反。共产党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和暴动的经验，但现在突然反过来要控制局面。毫不奇怪，他们实行以前政府所用的许多方法：管制武器，登记人口，控制舆论和宣传，使用反间谍。几十年的混乱，许多防范混乱的举措几乎已融入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所有的小巷、小街都安装了厚重的大门，共产党敦促邻里修整门户，每晚紧闭。一群群士兵和积极分子在街道上巡逻，解放后一个多月每晚实行严格的宵禁。

使用私藏的武器对公共安全构成最迫切的威胁。刚开始，共产党只要求武器登记，集中力量收集信息，威胁那些不申报武器的人。一旦共产党认为实际上已登记了所有的武器，他们立即宣布（私藏武器）为非法，给予收缴。例如，12 月份，收缴武器 1 600 件。^③ 在农村地区，刚开始允许农民持有武器，农民协会被授权收缴地主拥有的武器。^④ 但很快每

^① 关于叶剑英对市人大及各界人民的讲话，见《南方日报》1950年5月9日；关于运用法律建立秩序，参见孔杰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程序》（Jerome Alan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关于一名以前的干部对镇反程序的记述，参见古克中：《今日广州》（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年）。

^② 《南方日报》1949年12月26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1月12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5月17、25日。

个人，包括贫农和雇工，都要上交武器。

像对上海、南京地区一样，国民党对广州继续进行空袭。根据共产党的估计，从1949年11月3日防空指挥部成立到1950年2月24日，有76次飞机轰炸事件，伤亡170人。^①最严重的轰炸袭击发生于1950年3月3日，据共产党的估计，在该次袭击中，共有7架飞机轰炸使259人死亡、349人受伤。^②除了使用常规军队，共产党还成立了防空委员会，其中一小部分是军官，大多数是来自党和政府各机关的志愿干部。除了提供空袭预备警报，委员会成立了受害者临时接收中心，提供临时的住房及医疗、经济方面的援助。^③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防空袭设施，国民党的飞机可以来去自由、毫发无损。但到1950年3月，共产党击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此后，问题得到缓解。事实上，空袭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因为飞机轰炸惹人注目、令人恐惧，加上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从而坚定了人们反对国民党的立场。^④

广州通水路，这使它总易于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从未使用有组织的海军进行战斗，但他们曾充分利用海路来补给游击队武装、从事地下活动。解放后，国民党可以轻松地利用水路和香港联系，充分利用几千艘小船。^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3月5日后，政府对广州地区的船只进行了登记，所有的船只包括家庭的小渔船也要求展示登记号码，停泊于指定的港口。^⑥公安局检查所有进港、离岸的船只，晚间靠岸时要求使用灯光。1951年，渔民们被组织成相互负责的群体，并采取措施“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他们协助国防工作”。^⑦直到14年后渔民们在岸上有了住房，这一问题才完全解决。

对公共安全最严重的危险不是来自海上或空中，而是来自国民党的

①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3月4、6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2月3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3月4—12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9日，1951年9月15日；《当代背景》(CB)，no. 124;8, 128。

⑥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7日，3月7日。

⑦ 《当代背景》(CB)，no. 128。

间谍与同情者，他们表面上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任何区别。^① 多年的战斗和相互残杀，使共产党军队和留下来的国民党彼此十分仇恨，政府的政策不能赢得许多国民党残余的合作，也不能防止许多当地的共产党超级爱国者对在农村的国民党老兵的报复。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对前国民党士兵及其同情者的打击运动不一定会如此严厉。共产党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危险，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危险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离开前往朝鲜，共产主义的敌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空隙。机会是因此可以在民众中获得广泛的合作来对反动派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不管哪种情况，战争要求一场严酷的运动来彻底处理国民党反动派。

这场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共产党统治的前20年中最激烈的运动。第一步，1950年9月11日，军管会宣布所有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党员要在一个月内在公安机关登记。他们公开宣传对自愿投降与坦白者给予宽大处理，没有登记的要负严重后果。慷慨承诺给予那些交出国民党组织其他成员名单的人以奖励。通过给国民党分子未来一线希望，共产党希望地下反革命因担心被其同谋暴露，或被已渗入其组织的共产党所揭露时会受到更严厉惩罚而自己主动登记。事实上，承诺给予宽大政策的广泛宣传及担心同伴的举报确实使许多人登记。一旦登记，国民党成员受到详细的审查，交代他们过去的历史、关系，这常常会发现其他的成员和嫌疑分子。尽管没有公开所有登记的国民党特务的准确人数，但人数之多令公安局不得不向市政府申请借用干部帮助处理所有的案件，案件的处理过程有时长达几个月。

在运动到达高潮前，广东省政府开始切断广东和香港之间的自由通行。1951年初，共产党已能对边界实施监管。1951年1月30日后，所有希望越过边界的旅行者都必须获得县或市公安局的许可，且只能在11个边境检查点通过。^②

1951年夏，随着资料的收集、边界的关闭，共产党政权机关迅速行动，逮捕、处决反革命分子。因为考虑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的

^① 新华社（New China News Agency, NCNA），见于《中国大陆杂志选》（*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SCMM，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编）no. 31: 25，广州，1950年12月14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1月1日，2月13、17日；《纽约时报》1951年2月17日。

情况下，共产党的领导看到，获承诺坦白从宽的人许多却被处决了，这会激发民众义愤。但共产党政权尽一切努力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对镇压的支持。例如，仅在广州估计有7万名各界的代表参加了群众集会；17万人被动员参观展览；113万人在广播中聆听了大型控诉会的过程。^①

共产党官方的数据可能不够准确。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记录所有被处决的人。但共产党的数字提供了一些关于镇反问题的程度、规模及他们严厉惩处的思想。根据他们自己的数据，广东在镇反运动中，有239名共产党官员献出了生命，5467人受伤或中毒。到运动结束，52620名“匪徒”被消灭，89701名罪犯被逮捕，破获反革命案件1571起。从解放到1951年9月，收缴来复枪超过50万枝，6万多名班长或班长以上的国民党党员被登记。^②从1950年10月10日至1951年8月10日，总共28332人被处决。^③

共产党用运动来巩固他们的控制，消灭潜在的反抗核心。在运动中，他们不仅消灭了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而且也打击了潜在的有可能成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地方领导人。那些遭到控诉谴责的人的朋友、亲戚痛苦而无助，他们对处于被怀疑中的人敬而远之。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杀掉一个省中千分之一的人似乎不必要，而且残酷无情。但对于真正生活于动乱之中，已经习惯于政治领袖消灭反对派的中国人来说，虽然共产党的行动令人恐惧多于让人喜爱，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在组织严密而又残酷无情的运动中，共产党消灭最严重的反对派，震慑其余的人，共产党造成的恐惧多于爱戴，但通过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安全感。

一旦潜在的反革命被置于控制之下，共产党开始转向下一个对和平与秩序构成最严重障碍的目标：秘密会社和工团。秘密会社的一些成员，如路匪，曾作为反革命的一部分在运动中受到打击，^④但在1951年秋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甚至几乎没有提到秘密会社，而现在党发起了真正的进

① 《南方日报》1951年8月21日。

② 《当代背景》(CB) no. 25.

③ 《南方日报》1951年7月16日，9月2、15、29日；《当代背景》(CB) no. 124.

④ 《南方日报》1951年4月14日。

攻。^①

秘密会社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它是地方的泛政治群体，为了避免政府的侦查而保持地下状态。在广州地区，他们在敲诈团伙、运输帮派体系中最为强大。尽管一些秘密会社的领袖以前曾和共产党配合扰乱国民党统治，但共产党从未真正渗入到这些组织中去，一些人还为国民党所利用。在向秘密会社、工团发起进攻时遇到特别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所面对的组织最严密、最秘密的团体。

共产党认为对秘密会社的直接进攻只能加强他们内部的团结。总体上说，共产党的策略是不对其组织全体进行攻击，而是努力分化那些愿意抛弃其首领的不满分子。如在最强有力的秘密帮会——码头工人帮会中^②，在一次5 000多码头工人被组织参加的大型控诉会上，83%的帮会首领被起诉并被判刑^③。这是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方法：详细调查，精心准备，迅速消灭为首分子以威慑其余，这一方法后来被运用于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运动。到1952年末，大部分秘密会社的成员已不敢和以前的伙伴联系。

和帝国时代的中国一样，个人的犯罪，如卖淫、贪污、赌博、吸食鸦片、抢劫等比不上政治罪行处罚严重。^④ 1949年后，政策策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儒家的话语来表述：个人犯罪不是反革命，而只是封建残余，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训练及环境控制来改造和整顿。共产党针对这些人的运动类似于处理政治犯的方法，但不如对后者的严厉。通常某种类型的犯人被认真调查，然后突然围捕，但他们不会被处决，而是经过批评、自我批评、劳动改造和再教育这样一个过程。在释放前，会教给他们一门求生的技能，并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声明保证不再犯罪。而后公安部门的人员在当地积极分子的帮助下监督他们释放后的行动。

对吸食鸦片的人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历

① 《南方日报》1951年8月25日，9月8日；《当代背景》（CB）no. 128.

② 《南方日报》1951年8月20日，9月8日；《当代背景》（CB）no. 115, 128.

③ 《南方日报》1951年12月17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4月9日，6月15日。

史的创造性利用。1839年6月3—21日，在广州郊区，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销毁从英国人手中没收的鸦片，从而引发了鸦片战争，他也成了极其爱国的下一代所喜爱的对象。1951年6月3日，为纪念林钦差此举112周年，广州收缴了鸦片、鸦片烟枪、烟灯，并投置于大火中焚毁。在公共节日中人们燃起了大火，发表长篇爱国主义演说，全都涉及要求对1月份以来登记的4762名鸦片吸食者进行改造。^①在一次神奇的政治行动中，当地官员诉诸爱国主义，起而铲除种种罪恶。新政府明显成了英雄，最后清除了林则徐所未能制止的罪恶。^②

当局充分意识到在没有解决失业和住房的情况下，单凭施压是不能恢复公共秩序的。正如朱光在1950年初建议对流浪及贫困人口实施经济援助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所说的：“这些问题的处理对于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必要的。”^③然而，政府行动的范围受到资金缺乏的限制。一旦登记完成，处理流浪人口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旅费，使他们能够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失业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因为在解放后短暂的时间内，经济不可能迅速扩展以吸收所有潜在的劳动力。共产党政权在失业的口中作了基本的区分：起促进作用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无业游民。无业游民被送往特殊的收容中心。^④但政府还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帮助、支持和安置这些“失业者”。

政府的各分支机构进行周期性的调查来努力安置失业者，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教育局调查失业的专业人员，工会和经济援助委员会调查失业的工人。调查显示，1951年夏取得了较大进展，广州的130万人口中有45803名工人还没有工作。^⑤因为大多数失业的工人没有技术，劳动局和经济援助委员会如果不把他们遣送回老家，就得帮助他们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清扫街道，或者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小作坊或小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24日；关于鸦片的全国性政策资料见于《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no. 11:29, 1952年6月1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6月3日；《当代背景》（*CB*）no. 86。

③ 《南方日报》1950年3月2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7月13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7月13、15日。

商店，^① 如果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么也要给予其临时的最低福利。尽管当局希望在最初几年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上，仅靠行政的手段是很难阻挡农民渴望进城的浪潮的。失业和半失业的问题一直困扰了当局几十年。

就像早期西方的监狱改良运动一样，这些努力反映了天真的乐观主义和第一次试图引进合理的改革措施的决心。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相信犯罪是源于腐败而不合理的社会。在各种罪犯被登记、逮捕后，接着他们会受到训练改造，如果有机会，他们会重新回到社会上有用的岗位。可以肯定，许多人认为被改造的人还会继续在未来制造麻烦，但早期这些努力的积极成果十分显著。卖淫、吸食鸦片、赌博、酗酒实际上已被清除。在这个世纪中，公共道德第一次得到恢复。人们不再担心抢劫，或晚上一个人在街上行走。帮助和严格的监控相结合没有改变人性，但它把有组织的犯罪置于控制之下。

与早期改造努力同时并举的是不断完善的警察管理结构的建立，这对于以上成功的取得是必不可少的。在刚解放时，因为警察中的国民党遗留人员要比其他政府部门少得多，共产党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别无选择。1949年10月23日，广州解放后刚9天，共产党的军人正式接管了当地的各个警察局，把他们组织为市公安局的各个分局。通常是一个连的士兵（大约80人）被派往28个区中的各个区。在军人和公安干部的指导下组织了纠察队，负责邻里的安全工作。^② 到1950年2月底，这些邻里纠察队聘用了1253名专职人员，约有4010名志愿者协助在夜间进行街区巡逻。此外，251名学生志愿者组成的纠察队负责巡逻学校包括大学，783名工人志愿者组织起来巡逻他们工作的工厂。^③ 到1950年底，在公安部干警的指导下，广州的居民组成了7214个治安联防小组。^④

和其他地区一样，志愿纠察队给选择专职公安人员提供了一个试验

① 《南方日报》1950年7月10、18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2月3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4月5日。

④ 新华社（NCNA），（广州，1950年12月14日）见于《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31:25。

场，获得干部身份的渠道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学校：公安干部学校。^①但一些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因为大部分军队老兵已经掌握了担任警察所需要的许多技能。

尽管需要非专职的志愿者维持秩序，但他们不可能像正规的专职人员那样训练有素、坚持不懈。为了解决这些不规范的问题，1950年4月，当局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拘留所、监狱首先由政府机关清理。^②尽管如此，规则并没有完全认真地制定出来，决定只能由没有经验的人仅仅根据总的原则而作出。^③直到更多的人员被培养训练出来，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不规范的问题才得到控制。

和此前的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何既保持大量的警察使之对每个邻里社区继续实行监视，同时又能获得民众的善意？为了培养良好的公众关系，共产党继续训练、教育其军队。1950年春，温和的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警察对人民的不够关心。^④

为了避免大量的武装人员的出现，军队被分成小群遍布于城内。纠察队成员不穿制服，尽管大多数高级干部随身携带武器，但都是小型的，可以藏于口袋。新闻媒体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军人和警察帮助平民的故事。在国民党统治下警察凶残暴虐的故事很普遍，而共产党努力避免这样的恶名。例如，1950年1月8日，他们采取重大行动对一名向学生开枪射击的士兵迅速给予公正的严惩。^⑤这起案件的迅速处理反映了共产党对民众看法的敏感和保持良好干群关系的愿望。

虽然共产党做了许多努力，但警察并没有成为群众的亲密朋友。不管给警察怎样的赞美，如何的宣传，他就是警察，他手中有权。不久群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到1952年，警察管理结构已经稳定。解放后不久就成立了派出所，此后警察通过对本地的登记实行严格的控制。他们进面对底下的居民委员会、街道委员会进行监督。^⑥到1951年初，每个15

① 《南方日报》1950年8月31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2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4月10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6月3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4月15、22日。

⑥ 关于这些组织的作用，参见陆思礼：《毛泽东和调解》（Stanley Lubman, "Mao and Mediation", *California Law Review* 55:1284-1359, 1968）。

岁以上的人都发给了居住证。^① 吸收、训练了大量正规的警察来充实派出所、市公安局及区公安分局。到1952年，维持公共秩序的问题还没有结束，但那时紧急状态已经过去，维持秩序的工作成了日常事务。

驱逐外国人

一个世纪的外国人入侵、中国人受辱自然地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多年来当地的政治领袖已将其酝酿到令人瞩目的高度。除了恢复公共秩序，最能真正赢得民心的就是驱逐外国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不同信仰的政治领袖的梦想，但共产党第一次将其实现。然而许多中国人与外国人保持着愉快的关系，并且认识到和更多的外国人的接触可以利用其经济和技术上的长处，这些因素形成一种约束。本来或许能制止对外国人的驱逐，但朝鲜战争将这种约束解除了。

1950年末，共产党开始主动驱逐外国人，在广州的大部分外国人已经离开。接管时的混乱很少涉及临时性的外国居民，几乎没有商人对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进一步投资获利抱有幻想。大多数在1949年后留下来的外国人怀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坚持。他们是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福利工作者，他们自愿忍受一段时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爆发，因为他们和中国人有着多年的联系，愿意帮助中国重建。

朝鲜战争期间，随着民族主义的进一步高涨，政府最后坚定了决心，要解决如何处理外国人的问题。就像处理他们自己的人一样，广州的中国当局首先前往影响公共安全的地区，没收外国人的无线电接收器和武器。^② 不久后，1951年1月，100家左右和外国有联系的文化、福利和宗教组织受到调查，其官员和成员被编出名录，其活动受到监督。^③ 官方的声明解释说，尽管外国人忠诚于他们在华的事业，但他们的忠诚是分裂性的，并且在国家危险的时刻，不能指望他们把中国的利益置于外国列强的利益之上。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30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19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1月14日。

中国当局的基本倾向是动员群众去批评外国人。例如，在柔济医院，在300多职工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美国的管理者和护士长受到谴责，说他们为帮助美国的文化侵略，虐待中国人员，不允许想参加政治活动的员工请假。^① 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例被发现甚至编造出来以说明外国人的残酷。在广州，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圣婴儿童之家中的五名加拿大修女案，她们被谴责杀害了2116名中国婴儿，根据共产党的数字，从1949年11月到1951年2月间，儿童之家中的2251名婴儿中只有94名存活。^② 报纸上一连几周发表关于修女杀婴暴行的文章，成千上万人被动员去表示对可怜的受虐待孩子的同情。^③

在外商企业中，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此外，商业活动日益为许多条款所约束。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不久，与1950年12月29日颁布的北京处理外国机构的政策相一致，广州也冻结了所有的外国财产。^④ 一旦财产被冻结，外国公司中的中国工人开始公开抨击外国人，并且自己负起责任，以保证外国人在受打击时不破坏或工作停止，不能拿走必要的文件。^⑤ 正式地说，外国的财产不是被没收，而是要通过各自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合法手续接收。事实上，不流动的外国资产被估价很低，到计算公司对政府或工人的“后续债务”和过高的税收时，外国公司的总资产很少，不足以平衡所欠中国政府的债务。中国接管外国的设备把它作为偿还所欠中国债务的一部分。许多情况下，必须在缴纳一笔额外的资金后，外国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才被允许离开中国。

中国的基督徒被动员参加“三自”运动，使中国的教会完全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不受外国的影响。和外国教会的联系，包括和梵蒂冈的联系，随着当地基督教徒对其与外国联系自我批判而中断。^⑥

继续和外国人保持联系的中国人被置于疑云之下，受到进一步的审查，甚至被捕。有些中国人中断了和西方朋友的联系，而许多西方人意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2月27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3月18、22、25、29日，4月4日，12月3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29日，1951年1月6、8、16、18日。

⑤ 《南方日报》1951年1月9日。

⑥ 关于全国基督教会，参见《中国“三自运动”记录和文献》(China Notes and Documents of the Three-Self Movement), New York, 1963。

识到和他们的联系对所涉及的中国人会产生严重的危险，就自己主动终止了联系。实际上到1951年，所有的外国人都认识到努力继续他们的工作已徒劳无益，他们要求获许离开。中国人扣押一些人作进一步调查后，允许大部分外国人离开。在华的西方人与他们的中国朋友、同情者已难以成为跨越两国之间鸿沟的桥梁，因为双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已动摇瓦解了这一桥梁的基础。

1951年，留在广州的极少数外国人实际上已没有政治权或经济权。对他们的驱逐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意义。基本上讲，他们被驱逐是因为深刻而广泛的仇外情绪，但驱逐的过程相对有序，在政府计划的控制之下，并声称其符合法律规定及外国人意愿。到1952年，共产党的领袖宣布他们已完成了皇帝、军阀、国民党官僚所不能完成的使命，结束了受外国人控制的耻辱。

调整教育、工业和商业机构

刚解放不久，共产党接手了以前国民党或外国人所拥有的大型学校和企业的管理。虽然共产党乐观、自信，但他们在最初几年并不曾试图接手大量的私有学校和企业的管理。他们渴望完成对教育、文化和经济事务的控制，他们有智慧发挥临时性的约束作用。当时政府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经常重复提到的口号中：“暂时维持现状，逐步引进必要、可行的改革。”早期的挑战是想办法在不削弱私有经济、教育机构的同时限制他们，在政府能力范围之内扩大政府的控制。

政府控制私人机构的目的并不总是具体、明确的。在经济领域，这方面的领导并没有经济发展的计划，但他们对孰先孰后自有一套。他们把工业的发展置于商业之上，基础工业置于消费工业之上，长期的发展置于短期的享受之上，他们尽量大地投资于那些重点产业部门，而从次要的产业部门撤出资金。从一开始，他们就接管了关键的经济机构，并进一步控制了关键性的商品，如大米、工业生产资料。他们想增强理性和秩序来消除商业活动中的混乱和随意性。他们想尽量增加工人的权利和收入，削减商人的特权。但最重要的是由组织来控制。他们想尽可能

加强国有机构的财富与权力，削弱追求个人目的的私人机构的权力。

政府控制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收集掌握基本的资料，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这一任务十分繁重，几乎是没完没了。刚解放时，没有齐全的学校名录，更不用说教师、学生和课程了。也没有齐全的商业企业名录，更不用说商品、物价和人员了。社会处于动乱中，很难获得准确的资料，即使得到也很快就过时了。因此，政府领导希望获得各个机构、各种活动的信息资料。政府曾致力于登记每所学校、每家公司、每一个志愿组织、每个宗教团体、每个家庭，甚至是每只狗。^① 为了应对变化，不仅登记，而且还重复登记。就政府所作的努力，解放后的那一年可以称作是“大登记之年”。

人口数据资料是最基本的资料，因为没有它，就无法估计失业的情况、所需要的房屋、学校和其他城市服务设施。到1949年12月，也就是解放后的几个星期，政府已完成了初步的人口统计，估计广州市的人口是130万人。这至多只是个大概，因为许多人住在临时居住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临时过客还是永久居民。然而这第一次的大概统计至少为把家庭组织到邻里群体中铺平了道路，邻里群体反过来负责最新的家庭出生、死亡的统计。^② 事实上这些群体并没有认真做好汇报最新统计的工作，因而在1950年5月，政府再次重申72小时内报告出生情况，在购买棺材或分配墓地时应出示死亡证。^③ 1950年春的粮食短缺有助于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④ 政府不仅通过户口登记获得个人信息，而且还通过各种志愿协会的成员名单来了解，如：文化教育协会、福利协会、民主党派、同学会、同乡会、慈善组织等。每次登记后，都要建立一个系统保存最新的基本信息，所有的协会都要定期向民政局递交报告。^⑤

工业登记意味着收集更复杂的数据资料，如工业产品的型号、数量、

① 《南方日报》1950年5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2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5月26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2月10、11日，3月21、22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日。

原材料的来源。1950年1月25日，开始对工厂进行登记，大约5个月后结束，登记企业3115家。^①基于意识形态及实际需要两方面的原因，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工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贡献比商业更具基础性，因而他们尽全力使这些工厂保持运转。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外流、海外华侨投资的减少、私人企业家对共产党意图持续的焦虑不安，使共产党的领导要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也足以心力交瘁。因此，在头两三年中，有关工业的规章少之又少。进出口公司受到严格监督，以防外汇流失，限制消费商品的进口，支持进口更有利于工农业发展的商品，但另一方面私人工业被给予相当大的自由。事实上，登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当局选择准备贷款支持发展、扩张的产业提供一个基础。^②

登记之后，有选择地颁发生产指定产品的合同是影响工业产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大多数一般的各种类型的合同中，政府给生产符合要求、费用固定的产品的工厂提供原材料。尽管政府几乎不影响这些公司的内部管理，但这一体制有助于确保关键材料的产量，有利于政府把工业产品分配给重点领域。^③这种合同制虽然利润低，但人们乐于接受，因为在私人原材料交货不可靠时，公司可以保证稳定的物流，更重要的则是因为管理者已觉察到他们的未来依赖于政府的善意。

商业机构的登记始于1950年3月5日，几天之内扩展到包括所有的街道小贩和售货车。^④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工业相类似，包括商品类型、商品供货源、人员、资产等信息，但商业机构数量非常多，任务更大，因为比起工业企业，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愿意牺牲商业机构，因而对他们采取更严厉的政策。许多商业机构消失，但影响到关键商品流通或会引起

① 《南方日报》1950年6月9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6月2、9日。关于中国经济总的情况，参见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共产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Alexander Eckste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6）；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共产中国经济概貌》（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 S. Congress, *An Economic Profile of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加伦森、刘大松（音译）等：《共产中国的经济趋势》（Alexander Eckstein, Galenson, and Ta-chung Liu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Chicago: Aldine Press, 1968）。

③ 《南方日报》1950年8月2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3月5、7、9、15日。

严重失业的除外^①，对此，共产党领导并不担心。例如，对于街道小贩，32 573 辆售货车被登记后^②，只指定 20 个地点可以集中停放，要求所有的车主报告食品的来源。^③ 同样，饮食业机构的登记完成后，卫生局立即开始制定严格的卫生规定。^④ 到 9 月，登记发现有理发店 1 281 间，从业人员总共 4 200 人，当局有意减少其人数，禁止开新理发店，并要求现存的理发店具备某些特定的设施。与对工业品商店缺乏规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局对理发店的管理极其细致，例如，禁止理发店员工将精力耗费在按摩服务上。^⑤

正如政府和某些工厂签订货物加工合同一样，政府选择某些商业机构代理商品销售。例如，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及从其他省进口而获得的粮食，指定分配给那些接受任务的商店向公众出售。^⑥ 到 1950 年 4 月，已有 338 家这样的粮店为政府代理销售。^⑦

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商业机构中，关键的问题不是控制货源和规定资本额度，而是规定某些最低的职业标准和防止过高的服务价格。例如，1 月 3 日开始的医疗服务从业人员（包括：西医、中医、兽医、牙医、药剂师、草药师、助产士、实验技术人员、护士等）的登记中，卫生局收集每个登记者的训练和技术情况的信息。后来这些资料被用来制定某些最低的开业标准，淘汰不合格者。^⑧

正如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运作的分析那样，中共领导人对所有制及国内控制的问题十分敏感。在他们看来，商业总是企图垄断市场，消灭竞争。他们认为广州的国有和私人机构正在为垄断各自的领域而激烈竞争，他们希望政府获胜。例如，1950 年 4 月 22 日，所有的保险公司登记后，政府宣布不允许私人保险公司投资于其他企业。政府批

① 《南方日报》1950 年 11 月 10 日，1951 年 8 月 21 日。

② 《南方日报》1950 年 5 月 16 日。

③ 《南方日报》1950 年 4 月 15 日。

④ 《南方日报》1950 年 5 月 8 日。

⑤ 《南方日报》1950 年 8 月 21 日。关于这一地区的贸易政策，参见《新华月报》2. 6: 1352—1354 (1950 年 10 月)。

⑥ 《南方日报》1950 年 2 月 9、10、12 日。

⑦ 《南方日报》1950 年 4 月 23 日。

⑧ 《南方日报》1950 年 5 月 26 日。

准且实际上是鼓励对其所关心的工业的贷款，但政府努力保证贷款人不能对借款企业加以控制。并且，还要求每个保险公司向政府储存一定额度的存款，以保证其准备兑现承诺。存款使保险公司可供投资的资本更少，而政府控制了存入的资金。不能满足所要求保证条件的保险公司不得不向政府贷款，从而给政府以额外的手段。^① 为了提高政府企业的竞争优势，政府领导征收重税、规定最高价、限制原材料流入私营公司。政府的企业受到优待，自然造成国有企业繁荣而私营企业受损。

政府的学校同样努力强化相对于私人学校的优势地位。从解放初开始，政府开办了8所大学中的1所，88所中学中的14所，以及更多的小学。^② 通过资助政府学校、降低学费，当局提高了这些学校的准入门槛，从而在录取最有能力的学生人数上具备了竞争优势。^③

最初，共产党的领导更关心所有制及控制的问题，而不是内部结构和政策问题。但一段时间后，政府所有制使之能够加强党的控制，并引进新的政策和管理技术。在公有、私有机构并存的初期，公有机构是变革的发起人，而私人机构经常是被迫追随其后。政府学校引进新的课程，私人学校关心他们自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前途很快起而仿效。政府学校招收农民、工人，希望私人学校同样如此，并为他们提供奖学金。^④ 在经济领域，政府为了控制通胀而降低物价，私人企业除了降价外别无选择。

在早期，尽管政府没有真正管理学校、企业的内部事务，但有许多方法来增加他们遵守政府规定的可能性。方法之一就是利用秘密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汇报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最重要的手段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前关键性的组织特征也许是依靠群众组织来检查、监督私人领域领导的权力。^⑤ 一方面，政府的目的是控制私人的志愿组织，另一方面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人民协会”。^⑥ 正如土改前农民协会检查、监督地主的行为一

①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2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2月5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7月6、11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7月13、28日。

⑤ 关于群众组织成员的统计资料，参见《南方日报》1952年10月1日。

⑥ 《南方日报》1951年8月26日、10月9日；《当代背景》(CB) no. 115, 128。

样，工会组织检查工厂管理者的行为，学生组织检查教员的行为。例如，动员工会监督私人企业的管理者为工人提供有利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共产党政权不断提高工资标准，迫使私人企业更多地把资金用于工资方面，工会自然希望这是强制性的。尽管所有的时候都有工会，但在早期党接手其管理权之前，他们的权力达到顶峰，其后，群众组织的作用也随之下降。

比如，从工会的情况来看，早在1950年1月6日，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完成，随即成立了广州市总工会，有15个分会，分别是：铁路工人工会、邮电工人工会、电机工人工会、公路工人工会、海员工会、纺织工人工会、市政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食品业工人工会、出版印刷业工人工会、交通运输业工人工会、供销社工人工会、手工业工人工会、文化教育工作者工会及化工工人工会。^①到1950年3月，广州市的34万工人中有24万被组织到工会之中。^②

不管怎么说，工会充分地甚至是过分地实施了他们对管理方权力的限制。事实上，政府不得不限制一些热情过度的工会组织者，他们只是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行将权力集中于工人的手中。政府提醒工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逐步完成的。管理方不能干涉在他们的工厂中组织工会，但工人也不能干涉“生产过程”。^③资本家的权力必须得到控制，正在控制资本家权力的工人的权力也必须得到控制。

尽管政府官员忙于设计新的方法来扩大对经济和教育体系的控制，但政府的权力增长过快，使他们一时未能恰当地运用这些权力。官员们没有充分可靠的信息，因为登记的官员没有受过训练，公司和学校也不习惯于保存准确的记录，或者不愿意告诉政府的代表某些信息。即使政府的计划者掌握了更完备的数据资料，也很难准确预测各项措施对经济和学校体系的影响。在最初的几年中，政府的领导只能使用没有经验的人员、不完备的资料及不完善的计划应付，他们期待着他们的权力和使

① 《南方日报》1950年3月23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5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2月5日，4月19、21、24日。

用权力的能力大为增强。

创造收入和财政稳定的条件

在游击斗争时期，共产党形成了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为其活动提供财政支持。他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努力、当地人民小小的馈赠、对他们予以同情的富人的较大捐助以及对缺少善意者的强征以满足游击队生活的需求。然而，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秩序下的财政问题。他们所设想的政府活动的宏图要求大量的资金，甚至连国民党也难以想象。解放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由于征用外国人和其他资本家的资产，政府在没有增加群众负担的情况下获得了大笔资金，但这至多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他们迟早得面对根本的问题，即如何既尽可能增加税收，又能把群众的抵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减少对政府抵触的方法之一是寻求外在的支持，而不是由国库支出。例如，为了免于直接提供救济资金，政府动员邻里组织、传统的慈善组织以及人民中的同宗、乡村、学校或商业等组织来关心照顾贫困者。同样，在攻打海南岛战役期间，广州成为重要的后勤中心，政府不是依靠税收，而是依靠特殊的爱国热情，呼吁捐献。当然，在“支持前线”运动中，150亿元的目标使私人企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尽管总数被分摊到143家不同种类的商业、工业企业，但最大的几家私人企业从其利润中必须捐献的比例要高得多。后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方式。

不仅是前线，而且驻守广州地区的军队也需要支持，这里共产党运用了他们一个长期实践的经验。1949年12月，军管会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使军队实现部分自给自足。^① 驻扎在广州周围的军队负责自给他们所需粮食的1/3。尽管他们不可以开办任何商业机构，却被允许开办自己的小型工厂，从中获得收入。^②

政府官员聪明地把某些项目列于政府预算之外，开始形成并管理政

^① 《南方日报》1949年12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6日。

府机构，修复战争创伤，收拾整理城市，开办政府企业并从事建设，政府除了依靠征收重税之外别无选择。从短期来看，他们沿用了国民党的税收制度，只是稍微加以简化。^① 共产党刚到广州时，中央政府曾给予地方经济上的援助，但他们的目标是不久后要自给自足。到1950年1月，在估算了总体的财政需求后，额度被分摊到各个财源——商业税、农业税、公债销售等，征收工作开始认真落实。

在传统时代，税收量不是取决于固定税率，而是取决于政府的需要。在重税的压力之下，一些批评的人抱怨说这就是共产党首先采用的原则。^② 商业企业分摊的额度是300亿元。它不是依据从共产党开始统治的10月14日到年底而算出的，而是从7月到12月整整6个月，事实上，这段时间的部分税收已被国民党所征收。为了赢得商人的合作，让他们接受这一负担，1950年1月8日专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支持政府的问题。

共产党在农村地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粮食征收是基于1949年后6个月的产量，^③ 征粮工作队为了完成550万斤的额度，^④ 甚至被允许携带手枪。到1950年3月1日，只征收了粮食240万斤。共产党受到了以前对国民党那样税负沉重、命令主义、不顾人民死活的指责。为了消除一些抵抗情绪，当局指责一些征收人员的“命令主义”（命令而不是劝说），谴责其他一些人假冒征收人员，并努力纠正最不公平的负担状况，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并不能征收到足够的税收。

然而，最广为人知的筹款努力是公债销售运动。运动发起于1950年1月10日至16日的广州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前身）第一次会议（各次人民代表大会目录见附录B，表7）。广州各区的各界群众被召集参加大型会议，通过新闻媒体及个人的号召发起连续不断的宣传攻势，^⑤ 动员了从党、军队当局到地方消防队员的1000多人从事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在一些城市共产党用了长达10个月的时间，而在广州，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10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2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3月4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1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2月3、4、9、10日，3月20日。

闪电般的运动几周时间就完成了。

尽管公债被卖给各界群众，但负担主要落在富有的商人、以前的官员和其他富裕家庭的身上。军队没有负担，工人、农民、普通职员、学生承受的只是一般的压力。富裕家庭逐个受到详细调查，有时会在不同的地方受到多次调查，公债销售人员并不总是清楚家庭的财产状况，但他们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多地征收一些资金。运动受到很大的抵制，但并不是因为利率和担心贬值的问题，这两方面的计算都没有问题。公债利率5%，5年到期。到期面值基于当时的生活费用指数，用（每月）6斤米、4斤半面粉、4英尺平布和16斤木炭的价格来衡量。人们抵制是因为购买的压力，即征款量太大，还因为他们怀疑投资的钱是否会归还。当公债到期时，又向投资者出售新公债，人们的担心得到证实。到1950年5月，许多人直接拒绝购买公债。对于突出的事例，当局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批评，施加压力。毫无疑问，公债销售运动和征税一样，虽然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但使商业活动萧条，在早期当局可施加的力量还非常有限，因为一些商人可以干脆关闭企业，移往香港。^①

1952年初，资本家商人还成为另一国库增收计划的牺牲品。资产阶级商人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著名“三反”运动中受到猛烈攻击，^② 接下来“四反”，后来是“五反”运动，反对商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组织地反对“资产阶级吸血鬼”的运动使许多在当地受尊重的人士走向破产，甚至自杀。事实上，的确有许多商人在给政府的报告中隐瞒了他们的一些财产，由于混乱和朝鲜战争的需要而发生严重短缺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惜损害政府利益从中牟取暴利。^③

针对商人的“反”运动，不仅有助于消除他们的不轨行为，而且消灭了1951年的预算赤字。如果商人们上报尚未登记的财产，或交纳未申报的税收，他们可以求得宽大处理。事实上，一些商人在劝说、指责以及一段时间的劳改的威胁等经常性压力下不得不捏造未申报的税收。仅

① 《南方日报》1950年5月6日，11月10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1月10、12日。

③ 《当代背景》(CB) no. 101, 187, 226。

在广州，有多达1 800人在运动中每人上交政府的税收超过1亿元（旧币）。^①

政府和群众组织征收的资金服务于双重目的。除了为国库提供必需的收入，还减少了流通中的资金，有助于控制通胀的压力，而通胀的问题在接管时十分严重。除了征收重税、销售公债，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强制储蓄，^②要求政府、党、军队等单位所持至多只有资金10%为现金形式，有助于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并且，在早期政府只支付很少量的现金工资，主要是以实物代付，供应大米和其他必需品给职员。政府成功地把资金从流通领域中撤出，到1950年6月20日，仅广州就将4 810亿元（旧币）资金转移到银行金库。^③政府认识到如果不能控制通胀，它就不能获得民意的支持。即使在1950年7月开始以工资支付一些职员的薪酬后，工资的计点也是基于当时生活费用的指数。

另一种用来控制通胀的措施是发展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固定、合理的价格向政府或公司的职员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④这些消费合作社是由职员集资而成的，并向投资者提供小额的投资回报。他们对于哄抬价格，或在政府没有将现存的机构合作化的时候囤积居奇进行投机的商业机构形成一种重要的抗衡力量。到1950年1月，已成立了310家这样的合作社，职员投资者8 658人，^⑤到了5月，职员投资者人数达32 151人。^⑥随着这些合作社的扩大，控制了更多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公开市场上的价格也趋近这些合作社的水平。

共产党接管政权时货币的情况非常混乱。1950年2月10日，政府宣布一切外币的流通不管是支付工资、购物，还是外汇交易均为违法。^⑦但

① 《南方日报》1952年6月17日；《当代背景》（CB）no. 187。有关广州商人关于这些运动的观点的记述，参见古克中：《由“劳改队员”到“积极分子”》，香港亚洲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版。有关英语中对运动其他方面的记述，参见鲍大可：《共产党中国早年的“五反”运动，1949—1955》（A. Doak Barnett, “The ‘Five-Anti’ Campaign” in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 - 1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② 《南方日报》1950年6月3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6月20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22日，5月9、30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3月15日。

⑥ 《南方日报》1950年5月30日。

⑦ 《南方日报》1950年2月3、5、10、24日。

拥有外币并不违法，除了因为这一政策实际上不可能执行外，还因为当局希望那些先前犹豫不决的人继续交出他们的外币。仅仅是高压政策还不能使所有人拿出藏起来的钱，但有利的汇率^①与对企图使用外币的人的严惩相配合，确实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次运动开始后的那一周，8 000 多名干部、学生组成宣传队向广州城里的所有人说明外币以后不能再用，应在有利的汇率还有效时拿去银行兑换。^②

不用说，这次行动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外币，使之更容易从外国购买粮食和其他必需的物资。^③ 为使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保持顺差所作的努力获得相当大的成功，原因在于政府限制进口，而且当时私商手中缺少购买外国货物的外汇。^④

共产党的目标是在基本掌握的各个方面之前先控制银行，因为他们认为银行在控制经济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共产党接管时，政府银行的作用比较小，但接管后仅仅几个月，政府就在广州成立了一家人民银行，在市内各处有 7 个办事处，下辖 10 所支行。政府银行迅速扩大，部分是由于对私人银行及其投资的严格管理规定。私人银行不许直接投资于商业企业，但允许其投资于政府批准的工业企业和交通设施。如果私人银行缺少大型项目所需的资金，人民银行可以贷给他们部分款项，收取 20% 的利率，较银行向企业贷款的利率要低。这样，私人银行负债于人民银行，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后者对私人银行活动的控制力。

由于存款人对私人银行的前景不放心，而人民银行的未来更安全可靠，因而人民银行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了鼓励储蓄，哪怕存期只有短短 5 天政府银行也支付利息，并向储户保证（利率）随着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而调整，保证可以随时取款。事实上，最初这段时间一旦结束，承诺只部分获得兑现。

1950 年初，政府开始制订基本预算，控制开支。1950 年 4 月 18 日，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遵从中央政府关于统一金融、经济工作的命令，

① 《南方日报》1950 年 2 月 5 日。

② 《南方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③ 《南方日报》1950 年 2 月 12 日。

④ 《南方日报》1950 年 4 月 17 日。

建立了覆盖整个城市的全面分类账目。^① 干部们随即投入到组织、计划经济开支的工作之中。事实上，有必要接下来就宣布全面试行如何处理基本金融事务的规定，但宣布的时间迟至接管后的第6个月。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起草制订收支预算，记录实际的支出，把手头现金限制到流动资产的10%，编制组织结构和人员名单目录，汇报仓储和国库中的货物与资金情况，将所有收入和支出的数据资料汇总到一个大账户上，熟悉经济工作，避免浪费。^② 为了监督这项工作，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编制市政府的组织结构，一个委员会监督拨给各单位的资金的供给和分配，另一个委员会负责有关削减费用开支的事务。^③

到1952年底，政府金融领域中还存在大量的混乱和无组织现象，当局对于金融的概念还相对简单。政府希望获得更多的收入，整饬费用开支，尽快扩大政治控制。因为党的大多数高层领导对于金融、经济事务没有经验，所以看到形势的发展就很容易感到满意。尽管共产党的领导讨厌商人，强迫他们纳税、购买公债，过度严厉的政治控制使商业活动大为萧条，但共产党的领导在稳定金融局势方面已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已在地方国库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通过简化税收和基本的会计手续，把秩序引入到金融工作中。

改造知识分子

共产党曾努力消灭犯罪，改造罪犯，平定乡村，使农业、工业现代化，而更雄心勃勃的是改造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共产党同样追求消灭古代思维方式，并立刻以与现代共产党国家观念相适应的一整套信仰取而代之。图书、杂志、报纸都已针对资产阶级读者作出调整：共产党希望把他们重新改造为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个人目标，但现在他们要被改造以符合社会目标。几乎是从解放的那天起，国民党的教科书即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在香港或新解放区准备好的新材料。“黄色

① 《南方日报》1950年4月11、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4月21日。

的”音乐、文学受到谴责，取而代之的是反映严肃简朴、自我牺牲、努力工作精神的作品。孩子们接受“五爱”教育，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物。一些报纸被关闭，代之以共产党的报纸。^① 杂志、书店、影剧院受到监督。到1950年9月，共产党企图使高等院校的政治培训标准化。^②

共产党当时的目标可以说脱离了实际，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对此坚定不移。共产党的干部不可能去每个图书馆、每个书店销毁那些和他们的主义相矛盾的图书，但他们尽力去做。他们不可能控制每个教室，每张报纸，每本图书、每份杂志所宣传的思想，他们也尽力去做。例如，在一次大规模对广州城书商的搜查中，约有1.6万册图书被收缴。^③ 然而，即使共产党的干部都受到很好的教育，有很高的鉴别力，但图书也并不完全符合他们在各个领域中所需要的观点。尽管电影的数量要比图书少得多，但到1950年，因为没有足够的苏联电影和中国电影取代它们，西方的“黄色”电影还在放映。共产党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人的衣着风格，但因为布料短缺，人们还得穿自己的旧衣服。共产党执政当局可以命令抛弃所有的国民党报纸，但它们是唯一可用来包捆包裹的纸张。^④ 在广泛铺开的工作中，共产党十分谨慎地将精力集中在新出版物和思想源泉——知识分子身上。

知识分子的声望使他们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问题是要保证他们在逐渐放弃表达异端思想的同时，继续站在执政当局的一边，商人们只要不干扰经济计划，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很满意。但对于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更加警惕，并对他们作彻头彻尾的规劝、教育，因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群众。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一开始就是整个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1952年，为了促进这些改造，共产党执政当局发动了一场特殊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新解放区，1951年中期运动就已经开始，但在广州，共

① 《南方日报》1950年5月10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9月14日。

③ 《人民日报》1951年8月5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12月21日。

产党的领导还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更紧迫的运动上，包括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和“五反”。到1952年，这些运动大部分已完成，或至少已顺利铺开。这年夏天，正在放假的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到运动中，党的领导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①

在广州，一篇标志运动开始的社论已完全清楚地说明了广州知识分子的命运：^②社论认为，广州比其他城市更甚的是，知识分子已为资产阶级和西方的思想所腐化，广州毕竟是一个“消费城市”。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戏剧家坚持在他们的戏剧中使用过多的布景，音乐家没有动摇其对爵士乐的兴趣，作家、艺术家还在贩卖其服务。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使许多知识分子尊重西方的事物，在艺术、音乐及文学领域，外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作家模仿西方的风格，艺术家运用外国的而不是中国的主题，音乐家使用外国的乐器。社论作者不满地抗议道：美国培训出来的一位艺术家甚至傲慢无理地说，没有美国的技术他不能创作。^③

知识分子被斥为没有严肃认真地参加革命和脱离群众。^④一千多名帮助宣传广东土改的知识分子只简单地和中农而没有和贫农交谈，而后歪曲他们的故事。甚至连曾经去过延安的老文化干部也受到谴责，说是受到广州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文联广州分会负责人欧阳山曾拒绝把他下辖的作家派往乡村。^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甚至包庇地主，^⑥但大多数是“只顾埋头推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⑦知识分子还没有从他们小资产阶级的态度立场进步到如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典讲话中所指示的那样，在新社会发挥适当的作用。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服务的。知识分子

①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3日。西方人关于个人思想改造意义的论述，参见罗伯特·J. 里夫顿：《思想改造和集权心理》（Robert J.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1）；埃德加·沙因：《威胁性劝说》（Edgar Schein, *Coercive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41）；李克、李又安：《解放的囚徒》（Allyn and Adele Rickett,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Cameron Associates, 1957）。

②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5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5日。

⑥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⑦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的活动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兴趣，而应该“有组织，有计划”。^①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要检查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私的）还是无产阶级的（自愿为人民大众和共产党服务）。党的华南地区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树立了一个使用无产阶级能够听懂的语言的好榜样，他把问题说得简单明了：“思想改造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就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你是否能够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②

为了尽量减少知识分子的抵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毫不引人注目。1952年5月，党要求知识分子阅读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延安座谈会十周年纪念。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它甚至不叫这样的名称。首先引入的是“三反”运动的新阶段，一旦这一运动在政府中完成，似乎很自然地应转到知识界。甚至在几周后，负责开展大学中思想改造的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高等教育节约检查委员会（大学名）分会”。

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总的高等教育节约检查委员会协调广州的运动。委员会受党的宣传部指挥，它的成员来自政府工会、青年团和学生团体。^③两周后，即5月23日，在一次有300名广州文学、文化界领导参加的大会上宣布运动正式开始。^④在教育界，运动的总部已率先于5月17日在中山大学成立。总部是培训思想改造工作组的基地，每个工作组大约有15名至20名成员。而后，这些工作组开赴广州的其他教育机构。^⑤

也许最广为人知的是岭南大学的例子。由于它的规模及其和外国教会组织的紧密联系，岭南大学成了运动的主要目标。^⑥在岭南大学运动正式开始前几周的准备中，大学的教员学习基本的政治著作，特别是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⑦思想改造工作组在岭南大学成立总部后，其下又分成

①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5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6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4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5月26日。

⑥ 《南方日报》1952年9月13日。

⑦ 《南方日报》1952年8月7日。

宣传、文件资料收集等几个小组，并成立了单独负责教师、学生及其他职员工作的小组。在筹备工作中，与青年团的联系显得特别关键，因为学生是收集教员思想、行为信息的主要来源。

运动于7月27日开始，随即是一系列的大会。运动一直持续到9月12日。当时，教员把注意力转向新学期的开始。在第一次大会上，有1100多名学生、教师及其他职员参加，党和大学的主要领导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并大致勾画了思想改造运动后的思想状况。^①第二天，当时迅速上升为广东的党领导的陶铸向60多名指导运动的领导干部概括地勾画了运动的计划。在一次大会上，他呼吁知识分子要有爱国主义热情与服务意识，敦促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拿出国家发展的方案计划。^②7月31日，召开了另一次大会，其主题是燕京大学思想改造的过程，因为这所北京的教会大学被认为是岭南大学开展运动的好榜样。^③

运动的真正工作是教员口头和书面的自我批评以及教员间在小组中的相互批评。在运动结束前，每个教员都要写一份关于个人背景的材料，检讨自己过去对共产党的正确思想和行动的背离，并决心在未来改正错误。所有的教员每天至少参加一次小组会，讨论他们自我检查的进展。与此同时，学生进一步给思想改造工作组重新收集有关资料，以此与每个教员对自己的评论相比较。^④教员着意要写一份可以接受的检讨，因为他必须一写再写直到思想改造者认为其检讨交代得彻底、真诚程度满意为止。^⑤

这一基本的批评工作一完成，其结果就立刻在更广泛的群众集会上宣布。受西方文化腐蚀最深的杰出教授公开张贴他们的检讨，并且在批判大会上听他们的学生和同事当面忆述反映自己恶劣品质的事情。思想改造工作队管辖下的宣传小组举办“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资料回顾”展

① 《南方日报》1952年8月7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8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8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8月21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9月1日。

览，表明西方渗透的严重性及岭南大学的一些人对外国人的奴性盲从。^①

到10月中旬，运动后的讨论结束，大学的主要领导全部都呈报了他们的检讨，并决心使其领导工作和新社会相适应。^②实际上，所有1640名教职员、学生都参加了运动，183名教员全部都公开写了自我批评。运动的总结报告中列举了运动的成功之处是：摧毁了“爱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使大学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准备；结束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苏维埃的思想；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党和青年团的威信大大提高。^③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紧接着是广州地区所有大学的调整重组计划。思想改造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令可能反对大学重组的力量都保持沉默。尽管宣布新计划时，许多教员被调出、降级，但没有任何人公开表示不赞成。运动结束时，一群在运动中通过施加压力才保证全心支持政府的教授接受了官方《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们表示赞成的看法可能受到一点强迫，但他们公开一致的看法，证明教员不能不站在党所指示的道路上。^④

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重要的作家、教授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完成，低层次的广州各公私学校的教师中也随即开展了类似的运动。和以前一样，运动主要是说明政府对教育界的基本政策，自我批评、小组学习以平息抵触情绪。^⑤

尽管知识分子被置于强烈的群体压力之下，肉体上也备受折磨，对他们个人罪过的揭发使他们屈从，但极少有像把缘起于西方的奥威尔式洗脑噩梦合理化那样受到充分关注。正如后来的“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揭示的那样，思想改造并没有神奇地把知识分子转变成机械人甚至是随大流的共产主义者。但运动至少清楚地说明了党所期望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思想方式。它压制了公然的反抗，并且至少获得少许支持。

① 《南方日报》1952年8月21日，9月3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9月6、11、13日，10月21日，11月6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30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9月8日，10月13日。

秩序的恢复

对早期几年作一大致归结的话，会使这一方案听起来比实际上更有序、更有计划，因为它没有细致地关注事件始末的细节、不连贯性、失误、管理上的冲突及误解，这些情况比那些没有如此雄心的政府所表现的要严重得多。基本计划有一定的条理，但并未表明详细的计划已早早作了安排。时间的安排随机应变，当机会来临时，就动员可使用的干部去紧急应对。早期这些年的特征是混乱、无序和焦急的期待。大量复杂而又迫切的问题令官员们疲于奔命。

1952年末接管三周年纪念时，党的领导认为这标志着已度过了最初的时期，他们的成就是值得自豪的。^①一般认为，他们没有改变广州这座过于拥挤的商业城市的基本结构。尽管珠江大桥已得到重建，越秀山体育馆已开门，供水设施扩大了，许多道路得到修整，但新的建设还很少开始，很少有新的工作机会，一些热闹的小店、小推车甚至消失不见了。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工作于以前的地方。对经济和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控制还不全面，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秩序第一次得到恢复。飙升的通胀和繁荣的黑市已结束，物价稳定。赌博、卖淫、鸦片实际上已不存在。敲诈勒索、掠夺抢劫已大大减少。官员们有一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这成了公共道德的基调，而这在以前恰恰是严重缺乏的。街道比以前更干净整洁。以前没有人交纳的电费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缴纳了。

新秩序在许多方面和广州的过去不同。除了一小部分非华人还在沙面外，外国人和外国公司已经离开。基层组织，如小的邻里组织已渗透到广州各地。人们讲授学习第一次出现的支持工人、农民的新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动员工人、妇女、青年向旧官员、商人、教员施压的做法是国民党所不能想象的。

如果说早期的成功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话，那么就在于它结合了孤注一掷的决心、压倒性的强大权力以及对可能性的判断力。和国民党相比，

^①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1、14日，12月31日。

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从而粉碎了一切反动势力。它的力量来源于他们的军队、有纪律的组织、精心的计划以及培育出的群众基础。尽管拥有这样的权力，成功的领导人常常提醒他们下面的干部，对社会的打击面过大会带来灾难。他们逐步采取行动对付反革命、工厂老板、地主、腐败官僚、商人和知识分子。即使是在每个群体内部，他们也没有立即打击所有的人。他们首先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基础，打击少数关键的目标，保证其他人不用担心。通过精心选择打击的目标，排除潜在对手的权力和影响，使其他人保持沉默服从，从而巩固他们的控制。

回顾这些年中所使用的不准确的术语——干部们在这方面所花的学习时间更多——似乎很荒谬可笑。所有各种人几乎都不加区分地被贴上法西斯、封建残余、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等标签。尽管所用的术语多变、混乱，但有一样事情是一致的：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被贴上这些标签，所有可利用的宣传机器都宣传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人民”、“群众”、“工人”被经常提起。在共产党的言语中，党和政府当然是站在工人这边，而其他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

扩大控制的主要工具是运动，主要的依据是爱国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共产党并没有创造爱国主义和希望，但他们对其进行了激发和引导。群众响应是因为多年的混乱无序已使他们别无希望了。在这种意义上讲，在广州革命的时机是成熟的。

到1952年底，共产党已控制了广州，并为新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做好了基础工作。但在这项工作认真开始之前，必须在农村建立更强大的政治根基。并且广州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关系这基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三章 中央控制：土改的遗产， 1951—1953 年

首都和地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是任何国家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在古代中国，每个新王朝的开创者通过军事征服对以前各地区的敌人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控制。但掌管这么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王朝的开创者被迫和各地的地方领袖结成联盟，以辅助其征服。在取得胜利之后，征服者不必再征服敌人，但他们必须找出一种和帮助他们掌握权力的地方领袖建立平稳关系的途径。

至少，地方联盟起到了限制帝国权力的作用。帝国政府意识到如果对以前的联盟进行挑衅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因而发明了一系列应付这种局面的技巧。北宋初年，皇帝赵匡胤为了答谢他的地方支持者，马上赏赐给他们优厚的俸禄。而皇帝没那么仁慈，通过遣散他们以前的盟友从而排除了对权力的威胁。1648年，清朝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遇到强烈的抵抗，他们被迫作出妥协，允许南方半独立的“三藩”存在。这种独立状态成了麻烦的根源，直到1681年，经过八年的战争，康熙皇帝才征服了“三藩”，强化了中央的控制。^①

蒋介石执掌权力时，他非常感谢地方军阀的支持，为了保持他们的忠诚，很难加强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控制。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制，通过支持、劝说、欺骗、威胁、消灭他的盟友，才能在表面上保持中央控制。

1949年，共产党当政时，建立了忠诚的组织，其支部遍及全国各地。党吸收自己的地方领导人，对他们进行训练和纪律约束，从而减少了武装叛乱的威胁。日本入侵后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扩大了对中央政府支持

^① 曹开甫（音）：《“三藩”之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Tsao Kai-fu, *The Rebellion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against the Manchu Throne in China, 1673-1681*）。

的基础。主要中心之间的新型交通、通讯联系使协调工作更加容易。这些统一的力量决定了中央的控制更为牢固。

新的情况改变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关系的本质，但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游击队生活培养了地方主义，而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从1927年到1949年，除了共产党自己的根据地外，其他各地党组织只能在敌后战线起作用。共产党军队的交通、通讯是很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武装力量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和中央失去联系。在这段岁月中，地方力量必须在相当大的空间内独立行使权力。但1949年后，复杂的国家权力系统要求重新调整，使中央有更大的控制权。

中央政府给地方下达的指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实际上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政府、公共安全、群众组织、经济发展、教育、公共卫生等等。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争执的机会也很多。当发生争执时，不可避免地激起地方主义的情绪，使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关系出现紧张。在变化多端的条件下新政权的新政策的试验性，造成了政策的不连贯，从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毫不奇怪，广州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主要冲突具体反映在一个政策不断变化的重要问题上，这就是土改运动。

因为远离首都，又有山脉分隔，广东历来总是给中央政府带来难题。广州不仅在空间距离上和北方分隔开，而且社会的距离也十分遥远。广州的地方主义曾经是反对清朝统治和国民党的潜在力量，当共产党到来时，它并没有消失。广州人并不准备屈从于北方人，北京的领导人同样也决心防备广州地方主义的危险。

可以肯定，由于对国家的忠诚献身，地方党员对党的纪律的遵守，以及广州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北方同志之间的个人联系日益增多，使地方主义的情绪缓和了很多。事实上，在北京担任要职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广州工作时就有了广州朋友。许多当地的领导人如叶剑英、朱光曾在延安工作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甚至在延安，广州人就意识到强烈的地方主义的障碍使他们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同志分隔开，但在广东，广州人的地方主义更强烈。随着

1927年的惨痛失败，一小部分共产党人留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他们和共产党组织的主流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尽管1946年至1949年间，一些广州人在香港和北方共产党联系上，曾生和他的东江游击队在1946—1947年间在山东参加了共产党的其他部队，但是1937—1949年间，广东共产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地方游击队的运动。他们所关注的是地方，党的会议上所用的语言是方言：潮州话、广州话和最普遍的客家话。

反对广州地方主义的斗争不是直接发生在广州和北京之间，而是在广州和武汉的中南局之间。武汉地区的管理组织包括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南局和政府组织——中南区军管会两部分。武汉的官员在工作上在北京的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他们的职责是在中南地区执行北京的政策。北方人在武汉的领导下被派往广东，实际上在广州的争执是广州干部和由武汉派往广州的外地人之间的争执。

1949年，广州人有保留地准备接受随南下工作队而来广州的北方年轻知识分子。多年在山区的战斗经历使他们很难屈服于比他们年轻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年轻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没有经受“革命斗争的考验”。这些北方人到广州来任职没有经过艰苦的斗争，而是像广州干部所说的：“坐火车下来的。”南下工作队被告诫要避免命令主义，与当地干部合作，但北方人则不能回避这样的看法，即广州人只有游击队的经验，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在摆在面前的复杂管理问题。他们认为，过多地讨论当地的情况只是为了妨碍他们执行上级的命令。

中央政府希望缓和与广州的冲突，给广州的共产党人以荣誉和权力。刚解放不久，面对胜利的激动，对手头大量工作的投入，以及对国民党的共同仇恨暂时弥合了北方人和广州人之间的分歧。

但在解放一年多以后，冲突加剧，中心是围绕另一个必须详细考虑的基本问题：土改。当时的省长，党的第一书记叶剑英形容土改是广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① 土改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华东地区问题很大，但广东运动的进程比其他省更慢。^② 土改运动涉及农村最基本的政治、经济问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18日。

^② 其他省份的信息，参见《当代背景》(CB) no. 142, 143, 146;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99。

题。在这样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中，毫不奇怪，广东全省 1/3 的干部、党的中南局近 1/4 的干部直接参加到土改运动之中。尽管广东工作队所用的人不多于中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但广东在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成员总数大约有 12.3 万人，其中包括 1 万名北方军人。^①

甚至市政府官员也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约由 73 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此外，还要求城市中的干部密切合作搜寻隐藏在城市中的地主，将他们遣返农村接受审判。但广州涉入土改运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刚解放后广州市和广东省在领导上一定程度的交叉。土改是共产党控制农村的第一步，但到广东土改运动结束时，它不仅使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地方的党组织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改把半独立的游击队组织转变成一个服从纪律的、由强有力的中央管理的前哨，在这方面土改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有效果。

土改运动的开始

1949 年，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就如何在后解放区进行严厉的土地改革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论。1950 年 6 月 30 日生效的《农业改革法》^② 标志着主张温和者的胜利。其中第 6 条规定允许富农保留财产和土地，第 10 条规定地主可以保留自己耕种的土地。允许自愿的地主像普通农民一样耕作。

1950 年 6 月 14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大会上关于开始土改的重要讲话中，刘少奇提出更温和的土改政策倾向的方案。他认为，1946—1949 年间，由于东北的军事局势，富农和地主大多数站到敌人的一边，要求以激烈的斗争镇压他们。1950 年，随着共产党的胜利，富裕

^① L. P. Deliusin: 《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奋斗》(莫斯科, 1964)。

^② 《南方日报》1950 年 7 月 1 日。广东土改的许多重要文件重印于《当代背景》no. 47, 51 128, 165, 184, 211 226. 其中 no. 250、253 涉及朱光。1950 年 2 月土改前的法令见《胜利的完成和巩固》，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23—30 页。全国性的土改和合作社的指示，参见 A. P. 布劳斯坦：《共产党中国的基本法律文献》(Albert P. Blaustein, *Fundamental Legal Documents of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othman, 1962)。

阶层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后解放区的土改可以在较少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因此要注意不妨碍富农作出贡献。刘少奇曾仔细研究过苏联的事态，他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消灭富农所产生的困难。刘少奇甚至准备鼓励以前的地主自愿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而生活。^①几周后，中央委员会根据这种对土改的看法，发布文件对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执行更温和的土改政策提供指导。

根据中央政府这些概括性的总体说明，武汉中南局的领导开始制订计划开展辖区内的土改运动。他们从对土地产权做大略的调查开始。为了补充这些，他们开始对所管辖下的每个省的“试点”情况做更详细的调查。根据这些数据，首先大致估计大约3.5%的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估计这些地主控制着这一地区30%—50%的可耕地。根据这一总的调查，中南局要求每个省作出更详细的土改计划。^②

1950年9月15日，在中南地区政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土改委员会主席李雪峰明确说明关于开展土改运动进程的分歧。在说明了观点不同的一般性方案后，他指出一些同志想在土改中实现过于强硬、过于快速的推进，他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委员会将站在有序非暴力运动的一边，他说：“我们必须根据法律和道理来开展斗争。”^③根据这一讲话，中南土改委员会依据温和的政策倾向制订详细的运动方案。

甚至在李雪峰讲话之前，已经从武汉派出少数干部去研究广东的情况，开始训练土改运动的干部。^④10月初，广东省政府派干部去潮州地区的揭阳和客家地区的兴宁、龙川三个县进行土改运动试验，为进一步推进广东的土改做准备。^⑤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因此被选为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试验田。

1950年10月5日至16日，第一届广东省各界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解放以来广东最大型的官方集会，时间就在广东土改委员会名单宣

① 《南方日报》1950年7月1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8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11日。

④ 《南方日报》1950年9月12日。

⑤ 《南方日报》1950年10月24日。

布后几天。大会主席方方宣布土改运动开始。^① 在广东的官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像方方那样视野开阔，忠诚地追随党组织。方方参加革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他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的成员，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② 因为作风以及来自农村的背景，他深受农村干部的喜爱。在游击队期间，作为广东党的重要人物，他和广东各县党的领导建立了牢固的基层联系。他是潮州人，但他会说客家话、普通话和广州话。解放后他担任中南局的第三书记，但实际上他是广东党务方面的首要人物。^③ 中南局的党的第一书记叶剑英站在更高的国家立场上，虽然他是广东人，但自1927年以来，他很少在广东留驻，甚至在解放后才回到广州，他担任许多军政方面的职务，在武汉，他还担任中南军区副政委。中南局的第二书记张云逸担任广西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没有参与广东的事务。因此，实际上广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物还是方方。

回顾方方关于土改的重要讲话，很难找到他后来遭受迫害的原因，因为他不比刘少奇、李雪峰更温和，而他们俩当时都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即使方方没有用“和平土改”这一说法，但后来他的反对者用这样的说法来标明他的立场。他确实说过土改应有一个“有序进行的计划”，他还讨论保持富农经济的必要性。他确实敦促要警惕在土改的过程中不妨碍工商业的发展。他确实说过如果地主不满针对他们的判决，他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向法院申诉。但这些温和的说法和以前刘少奇、李雪峰的讲话在精神上、字面上都是相符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重要发言的传统惯例，方方关于土改的重要讲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其中他特别注意处理属于华侨的土地问题以及分配沿海沙地的问题，划分小块的沿海沙地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④ 但这些强调也完全符合北京的指示：每个省负责起草适合当地情况的土改政策规定。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6日。

^② 方方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当时学生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中的五个班级的名册之中，可能当时他用另外的名字。不管事实如何，广东党内承认他参加了农讲所，这增强了他作为老革命的地位。

^③ 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并没有正式的广东省委，而只有党的华南分局，它包括了广东和广西，但为了实际的考虑，广东和广西各自有单独的党委。

^④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6日。

事实上，广东土改委员会准备的开展运动的“46条规定”在发表前已经得到中南土改委员会的批准。进一步说，这一文件的最后一条明确提出规定的改变必须得到中南地区总部的批准认可。无论是方方的讲话，还是“46条规定”，或是配合开展运动的其他文件都没有背离武汉领导人愿望的迹象。^①

然而，一旦广东发动这一运动，更激进的土改政策倾向开始在中南总部占上风。在解放初期，必须作出许多重要的决定，许多人第一次肩负着新的责任在一起工作，许多环境需要重新评估，政策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用激进的新秩序来调整这样一个缺乏组织的近6亿人口的国家，毫无疑问会有分歧、不连贯性和政策指示的激进变化。土改中政策的突然激进化，无论是北京还是武汉都可以明确地归于一个具体的外在刺激：朝鲜战争的激化。^②

广东的土改计划在1950年10月5日——也就是大会召开的那一天——前已经完成。但正当会议开始时，联合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11月9日，《南方日报》宣称抗美援朝运动正“掀起一个新高潮”^③。11月中旬，武汉的官员宣布了新的更严厉的土改政策。

正如在东北地区一样^④，战时状态似乎要求更强硬的土改路线。朝鲜战争引起了新的担心，背离共产党政府的广东地主会对抵制共产党的前景更加乐观。他们可能会从事破坏，或是和香港、台湾的国民党联系。即使没有破坏，新政权的敌人至少会利用党的领导全心投入朝鲜战争的机会削弱党在农村的政权。早期的土改报告有很多例证说明许多农民不敢反对当地的地主。^⑤为了使农村中党和贫农的政治力量占优势，许多领导人认为对地主、富农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这些领导人希望通过消灭最有影响的地主，动员农民在公开的“斗争大会”上控诉谴责地主、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4月8日；另见于省长陈郁的讲话（《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0年11月9日。

④ 艾伦·F·欧海亚：《中国农业改革法背景》（Ellen F. Ohja,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Agrarian Reform Law," forthcoming in Papers on Chin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⑤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10、12日。

富农来转变农村的政治形势。

1950年11月18日，武汉中南土改委员会召开会议加强土改。李雪峰助手杜润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土改新的强硬政策的重要发言。^①也许李雪峰自己不想发言，因为他并不支持、同情新的激进倾向，或许他只是想回避和早前讲话相矛盾的尴尬局面。杜润生以战斗的口吻宣布，对地主密谋的严重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必须更严格地划分阶级路线，要有激烈的斗争。他说此前太过顾忌完全“不顾后果的打杀”，而土改运动最大的危险正是在于认为土改可以和平地开展。杜润生宣布中南地区的土改斗争要加强，进度要加快，不仅是针对广东省，其他省份也一样。^②从一开始，土改不仅被认为是经济斗争，而且是关于农村领导权的政治斗争。朝鲜战争让关注点倾向于政治方面。后来成为党在全国农业系统的领导人的邓子恢在武汉的另一篇重要讲话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了政治事务已成为新的焦点。^③

土改运动在广东开展时，一些地主逃往城市，或移民离开中国，另外一些留在农村的地主则试图在较有利条件下利用土改所出现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们比农民要有利得多，他们识字，因此他们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方案。他们和村庄外的联系较多，这使他们获得更多广州的日常信息。为了应对土改，他们采取了许多办法：一些人放弃了部分财产，一些人借出或隐藏部分财产，一些人答应给农民额外的好处，以便在审判时对他们更宽容。^④由于不知道这些处理的用意，或是期望在土改后仍继续拥有这些财产，农民常常很合作。那些有朋友、亲戚是干部的地主，积极培养这些关系，希望受到优待。为了在土改中缓解经济上的冲击，保留一些权力基础，不少地主向干部馈赠礼物，甚至把女儿嫁给干部。土改运动发生变化、加快进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地主来不及巩固他们的地位、阻碍新政权铲除他们的权力。

即使地主失去了财产，他们也有其他办法保持其影响。例如，官方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10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10、15、22日。

③ 《当代背景》(CB), no. 227, 1951年1月8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2月27日。

迁移宗族坟墓不会破坏族长决定谁埋在哪里的传统势力。因为以前的村中权势人物通常在地方宗教事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农民们还受到个人关系、宗教迷信思想及担心报复的心理的影响，而不愿意批判他们。许多地方干部认识到农民不愿意斗地主，于是让斗争会轻松过去，而后迅速划分土地。许多干部意识到很难使不同宗族的贫农、中农相互合作，于是他们只是简单地站在一边或另一边的立场上进行分地。正如共产党的领导所指出的，土改中最大的危险是没有团结农民，只是“走过场”、“做样子”，没有彻底地使地主丧失威风。除非克服这一危险，否则，一些农民不敢拿以前地主的土地，共产党在农村的权力还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最后，共产党所期望的引起农村发展、变化的方案过于激进，得不到以前农村首领的密切合作。那些非常顽固抵抗的人，以及那些容易成为抵抗焦点的人必须被弃置一边，如果他们还留在农村，必须使他们威风丧尽。只有当农村的权力转移到彻底服从共产党的新领导的手中，只有当农民的愤怒被激起，权力不再会有回到以前地主手中的危险，只有当地主诚恳地“向群众低头认罪”才可以认为土改完成了。1950年12月的这些争论对广东来说并不新鲜，但当时他们确是取得了突出的新成绩，具体体现于土改中新的强硬路线。

南方抵抗的原因

土改政策的突然强硬是使广东干部感到极其窘迫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是在一年前才掌握权力，他们所倡导的运动中，没有哪一项像开展土改运动这样做了充分的准备、广泛的宣传、鼓动。他们因在农村地区作为以前的游击队领导而广为人知，现在他们想向公众展示他们有能力处理大型复杂的组织问题。他们面对的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他们第一项重要运动的基本倾向被中南局的领导宣布是错误的，他们必须加快运动的进程，采取更有力的立场反对富农和地主。方方没有作公开的表态，但土改委员会副主席李坚真在武汉发出新的强硬路线的11天后承认广东土改委员会初期的看法有错误。她表示土改委员会正在进行内部讨论，将

服从中南局的指示，在委员会内部“进行小组批评”。^① 在她的公开讲话中，她实质上是支持中南局提出的新方案。她重申土改必须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但同时她没有像杜润生在武汉那样针对那些主张更和平地进行土改的人进行恶性攻击。在正式的公告中，广东的官员支持新的强硬路线的主旨，公告发布几天之内，进行土改试验的县份从3个扩大到11个。^②

方方很显眼地保持沉默，他甚至没有公开宣布支持中南局新的强硬政策。即使在重要的1951年的新年讲话中，他也轻描淡写地回避了土改问题，没有特别强调支持中南局的强硬路线。尽管方方没有公开批评新的强硬路线，但他被认为是傲慢而暴躁的人，可能是他在私下的谈话中强烈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尽管争论的“内部故事”不为外人所知，但分歧的基本事实已为公众知晓：方方从没有公开支持强硬路线。在接下来的中南地区土改会议上古大存而不是方方代表广东。中南局对广东土改运动的领导发表了公开的批评意见。不到两年，方方受到批评，不再担任土改委员会主席，从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不久又调到其他地方。

令人困窘的政策变动并不是使广东官员感到郁闷的唯一原因。新政策令人深感不安是因为它真正触及广东社会组织的核心。新的强硬路线的本质在于划分明确的阶级界线，严厉处理富农、地主及传统农村秩序中的领袖人物。中国社会的本质结构不是基于社会阶级，而是基于同村、同姓、同一血统、同一学校、同一工作地点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正如共产党所指出的，农民的“阶级意识水平低下”，必须给予提高。^③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关键性的分歧不是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分歧，而是一姓与另一姓、一村与另一村之间的分歧。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在于广东的社会结构使其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在华南地区，特别是韩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4日。

②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2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3月4日。要了解对土改初期广州郊区一个村庄的人类学观察，参见杨庆堃：《中国社会：家庭和村庄》（C. K. Yang, *Chinese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关于在新解放区的土改，参见韩丁：《翻身》（William Hinton, *Fansh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地区，经济已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要比北方少得多。^① 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许多土地是族田或是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至少有理由怀疑后来被判为地主的许多划分。

还有，广东的华侨人数最多，他们占有全省 1/5 的土地。^② 处理华侨占有土地的问题是土改委员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如果可以说明他作为一名劳工而不是剥削者从海外赚钱，土地的占有者是否应该划分为地主？如果土地的所有者生活于海外，干部是否应该控诉其在中国从财产中获益的家人？如果不这样做，其他被划分为富农、地主的人是否会感到严重的不公平而更坚决抵抗？如果占有土地的华侨受到压制，新政权如何吸引他们急需的华侨投资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华侨的阶级划分很困难。毫不奇怪，在土改的过程中，处理海外华侨财产的做法经历过这样的起伏。^③

广东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韩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化的程度比中国其他地区要高。许多富农和地主大量参与商业活动和小规模经营的工业领域。因为在解放初期特别担心扰乱经济，政府对从事工商业的人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当针对富农和地主的严厉政策宣布时，对于资产阶级较温和的政策和对待地主阶级较为严厉的政策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难题在于，是把从事商业的地主划分为地主还是作为资本家，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决定会影响到一个人是否会丧失其资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及生命。有商业利益的地主急于想被认定为资本家，一般移住在城里，大部分时间忙于商业和工业活动。问题在于不是简单地划分阶级界线，而是把被判为地主的人遣返回乡。城市中负责工商业发展的干部通常倾向于让这些地主留在城里，以免使他们的活动受到干扰。随着土改运动越来越严厉，农村的干部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① 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John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南京：南京大学，1937年）。

② Deliusin, p. 144.

③ 《南方日报》1951年3月14日。

要克服城里资产阶级地主及城里保护他们的干部的干扰。土改运动之初，这些资产阶级地主有时会获准留在城里，但随着运动越来越激进，社会上要求把他们划为地主，送回农村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①

在南方，农村家族群体一般比较大，有时全村就是一个家族。^② 在有几个不同家族的村庄，比较容易利用不同家族间的矛盾分歧激起对乡村领导的批评。例如，处于不利地位的小姓家族的成员很容易和共产党干部合作，党的干部对他们批评村庄中最大姓氏家族头领的行为给予正式的鼓励、支持。但在所有人都同姓的村庄，他们共同的联系使外人更难激发贫穷者去“斗争”他们的富亲戚。例如，偶尔有报纸报道在一个邓姓村庄中开展工作如何困难，它反映了在单姓村庄中明确划分界线所遇到的障碍。^③

土改工作队固然可以经常利用一个大姓家族各支系之间的相互仇视，^④ 但来自外人的压力也有可能很容易强化家族间的联系，而不是使之解体。可以肯定，土改工作队并不缺少推进其运动方案的办法，有时可以鼓励一个村庄的穷人去批评邻村的富人。^⑤ 或者，正如一个受到表扬的成功处理问题的例子中那样，^⑥ 工作队可以超越传统村庄或宗族的纽带，把穷人集中在一起，使他们相互合作“斗争”地主。但贫农和中农间结成新的社会联盟以反对富农和地主常常和现存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阶级仇视的基础有时也存在，但这种基础决不是普遍的。土改前的减租，目的是为了提阶级觉悟，而提高阶级觉悟的工作给当地干部添加的负担比只是占用、重新划分土地要繁重得多。事实上，必须动用军队和民兵的武力才能使运动进行到底。

然而，强硬土改路线给干部们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和迫切，也更影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17日。

② 莫理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部的家族组织》（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莫理斯·弗里德曼：《中国的家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③ 《南方日报》1952年2月3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1月15、16日，1952年2月6日。

⑤ 《南方日报》1951年5月8日。

⑥ 《南方日报》1951年7月9日。

影响到切身利益。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的大部分共产党领导留在了广东，他们还有很深的地方根基。目前没有有关广东的全面数据资料，但邻省广西的一期土改干部培训班中，500多名干部中13%有地主背景，5%有富农背景，24%有小资产阶级背景。^① 这些不是来自同一阶级的干部都有一些朋友或亲戚很容易就被划为富农或地主。在1949年以前，人们期望干部可以照顾、保护他的家庭、朋友和以前的伙伴。土改运动的强硬路线意味着地方干部必须切断和那些被划分为富农和地主的人的个人联系。如果划分阶级界线，许多干部希望他们可以对其朋友有所例外。在来自上面新的压力之下，这样做绝对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些广东最高层的共产党干部本来就出身于富裕的家庭，或者是有亲戚被划为富农和地主。这些干部承受着特别的压力，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随着土改运动越来越严厉，不仅他们的亲戚朋友有危险，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受到指责。正如一篇社论所清楚指出的：“一些革命者原本出身于地主阶级，但现在必须和他们的背景明确划分界线。”^②

直到1957年一些案子被揭露出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才报道了最高领导和他们的具体联系。从广东逃出来的逃亡者称，广东的最高层领导也有他们不想与之断绝关系的地主朋友和亲戚。据报道，广东最大的地主方十三是方方老家邻村的，是方方的一个亲戚。其他的报道指出方方利用他的影响帮助他的亲戚和朋友。^③

尽管许多谣言无法得到证实，但可以知道方方和广东共产党的其他主要领导出身于相当舒适的家庭的背景，很难想象他们能够避免是否帮助他们亲戚朋友的两难困境。即使高层干部不直接发挥影响，基层干部在执行土改政策时也可能对他们的亲戚很宽容，他们不愿在高层干部的统治下冒招致受敌视的风险。随着土改运动越来越严厉，这些判决也会为高层干部招致麻烦，尽管他否认与地方干部有串通共谋。

对地主更加严厉的政策倾向影响到他们个人，因为这常常违背他们的正义感，并且造成了是否会赢得群众支持的实际问题。在中国社会中，

① 《当代背景》(CB), no. 184: 55。

② 《南方日报》1951年1月22日。

③ 参见《香港中国日报》1951年7月22日；《南方日报》1952年7月28日。

传统上认为，尊重以前的个人关系是有道德的，对地方联系的背叛则违背了地方民众的情感，不能让群众亲近、喜爱干部或共产党。在1937年到1949年游击战争期间，广东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构建各阶层一致对敌的统一战线的全国性政策，在解放以前，许多当地共产党曾劝说村庄首领：如果他们和游击队合作，解放后可以获得优待。干部们全心希望能兑现这些诺言，但现在他们的上级告诫他们必须突破这些联系，明确划分阶级界线。既然统一战线精神被抛弃，要划分更明确的阶级界线，并且要求干部们背叛这些老关系，对于这些要求，即使是忠诚的党员，要在特别的朋友关系和彼此间的阶级关系之间作出选择也不容易。

即使是在新的强硬路线下，对曾经“帮助革命事业”的地主也会给予一些考虑，但现在问题是判断这些地主在游击队期间对共产党事业的贡献极端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当地干部和地主本人才真正了解真相。一个高层干部怎样才能判断当地干部为一个地主说话真正是由于其以前对党的事业作出过贡献，还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关系而为他说情？因此很难准确判定一个地主几年前对党的事业秘密作出贡献的实质，有可能是一个干部在为某个地主制造一个合理的例证。这一困难还意味着干部为地主说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怀疑为和落后阶级串通合谋。只有最无情的、最机会主义的干部才能避免有别的想法，并且放弃他的老关系。

大部分干部已准备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富裕的朋友、亲戚必须放弃其土地，分给贫农。但他们不准备猛烈攻击其人格，或在某些情况下危及他们的生命。大部分干部已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意味着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崛起。他们乐于合作去抨击那些非常残酷、对农民犯下明显罪行的地主，但他们抵制来自上面要求严厉处理其他地主、富农的压力，尤其是在影响到他们个人的时候。

南北冲突的激化

如果说广东的干部对来自外部更严厉的土改政策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当武汉要求广东土改委员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这些怀疑就

消散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干部以北方人的身份从外省进入广东执行严厉的土改政策，当地干部则明显采用更加个人化的形式、更为温和的政策。派往各县的土改工作队包括北方人和当地人，完全可以理解，地方干部更加同情当地的领导，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农民不愿意处决族人与乡民，反对“打杀面太广”。而北方人和当地人没有私人关系，通常更主张要提高阶级觉悟，将运动进行到底。^① 上层领导完全意识到这种紧张局势，因为这正是他们派遣外来干部推进土改的原因之一。

许多广东干部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干部的指导和帮助。当地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认识到作为游击队武装，他们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训练，缺少处理像土改这样问题的经验。一些人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问题而诚恳热情地欢迎北方的同志。他们认为北方人在广东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占领导地位是很自然的。一些更有思想的当地干部认识到国民党政府任人唯亲、关系复杂的网络使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当地干部认为在共产主义下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外地干部的参与更容易抵制下面干部的额外求情。一些认为地主应该受到惩罚的干部乐于把执行这样政策的责任推给外地人。一名广东的中层干部认为下面的基层干部很难割断和富农的私人关系，尤其是当他自己有亲戚朋友被划为富农和地主的时候；有时其他人来下达命令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基层干部可以向当地村民解释是外地人而不是他们在执行严厉的政策。但是，尽管有思想的干部欣赏北方人的优点，但他们还是在情感上认为，他们受到了不断下达在他们看来过于严厉的政策的外地干部的排斥。

划分地主、富农的决策机制强化了当地干部和外地人之间的根本对立。当土改工作队来到一个县时，首先派出小分队到一些区镇，然后再派往各乡。在各乡，他们进行宣传工作，确定阶级身份，组织斗争会批判地主，监督分地。下到各镇的土改工作队领导通常是北方人。在各镇之外，土改工作队派出的小分队到各村作实际调查，这些一线的调查者一般都是广东的干部。每个村判定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判定（当地人称之为黄单，因为贴在黄纸上）要经过第二次审批（红单）和

^① 在一份土改初期的报告中估计约有一半的土改干部在其本县工作，《南方日报》1952年3月9日。即使不在本县也是在邻县工作。

最后一次（白单）共两次审批。头两次必须由镇里的干部明确，最后一次白单由更高层的官员——大多数情况下是北方人决定。下到各村的当地干部基本上了解各村的情况，即使不是（通常不会是）出生于被调查的村庄，他们也倾向于更温和、更有同情心，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干部里的北方人距村庄一步之遥，他们更关心上级干部的看法而不是村里干部的想法。党的上级机关已经设定了每个村庄虽然非正式但相当僵硬的划分地主、富农的百分比额度。干部在压力之下得完成这一额度。一线的工作队推荐的名额通常够不上这个额度，因而中南局除了增加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数外别无选择。因此，许多在第一轮没有被划为地主的人后来又被划为地主，最后被贴上可怕的白单。

许多农民和当地干部热情合作分到土地，但当他们必须“斗争”村民时，通常都表现得很消极，把这项工作留给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去做，正如当时一家广州的报纸对某个村庄所描述的：

干部拍手拍到肿，
积极分子喊到嗓子哑，
落后分子平安无事睡大觉，
恶霸地主还没低头。^①

许多农民和当地干部渴望分田分地，但要求他们斗争地主，严肃处理那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人，^② 一线的当地干部和许多村民难免感到北方干部的一些决定太随意且过于严厉。

这些决定是令人痛苦的，但并不直接影响当地干部的个人地位。然而，随着土改的推进，当地干部开始被要求纠正个人错误。这些错误在某些方面属道德上的不当。当地干部并不总是用道德力量来抵制村民为保护其生命或财产而设置的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这些错误都是南方的干部所犯的，因为北方人不会讲当地方言，不会被派到土改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受到这样的诱惑。其他主要类型的错误，用“五同关系”（即同

^① 《当代背景》(CB), no. 194: 9; 另见《南方日报》1952年2月26日。

^② 虽然官方的数字显示在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只有28 000人被处决，但有人估计要高得多。

姓、同宗、同村、同校、同单位)^① 保护他人也只会发生在当地干部中。在阶级身份结果再检查中，许多干部的错误受到批评。^② 这样的问题非常普遍，为此而专门为在土改中犯错误的干部设立了一所特别纠正学校。^③ 因为北方人掌握权柄，对本地干部屈从于诱惑及滥用个人关系的谴责经常被提起。纠正至少意味着要进一步学习；通常还意味着受到严厉的惩罚，它影响工作前途。不管对“错误”判断的准确性如何，整顿工作对外地人有利，而对当地干部不利。

土改运动结束前，整顿还成了北方人取代当地高层干部的手段。1951年4月，进一步输入北方干部的计划开始实施。到土改运动结束时，大约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县一级党委的关键性位置为北方人占据，以前的党委书记（当地人）一般被安排留任副书记。全省其他党的重要位置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新的党委书记和以前的书记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平滑顺畅的，但以前的书记被取代的过程一般并不顺利，因为他下面的干部通常会支持他，他毫无困难地给取代者制造麻烦。一些被取代的书记学会了适应环境，但其他一些人极力抵制，因而遭受进一步的整顿改造，这样的情况似乎对当地干部更加不公。北方人首先取代了当地干部，而后把他们送去整顿改造。

尽管政府当局不断作出努力，然而一旦当地干部和北方人之间的冲突激化，就不可能有轻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最初解决问题的尝试后来已被完全不同的手段所取代。

从妥协到纠正

第一轮：妥协

1951年4月，武汉第一次严厉的讲话发表几周后，中南局被迫向广东当局妥协。原因不难发现。首先，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一样关心农业的产量。解放之前，一直由国民党负责养活这些人口。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月7、22日，3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9月18日。

^③ 《中国大陆杂志选》(SCMP) no. 299:10-14。

农业产量几乎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不用说以此来扩展工业的计划。1949年后，粮食短缺也反映到新政权上，共产党的领导担心土改可能会影响农业产量，而更严厉的土改方案的前景只会使危险更大。在这种情境下，政府当局发布了一道命令，向全省的农民保证，不管同时并举的土改有什么样的决定，那些种植庄稼的人都可以收割自己的庄稼。^①

无奈的是，1950年冬，广东的北方人数量很少，还不能执行当地干部不赞成的政策。如果对当地干部施压太多，反过来会影响农业产量。1951年1月11日到21日，也就是春耕开始前几天，在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中南局被迫作出妥协，以便干部热情地投入到与春耕有关的工作中。

曾在1950年12月中旬发表言辞犀利讲话的杜润生代表中南局出席会议，尽管他还在批评，但他的批评已变得温和得多。会上的妥协反映在新的土改口号——“有序”（当地干部所坚持）、“迅速”（中南局所坚持）——之中。^② 鉴于杜润生仅在一个月之前曾抨击重视“合理合法”是土改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会议后的新闻报道就清楚说明土改将根据法律和法令来开展。会议后接连发表了九篇关于土改的文章，敦促干部卷起袖子和群众一起紧密工作。^③ 尽管还要求干部批评地主，但杜润生第一次讲话中的严厉精神不见了。

方方在这次会议前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直言支持这次会议所阐明的政策。尽管他没有公开反对和平土改，但他承认土改不是简单的分地，而是一场政治斗争，他敦促干部投入到农村的工作中。^④ 在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广播讲话中，方方显然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警告干部，毛主席正利用土改来做一次检验，看看干部是否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是否能过这一关。^⑤ 种种迹象表明妥协局面基本形成，干部们又回到田地中推动春耕生产。

到地里的庄稼成熟时，倾向更激进土改的压力开始形成。例如，

① 《南方日报》1950年12月29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1月27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1月23—30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1月27日，2月24日。

⑤ 广州：《南方周报》第1卷第8期，1951年2月14、17日。

195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初看起来似乎相当有道理、详细描述了相邻两个村庄的派系冲突的文章。^① 文中的一个村庄中主要由地主、富农组成，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住在这里，在战争期间，他们和日本人合作，袭击部分地区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而另一个村庄中的农民，他们的先人只是在五六十年前才移民到这里，他们非常贫穷，参加了东江游击队。文章发表两周后没有公开的迹象表示它有什么错误，但3月中旬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批评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把两个村的冲突说成是“派系斗争”。尽管第一篇的作者同情贫农的村庄，但他没有明确划清“敌我”界线，他错误地称为“派系斗争”的，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总之，路线划分再次加强。然而，直到4月中旬，除了偶尔有干部被批评对其亲戚朋友过于宽大外，严厉的路线并没有得到大力推行。

第二轮：1951年春，“大军”进驻

4月底之前，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准备参加5月中旬的土改工作。此后不久，这样的训练扩大到包括22个县。^② 根据共产党在其最受支持的地区开始的倾向，选择的8个县集中于东江地区，这里游击队的力量最强。这一选择的意外效果是把北方的力量带入当地干部最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到4月份，大量的北方人已抵达，足以扭转外地人对当地人力量对比的劣势，并且扫除了以前3个月的妥协的情绪。

1951年4月19—25日，广东召开了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口号是“依靠大军”，也就是说，当地组织要服从于外来组织。这一口号并不完全是新的，1949年10月北方军队第一次进入广州时，曾用过这样的口号，但从没有达到1951年4月这样的程度。这次干部会议后来被指是广东土改运动第一次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强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③

在这次会议上，方方作了重要发言，他第一次明确地把他自己摆在

^① 《南方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6月5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7月13日。

从属于外来干部的位置。他替难以克服游击队习气的干部的错误作了道歉。他敦促来自游击队武装的同志同他一起作出诚恳的努力来依靠大军。他重申了1949年秋的论调，如果没有大军，广东不可能解放。他还继续谈到来自大军的士兵的优势，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对群众的爱是深厚的，他们的纪律是严明的。当地的干部必须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以使自己也能够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准备密切地和群众一起生活、工作。方方直截了当地处理当地干部降级并由外地人取而代之的问题。他敦促那些现在担任外地干部助手的干部，不要站在局外抱怨外地人不懂当地的情况，而应该努力帮助他们弄懂，为解决问题作出贡献。^①

方方承认他采取过于温和的土改政策倾向的错误：“我们过于强调有序的斗争，把广东的情况复杂化。我们非常害怕混乱，到了把情况视为非常平和而盲目乐观的程度。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地主阶级欺骗、有害的本质。”^②

随着北方人大量涌入进行土改运动，广东一些干部接受学习，也就是说，他们学习如何接受他们应有的角色。当时《南方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需要学习的教训：一名1938年参加地方游击队的党员，他的妻子收下了她的地主兄弟的一头奶牛，使其免于被划为地主，结果这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工作。^③几年后，干部们谈论他们的苏联“老大哥”，而在1951年当地的一篇社论中曾敦促干部们依靠他们的“老大哥”，这里则是指来自北方的干部。^④5月，对“五同关系”的批评加强，^⑤一些批评者甚至抱怨尽管当地的（游击队）战士打击日本人、国民党时十分勇敢，但（现在）已丧失了斗争意志。^⑥

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加快了土改进程。尽管广东原计划土改在1952年结束，事实上要延迟到1953年，但这次4月干部会议后却宣布广东的土改将在1951年秋完成。^⑦

① 《南方日报》1951年5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5月9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4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5月11日。

⑤ 《南方日报》1951年5月11、13日。

⑥ 《南方日报》1951年5月18日。

⑦ 《南方日报》1951年5月11日。

为了执行新政策，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广到基层干部中去，省级会议后接着是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和粤中地区的地区干部会议，有数万干部参加。^① 新政策并非一开始就受到热情欢迎，正如下面北江专区会议报告中所清楚显示的：

至于依靠我们大军的同志，学习他们、遵循他们的领导的问题，许多同志刚开始不能接受这一思想。一些同志说：“说了要我们只依靠贫农，为什么还必须依靠大军？”一些人说：“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要有军队的领导？”还有一些人说：“在我们县没有任何大军，我们怎么能依靠他们？”一开始一些干部虽然认为大军的同志确实有些特殊，后来看到他们的一些失误而感到“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还有许多其他的想法：“我们可以依靠他们土改，但其他的事情不必要依靠他们。”“一般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他们，但特殊的问题我们不能依靠他们。”“我们可以依靠大军的高级干部，但不必依靠其低级干部。”“我们可以依靠大军的一部分人，但其他的不成。”

据说一些同志只简单地把事情转推给大军，长舒一口气：“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了。”一些干部消极抵抗。一些县的负责人甚至在小组会上看小说，完全由大军的同志自己制订土改计划。^②

尽管有这些抵抗，但这篇文章的结论和其他地区的会议一样，那就是当地的干部现在已充分了解了土改问题，要依靠大军。由于处决的“敌人”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对反革命的斗争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中南局表示认可广东土改的新趋势。在对这一专题的重要公告中，中南局指出4月会议之前广东的土改开展得不好，但现在因为4月会议，广东采取了适当的态度，土改进展顺利。^③

① 《南方日报》1951年5月28、29日，6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5月28日。新政策进一步显示出普遍不受欢迎，见《南方日报》1951年5月9日、7月13、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7月13、21日。

第三轮：1951 年秋，冲突升级

武汉的乐观是短暂的。大军 4 月份抵达后，并不是政策而是土改运动自身变得更为激进。4 月以后，残酷的斗争会数量上升。大量的地主受到批判，并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达到高潮而被枪杀。但当地干部对新的更为严厉方案的抵制已使土改运动远远落后于原计划，8 月 6 日至 20 日，镇压反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后，召开了一次干部扩大会议，考虑一些干部的问题。

曾在 1950 年 12 月宣布土改强硬路线的杜润生从武汉南下，作了一次毫无含糊或让步可言的讲话。他说，广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各级干部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应该鼓励基层干部批评甚至是党的华南分局的领导，保证不必担心因为使他们的上级不高兴而失去其位置。^① 1951 年 5 月后，在广东与杜润生相对等的人物赵紫阳^②回应了杜的评论^③，用中国共产党圈子中非常强烈的语言谴责广东的干部“阶级立场不稳”，^④ 坏分子甚至就在党内。^⑤

显然，广东的领导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组织受到北方人侵人的痛苦，感受到目睹农村太多流血的痛苦。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在 8 月份很难像在 4 月份那么平静。

方方作出了一些必要的顺应：“我们必须更谦虚地学习，更勇敢地斗争。”^⑥ 在几周后他的更详尽的讲话内容发表，在讲话中，他列举了一些农村干部对党的基本使命缺乏奉献精神缺点，他说一些人把土改视为在短时间内出名的机会，以期在组织中获得更高的地位；一些人认为土改使以前沉闷的工作变得有趣；一些人甚至简单地把它作为找女朋友的机会。

但方方没有批评他的干部的阶级立场，甚至还保护他们：“大部分当

① 《南方日报》1951 年 9 月 5 日。

② 赵紫阳当时是激烈的“左派”，自 1951 年 8 月 6 日起，他担任党的华南分局土改委员会负责人的助手和分局党的秘书长；陶铸同样是“左派”，他担任党的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的副手、中南局党委秘书长。关于赵紫阳的背景见红卫兵小册子，《中国大陆杂志选》（SCMP）no. 4085:13-20。

③ 《南方日报》1951 年 9 月 5 日。

④ 《南方日报》1951 年 9 月 5 日，12 月 9 日。

⑤ 《南方日报》1951 年 10 月 3 日。

⑥ 《南方日报》1951 年 10 月 3 日。

地干部是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进一步批评一些外地人骄傲自大：“外来的干部不应该看不起当地干部，他们不应该讽刺当地干部是‘乡下人’。”他解释道，外地干部应该帮助当地干部，因为后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外地干部应该通过当地干部来做工作，而不应该试图绕过他们。^①

叶剑英由于地位更高、长期不在广东而很少涉及当地的组织，尽管如此，他也表示外来的帮助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土改中最紧张的战斗和最大的成功是在潮州地区（碰巧是方方老家所在的地区），战斗的胜利是因为大军强有力的参与。虽然他认为土改在潮州地区的成功是因为大军的楷模作用，并对此表示敬意，但他同时指出梅县、兴宁县的土改没有大军的参与也很成功。^②

武汉中南局显然在关注对严厉政策的反应。当时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了7名地主，他们在洞中躲藏长达8个月之久，这反映了当时的形势。^③当局开始耐心解释：因为朝鲜战争，采取更为激进的方案是必要的。^④并且组织了宣传运动以应对那些从农村传到广州甚至是北京的关于广东土改中骇人听闻的故事。还安排了一群广东重要的“民主人士”（杰出的非共产党人士）参观，借用他们的名义来赞美颂扬运动的成功。^⑤在杜润生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后，许广平（鲁迅的遗孀）率领北京100多名民主人士到预先选定的地点参观，汇报广东土改的成功所在。^⑥

可能是因为抵制比当局所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大量的支援人员被派往广东以保证运动的成功。^⑦尽管有增援，但广东的土改仍然落后于计划安排。中南局向干部传达指示要求加快土改的进度，但武汉中南局考虑到当地干部的抵制、土改进程的缓慢，决心对高层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① 《南方日报》1951年11月28日。

② 《南方日报》1951年10月3日。

③ 《南方日报》1951年11月20日。

④ 《南方日报》1951年9月16日。

⑤ 《南方日报》1951年10月3日。

⑥ 《南方日报》1951年11月18日。

⑦ 《南方日报》1951年11月20日。

第四轮：1952年，陶铸与整改

1952年1月底2月初前后，陶铸到达广东，受命成为华南地区最有权力的人物。他明显有中央政府作后盾。和毛泽东一样，他也是湖南人。虽然无法证实他和林彪的友谊可追溯到在黄埔军校学生时代这样的传闻，但他曾担任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政治部副主任；他曾是南下工作团的副主任，负责监督工作团吸收成员；北京解放时，他曾任林彪的私人代表。1945—1949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在来广东前不久，他在武汉的中南局总部任要职，在广西的土改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陶铸在早些时候的一篇讲话中明确说明，广东的土改必须在第二年春天前完成，他说这是毛主席个人的命令。^②然而，当他抵达时，他只是中南局的第四书记（叶剑英是第一书记，广西的张云逸是第二书记，方方是第三书记）。陶铸到达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指导土改情况的调查；检查组的领导包括赵紫阳和其他坚决支持采取更为激进方案的高层领导干部。^③在检查的方法公开的前几周，省土改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剧烈的变化。^④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方方的解职，但当土改的重要调查方案提交、公布时，没有提到方方，而是提到了陶铸。^⑤对方方为什么靠边站及被排除出考虑范围，并没有公开的说明。

陶铸在广东的崛起很迅速，但并非一蹴而就。8个月后，即1952年10月，陶铸才在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宣布：“各项任务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局面将有很大的变化。”^⑥

陶铸崛起和取代广东领导是无须广东任何主要领导参与的。最后，广东的领导被给予重新担任党内重要职位的机会，并且要么出于对党纪的认知，要么清楚自己的选择有限，他们都接受了批评，有些还是羞辱性的。

整改的计划不是从最高层，而是从底层开始的，一开始是集中于最

^① 《当代背景》(CB), no. 142; 《新呐喊战报》(红卫兵报纸); 广州: 《武汉大专院校》no. 2 (1967年1月20日)。

^② 《南方日报》1952年7月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2月5、10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1月10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3月9日。

^⑥ 《当代背景》(CB) no. 226:5。

易攻击的领导。其过程与共产党处理敌人的方式相类似。一开始是较小的目标受到冲击，直到主要目标与其支持的基础分离。陶铸第一次出击时，还正面提及叶剑英和方方。^①一年多之后，方方受到公开的责难。^②

当时担任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和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左洪涛成了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对象，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方方的伙伴，很容易受攻击。左洪涛在东江纵队组织中非常活跃，解放前夕，他和在香港华南分局的方方工作关系密切。左洪涛和资产阶级及国民党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其中包括曾任著名国民党将军张发奎的助手。左洪涛的资产阶级习惯，如购置豪华家具、从香港聘请厨师、试图把广州建成娱乐中心，甚至建跳舞场，^③都受到责难。几周后，即1952年4月1日，左洪涛和方方的另一个易受攻击的老朋友杨奇一起被开除出党。和左洪涛一样，杨奇也曾加入东江纵队，在香港和方方联系密切，他也欣赏、喜欢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解放后在计划制订广东省的经济、金融事务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担任南方日报社的副社长。他一直在香港有生意，使他在刚开始的“三反”运动中轻易成了运动的靶子。^④

第一次重要的整改不是在省一级的层面上，而是在1952年4月的一系列地区级的干部会议上。地区级整改运动中没有提到方方，他也没有参加通常所有主要领导人物参加的重要接待活动。^⑤一家媒体甚至报道整改期间方方负特殊使命被派往海外。^⑥陶铸亲自主持1500多名干部参加的粤中地区干部会议，这次干部会议成为其他地区整改运动的样板。在讲话中，陶铸承认他刚来，还没有太多在广东的经验，但他说明关键的问题不是经验，而是阶级立场。他不满地指出许多干部保护地主，没有执行党的政策。他敦促基层干部批评其上级，直到所有的错误曝光。^⑦

粤北地区在赵紫阳的指导下开展了类似的整改运动，1000多名干部

① 《南方日报》1952年2月7日。

② 《南方日报》1953年5月29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2月7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4月29日。

⑤ 《南方日报》1952年2月13、15日。

⑥ 《香港华侨日报》1952年3月4日。

⑦ 《南方日报》1952年4月18日。

被撤职。^① 广东的其他地区也在能干、可靠的外地人的领导下展开了类似的整改运动。^② 只有在海南地区，冯白驹的力量还很强，地方主义情结还很浓烈，当地人得到温和对待，^③ 整改被推迟到以后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

到1952年6月，地区级的整改完成后，新上任的领导出席省级干部扩大会议，议题是土改，由陶铸主持。叶剑英、古大存为广东干部所犯的错误的错误致歉，并表达了改进的决心。叶剑英还是正式的第一书记，他在形容广东最近土改的进步时说，广东的干部不再“软弱、动摇、困惑”，最近的进步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尖锐批评，……这一成功我们应归功于陶铸和赵紫阳同志的领导。有这样的指挥员，战士们自觉投入到战斗之中，这是我们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④ 古大存为领导缺乏对自身需要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认识而致歉。^⑤ 方方敦促支持土改，但他没有加入到道歉之列。^⑥

叶剑英被平静而巧妙地移出广东的权力核心。他曾是全中国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陶铸在广州起义时曾在叶剑英的领导之下，^⑦ 了解叶剑英的全国性的影响而避免直接指责他。反过来，叶剑英同情地方的事业，但他避免和新的领导公开辩论，虽然他或许是因为性情更平和，比方方更少接触地方干部。他除了在1952年6月29日作了一次笼统的道歉外，并没有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作公开的道歉。他继续在武汉和北京担任高级职务。他一步步静悄悄地退出了广东，但始终在武汉中南局总部兼任职务；1953年初以后，他越来越少出席广东的会议。官方没有正式的文件宣布叶剑英退出广东。1953年5月，陶铸悄然被任命为广东省

① 《南方日报》1952年4月22日。

② 《当代背景》(CB) no. 184。

③ 《南方日报》1952年5月17日。

④ 《南方日报》1952年7月12日；《当代背景》(CB) no. 211。

⑤ 《南方日报》1952年7月24日；《当代背景》(CB) no. 211。

⑥ 《当代背景》(CB) no. 211。

⑦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11日；另见：《中国大陆杂志摘要》(Extract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no. 129, 及联合研究服务处 (Union Research Service, Hong Kong) vol. 10, vol. 7。

委第一书记，^①而事实上，至少自1952年10月起，陶铸已经掌握了实权。^②

中央领导层并不希望撤换所有的地方高级干部。为了维持最起码的地方支持，保留一些广东干部是很重要的。以前游击队的领袖、当时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古大存在1952年6月的会议上^③检讨致歉后获许留任，但他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朱光，名义上只是副市长，而实际上是担任市长的职责，因为叶剑英要履行其他的职责。朱光没有参加土改，但他被深深地卷入到地方主义者对外地人的抵抗之中，而不可能回避组织重组。1953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党的中央纪律检查组副书记钱瑛出席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朱光被指责为因判断失误而导致严重浪费，尤其是他在处理化肥厂问题上的错误代价惨重。他被指责为个人英雄主义、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不接受批评承认错误。^④朱光仍获留任，但已成为众矢之的。叶剑英离开时，朱光没有被提升为市委书记，相反，外地人何伟在1952年年中接任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份任市长。^⑤

最严重而棘手的问题是方方。他是拥有最为广泛的基层群众支持的党的领导人，是地方干部抵制北方人渗入的英雄。对他必须采取以尽量少触犯地方主义情绪的方式，使之慢慢降级。陶铸到来后，方方不再是土改的正式发言人。他的任务是鼓励商人们克服右倾倾向，^⑥也许这项任务对于他自己在压力下克服同样的倾向是合适的。从1952年初开始，方方的权力基础逐步削弱，但他继续任第三书记，到10月份，他不知不觉地被列为第五书记。^⑦

虽然从党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改中“温和路线”的辩护人方方必须检讨承认他对待群众过于严厉的错误。一份检讨中强调，方方对广东的镇反运动不出力显然不是由于同情群众。在许多亲密伙伴被整改后，1953年5月，方方自己在一次盐业工人会议

① 《南方日报》1953年5月17日。

② 《当代背景》(CB), no. 226。

③ 《当代背景》(CB), no. 211。

④ 《当代背景》(CB), no. 250, 253。

⑤ 《当代背景》(CB), no. 253。

⑥ 《南方日报》1952年2月16日，3月1日。

⑦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28日。

上（碰巧有许多党的干部参加）承认了他反人民的“罪行”。他的坦白检讨被广为宣传。尽管外国人无法知道他在这些“罪行”中的作用，但他手下的干部们只是在执行党更高层的决定。他的第一个“罪行”是1952年4月关闭了盐厂。方方由于对粤东“缺少关心”而关闭盐厂，使3万人失去工作，间接影响了约10万劳动力。方方被控诉为无情剥夺了13万人的生计，不另外安排他们工作。中央委员会宣称，在发现方方的错误后，决定拨款80亿元（旧币）以缓解他们的生活困苦。方方的第二个“罪行”是1952年底他不允许群众出售商品以购买新年节庆所必需的年货。尤为可笑的是，方方的第三个“罪行”是1953年春他执意坚持推行十分严厉的教师整改政策，从而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尊严。^① 他的错误被广为宣传，以致许多广东当地人以为他缺乏关心普通民众而对他非常不满。从检讨错误到1954年这段时间，方方参加公共生活的记录并不清楚（少数出席广东中苏友好协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除外）^②，但一般都相信他是在“学习”。到1954年末，方方又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在北京的侨务委员会任职，^③ 这可能是因为他朋友的影响（在北京的侨务委员会负责人是方方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广东潮州人）。因此，方方虽然因为自己的检讨而丢了面子，随着他的亲密支持者的去职而地位削弱，但仍让他在远离广东以外的地方担任一个荣誉性的职位，他已不再有煽起抵制北方人的地方主义情绪的危险。

中国有句谚语：树倒猢猻散。但当方方倒下时，许多地方干部并没能逃到安全地带。根据几年以后公布的数字，土改的后果是80%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当地干部丢了职位。^④ 不过，在较高的层面，每个地方党或政府的委员会还有必要保留一个或几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干部。在官僚组织的基层，当地干部占多数。但那些留任的干部必须证明他们已认识到方方的错误，公开就他们自己的地方主义情绪作自我批评，并表示他们自愿支持新的领导。

① 《南方日报》1953年5月29日。

② 《南方日报》1954年2月14日。

③ 新华通讯社（北京，1954年11月1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9日。

一竿子插到底

当一个领导被另一个取代，在形容正确的组织技巧时，中国共产党有句口语叫：“一竿子插到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个上级领导更换时，他的亲密伙伴也将被取代；为了建立有效的组织，新的领导将安置一群与他工作上配合密切的伙伴。

很显然，1952年陶铸的崛起，已表明他拥有领导广东党组织的素质。他不仅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地方利益之上，而且，他具有更高的组织技巧。他精力充沛、勇敢大胆、为人直率。他的崛起，和方方的失势一样，被安排得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干部的敏感不安。他虽然在广东的事务上迅速取得强势，但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仍然任第四书记，方方去职时，他谨慎地不把自己摆在方方以前第三书记的位置上。而是让他那位没有卷入这场政治争端的老朋友谭政将军取代方方任第三书记，^①虽然谭政的任职时间很短暂。甚至在陶铸正式取代叶剑英担任第一书记时，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使用第一书记的头衔的。尽管他认为必要时应强硬推行他的方案，但他对地方情绪表现出一种敏感。1952年10月，他一完成对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就对他的“左倾”错误作道歉，努力重新获得当地干部的合作。^②

陶铸在省委的地位牢固确立后不久，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之易于并且自然地安置新的领导来负责掌管这些组织。大部分选拔出来负责这些新地区党委的领导在地区整改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证明了他们的效率和对陶铸的忠诚。他们大部分不是广东本地人，许多人很可能是陶铸原来在选拔南下工作队时吸收的。在粤东地区，曾在中南局总部接受训练、在地区整改中起过积极作用的郝中士担任地区党委第一书记。^③在粤北地区，陶铸的另一忠实伙伴伍晋南任第一书记。^④在粤中地

①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1、28日。

② 《当代背景》(CB), no. 226 (1952年10月28日)。

③ 《南方日报》1953年5月12日。

④ 《南方日报》1953年3月10日，5月27日。

区，曾领导粤西地区党组织整改的王德成为第一书记。^① 当时陶铸负责粤中地区的整改。王德离开粤西地区后，王匡成为当地的党委书记，^② 他在1951年中期推进依靠大军运动中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海南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冯白驹的力量很强大，^③ 他还敢于说并没有发现《资本论》中说要依靠大军或者是南下工作团。^④ 直到1957—1958年，海南才插上国旗，当时冯白驹被提升为副省长，调到广州，在这里他的地方主义威胁大减，冯白驹因为其地方主义而受到批判。

在省级党组织中，陶铸任命其忠实的伙伴、湖南同乡^⑤赵紫阳为总书记。赵紫阳在1952年初的调查及后来的整改中显露出才干和忠诚。他一直在陶铸的指导下工作，直到1965年陶铸卸职，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赵紫阳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关键性的党的组织部门，区梦觉是个重要人物，虽然她是广东本地人，但已证明她对陶铸是忠诚的。在广州市委的党组织中，能干的北方人何伟在1952年掌控了市党委后，实际上降低了朱光的地位。^⑥

从大军中派驻广东的军队来自“四野”的政治部。^⑦ 这是陶铸过去的组织，正是这一原因他期望这些干部随时听从他的指示。正如1952年春整改中显示的那样，当地干部大多被“四野”派遣的干部所取代。一旦这些退伍干部的地位巩固，他们就尽力吸收对他们忠诚的当地人。^⑧ 在党的组织处于陶铸和他的北方干部指挥之下时，吸收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工作大规模展开，^⑨ 从而保证这些新成员接受新领导的训练，并听从新领导的调遣。

陶铸和他的同伴在1952—1953年在广东所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牢固

① 《南方日报》1953年6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53年3月10日。

③ 《南方日报》1952年5月17日。

④ 《新华半月刊》no. 19:44 (1958)。

⑤ 原文如此。赵实为河南人。——编者注

⑥ 《南方日报》1952年12月31日，1963年5月16日；《当代背景》(CB)，no. 250, 253。

⑦ 《南方日报》1952年8月2日。

⑧ 《南方日报》1952年5月17、20日。

⑨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20、21日，1953年1月3日，5月27日。关于党的建设，参见舒放（音）：《1952年中国共产党的扩张运动》(Fang Shu, *Campaign of Party-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52*,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November 1953)。

的，直到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陶铸的权力结构受到外在的冲击时，它仍然保持稳定、牢固。与清朝时从北方南下的满族旗人不同，旗人只是在当地统治集团的上层相对孤立着，而北方来的共产党干部则是彻底穿插渗透到所有重要的党和政府机关——从最高层一直到最基层。一旦北方人进入了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他们之间形成的个人关系跨越了地区间的联系，从而缩短了当地干部和外地干部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的历史上，广东的地方主义从来没有被这样彻底地渗透过。

但这并不是地方主义的终结。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当地干部再次抱怨土改的严酷，反右运动期间，中央政府再次作出回应。^①种种迹象显示地方主义的情结还是很浓厚的，但广东土改已令地方主义问题产生本质上的改变。在土改初期，地方主义是一股让人畏惧、需要对其让步的强大力量；在土改末期，它只是一种情绪反应，已经没有了明显的组织基础，只需引起关注，而不再是担心。土改意味着建立党对农村的控制，但事实证明它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困难、更关键的问题：中央对一个地区的控制问题。

曾经帮助国家领导人征服华南地区的广东干部没有像中国历史上相同时期的地方合作者那样要么赐金退养，要么分封，要么被消灭。用忠诚而又愤世嫉俗的地方干部的话说是：一旦他们“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广东的干部就离开了他们的职位并受到监管，但他们被授予荣誉性的、有时是挂名的职位，这样使他们不会支持地方的抵抗。

在广东的土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严酷的运动是由于北方人的反广东情绪促成的。基本的原因似乎应是考虑到用有效的组织给这个国家带来秩序和纪律。尽管在广东的土改中，人力资源、个人生命以及被断送的个人前程等的代价高昂，但北京的领导人无疑会认为，为了避免代价更高的组织混乱及上半世纪中分裂国家的公开冲突，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必要的。他们成功控制广东地方主义的原因之一是至少一部分广东的干部和民众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①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4日，载于《中国大陆杂志选》(SCMP) no. 676:31-35。

第四章 经济控制：社会主义改造， 1953—1956 年

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控制农村的手段，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及一个新的方案就开始提上日程。问题围绕调控经济和提高生产。未来社会的图景是一个有序而有计划的社会。这样的图景并不新，但它一直作为干部们处于一种半紧急状态、急于回应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早期阶段的工作背景。到1953年，社会自身已开始稳定，统治的问题越来越可预测，干部们有了更多的经验。因此，1953年，领导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发展。

不管苏联在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时显得多么丑陋，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广州的官员真诚地把苏联视为值得效仿的榜样。尽管没什么苏联顾问来广州，但许多学生和一些干部开始学习苏联。更多的人学习新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了解苏联的组织、技术或文学。中苏友好大厦计划兴建，很快便在广州的西北部投入建设之中。“苏联”以及知晓的人较少的“捷克”，甚至是“南斯拉夫”都成了“现代”和“理想”的同义语。

连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干部也认识到经济的发展要求高度的组织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广州对中央指导和计划的期待和北京一样强烈，因为地方的领导人只有在全国性规定发布了之后，才有可能将他们的组织合理化；只有国家制订了经济计划后，才有可能快速发展经济。1953年，国务院宣布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地方领导人以为混乱将让位于有序，猜测让位于精确的统计，^① 具体的公告让位于计划与规则，偶然的发展让位于持续的经济增长。由于天真地相信在西方已经绝迹许久的

^① 《南方日报》1953年1月9日、2月1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论述，可参见薛暮桥、苏星、林子力：《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管大同（音译 Ta-tung Kuan）：《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董大林：《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

合理性，他们的新口号是“正规化”、“制度化”和“合理化”，将它们看作是通向乌托邦之路的重要步骤。

在经济方面，活动的中心是制订、改进、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动员群众，计划被宣传为“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是“脱离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落后的第一步”。它是为了“保卫和平”，为人民、为国家、为了全世界。而关心计划内容而不是其宣传的官员忙于确立重点、分配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等世俗事务。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不过三年就启动了。即使经济上领先的苏联为此等了十年，因此，这个计划也不可能成为有严格意义上投入—产出分析的精确计划。计划仅有个基本，但它的确代表了一次认真的尝试：去确定经济的重点，分配国有资金和资源，发起大规模的国有项目，确定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目标。

也许比计划内容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精神的普及，这种精神就是“计划意识”。1953年后，任何战线上的工作不是作孤立的考虑，而是要融入更广阔的图景，全国被视为“一盘棋”。短期的项目要结合其后的项目进行考虑。各单位都在讨论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①

政府重新组织的宣传开始于1953年，就像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宣传一样，都是用来赢得群众的热情的。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委员会取代了地方政府，^②在这一民主的掩饰下，政府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变化反映了政府组织的增长和规范化。由于省政府的扩张，广州不再直接向北京汇报。^③在市人委和各个局之间成立了新一层的政府部门——办公厅，协调其下属的几个局的工作。兴建了新的办公大楼来安置这些新增的机构，并兴建了宿舍大楼来安置干部。为了使这些新增组织有序化，北京开始颁布一系列的法规汇编来规定行政管理行为、组织结构、工资水平和预算。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8日。

② 关于选举的筹备，参见《广州日报》1954年1月16日。

③ 这一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4年6月19日作出，此后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直辖于北京，1958年后，天津被置于河北省之下。

规范化的新精神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一切领域。例如，教育领域的一位重要官员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脱离感情色彩进行理性分析的新精神，他说：“如果我们把高等学术机构看作是一个生产工程师的工厂，那么，大学的设施则是生产工具，教师是技术人员，新生是原材料，毕业生则是生产的产品。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你必须不仅提高工具和工人的水平，而且进厂的原材料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否则，产品将是废物。”^①

这种对统计、科学和计划的信仰与对专业化的优势的信心相辅相成。和传统的中国一样，问题被定义为吸纳人才，人才被解释为具有技术能力的人。干部们被敦促去掌握一种专业技能，老干部被警告政府不再需要工作中缺乏专业技能的人的服务。^② 技术人员被视为文化英雄。这是一个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图景，它彻底地离弃了“游击队精神”。^③

广州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尽管一个计划有序的社会图景已展现眼前，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不免让人失望。1949年后，一个新的统一、强大的中国的出现激发了许多新的希望：文盲会在几年内被扫除，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实现工业化，中国农村实现机械化，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共产党领导、团结民众支持他们的事业，激发他们完成事业的乐观主义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要求干部们完全放弃这些乌托邦式的图景，但由于这是第一次把它们付诸实施的严肃尝试，因此计划要求根据经济现实来重新看待这些图景。因为资金、原材料和人员是有限的，许多项目的规模缩小，另外一些被无限期推迟。和乌托邦式的图景相比，计划显得庸俗不堪，降低期望值的过程是痛苦的，降低的目标难以完全接受。

不仅远景目标必须缩减，而且要求全面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产出、增加收入、促进经济、降低消耗、完成并超额完成定额、实现国家计

① 《南方日报》1955年7月28日。

② 《南方日报》1953年1月18日。

③ 这一精神普遍见于1953年初的作品，例见《南方日报》1953年1月4日。

划”，^①这其中广为宣传的一条中央指导方针反映了多方面的压力。

农村地区被号召增加粮食产量以支持军队供给和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为应付自然灾害提供储备。同时，农民要生产更多的“经济作物”，为轻工业提供棉、麻等原材料。1953年末，为了获得大量的粮食和避免竞争性价格所致的通胀压力，中央政府宣布粮食实行“强制买卖”。因为广东的农村还不稳定，这一方案的推行在（广东）实际上比大部分地区晚六个月。^②此后，除了征集粮食，政府还给农民分配了以低价收购的高额粮食定额。此后，粮食只由政府的商店以固定价格出售。农民们感受到了出售大量粮食而只有少量经济补偿的重压。因为当时广东试图停止从其他省份进口粮食，完全负担粮食自给的责任，定额定得似乎特别高（官方的每年粮食产量数字，见附录B表8）。

城里和农村地区一样感受到粮食短缺的冲击。这一时期广州不仅采用了粮食配给制，而且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发动了一场正式的经济运动削减浪费和过度消耗。^③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工厂和政府机关的群众食堂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并且动员街道委员会监督家庭妇女节俭度日。定期公布浪费的事例，并在群众集会上严厉谴责犯错的人。

一般民众被要求勒紧裤腰带，许多地方干部热切盼望的工程项目被中止或推延。广州的官员和其他城市的官员一样，渴望建立起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新的公园以体现进步。尽管中央政府不轻易冒舆论风险限制地方的美化工程，但实际上朱光正是因大力进行这方面建设而受到批评，被谴责为浪费公款。^④各级党政机关竞相以更大的办公大楼、更现代的干部宿舍攀比。地方官员热衷于投资表面化的工程，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致使中央政府在1954年批评广州新建的30多万平方米的工程建设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陶铸于是在1955年宣布今后两年内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⑤

① 《广州日报》1954年8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25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8日。

④ 《当代背景》(CB) no. 250。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当政府一度扩展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开辟道路时，一些政府建制却不得不缩编。广州成立了“组织机构编制委员会”起草缩编行政管理人员的计划方案。单位的数量减少，有可能的话，各个管理层都要缩减，政府的开支受到更严格的控制。^①事实上，因为这次缩编方案的结果没有公布，给方案执行的彻底性布上一层疑云，但至少做了一些缩减，党和政府的扩张比例也缩小了。

在资源的分配上，广州绝对不是唯一一个给北京出难题的城市，但事实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广州被撇在了一边。在计划中，一些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一些中等城市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因为投资资金会流进这些城市，所以代表当地的地方党委都努力争取国家的支持。工业不仅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且是进步的象征，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商业是资本主义的，而工业则是社会主义的。无论是出于理论的还是实际的原因，广州的每个人都希望广州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3年正式开始，但直到1955年年中才完全编制成功，并最后详细公布。在公布之前，计划的各个部分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了几轮讨论。每一轮讨论中，中央政府把尝试性的计划指标下达给地方官员，由他们对被要求的人员和资源作出详细的评估，并规划地方如何完成这些指标。在这些规划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对计划指标作出修改，并返回给地方官员，进而由他们作出更详细的计划。^②广州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轮严肃讨论是1954年春。在1954年5月的广州市第四届党代会上已经形成了生动的讨论，反映了地方官员对广州市没有被给予适当支持的关注。然而，广州还是希望在计划期间走工业化之路，党代会上还悬挂着“把广州建成华南工业基地”标语。^③（官方的工业总产量数据，见附录B表9）

1955年年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公布了详细情况，显然在计划中广州没有被列入开始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虽然当地的官员对这一决定并不完全感到意外，然而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被指把中央政府的利益置

① 《南方日报》1955年5月27、29日，6月5日。

② 这些轮的总结，见《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③ 《广州日报》1954年8月25日，1955年6月14日。

于广州利益之上的陶铸，领导批判“第四届党代会的不正确观点”，并解释为什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广州没有被选为工业中心。他解释道，广州没有大型工业基地去启动工业建设，并且缺少原材料供给。不仅原材料的运输是不必要的开支，而且中央政府不能保证它们的落实。如果这些工业没有充足的供给，就只能亏损经营，从而成为城市的负担。由于明白共产党对商业活动持不赞成的态度，陶铸没有强调广州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广州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以免进一步触及当地的敏感情绪。他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农业上。他承认广东在努力实现农业自给上的压力，但他强调广东适合农业发展。因为气候关系，广东每年至少可以种植两造水稻。由于有漫长海岸线，可以发展海产品。发展农业会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经济作物可以为轻工业提供原材料。随着糖、纸、丝、麻、烟草、茶叶和粮食产量的增加，轻工业会相应的发展。除了这些发展以外，陶铸还希望重工业将来会进入广东。^①除了陶铸所提到的这些因素外，还有另外的因素。正如市长朱光所指出的：“因为广州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它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②

在1955年10月的广州市党代会上，面对失望的听众，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承认：“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看到广州的多种可能性……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因为广州不是工业建设的重点就没有前途。一些人认为即使有些前途，主要的任务只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那么几家小厂，没有真正的挑战。因而他们不能安心于工作。”^③不仅广州人表示不满，而且外地的干部也认为在没被选中进行发展的组织中工作没什么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提升。王德承认“一些同志一直希望离开广州，这是不正确的”。^④为了抚平当地的情绪，王德指出“有许多发展轻工业的有利因素”。事实上，他获准提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将迅速发展，广州市第四届党代会上所提到的前景——广州的工业化会实现，

①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6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只是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①几周后，一直在尽力寻求可令广州人接受的适当表述的市长朱光当时力图把事情推向最乐观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州将“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变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城市”^②。但没有一个表述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第一次“把指令带入整个方案”的尝试并没有给广州带来多少让人满意的东西。

迅速改造的负担

没有中央政府经济上的支持，也没有对短期经济发展太乐观的预计，这一阶段广州地方干部负责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对私人企业的征用和把管理权转换到公家的手中，它是要努力重组从事经济的企业和经济活动，使它们更加符合上级的计划。它涉及合并、合理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干部们必须补偿以前的商人，指导私人企业的合并和重组，重新分配人员，建立新的政治控制的路线。即使在合作中，政府不直接插手操作，干部们也必须监督征用工作、重组和人员的选择。

一些干部对任务的艰巨性感到不安，并且怀疑改造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进步的程度，但几乎所有的干部都认为政府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地负责计划经济活动的官员开始痛苦地意识到指导成千上万的私人企业的难度，而且每个企业都在试图和政府斗智，欺骗政府。指导数以千计的手推车和小手工业作坊、数以万计的小农户，以及控制关键性的供应物品流入的任务使各地的干部感到头痛，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以小企业的繁荣而闻名。

当地干部接受了上面的观点，认为小规模企业的无效率妨碍了经济的增长。一些有技术人员的工厂中缺少适当的机器设备，而其他工厂的机器设备闲置着；一些有技术的手艺人拒绝把技术传授给其他厂的工人；独立的农民不愿意让灌溉沟渠通过其田地以利于其他农民；一些工作是没必要的重复，而这是很容易得到整合的。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6日。

作为市场机制的结果，小企业合并成更大、更有效率的单位。当地的干部接受了他们领导的观点，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尝试已迫在眉睫，只有通过政治的手段走捷径。

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因为个人的原因更热切地渴望改造小工厂和农户。这些干部负有他们上级赋予的监督其管辖范围内企业完成其定额的职责。从根本上说，私人企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相对立的。一些企业在有机会去生产和销售那些还未受低的固定价格规定限制的产品时，就发现匆忙完成他们的任务并不划算。一些商人按政府的合同收下原材料，却把这些材料转向生产私下出售的产品。尽管有一些小企业没有欺骗政府，但干部们仍怀疑他们这样做了。许多干部都认为正是这些小企业的唯利是图使他们难以完成上级领导制订的高额生产指标。因此，大多数地方干部开始乐于接受合并这些麻烦的私人企业的决定。

尽管对最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获得广泛的认同，但干部们对何谓实施改造的理想进度和最佳途径有着极大分歧。一方面，一些人提倡发动一场闪电式的运动推翻反对派，把工业迅速推进到一个台阶。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迅速改造组织准备上不充分，会引起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对农民来说，会因此使反对力量团结起来，进而要被迫使用武力。在他们看来，最好是逐步推进，通过提供个人加入集体的优待条件，使之自愿服从。在北京和广州的最高层都有这些分歧性的看法，这反映在来自北京的指示的不断变化。1955年夏，这些辩论在北京的最高层得到解决，支持迅速改造。对要进行迅速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充分认识”的干部，要进行思想上的纠正，但思想准备实质上在决定迅速改造之前已经开始。

思想准备：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在计划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吸取了苏联的经验。在高层，苏联在华专家给中国的计划制订者提供咨询，基层干部学习苏联的教科书。1955年春末，中国所有的干部都被指派学习斯大林的苏维埃党史中关于

处理农村集体化、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部分。^① 中国人对苏联集体化中的血腥印象深刻，但对苏联迅速的经济发展印象更深。学习斯大林不是因为他的过度，而是因为他的成功。

然而，中国人想避免苏联集体化中的暴力。在中国人看来，苏联努力反对“右派的抵抗”过于依赖武力，太少依靠“思想准备”。^② 虽然共产党攻击儒家思想是封建主义的，但他们完全接受儒家的观念：人首先应端正自己的思想，然后改变世界。用西方的话来说，共产党希望改变个人的态度。他们希望通过劝说诱导来克服对集体化的抵抗，使用暗含的武力相威胁，而不是直接地显示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讲，自从1953年初以来，领导层为民众准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展开了重要的宣传运动。1953年国庆节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到1955年，每个人都已期望大型企业国有化及小型工厂和农户合并入合作社。

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紧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公布。计划正式开始于1953年初，但其内容直到1955年7月才揭晓。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动紧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在时间的选择上是聪明之举，因群众性欢庆计划的光荣目标而产生的热情被引导到为社会主义改造而努力工作中去，正如早期的革命动力被利用而成为组织纪律。由于群众被动员起来颂扬光荣的新经济目标，财产所有人无法抵抗。随着计划的公布，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实现计划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途径，随处可闻。尽管广州的目标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令人兴奋，但也有足够的项目让人产生一些真正的热情。计划被描述得尽可能地乐观、顺利。因为预期平均工资会迅速提高，计划也有助于遏制恐惧国有化会使他们的收入降低到一般职工水平的商人的抵抗。

共产党并不天真地认为通过多番赞颂就能克服所有对国有化和集体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4日。关于苏联和中国集体化的比较，参见托马斯·伯恩斯坦：《1929—1930年苏联和1955—1956年中国集体化运动中的领导和群众动员：一个比较》，（Thomas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zation in Soviet Union and Chinese Collectivization Campaign of 1929 - 1930 and 1955 - 1956: A 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no. 31:1-47, July-September 1967）。

^② 关于中国的宣传的总体论述，参见弗雷德里克·于：《共产党中国的群众宣传》（Frederick Yu,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化的抵抗。在领导层看来，潜在抵抗的关键并不在于农民，也不在于商人，而在于他们自己的干部。早些时候针对反革命、知识分子和商人的运动已经使民众对于来自政府当局设计妥当的暗示有积极回应。得益于土改及其成果，在集体化前夕，中国人建立起了比苏联远为有效的农村组织。^① 即使党和政府的批评家不公然站出来，共产党的群众组织也大体上能动员民众。安然无恙地逃脱前几次运动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更加自信。但像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艰巨而有争议的任务，干部纪律并非稳如泰山。

在广东，干部的抵抗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地干部对外地人的抵制。但以为仅仅这一问题就足以令接下来的运动（在党内、政府、商业机构和学校等单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来得如此猛烈，那是值得怀疑的。^② 肃反运动的严重性无疑源于北京的问题，它引发了共产党掌权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共产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高岗被谴责阴谋夺权。据说，他在1954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被批评后自杀，但这一案件直到1955年3月21—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才向群众公布。高岗及其同伙被指控为暗藏的反革命。接下来的运动之激烈只能以力图清除可能阴谋推翻党的领导的异己的威胁来理解。

针对暗藏反革命的运动不是从抨击高岗及其同伙开始的。它不痛不痒地开始于胡风运动的末期。1954年，有影响力的革命老作家胡风大胆向中央委员会上书，抗议党对文艺活动的限制。刚开始，人们可以相当自由地讨论胡风的信，但到1954年末，当他的批评已成为文艺界的话题时，胡风的老对手周扬领导的党的文艺机构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反击。到1955年1月，胡风被迫写检讨承认他的错误，两个月后，他的第一份检讨书被认定为不充分，他再次检讨。在全国的文艺界，胡风、他的朋友及同伴受到彻底的理论批判和抨击。^③ 在广州，一位不幸认识胡风的中学

① “领导和群众动员”这一点是由 Thomas Bernstein 形成的。

②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6日。

③ 关于文艺界运动情况的详情，参见莫尔·高德曼：《胡风与文艺界当局的冲突》（Merle Goldman, “Hu Feng’s Conflict with Literary Authorities”, *China Quarterly*, no. 12:102–137, October-December 1962）。

教师朱谷怀也受到他的同事、学生和广州的作家的批判抨击。^①

反对胡风的运动逐步扩大，但在1955年5月事情突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转变。在检讨中，胡风声称他只是小资产阶级，但在5月，他被指控为反革命。《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反对胡风的三篇系列文章，紧接着，广州的《南方日报》分别于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转载。以后日复一日，报纸上充满了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判。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

因为党和政府内的批判并不充分对外公布，因而比早些时候的运动更难了解其过程。然而，通过许多以前参加运动的干部的叙述以及在1957年“鸣放”时期所发表的运动中的批判，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其大概情况。

运动之初，广州的每一个党政单位都收到一份通知，其职工的5%应划为进一步调查的“目标”。尽管没有文献证明这一目标数字，但一些文章确实说“90%的干部是好的”。^②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中，公开发表的数据表明几乎有10%的党员在运动中受到批判。^③前任官员周鲸文（Chow Ching - Wen）也提到5%这个数字。^④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发现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的目标集中于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和那些过去曾有朋友或亲戚反对过共产党的人。在广东，总共有34 670人受到调查，虽然最后宣布只有3 670人是反革命。^⑤运动的目标限于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他们要写清楚某段没有明确指定的时期的历史，并追溯他们过去的关系。他们在会上当着质询者的面详细交代，而后把检讨上交给负责该工作的同事。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如果确实需要上级决定的话，当地官员事先是不知道的。

当发现新的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常常重新调整运动的方向，从一个目标转向另一个目标。针对暗藏反革命的运动的发动，其最初的原因可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9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8月6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7月4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25日。

⑤ 周鲸文（音）：《十年风暴》（Chow Ching-wen, *Ten Years of Stor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0, pp. 153 - 158）。

能是担心出现像高岗这样的阴谋家，或者是为了压制胡风的批评的影响。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它被用来遏制可能出现的干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制。

在中国悠久的政治警告传统中，“杀鸡儆猴”这句格言清楚明白地揭示出人们从胡风运动中所得到的基本教训。正如一篇关于胡风的社论中所说的，许多同志知道胡风以耿直言论、忠诚追随政府而闻名，由此而怀疑他是不是反革命。如果献身服务于党的事业几十年的胡风上书批评后被划为反革命，那么，任何人批评政府都有可能被划定为反革命。一篇重要的社论中警告说：“甚至在党内，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人之中，也有反革命寻找机会向党和政府进攻。”^① 每个读者从中都可以领悟到：沉默是金。^②

潜在的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的特殊联系。一篇早些时候的社论曾警告道：“在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出来从事颠覆活动……我们力量的根本在于群众的政治警惕性，他们有能力发现反革命分子。”^③ 另一篇社论中号召：“粉碎反革命分子，保卫互助组和合作社运动。”^④ 事实上，肃反运动强化了反对集体化的严重性。也许，最广为人知的反革命案件是山西省的一群因激进且同情农民而闻名的干部。他们帮助农民脱离合作社，并且无意中要对合作社中一头羊的死负责任。尽管他们绝对不能被指控为搞现行反革命活动，但因为这些罪行，他们被宣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⑤ 就在广州郊区，约有4万人集会批判某一个人阻碍农业集体化，他被谴责为国民党特务。^⑥

肃反运动的过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和压力紧密关联。1955年年中，毛泽东第一次宣布集体化的高潮必然到来时，反革命嫌疑分子被拘

① 《南方日报》1955年7月4日。

② 《新华半月刊》no. 14; 123 (1956)。

③ 《中国大陆杂志选》no. 1070; 15。

④ 《南方日报》1955年7月4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7月1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9月11日。

禁于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必说，当时没有多少人敢说反对集体化。

整个秋季，对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最后处理都未有定夺。按规定，只有罪犯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被送去劳动改造，而把这么多干部作为罪犯对待不太合适。1955年12月，这些被拘禁而未作宣判的人突然被送去“劳动再教育”。劳动再教育是个新发明的名目，它可以绕过审判程序，而只是通过简单的行政决定实施。对于那些被送去的干部，劳动再教育和劳动改造一样糟糕，甚至更坏，因为他们没有被判确切的期限，无法知道什么时候释放。12月，正当这些人被送去劳动时，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因此，一些最敢于直言的干部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场，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看到了什么是“杀鸡儆猴”。

1956年年中，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部分嫌疑分子从劳动营中释放。罗瑞卿曾用道歉的口吻承认许多对象受到错误指控，被证明是无辜的，因此要作出修正。^①一些人被发还全部工资，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并获得公开的道歉。另一些人发还部分工资，回到原来的位置，但还有一些人被判定为不全是无辜的，被安置到比原来低的位置上。可以肯定，发还工资和道歉不足以激发这些曾在劳动再教育中度过几个月的人的极大热情。正如以后几年中的讨论所证实的那样，在受害者的亲戚朋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易驱散的。然而，这一点被消弭的热情对于消除集体化运动中的有效反抗，代价是低廉的。正如罗瑞卿自豪地指出，肃反运动是成功的，因为它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②

粮食准备：“三定”运动

广东省的领导人痛苦地认识到1955年春合作化运动前夕广东农村的状况甚至比大部分省的状况更加令人不满意。全国的粮食紧张，^③广东更

^① 《新华半月刊》no. 14: 123。

^② 《新华半月刊》no. 14: 123。一名广州当地公安干部有类似的说法，参见《南方日报》1957年8月6日。

^③ 刘少奇的讲话，见《党的八大议程》，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7页；陈云的讲话，见《当代背景》no. 339；托马斯·P·伯恩斯坦：《1955年春粮食供应的危机》（Thomas P. Bernstein, *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

紧张。1954年夏收时，地方上的粮食征收额保持着适度的比率，但广东省被批评为征收不足，被迫在秋收时作额外征收。通常，秋收时征收占每年国家征收的60%，但1954年，秋收时征收的占年征收额度的70%以上。^①秋季征收很高，以至于1954年的国家征收高于1953年约20%。^②尽管官方没有公开承认，但所有的证据表明政府想得到相当大的粮食储备，以渡过集体化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因为广东土改较迟而且严厉，广东省的领导获准推迟到1954年年中实行统购统销方案，比其他地区晚6个月。^③在这之前，允许农民在完成粮食税后在私人市场上出售粮食。1954年中期后，农民必须把除他们自己消费以外的所有余粮出售给国家。因而国家得到大量以固定的低价购买的粮食，以平息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方案使国家在1954年末得以征收到大量超额的粮食。

广东在1954年末过度征收大量粮食带来了许多后续问题。它强化了传统的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上缴了许多粮食后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1955年，农民准备抵制上缴这么多粮食。^④当地的干部通常同情当地农民的窘迫处境，像在土改时期那样倾向于指责外来的干部。陶铸承认一些同志已经批评省委在1954年末购买大量粮食时过于“左倾”，他为省委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组织的弱点，忽视农村的状况，在制订1954年的征收额度时过于乐观的失误而道歉。^⑤不管是因为实际产量的下降，还是因为农民和干部低估以避免1954年那样的粮食短缺，1955年春，粮食产量的数字比前一年低了10%。^⑥

因为强制征收的额度很高，1955年春，许多农民发现除了在更多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外别无选择，这样他们才能在完成上面下达的定额后自己有足够的粮食。因而，他们忽视了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代之以种

① 《南方日报》1955年7月31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0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25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7月31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植粮食作物。^①正如干部们所说的：“农业产量落后于工业的需要。”^②

因为1954年没有确切的农业产量的数据，当地干部只得重重征收，而无从了解能留下多少给农民吃。1955年春，许多地区开始抱怨他们遭到严重的粮食短缺，上层官员并没有客观地确定粮食需求。尽管1952年在土改运动过程中曾获得一些关于产量的数据，但当时这些数据很不充分，随着产量的增加，这些数据更不准确。1952年，为了激发农民生产更多的粮食，国家向他们保证国家只根据预期的平均产量征税，并且即使产量增加了，三年之内计算征税的基础也不变。^③只要国家不对新增的产量征税，农民就稍稍感到放心。然而如果国家想收购所有除农民自己消费需要外的粮食，那么显然需要更充分的关于产量的数字。

1955年春收后不久，为减少农民的抵抗，获得更准确的粮食产量的信息，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修改，引入了“三定”运动。这些“定”是指固定的额度。其中“两定”——定购、定销已在1954年末引入。第三“定”是定产量，于1955年中期首次引入。回顾起来，人们可以明白“三定”有助于收集必要的的数据，为合作化铺路，加强当地的组织，但当运动开始时，即使是最基层的干部也没有弄明白它和合作化的关系。重点在于让粮食征收更易于被接受，以便在春收时征收粮食。

下到基层的“三定”工作组的大部分干部来自专区和县政府各办公室，但有2000多名干部是由省、市政府以及党、军队部门派出的。^④专区会议后，接着是在县政府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⑤然后，工作组下到乡，安排当地党、团和其他基层“三定”工作组干部会议。^⑥

“三定”运动包括作大量的宣传以赢得农民的合作。当“三定”工作组从乡政府派出时，会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扩大宣传。这个小组努力让农民看到政府着力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的广阔图景。它强调政府成功地消灭了投机倒把、稳定了粮价，并且把政府在提供紧急粮食救助、缓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0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6月9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9、22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4日。

解粮食短缺和没有政府干预的1943年的饥荒进行对比。^①正如陶铸在一次关于“三定”运动的重要讲话中所提到的，短缺的主观感觉比实际的短缺要大得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政府真的在努力组织粮食调配，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②

与宣传努力相伴随的是额度的全面减少。1955年的粮食额度是26亿斤，尽管比1953年要高，但比1954年征收的29亿斤要少得多。^③地方“三定”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少购少销”。这一口号反映了努力纠正城乡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减少从农村征收粮食来维护农村地区利益，^④这一政策对于城市不是没有问题的。政府期望该政策通过较低的征收额和不作超额征收的指引，诱导农民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⑤

“三定”工作组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是获得准确、即时的农业成本和农业产量的信息。由于1954年末从重征收，地方上普遍抵抗，不能依靠农民甚至是当地干部汇报准确的粮食产量数字，因为这些是向国家销售余粮的基础。工作组必须在农村观察实际的收成。由于广东大约有600万农户，所以监督粮食征收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约有1.6万名干部被欢送去农村。^⑥

这些基层工作组收集有关产量、前几年的购销及当地总的生活水平的资料。^⑦理想的话，干部召集群众参加讨论，让他们参与粮食定额的决定。^⑧每个家庭都得到保证，在完成粮食定额后有足够的粮食吃，种植经济作物的家庭则被保证供给其粮食以满足其需要。例如，在一个模范村，村中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确定各个家庭的定额，一次会上，80户拥有大量土地和充足粮食的家庭被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提高定额；38户定额不变的家庭开了另一次会，会上建议他们节省开支，增加供给；另外229户额度下降的家庭因为粮食状况紧张，开会决定下调其定额。有22户表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4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7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4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4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6月9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4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7月13日。

示有异议，而后由干部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调查。^①

尽管粮食定额总的来说降低了，但当运动达到高潮时，实际的粮食购买压力再次要求从重征收。7月8日，《南方日报》重登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敦促基层干部保证征收足够的粮食。地方干部因担心被指责为右派分子而犯征粮越多越好的错误的不在少数，后来他们为此受到批评。^②

正如一篇社论中所说的，“三定”有助于为合作化铺平道路。^③“三定”工作组收集了集体化后重新组织粮食生产所需要的信息，他们征集了大量的粮食，安全地储备在政府的粮仓中。7月中旬运动结束，仅在几天之后，毛主席突然宣布了集体化的高潮。^④

组织准备：乡政府

土改后，大部分农民被正式组织到互助组。典型的互助组通常包括6户或6户以上的家庭。互助组中的家庭在劳动和生活上相互帮助，以防止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复辟。然而，早在1953年，一份关于广东农村的调查显示，约有10%的家庭对其他人放贷借钱，一些人甚至购买债务人的土地。^⑤事实上，互助组的数目太多，国家不能充分监督他们。政府官员甚至不能了解互助组的要求，更不用说监督粮食收成，或是引进新的技术、指导水利灌溉建设、合理安排土地和劳力的使用以提高产量。许多干部认为新的组织是解决这些问题最有希望的方法。合作社是新的基层单位，它比互助组更大更强。

至少自1949年起，互助组最终将向合作社转变已经很明显。早在1952年，广东已组成了62个合作社。到1954年初，已有202个，到1954年中期，达到1003个。^⑥这些早期模范合作社的做法为后来其他地方树立了榜样。在合作社中所有的家庭在一个给定地域范围内将其95%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8日、7月10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4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7月21日。

⑤ 《光明日报》1961年5月29日。

⑥ 《南方日报》1952年10月1日，1955年2月19日。

的土地、所有的主要农业机械和所有的大牲畜交出共用。日常的工作不再是个人的家庭安排，而是由合作社的领导组织、分派。合作社记录账簿，收成后，合作社根据每个家庭在合作社中的资本投入和收成前的劳动力贡献来分配利益。劳动力的贡献每天计算，记录为“工分”。虽然合作社中有一两名干部基本上是全职的，但大部分干部要花部分时间进行日常的体力劳动。

从1954年到农业合作化结束，负责组织合作社的主要单位是乡。虽然在集体化的18个月中行动混乱，计划经常改变，但乡是基层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核心。乡的范围依据居住地模式的不同变化很大。在肥沃的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其他沿江、沿海地区，那里的村庄比较大，乡可能只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人口更为稀少的山区，人烟和农田稀少分散，乡的行政区划相当随意。虽然乡是一个正式的单位，但其政府领导薄弱、实际的政府职能很少。广州的领导不是把精力集中于乡政府的建设上，而是集中于建设乡里的党、团支部。虽然集体化完成后，要对乡进行整合巩固，但在集体化运动中，广东大约有1.1万个乡，^① 每个乡的人口平均大约为2500人。到低级社完成时，平均每个乡约有15个合作社。

到1954年冬，每个乡至少有一个合作社的初始目标基本完成。（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基本完成”意味着至少有70%完成了）当时，1.3万个合作社分布于约8000个乡，^② 因而，72%的乡至少有一个合作社。

每个乡的第一个合作社被设计为“重点”，作为培训与示范中心帮助发展乡里的其他合作社。^③ 那些没有合作社的乡可以利用邻近乡的一个合作社作为榜样。依靠“重点”合作社有利于他们的成功，因为乡里的其他村可以从它的经验中获得启示。因此，他们一定要有好的领导和有利的条件。这些示范性的合作社不一定要有最肥沃的土地或最有利的地点。关键性的数字是合作社组成后增产的幅度。有理由怀疑政府的统计数字

①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9月11日。

是否是夸大了，因为他们报道到1955年春65%的合作社增产了，^①但毫无疑问，干部们为早期示范性合作社的成功已竭尽全力。

在一个典型的乡里，党支部指挥一切主要的活动，包括合作化。^②在合作化迈向高潮的几个月中，党组织迅速扩大，此后继续迅速发展。从1954年末到1956年中期，广东的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增加的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③到1955年秋，农村大约有10万名党员；当时73%的乡有党支部，^④这个数字几乎和拥有合作社的乡的数字精确对应。为了在每个乡建立党支部，党允许比通常情况下人数少的党员组成一个支部。在广东，平均每个支部约有20名党员，而在一个新建的乡里，一个支部只有8名甚至更少的党员。^⑤到1956年中期，广东94%的乡有党支部。^⑥青年团的发展甚至更快。1955年初，约有90%的乡已经建立了青年团支部，到1955年末达95%，全省青年团员总数近50万。^⑦那些没有党支部的乡至少要有党员，他们从属于邻近乡的党支部，他们在邻近乡党支部的指导下和青年团支部相配合为他们乡的合作化作计划安排。

在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外来干部下到乡里担任领导。1955年，来自城镇的干部比土改期间更不愿下乡，因为很明显，农村要求新干部的加入，他们担心被安排留下来。合作化运动期间，曾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为农村录用干部，^⑧并且在使他们留下来方面也下了颇大的工夫；有些干部弃职回城。^⑨

可用作农村新的领导人员的人选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复员军人。合作化运动大致和军队中的一次重要重组——“义务军事训练的引入”同时进行。新的军队重组导致许多半文盲的老兵复员退伍，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更高的年青人，他们是更加专业化、现代化军队的基础。为这

①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7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5月21日，1956年7月2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1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0日。

⑥ 《南方日报》1956年7月2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5月4日，12月21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6月10日，10月27日。

⑨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10月14日。

些新复员退伍的老兵找到一个位置并不容易，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不懂民用技术。大部分退伍士兵乐意担任合作社的领导，从而享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力。把他们安置在合作社中也可以相对保证对政府的忠诚、政治可靠的人处在领导位置上。除了大量退伍士兵被乡里派到合作社，在广东约有1万名军官转业到乡、区级的领导岗位上。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关注会出现要么是当地干部强调当地的利益而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要么是外来干部像派下去指导苏联集体化的“两万五千”外地人那样彻底背离当地人民。而退伍军人，他们忠于国家，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合作社的成功密切相关，他们有助于协调地方和国家的利益。除了退伍老兵，每个新合作社刚开始还有一名从乡以上临时离岗派下去的“驻社干部”，“驻社干部”可以指导并同时监督当地的工作，以使合作社的实践在更大程度上按计划进行。^①

乡还是当地的资金积累单位。到1955年5月，广东大约有90%的乡有当地的信用合作社，约有556万名社员作了投资。积累量不太大，平均投资规模是3613元。^②从1955年1月到9月，省政府大约对这些信用社投入5700万元。乡党支部指导信用社，使之有选择地使用资金，帮助刚产生的合作社购置必要的机械和物资。^③

到1954年中期，各县率先逐步缓慢地建立合作社。在1954—1955年度的冬季，除了以前已组成的1000个合作社，各乡利用两造之间的间歇，带头建立了1.2万个新合作社。^④这1.3万个合作社只占人口的5%，但他们是其他乡效仿的榜样。由于1954年秋对粮食从重征收遇到普遍抵抗，同时也出于对一个好的春收的企盼，1955年春省委没有促动扩大合作社的数目。事实上，1955年春的报纸杂志上几乎没有提到“合作化”，而全部是强调提高产量。1955年初是1.3万个合作社，1955年中期仍然是1.3万个。^⑤总之，1955年春，在广东党对农村的政策取向中充满着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2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5月29日，6月1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0、23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2月19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关注、犹豫和谨慎的情绪。^① 5月，这种情绪让位于18个月的疯狂行动，可能在广东漫长的历史中无出其右。

农业合作化运动

五月加速：吸引中农

广东第一次加速集体化始于1955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② 会议决定到1956年春引入3.2万多个合作社。^③ 到第二年春，平均每个乡里的一个合作社要负责发展4个以上的合作社。“五月决定”后不久，“三定”运动中派下去的干部到达乡里。在执行“三定”工作的过程中，他们还检查当地的乡组织，推荐替代的人员，监督薄弱的党支部。6月初，随着1.6万名“三定”干部被派下，又有5000名干部被派下去具体负责合作社组织的工作。^④

尽管“五月决定”在一年内^⑤增加3.2万个合作社使农村干部筋疲力尽，但它并不放弃严格的计划。和以前一样，关键性的组织单位是乡党支部。支部从农村中选择有能力的青年积极分子，送他们到县里短期集训，他们回来后被安排到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⑥

新录用的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会同时被发展为党员，并担任新合作社的负责人。当时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成立合作社。“五月决定”后的4个月中，50%的农村党员，但只有6%的农村人口生活于合作社之中；93%的合作社中至少有一名党员。^⑦ 因为党员和合作社领导紧密关联，乡党支部会议实际上就是乡里所有合作社负责人的会议，这种重叠交叉使合作社的负责人由于其在光荣的内部圈子中的成员身份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促进了党对合作社的严密控制。在党的监控下，青年团对合作社领导的第二梯队保持同样类型的控制。

① 这正与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下达指示阻止进一步合作化相巧合。

②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9、24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6月9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1日。

8月，成立合作社的目标提高，一些干部被轻微地批评自5月加速以来犯了“右倾保守主义”错误。事实上，干部们一直完全按照上级命令的精神执行，因为当时为赢得农民的自愿合作，政策是较温和的。^①例如，粤北执行“五月决定”的干部会议告诉干部，农民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意愿成立合作社。干部们没有施加政治压力，而是将精力投入到关于化肥、田间管理和害虫控制的经济和技术的问题上，^② 他们要证明合作社可以使经济发展进步更快，提高其成员的生活水准。^③

“五月决定”后的一道指示迅速下传，批评对离开合作社的成员施加压力的情况。脱离合作社的农民被嘲笑为“退社鬼”；他们不准购买种子，也不准使用自己的农具或牲畜。青年团员因为没有说服其父亲留在合作社而被开除出团。根据当时的指示，这些做法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削弱了和农民的联盟”，“产生了对集体化的抵触情绪”。^④

尽管地主和富农在初期温和阶段受到合作社的排斥，但干部们仍然努力吸收富裕中农。在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中农和贫农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或者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是一个“矛盾”）。矛盾起源于合作社成员资格的问题和如何评估、支付合作社股份的问题。因为中农拥有较多的农具、牲畜和肥沃的土地，在合作社中这些对每个人都有利。贫农希望和中农一起加入合作社。中农则想和其他中农一起加入合作社，而不愿意较贫穷的人，有时是不太勤快的人分享其财富。^⑤ 在组建这些合作社之初，每个人都希望购买固定的股份，股份可以通过贡献土地、设备、牲畜或者是现金购得。中农可以献出更多的物资，因而他们比贫农更加倾向于高估他们的物资。少数贫农因为怀疑能否偿付他们欠下的购买股份的钱而对加入合作社心存疑虑。其他一些贫农则希望他们对合作社的债务能够推迟偿还或是被遗忘，而中农则希望保证在将来合作社分配利益时，较贫穷的农民能作出补偿。

初期合作社（后来被称为“低级社”）的基本政策是吸引中农。在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9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8、24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7月6日。

⑤ 《南方日报》1966年10月7日。

这些低级社（“半社会主义”）中，其成员所得有一部分（通常是70%）是根据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通常是30%）是根据他们献出的资本（土地和物资）。正如共产党希望获得富裕商人的合作而在集体化之后给予一些补偿一样，他们希望补偿合作社的资本投入使合作化更多地吸引中农。大部分中农背景出身的干部自然同情中农，他们获得较多的财富是因为他们勤奋劳动。土改时，从年轻而能干的贫农中选拔出的许多干部，后来因为自身能力以及和党的关系而致富，许多人上升为新生的、称号有点让人不安的“新中农”。可以理解，他们也赞同补偿中农的政策，以便使他们自愿地加入合作社。

在一篇社论的评论中还举例提到吸引富裕农民，在这个例子中，24户农民全部是中农，都离开了合作社，剩下的只有17户。他们献出了大量的物资、牲畜，而一开始他们所献出的没有给予充分的估价。而在合作社中较贫困的农民一度既没有出钱入股也没有出劳力。社论的寓意是必须公正地对待中农，以使他们留在合作社中。^① 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没有任何政策改变的迹象。7月30日，也就是毛主席著名的关于集体化的讲话的前一天，还有文章在敦促要更加关心中农的问题。^②

八月加速：吸引贫农

毛泽东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决定干预，激进地改变合作化的步伐还不为外人所知，甚至也没有向中国国内的普通党员透露。显然，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讲话没有跟上几个星期后，即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讲话的步伐。^③ 毛泽东讲话中的核心内容是号召大大地加速合作化。根据毛泽东在重要会议之前要进行大量的个人商讨的模式，可能在决定之前的几周，他和当时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的各地党领导进行了许多次交谈。他选择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宣布他的新

① 《南方日报》1955年7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7月30日。

③ 毛泽东的讲话直到1955年10月17日才在《南方日报》上发表。李富春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以及这一阶段其他重要的文献收录于罗伯特·鲍威和费正清：《共产党中国（1955—1959）：文献与分析》（Robert Bowie and J. K. Fairbank,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 with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政策。显然，他决定性地认为合作化更快的步伐是有必要的，这样粮食征收才可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任务。加紧行动无疑和即将到来的大丰收有关，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粮食储备，避免秋收时的混乱。毛泽东很可能也考虑到主要吸引少数中农而努力扩大合作社数目的困难。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广东的许多干部在回顾时都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一年之内合作化就基本上完成了，所产生的混乱比苏联少得多。

虽然政策最后成功了，但毛泽东讲话之后的那一年中，广东的情况一片混乱，当地的干部对此毫无准备。毛泽东讲话后的几周中合作化几乎停滞不前，因为党的干部忙于在内部会议上制订出新的加速方案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是省委干部扩大会议。^①和通常一样，早期的温和倾向必须予以谴责。正如当地干部后来所描述的：“遵照中央指示，我们开始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②还宣布工作好的干部（就是发展了合作社的）要表扬奖励，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推动合作社发展的）要给予批评。^③

到9月1日，省委已准备发布新的关于合作化的指示，从9月5日至14日，召开了一次省党代会讨论宣传新指示。到1956年春，广东的1.5万个合作社不是按几周前的计划增加到4.5万个，而是增加到7万个，包括了全省27%的农户。因而，每个乡党支部平均负责的新合作社不是4个，而是7个（7月1日，广西的5个县划归广东管辖，这些县有2000个合作社，因而，新数字是1.5万个合作社，而不是1.3万个，它不代表实际的增加。）^④到1957年秋，新成立了5万多个合作社。^⑤全省新的额度被分摊到各县；各县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纠正他们的思想，根据新的指示制订新的计划。^⑥到10月中旬，各乡召开会议，执行计划。^⑦

①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8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4、27日，10月4、5、6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2日。

要应付这一巨大的重组，必须有新的人员。到第二年春，广东农村的党员从10万人增加到14万人，90%的乡有党支部。^① 考虑到每个新的合作社需要6到9名骨干领导，^② 省委估计总共需要训练50万人担任骨干领导岗位，这其中包括一些已经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骨干。^③ 这些人中，有1/3要在秋季受训，2/3在秋收后受训。^④ 估计自1953年以来，广东省毕业于小学、初中的学生大约有30万人，这些毕业生，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占了这批新成立的合作社领导的绝大部分。^⑤ 但政府还必须使用许多从当地农村吸收录用的文盲。例如，676名参加15天会计培训班的人员中，2人读完中学，72人小学毕业，192人小学三年级水平，410人还不到小学三年级。^⑥ 各乡的积极分子被动员到县里学习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参加会议制订各自地方的集体构成的具体计划。^⑦

遵照北京的指示，吸收录用退伍军人的工作重新开展。^⑧ 省委省政府为此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帮助退伍军人进入合作社；^⑨ 县、区、乡三级领导召开特别会议敦促退伍老兵加入合作社。例如，到1955年末，茂名县58%以上的退伍军人加入了合作社，300多人成为合作社的领导。^⑩

除了每个县组织的培训项目外，省教育厅联合省农业厅很快开办了5所新的中级学校，每个大行政区一所，培训约2000名会计帮助合作社。广东还开办了7所中级学校提供农业技术、畜牧业、农学以及其他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培训。这些中级学校吸收华侨和没有进入高中的中学生，给他们的课程设计时间是一年，^⑪ 而由于对毕业生的需求，该课程实际上被缩短到6个月。^⑫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1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2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8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3日。这些数字是邻省广西的，虽然没有广东的可比的资料，但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实质性的不同。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3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5日。

⑨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2日。

⑩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⑪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7日。

⑫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2日。

在县城的培训层次较低，但学习的课程类似，学生的人数很多。例如，在粤西地区的几个县中，约有8 100名农民被组织参加县级的农业技术学习。^①

吸收骨干干部动员一般的农民加入合作社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大批农民被组织参观“重点”合作社。^②电影队携带着影片和放映机下到乡村，以放电影的方式来证明合作社的优越性。在粤东地区，9月份约有23.7万人观看了这些影片。^③

在合作化成为高于一切的关注点时，党为了达到这一主要目的也愿意作出一些让步。7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古大存在报告中说明广东如何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作出很大的牺牲完成了1954年的定额，^④实际上是要减少广东省1955年的粮食定额。地方主义情绪由此日渐高涨，以至省财政厅的领导认为有必要提醒地方的同志“扰乱‘先中央，后地方’的原则绝对是错误的”。^⑤几周后，中央政府颁布一道指示，对广东的干部“以耳代目”，没有准确汇报农村的情况给予口头上的严厉批评，严肃警告广东的干部必须完成1955年的粮食定额任务。但与口头批评相伴而来的是他们1955年粮食额度的降低。^⑥

八月会议以来出现的最剧烈的变化是阶级政策的变化。为了扩大合作社的数量而给中农提供有利的条件，成功是有限的，是没有大的前途的。毕竟，大多数农民是贫农，如果要迅速发展合作社的数量，必须把吸引的方向指向较贫困的农民。在新一轮县、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向贫农的新路线得到宣传扩大。^⑦

一篇社论中说：“为什么合作社没有迅速发展？因为干部们过于依赖中农。”^⑧另一篇社论中问道：“在集体化运动中，我们要依靠谁？……”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0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0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7月31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7月21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7、25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4日。另外，梅县的例子见《南方日报》1955年9月27日。

首先是党员和青年团员，其次是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第三是贫下中农。”^①

上中农仍然是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尚在合作社之外的上中农，但合作化能迅速获得成功，那么通过较重的税收、购买种子和其他必需品的限制及福利特权的排外，就可以对富裕农民施加压力，使中农除了想办法加入合作社之外别无选择。毛泽东在他著名的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人农会不可得。……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② 1955年冬的合作社政策精神与此是完全相同的。压制中农的政策没有直接、公开地宣传，但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例如，两个月后，召开了一次来自50个乡的富裕中农会议，讨论他们的申诉，他们表示了被排斥在合作社之外的忧虑，他们抱怨政府“像对待地主、富农那样对待他们”，而不是像对待中农那样。他们被当地孤立，甚至不能在供销合作社买东西。处理他们抱怨的政策公布如下：允许他们组成互助组，少数有“觉悟”的允许加入合作社。^③

限制贫农加入合作社的一个问题是购买股份。在有些事例中，一些最贫穷的农民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购买股份，可能他们也难以偿还贷款；在另一些事例中，贫农因为担心偿还的问题自动退出。^④ 7月后，根据新的阶级政策，农村信用合作社宣布新的特别贷款项目给那些希望加入合作社而无力购买股份的贫农。^⑤ 1955年秋，这样的贷款大约为514万元。^⑥

新政策在评估问题上还特别有利于贫农。在评估合作社偿付的土地价值的利益时，指示中说明，富裕家庭的土地按其价值的85%计算，一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7日。

② 斯图亚特·R.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dong*, New York: Praeger, 1963, p. 181.）全面的毛泽东传记，见斯图亚特·R. 施拉姆：《毛泽东》（Stuart R. Schram, *Mao Tse-dong*,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最完整的英文版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选集》，4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3日。另见：《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7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4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9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19日。

般农民的土地按其价值的95%算，贫农的土地按其价值的100%或更多来计算。^①

十一月加速：简单化的推进

遵照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六中全会精神，还发动了一次加速，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挂帅领导。^②在春季前达到7万个合作社的地方计划上再增加1.5万个。^③事实上，到12月初，广东就宣布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0万个，而不是7万个或8.5万个。^④迅猛的加速影响到全省，但尤其集中于珠江、韩江三角洲地区的39个县。单这39个县约占了8.5万个合作社中的5.1万个。^⑤甚至在落后于全省其他地区的海南岛，到11月初也已发展了3500个新合作社。^⑥

和以往一样，当定额增加时，就必须对付干部的抵抗。虽然在当时的集体化热潮中没有时间来开展全面的纠正运动，但干部们仍然继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纠正他们的右倾错误。^⑦自从8月份阶级策略改变以来，许多干部已经承认他们阶级立场的错误。^⑧许多是“新中农”的农村干部因为太同情中农而受到批评，其他干部则因为没有完成宣传、录用和组织新的、成功的合作社的艰巨任务而受到批评。而其他的高层干部则因为抗拒下到农村帮助工作而受指责。^⑨久经检验的“学习”方案再次用于压制反抗；正是在11月加速后，作为最大的推动力之一，在肃反运动中受批判的干部被送去劳改营。

但要求增加的数字令人惊愕，甚至思想控制也还不够。只有一种可能的办法能如此快地组成如此之多的合作社，那就是：把互助组只作表面的组织改变而使之成为合作社。9月，广东已有1.5万个合作社和8.4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2日。

② 这一阶段中国各地的文章汇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为其作序。（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年）。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3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6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3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5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4、5、6、28、30日，11月1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5日。

⑨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25日。

万个互助组。^① 通过改造互助组有可能相当快地达到要求的 10 万个。8 月份，尽管新的进度飞快，但乡里还努力选拔能干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在县里至少学习一至两周，但到 11 月，甚至连这些时间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由县里传达到乡里，由乡里召集各互助组代表开会。互助组代表组成合作社筹委会，作出集体化的计划。在筹委会中，一名副指导员和一名助手起草生产计划，另一名副指导员和他的助手估算合作社成员的财产，并作出账务和资金上的安排。^② 可以肯定，一些熟练的外来领导被抽调来帮助组成新合作社。事实上，老合作社的干部忙于组建新合作社，而使自身严重缺乏领导，人们已经反映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严重影响老合作社。^③

互助组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改造成合作社。11 月 11 日至 23 日，在广州召开的约 1 700 人参加的省、专区、县党委书记特别会议上，陶铸表示对新合作社的数量非常满意。他用经典的含蓄表述指出，问题不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④ 因为合作化已基本成功，正如陶铸所指出的，有必要加强现存的合作社。事实上，正如陶铸所承认的，10 万个合作社中，5 万个甚至还没有评估其成员的资产，另外的 3.5 万个还没有提高其产量。^⑤

提高合作社的质量作为运动的一部分，省领导要负更大的责任。12 月中旬，宣布全省各地的 77 个“重点”合作社直接由省委领导。18 名省委领导被树立为下层干部的榜样，个人担保合作社的成功。领导每年几次参观访问这些合作社，直接了解农村的情况。^⑥

看到合作化中的这些基本突破得以实现，陶铸还指示要努力把在此以前被排斥在外的富裕中农组织起来。^⑦ 一些富农也在周遭的压力之下进

^① 《南方日报》1955 年 9 月 24 日。关于一些合作社作为其他合作社的样板，参见：《广东四十个农业合作社》（广州，1956 年）。

^② 《南方日报》1955 年 10 月 23 日。

^③ 《南方日报》1955 年 10 月 28 日。

^④ 《南方日报》1955 年 11 月 14 日。

^⑤ 《南方日报》1955 年 12 月 30 日。

^⑥ 《南方日报》1955 年 12 月 23 日。

^⑦ 《南方日报》1955 年 11 月 14 日。

入合作社，但当时主要的手法是“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① 解开中农“心锁”的方法是用通过某个已经加入合作社的、身为积极分子的亲戚或朋友进行开导。显然，集体化的高潮滚滚而来，富裕中农除了投入大潮之中别无选择；亲戚或朋友只不过是个传达信息的中间人，帮助实施特别的安排。

1955年秋收时粮食征收的办法有助于展示加入合作社的好处。粮食首先从合作社中征收，然后，由加入合作社中的人负责监督合作社以外的人付清他们的全部粮食定额。^② 当然，那些热心于征收没有加入合作社的人的粮食的合作社干部不会受到批评，因此社外的人都争取在下一个收获季节来临之前加入合作社。

随着1955年11月的加速，低级社数量以天文速度增加。到1956年1月底，官方统计的数字是132 304个合作社，总共占8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③ 到2月底，92.8%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其中44.2%是高级社。^④

高级社

在高级社中，利益分配不再是根据土地、牲畜和设备，而是完全根据劳动力。新制度显然对那些财产少的人——也就是贫农——有利。理论上讲，对那些献出了牲畜和机械的人还是要补偿的。但是，8月份之后，贫农因人数及党的政策方面在合作社中占支配地位，他们主张少赔，或者干脆置诸脑后。1956年1月，当大部分中农已进入合作社时，新的公告立刻下达宣布在春季组建385个高级社，每个县至少要有一个。到1956年秋，5%的农户要进入高级社，到1959年，要有80%进入高级社。^⑤ 几周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到1958年底100%的农户都要进入高级社。^⑥ 这篇文章发表4天后，省委根据新的国家十二年农业发展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0日。

③ 《南方日报》1956年2月11日。

④ 《南方日报》1956年4月7日。

⑤ 《南方日报》1956年1月9日。

⑥ 《南方日报》1956年3月27日。

规划，宣布到1956年秋85%的农户要加入高级社。^①这个数字实质上达到了，到年底前，广东89%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7%多一点还在低级社。^②

低级社改组为高级社比刚开始创建低级社要简单得多。中农肯定会抗议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赔偿，他们抵制新的利益分配方式。牲畜和机械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看。而高级社总的来看是单个单位的合并，而不是最基层单位的重组。以前的合作社在成为高级社中的生产队时仍原封不动。几乎所有的合作社都继续存在管理上的问题和不满，但过渡并没有给这些原有的问题增添大的额外负担。

到1956年秋，疯狂的18个月结束，广东的农村人口被组织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之中。不用说，许多合作社组建得太匆忙，还需要倍加留意。在最后阶段，合作社政策的核心是“先加入，再兑现”。存在的问题由合作社定期组织整改运动处理，整改运动涉及从“思想”、组织结构到生产管理的一切事务。^③事实上，毛主席已经说过，合作社的整改运动不应该是每年一次，而是每年三次。但基本的组织框架已定，任务是在再次转向生产和农业计划的同时，继续加强组织建设。

广州的工商业、手工业、个体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虽然广州的现代工厂无法和上海及东北三省相比，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众多，使政府的监督负担很重，使社会主义改造的负担更重。在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前夕，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业。^④而广州则有270家，138家工业企业代表4000家不同的机构，132家商业企业代表16500家不同的机构，此外还有手工作坊和小摊位。^⑤共产党的统治者要采用某些社会化形式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到1953年就明确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① 《南方日报》1956年4月8日。

② 新华通讯社（1957年8月19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599:18-21。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0月30日。

④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2日。

⑤ 《南方日报》1956年3月30日。

1954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公私合营公司暂行规定，商人们对改造后的工商企业要采用的形式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相当大数量的企业划归国有，但名义上是公私合营的公司。虽然委婉地保留了“私”字，实际上只体现为在政府接管企业后，以前的资本家能继续拿到资本和资产名义上的固定利率。^① 很小的工商企业、手工作坊（当时解释为4人或4人以下的作坊）、摊点（包括流动的小车和提篮）被组织为合作社。到1955年中期，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全面展开。^②

甚至在1955年中期以前，一些最大型的工厂就已经处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广州四家最大的工厂（发电厂、通用机器厂、广州水泥厂、广州造纸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直属中央政府管理。此外，另外35家中等规模的工厂，包括13家重工业工厂、8家纺织厂、14家轻工业工厂已被改为直属市政府的国营企业。^③ 到1955年末，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私有工厂的工业产出仅占54%，而1952年则占87%。^④ 4000多家小工厂、作坊中，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的，1950年占9.79%，到1954年增加到占21.88%。^⑤

1949年后，政府还逐步增加了其控制的物资的数量。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政府的策略是通过获得对物资流动的控制，利用价格杠杆限制利润幅度，对那些有利于经济、服从政府指导的公司给予优待。到1955年秋，社会主义改造前夕，约80%的工业产品以商业合同的形式处理，以实现政府的指令。^⑥

通过用合约规限必需的物资，政府进而控制了物资向零售商的流动，但政府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前控制更多。为了保持对存货和物价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安排零售商店作为物资销售的代理人。到1955年5月，广州16500商店中的8900家至少是某些物资销售的政府代理人。^⑦ 尽管当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6日。

② 关于各个城市中运动的发展的一些基本比较，见《当代背景》(CB), no. 393。

③ 《南方日报》1955年7月28日。

④ 新华通讯社(1955年12月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183:31。

⑤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时政府还没有真正开始在数量上接管零售商店，但已经接管了许多批发公司，从而利用价格杠杆更严格地控制了零售商业。到1955年6月，政府直接经营专营不同门类物资的有37家批发公司。^①到1955年9月，93%的批发商要么是国营，要么是合作经营。^②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到接管批发机构的进程。^③

私营企业的所有商业贸易的比例

	1952年	1955年9月	1955年12月
批发	66	7	4
零售	83	55	29

但在实际上控制并不总是像政府希望的那么有效，而是困难重重。强制执行某些商品的价格并不太难，但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政府试图和私人企业协商，控制所有基本必需品的物价。^④试图裁定几百项品种、质量不同的商品的价格，难度极大，使干部和小店主双方都很厌烦。许多商店因为不满意作为政府代理人所获得的利润，而且不愿意大量投资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可能会被没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逐步从他们的买卖中撤回资金，^⑤不从批发商那里购进数量充足的商品。^⑥特别是自1955年1月起，商品成交量下降。^⑦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⑧因为政府支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低，农民试图绕过政府，直接把他们的产品卖给零售商店，甚至是消费者。零售商店尽量避免出售利润固定的政府商品，转向经营不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商品。为了使商品再次流通起来，政府的商业企业作了很大的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

①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3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3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6月2、8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7月4日。

型商品交流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①但这至多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

工业的情况一样令人不满意。当工厂不能完成政府的合同指标时，政府不得不违约拖延向其他地方供应物资和产品。有时，为了补上商品缺额，政府施压让其他企业超额生产。然而，等到政府开始了解生产上的困难时，让其他企业补缺通常已为时太晚。所有的企业都被鼓励要更多地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质量的下降，使政府难以维持质量标准。^②并且，政府还不能充分控制企业的内部。尽管工会组织检查管理方的活动，但难以监管管理方拿走的利润。企业库存一部分货物，但也难以知道是多少。^③当一个企业抱怨原料不足，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机器问题妨碍其完成定额时，政府也不容易作出独立的评估。即使商店按合同供货给工厂，工厂也几乎不可能合理地使用机器设备和人员。如果A工厂使用一台机器只有一半的时间，B工厂并没有办法利用这台机器的另一半时间。如果A工厂缺少某种特殊技术的人员，也没有办法送他们到B工厂接受培训。无法强迫一家拥有特殊处理工序的工厂或车间把这些工序传授给其他工厂。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阻碍了社会主义的进程。

在集体化的前夕，政府处在向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使他们继续开业的独特位置上。几年以来，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工会要求更高工资的胁迫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经营的规模。这样的情况在1955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迫近的传言的蔓延而更加严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威胁下，许多小企业主开始从他们的企业中抽回资本，而不是进一步投资于物资与机器设备。商店和可供应商品的数量迅速下降，^④为此，政府不得不成立特别的消费者代表委员会来处理消费者的抱怨和不满。^⑤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尽量鼓励私人企业主。在集体化开始前的几个星期，当地的官员一再向私人企业保证他们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

① 《南方日报》1955年5月31日，6月3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6月8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内可以继续作为政府的代理人。^① 干部们被告知对私人企业主要更宽容，后来这被认为是公然的右派思想。^② 一些以前被分给合作社和政府批发商店的物资重新返还给私人企业。^③ 从1955年2月至6月，已经掌握于政府之手的104家商店重新返回给私人企业主。以前受政府控制一些物资的有关规定被撤销。^④ 为了维持交通服务，政府支付了属于私人公司的23辆公共汽车的修理费用。^⑤

在处理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恐慌而引起的混乱的同时，政府已开始操办帮助商人准备改造到来的各种会议。早在1954年，商人们被组织进各种学习班，考虑为国家的发展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5000多名最大的商人在市里召开的会上学习，1万多人参加5个主要城区的学习班，几千名小商人参加了54个街道办事处专门学习班。^⑥

商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应获得比农村的地主、富农更为仁慈的对待。因为，农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很低，农村中的地主没有专门的技术，而指挥一家工厂确实需要专门的技术，政府业已明确宣布将根据和政府合作的前资本家及其助手的能力给他们安置新的工作。^⑦ 商人们被告知他们在改造后的七年中继续收到利息。

尽管有这些保证，工商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安情绪。商人们意识到在改造后，他们将无法抵制共产党，党在理论上、情感上都倾向于严厉处置他们。政府官员意识到商人们在细心观察第一家进行改造的商店、工厂所发生的情况，因而十分注意充分利用以前的商人。此外，许多商人还关心在共产党的干部掌握了必要的商业技巧后，这样的安排能持续多久。7月底，毛泽东宣布农业集体化，引起了商界的高度关注，政府感到应该颁布一道声明向他们保证在城市中改造不会太快：“已经决定工商机构将在五年之内基本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⑧ 事实上，工商界的

① 《南方日报》1955年5月23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6月5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1月18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9月21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3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5月26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9月8日。

这一转折在6个月内就发生了。

城市中的准备工作和农村集体化的准备相类似，只不过不同的情况导致方法上略微的差异。正如在农村集体化之前“三定”运动中农村干部调查农村的情况一样，城市干部在城市的改造之前调查企业的资本、物资的数量与价值及职工的人数与类型。除了干部的来访，企业主还要填写各种表格，而工人们则被工会动员起来检查他们的雇主回答的准确性。^①

政府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仍然要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来赢得资本家的合作，而在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中对地主并没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一些消息灵通的资本家愿意和党的领导合作，在很早之前已被组织进工商联担任领导。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在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工商局的领导下，工商联成为负责赢得商人们合作的关键性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党或是政府的干部不直接接触商人，而是通过工商联做工作。总之，党利用资本家来影响其他的资本家。

在农业集体化中，当地的地域单位——乡可以在某个地域内监督所有的农田被重新组织进合作社。在城市中，企业的多样性和专门性行业问题的复杂性使利用邻里或区作单位来监督经济的重组不现实。然而，城市就是一个合理的单位，广州的商业因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城市的商业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限。在城市中，区可以作为一个单位来组织为改造做准备的职工的政治学习，^② 监督经济的重组方面，一个行业中的所有工厂、商店的组织是一个更为适合的架构。在广州的行会组织结构中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如广州传统的七十二行行会^③就有许多延续至今只作过细微的变动。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行会是商人的组织，而不是手工业者的组织，是封建性的。然而，这些行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没有组织成行会的行业，共产党只好自己建立行业组织，有时要从零开始。在1955年之前，党就已经开始根据主要行业的路线来细分工商联，

① 《南方日报》1955年9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6月4日。

③ 七十二行的名录，可参见《中国指南》正式系列，vol. D.（东京：日本政府铁路，1924）第397页。

逐步将某一行业的商人更频繁地聚在一起讨论商务。到社会主义改造时，从大型的纺织业制造商到木柴商有 138 个工业行业及 132 个商业行业，它们是关键性的协会性组织结构，共产党计划围绕这些组织结构来重新组织经济。^①

对每个行业的适度监督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没有足够的有技术能力的干部，政府必须让商人参与到计划的过程中。然而，将竞争对手组织到一个行业中产生了“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这使干部易于监督他们的工作，保护政府的利益。所有的商业行业对市政府的商业局负责，工业行业对工业局负责。这些局分派干部监管各个行业的工作。每个行业都由经营管理委员会领导，经营管理委员会由 27 人组成，其中 6 名政府干部，12 名商人，8 名工会代表，还有 1 名工商联代表。^② 尽管商人在其中是最大的一股，但干部们需要和工会代表联合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占大多数。虽然干部、工人和商人之间的联合并不容易，但总的策略是在技术问题上依靠商人，同时将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干部的手中。基本的决策由政府的工业局和商业局决定，但政策执行的途径方法由每个行业的经营管理委员会内部的各派共同作出决定。

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任务繁重，所需要的干部人数要比党和政府各经济部门所能提供的干部多得多。一旦这些企业被改造，对经济干部的需求就会持续不断。因此，政府打算录用改造完成后仍能继续担任经济领域管理人员的干部。在这期间，政府持续经受着缺少适当干部的困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在其他战线工作的干部发出呼吁，请他们参与工商业的工作。^③ 然而，有经济事务方面知识的人几乎全部是出身于“反动阶级”，甚至是那些被认为是和老板同流合污的公司雇员。因为广州漫长的商业史，大部分广州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商业意识，但这种“意识”更多的是讨价还价和贸易方面的，而不是商业管理。而且，能力强的管理干部全力抵制被分配到经济领域。他们认为虽然工资稍微高一点，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会将他们和政治事务的主流隔开。还有，这是有风险的，

① 《南方日报》1956 年 3 月 30 日。

② 《南方日报》1955 年 11 月 18 日。

③ 《广州日报》1955 年 6 月 14 日；《南方日报》1955 年 11 月 8 日。

因为如果他们太靠近商人，干部们会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商人的积极合作，会被指责为“命令主义”。因为经济事务的复杂性，干部们即使政治立场正确，也很容易犯商业上的错误以及完成不了定额。

因为这些问题，在寻求管理人员时，政府不得不依靠行政管理干部和那些表现出“较进步”思想的商人。因为商人们必须在学习小组上表现自己，学习小组成了选拔态度正确的商人的录用工具。从这些学习小组中总共录用了835名基层的工商业干部。^①此外，1953年以来，一直试图提拔一些工人和工会的领导担任干部，并让他们入党。^②尽管许多这样的干部进入到管理的行列，但工会的领导工作并不足以作为进行商业管理的准备。不管是从哪里录用的干部，1955—1956年的迅速扩张，加上能力上胜任、政治上可靠的人员的缺乏，使这些领域的干部不可能像党和政府其他战线的干部那样可以胜任。

为培养新干部，特别是那些由工会干事从企业的工人中录用的干部，当局设置了专门的课程。例如，从1955年5月1日到6月8日，从私营批发企业中选拔的1379名进步分子被送去学习，6月8日，再有1000人开始了他们简易的学习课程。^③但正式的课程学习不能取代学徒训练，因此，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已处于政府管理下的企业雇用了远超出需要的职工，给他们提供了学徒训练，然后等到其他企业也进行了改造，他们被分派到这些新的国营企业。为了准备这项工作，在1955年上半年，政府企业积极从私人企业的职工中录用人员。尽管私人老板对于这件争夺他们较好的职工的事不大在意，但工人自己为这样的机会所吸引，虽然工资低一些，不过他们认识到商业的未来在政府这一边。

十一月加速

虽然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的7月31日讲话后加速，但在1955年夏、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3日。

② 《广州日报》1954年6月14日。

③ 《南方日报》1956年6月18日。

秋，商业改造进展的步伐还很缓慢。大型的面粉厂、造纸厂、纺纱厂、最大型的纺织厂和几个全行业（电子管厂、缝纫机厂、陶瓷厂和制冰厂）已经被集体化。但考虑到广州经济活动的范围，这些进展是非常有限度的。

和农业集体化一样，步伐改变的征兆直接来自上面。1955年10月29日，在一次政治局委员与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亲自号召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进程要迅猛加速。^①在9月，曾宣布过这一运动需要五年时间，但在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在广东省委干部特别会议和广州市人代会上宣布这一运动实际上要在两年内完成。^②9月，广州18%的工厂已经公私合营，但新计划（针对雇用10人或10人以上的企业）^③要求到1957年底增加到90%。到那时，86%的商业机构将是公私合营企业，85%的小商贩和90%的手工业作坊将被组织成国营或集体企业。^④

加速政策宣布后几天之内，1.6万名商人被召集到一起，听取新政策的信息。^⑤他们的家属也被告知改造的必要性，并敦促他们的丈夫、父亲合作。^⑥其他的群众团体，特别是工会被组织起来检查资本家。^⑦

毛泽东十月讲话后的新计划宣布要对各行业施加更多的压力。工厂、商店不再是单个的改造，而是要将某一行业的所有企业一举转变过来。运动开始于比较大的行业，但希望小的行业追随其后。^⑧准备工作随即开始。专门的干部工作组召开每个行业的所有工厂开会，讨论新的目标，并作出改造的计划。在几个行业中，所有的工厂在一系列的会议之后开始递交申请，要求允许他们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例如，在12月16日市工商联主办的一次大会上，干货店行业的所有127家商店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允许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他们的

^① 《联合研究服务》（URS），vol. 1, no. 19（1955年11月18日）；《南方日报》1955年10月31日、11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7、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⑤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3、16日。

^⑥ 《南方日报》1955年1月18日。

^⑦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1日。

^⑧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6日。

申请得到批准。^① 干货店的工人主持讨论会，准备在每个商店组织合营管理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干货店的老板被召集在一起当众公开表示他们对此热烈拥护。《南方日报》报道：“商店干净整洁，装饰得像新年的气氛一样，……所有的商店都有标语：‘祝贺批准加入公私合营’，……工人和资本家分头组织了四个‘报喜队’，昨日下午到各个商店舞狮、敲锣打鼓，彼此祝贺，气氛十分热烈。”^②

到12月底，65个工业行业的所有工厂一致向市政府申请，要求允许组成公私合营企业。但市政府明确表示这样的权利不能轻易获得，只批准了4个行业。^③

从12月13日至27日，所有涉及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干部被市委召集到一起加强准备工作。会后宣布新的指示，除了非常老的老人、孩子和病人，全市所有人员从1月1日至15日期间都要参加会议听取关于集体化必要性的报告。^④ 约700名即将成为基层干部的工人从1月4日开始在各自的企业学习，计划有关改造的实际工作，^⑤ 他们进而动员全市的其他工人学习新政策。1月9日，约1300名资本家和指导20个主要行业的人员在一起参加学习班，他们还继续培训其他人员。^⑥ 和以往一样，学习不仅包括大型讲座，而且还有小组学习班，参加者要公开对新政策表态，并制订出他们各自单位的具体计划。^⑦

一月加速

1956年1月8日，广州市副市长梁湘重申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纲要：“我们必须在1957年底之前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⑧ 两天后，即1月10日晚，5000多名资本家及其家属被分别召集到全市的150个会场听

①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3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23日。

③ 《南方日报》1956年1月6日。

④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日。

⑤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1日。

⑥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1日。

⑦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1日。

⑧ 《南方日报》1956年1月8日。

取长达4小时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新加速的广播讲话。^①虽然很可惜没能得到这次广播讲话的全文，但很清楚，这些商人正准备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次加速。两天后，全市所有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要在10天内完成的消息自北京传来，广州要学习北京的榜样，^②当地的资本家可以明白他们的未来何在。1月17日，一次市委直接召集的约300名最主要资本家参加的大会宣布：“可以肯定，广州所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是一年，也不是一个月，而是就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③

所有这一切是“根据自愿的原则”^④实现的，但同时警告每个人“一小撮反对这些规定的资本家将依法予以处理”^⑤。但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法律。宣布与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的商人“作出人员安排时，政府将予以照顾”^⑥，但对不合作者的处理没有明确。

参加1月17日市委会议的300名主要资本家“一致”决定他们将“积极带领、动员所有的商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要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⑦。针对大多数资本家的统一战线组织——民主建国会同一天开会决定在1月20日之前完成改造。当晚，1500名资本家子女开会，打出标语：“登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一列列车。”^⑧同一天晚上，约2.5万名工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18支资本家的“报喜队”宣传社会主义胜利的消息。^⑨第二天，即1月18日，105个行业在全市的会场集会，一致申请允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游行到市政府和工商联宣布喜讯。^⑩次日，即19日，剩下的行业完成了申请，1月20日，6万多群众集会，宣布所有270个工商行业的20200个单位（其中4000家工业单

①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1日。

②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2、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19日。另参见罗伯特·骆：《逃离红色中国》（Robert Loh,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McCann, 1962）。

④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参见傅高义：《志愿行动和社会控制》（Ezra F. Vogel, “Voluntarism and Social Control” in Donald W.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⑤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

⑥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2日。

⑦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

⑧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⑨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

⑩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9日。

位、16 200 家商业单位) 已经申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所有的申请都被接受。^① 全市各个群体从少年先锋队到年老的资本家都被组织参加大型的游行、舞蹈、集会, 高潮为一次 30 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庆祝“社会主义社会”成就的伟大胜利。^②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在 1956 年 1 月中旬之前统治集团中的哪个阶层已获悉计划以这样的速度进行。很可能是广州领导的最高层至少提前几天获悉运动的速度, 因为事态发展的秩序和组织水平反映出其经过精心准备。当然, 不管时间安排如何, 学习班和计划会议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显然, 突然宣布加速有许多实际的好处, 因为资本家来不及组织对抗运动, 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前从他们的企业中撤出资金和物资。在各企业中工作的青年团员被组织成 166 个“突击队”进一步检查资本家在最后一刻是否撤出资金, 是否以完好的状态交出物资和设备。^③ 尽管广州领导的最高层可能已准备好突然的加速, 但工商界的一般干部并没有。突然加速宣布后的一篇重要社论曾不满地表示: “干部们……不懂或者是没有充分懂得工人、职工对工商业改造的积极性和迫切要求。”^④

加速形成了一种模式, 不仅表现在集体化中, 而且表现在土改和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模式就是做好精心计划及各阶层的基础工作, 然后朝统治集团上层设定的目标突然加速。在全面的动员突然铺开之后, 新的目标“达到”, 目标被几次提高之后达到最后的目的。接下来是重新调整纠正“纸面上的成功”和因为运动太仓促出现的问题。领导们并不在文件中说明突击浪潮背后的道理, 他们似乎发现制服冷漠和抵抗力量的阶段性突击是引发根本变化的最好方法。

1955 年秋, 在对私人工商业以温和适中的步子进行改造时, 企业中常有一群干部到访, 他们在企业中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登记财产目录、

① 根据后来的数据资料, 总共有 4 727 家工业企业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总共约有工人 6 万人。《香港文汇报》1957 年 2 月 14 日,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no. 1468: 19-24。

② 《南方日报》1956 年 1 月 30 日。

③ 《南方日报》1956 年 1 月 19 日。

④ 《南方日报》1956 年 1 月 18 日。

调查账户、制订新的经济计划、重组公司、计划重新分配。此后政府才接管。因为1月份的突然变化，这些工作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完成。正如一道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过去通常的方法是先登记财产目录、检查账户，然后允许改造。现在，第一阶段是允许改造，生产和以前一样继续进行，人员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工人、店员、资本家一起登记财产目录、检查账户。第三阶段，进行经济重组和商业调整。”^①

一旦企业被宣布改造，每项事务将如何进展的不确定性会引起混乱，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临时停产。为了避免混乱，保持企业继续运行，上面下发了一道指示，声明6个月内不会发生重组和人员的重新分配，同时不会作任何变动。^②换句话说，1月份的改造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变化还没有开始。

和农业的集体化相比，对工商业改造的抵制是很小的。政府控制物资、调整物价的能力所产生的杠杆作用使抵制最终毫无希望。工人和政府的骚扰、严密的控制网、利润低下甚或亏损，以及对最终境况的焦虑，使许多商人在改造到来时感到切实安心了。对于许多商人来说，最好是成为一个普通的职工，这样就不用面对不断的骚扰和不安，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庆祝会上一些热情的表示并不是人为装出来的。改造工商业的难处并不在于来自商人的多少抵抗，而在于日后重组、管理企业工作的复杂性。虽然政府有了更多的在工商业方面受过训练的干部，但要在无数的问题上作出合理的决定、在生产运转的同时使成本和物价降低、使商人合作而又要作出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上，许多利润低微的小企业后来又重新归私人管理，因为政府不能应付大量的细节问题。

即使花了6个月，而且作了全面的动员，1月份之后干部们还必须利用许多捷径来进行重组。来自党、政府、工会组织各机关的2153名干部组成工作组领导执行财产登记和计划重组。^③要在这么多的企业迅速进行财产登记、检查账户，全广州的干部还不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依靠各

①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

②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232。

③ 《南方日报》1956年1月21日。

行业委员会。所有以前某个行业的资本家都被组成“评估组”，他们一面工作，一面相互监督。^① 正规地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前的商人不再是资本家，而是“工商业者”。不用说，旧的称呼并没有立即消失。工作组成员一开始是参观某个示范工厂，那里的资产登记被拿出来给所有人观看。然后他们以小组的形式被派往其他地方评估资产和账户。各工厂的职工被动员起来配合财产登记，检查他们的老板，以免他们作出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调整。因为商人们认识到他们所获的补偿和其他人有关，他们愿意高估竞争对手的资产。这些个人调查的结果被传递到包括干部和商人的全行业工作组，由工作组来作最后的决定。通过这种方法，全行业的资产登记在三到五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② 事实上，到2月8日国务院最后采用资产登记和评估规定时^③，资产登记的工作已经照此在进行了。

两个月后，干部们开始处理对被政府征用的物资应该给予资本家多少利息补偿的问题。当时，由于资产登记已经完成，工人们了解企业管理的情况，前老板们已无法抵抗。3月初，计算利息的工作刚开始，前资本家代表在一次大会上被召集到一起。商人们被告知一开始他们每年会收到1%—5%的利息，但其后这些财产将属于国家，具体时间没有说明。商人们清楚利息不是按全部价值计算支付的，但他们认识到如果想要保留工作的话，就不能抗议。他们还怀疑使用他们的利息补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新的公债销售运动正在进行以吸收利息偿还，^④ 但即使资本家们不买公债，他们也不愿从银行中把钱取出来。所有人都被提醒在这头六个月中还要对他们企业的成功负责，此后会对前资本家作人员安排，一些老人和失业者如果“彻底改造自己”，将获许工作，但“他们不应期望太高”，“国家要求商人们继续工作，肩负起责任，热爱伟大光荣的祖国，热情真诚支持社会主义改造，未来国家不会忘记商人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杰出表现的”^⑤。事实上商人们继续收到一些利息补偿，虽

①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日。

②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8、21、25、26日。

③ 《联合研究服务》(URS), vol. 2, no. 22.

④ 《联合研究服务》(URS), vol. 3, p. 181.

⑤ 《联合研究服务》(URS), vol. 2, no. 22.

然大多数情况下只比象征性的多一点，但这有助于他们和政府保持合作。

改造之后工商业界关键性的组织结构是专业公司。每个公司由一个或几个行业组成，各行业的所有工厂都置于新公司之下，进而专业公司又置于工业、商业局之下，各部门分工应付因现在经济事务直接处于国家的管理之下而增加的工作量。虽然只是基于一个或几个行业，但专业公司是一个全新的管理结构，其总部位于市中心的某个大厦。虽然要吸收录用许多新人员，但通常都由以前负责行业改造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担任新公司的领导核心。这些公司是随人员、办公地点和具体计划的配备而逐步建立的，但早在1月18日就宣布20家这样的公司已经成立了，其中有15家工业公司，5家商业公司。^① 重组的冲击使某个专业领域的工作更加协调，为某个生产线下的工厂的标准化铺平了道路，并且使处于分割状态下的工厂或商店作更合理的市场和人员分工成为可能。也许最直接显著的结果是巩固了许多小厂，^② 提高了一些工厂的专业化水平，这一趋势在前一年每个企业被划归某个行业时已经开始。每个工厂的业务限于一个行业，如果它的业务原先包括许多专业，那么，它将集中于主业，把其他的工作划转到其他行业适当的工厂。

私营工商业被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之后，手工业和个体摊档组织成合作社，但它只是工商业改造的枝节问题。因为这些很小的作坊既不现代，生产能力也比较大型的企业要小，本质上讲，它们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外。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所起的具体作用都是为了防止其吸纳其他地方的物资，这些工厂和摊档的数目非常之大，也不标准化，不值得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计划它们的活动，后来它们没有被组成国有企业，而只成了集体企业。

手工业工人的专业化程度低下，连接专业组织在一起也很难，使其集体化的基本单位更多的是按地域而不是按专业划分。一个区经营的合作联社指导区内各地的合作社，反过来，区合作联社受市手工业局监督。在区内有时手工业可能按专业划分，按某个专业将区内所有相关手工业

^① 《南方日报》1956年1月20日。

^② 《南方日报》1955年7月5日，12月13日，1956年1月18日。

者组织起来，但小摊档通常只是按地域来组织。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每个区都有一个“手工业改造办公室”，派出工作组实施改造工作。^①改造之后，这些办公室就成了区合作联社的核心。

合作化达到高潮时，广州的手工业工人大致有9.2万人。^②在1955年6月至7月上旬的约六个星期中，合作社中手工业工人的人数从不到1.1万人增加到1.5万多。^③但在余下六个月中，由于改造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农业上，只有5000多人被组织进合作社。到1956年1月初，约有20200名手工业工人从属于227个生产合作社（它们不直接销售其产品和服务）和392个产销合作社和小组。^④

手工业工人集体化的大推动和工商业改造的大推动同时到来。1956年1月10日，市手工业局召开大会宣布集体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1500名干部承担宣传和组织工作，^⑤并组织短期培训，训练进步的手工业者作为新合作社中的骨干干部。两天内，约2.5万工人申请加入合作社。然而，因为财产没有被政府征用，不存在财产所有人撤出资金和财产的问题，因而合作化并不迫切。虽然大型的工商企业全部在几天之内完成了改造，但4个月后，只有6.8万名手工业者，即总数的77%进入了合作社。^⑥到1956年底，这个数字达到82%。^⑦到1957年末，又下降到79%，分散在1501个合作社中。^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非农就业数据参见附录B表10、11。）

小型的家庭作坊、沿街摊档、推车及提篮小贩的社会主义重组就更不急切了。一些经营类似商品的商店和某些地方的一些作坊不管其类别如何被组织成合作社，但没有集体化的高潮。到1956年6月，4万名作坊主和车主中，只有约45%，大概1.8万人被组织进某种集体组织。^⑨其

① 《南方日报》1956年1月20日。

② 《南方日报》1956年3月13日，4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5年7月10日。

④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⑤ 《南方日报》1956年1月19、20日。

⑥ 《南方日报》1956年4月24日。

⑦ 《联合出版研究服务》（*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JPRS, U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Commerce*）no. 16369: 27。

⑧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23日。

⑨ 《南方日报》1956年6月7日。

他的只要不是太突出，就仍然保持私有。

后来小生意人提出的要求说明了政府控制货源和利润的成功。虽然小生意人获许出售某些政府的商品，但他们没有保证的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在分配原材料、设备、资金和人员时，政府优先考虑国营企业。因此，许多小商人要求允许他们的企业成为国营企业，加入社会主义行列。尽管这种体制令人充满幻想；但领导人也认识到把小商人的企业变为国营企业的复杂性不见得对政府有利。政府对这些请求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话语中回避的杰作：这些商号必须“继续保持作为国家工具的结构，……作为国家的工具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主义，……保持现有的结构并不是要阻止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政府将采用适当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改造他们”^①。

社会主义新秩序

虽然欢迎“社会主义社会”^②到来迸发的热情，后来被承认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的现实所约束，然而，1955—1956年的变化还是十分剧烈的。到1957年底，工业产值的99.4%、商业交易额的95.7%都是出自国营、公私合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③ 干部们可能会有点为他们的新职责而焦虑，且“报喜队”的一些喜讯可能是制造出来的，但共产党的领导相信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像严复和其他理想家一样，他们梦想一个富强的国家。^④ 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是迈向理想成功的一个里程碑。

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不再是努力规划调整经济，而是直接管理它。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过去几个世纪中偶发的经济组织和经营方式的广泛多样化开始在合理指导的基础上标准化。由于新的组织形成，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得以通过政治指示传播扩散。用共产党的话语来说，

① 《南方日报》1956年3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6年1月30日。

③ JPRS, no. 16369-27.

④ 本杰明·L·史华兹：《寻求富强》（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就是政治要指挥经济。

社会主义改造提高了国家控制的水平，也改变了控制的模式。经济单位中增加了党委，党委制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企业中保持行政和党组织双重管理结构，但党现在将注意力转向指导管理，而不是动员群众检查监督商人。过去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处于幕后，但现在它作出管理决定、发布命令、监督经营者。虽然合作社不像国营企业那样管得全面，但党组织和新成立的合作社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类似的控制系统，控制农业、手工业和小零售商业。

新的控制模式导致群众组织的萎缩。在正式的组织发展之前，工会、学生组织、妇女联合会、进步资本家联合会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的活动因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作用，在1955—1956年达到一个新高度。但在他们成功的巅峰时期，随着企业被改造，群众组织也由限制管理方的积极武器转变为共产党新成立的正式组织机构的被动工具。一些以前从事群众组织工作的干部被提升到新的管理机构，但组织自身却被动地、顺从地协助新的党员干部。总之，经济单位中共产党的权力不再是由基层的群众组织向上流动，而是从上到下。群众组织的萎缩没有明显体现，但这一基本事实在仍留任群众组织的干部的怨言中得到反映。^①

在农村，个体农业的消除和新管理方式的发展更易于根据土地的状况和产量的需求作出土地利用的决定。种子、耕种、化肥、灌溉和作物管理的革新可以通过要求合作社的领导效仿实验站和示范田的新技术而迅速传播。虽然没有足够的大型设备组建拖拉机站，但农用牲畜、农具可以更好地分配，更充分地利用。合作社易于调配工作，因此一些成员可以有时间修整道路、建设灌溉渠、开垦土地。除了经济事务，合作社在努力消灭文盲、推广公共卫生、防范特务、提供基本的政治教育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集体化高潮后不久，四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被消灭，充分展示了新组织的潜力。

从制订经济计划的人的眼光来看，农村合作社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们

^① 关于工会干部的状况，参见：《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no. 355, 359, 361，另见：《南方日报》1957年11月30日。

可以保证获得大量而可靠的粮食。由于粮食属于合作社，个体家庭几乎无法抵制国家的粮食征购。干部们不用简单粗暴地宣称国家从农民那里强征粮食的能力，他们自豪地指出合作社的成功“满足了国家的需求”，他们承认合作社方便了粮食征购。^① 国家作为粮食征购者和农民个人作为纳税人之间的直接“矛盾”的消除简化了征粮过程，增加了经济计划的可靠性。

干部们期望合作社在国家没有大量资本投入的条件下增加农业产量。合作社成立后，领导人开始计划构筑比原先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更为雄心勃勃的农业发展计划。北京的官员不愿仅为剩下的两年制订一些新的计划，他们起草了一份新的国家十二年农业发展计划纲要。作为计划纲要的一部分，广州的官员制订了广东的七年计划。在早期的计划中，由于缺少对生产加工的控制，只能对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有个估计。随着对生产加工新的组织控制，有可能是第一次对农业副产品的实际产量有一个合理的估计。

国家和地方的官员完全意识到激发农民生产的关键问题。他们有目的地奖励成功的合作社和合作社中努力工作的个人。合作社设有定额，超额奖励。正如口号中所说的：包工包产，超额奖励。因为高级社中的利润严格按劳动贡献分配，合作社的领导对于激发劳动者个人积极性有相当大的作用。国家的指示中也明确规定工分奖励不是简单地根据投入的劳动时间，而是根据完成任务。^②

熟悉日本、美国和欧洲许多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农业产出快速增长的西方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将教育、示范工程和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结合在一起，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提高农业产量。但遗憾的是，没有适当的方式检验这些方法在中国是否也奏效。和那些这种组合运行得比较好的国家相比，在中国，农民的教育水平低下，大量的迷信妨碍进步，个人储蓄率低，资本投入于农业可得的边际利润有限，因此从农村获得商品的压力更大。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迅速提高粮食产量。从短期来看，合

^① 《当代背景》no. 393 中邓子恢章节。

^② 黎安友：《中国的工分制》（Andrew Nathan, "China's Work-Point System," *Current Scene*, vol. 2, no. 31, Hong Kong, April 15, 1964）。

作社失败了，无论在广东，还是在全国（广东每年的粮食产量，参见附录 B 表 8）。然而目前还不清楚失败是合作社组织的必然结果，还是合作社重新组织后的其他错误或临时混乱所致。^①

早期的合作社面临大量的组织问题。领导没有经验，混乱和不协调十分普遍，计划有时为官僚的繁琐拖拉的程序所耽搁，其机动灵活性比市场机制要差得多。由于对农村下达的粮食征收任务很重，有时利润分配非常微薄，难以形成公平的、易于管理没有腐败的工分制。也许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村组织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县与合作社之间的一环。高级社完成时，广东每个县平均约有 150 个乡，每个乡有 3 个高级社。^② 因为县中的区很弱或根本不存在，一个典型的县必须监管 450 个合作社，没有有效的中间组织结构，往往就没有充足的交通设施。政府试图通过巩固和加强乡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直到 1958 年公社成立，需要强有力的中间管理层的问题一直很尖锐。

在工商业领域，更严格的组织使物资和供应处于计划之下，但城市经济的复杂性使基本重组耗费多年。工厂关门，或者商品通过新的程序制造生产，产品通过新的渠道分配。官僚主义发展的形式层出不穷：新的组织结构、新的管理层、新的制度规章、新的表格、新的簿记、会计程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社会主义前进的名义下进行的。

工商业领域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不同层次的政府管辖权的划分。一般来说，每个企业都划归某个层次的政府。最大型的工厂、涉及国防工业的工厂直接划归中央政府，中型企业和那些与农村工商业密切相关的企业划归省，比较小的企业划归市，而手工业、作坊和合作社则划归市里的区。然而任何一个企业也必须为某些人员和某些种类的物资供应的问题和其他层次的政府打交道。为实现对每个企业进行组织控制而作出的努力，引发了许多混乱和裙带关系，尤其是在最合适的办事程序建立之前的最初几年。

^① 经济学家对农业集体化和农业集体化后农业经济的分析，参见德怀特·珀金斯：《市场控制和共产主义中国的计划》（Dwight Perkins,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肯尼斯·R·沃克：《中国农业的计划》（Kenneth R. Walker, *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5）。

^② 1957 年末，广东省有 47 000 个农业合作社。见《南方日报》1957 年 12 月 7 日。

即使在优先顺序原则上基本达成一致，像预算、税收这类基本问题也极难解决。农业税相对固定，但城市企业可以通过区别税收来促进或阻碍某些活动。这时，国家已引进了基本的流转税，简化了管理，但没有解决资金分配或税收刺激的问题。虽然政府不计运营效率，投资于高度优先考虑的领域，但它试图通过复杂的计件工价制度给予个人刺激，这也需要许多微小的调整。

作为将经济置于管治之下的工作的一部分，政府使商品的型号、质量标准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显然是有利的，因为最知名的名牌产品和最知名的工厂可以作为标准推广到其他工厂。然而，同时这一过程要求商品的数目种类简单化，某些商品在有意或无意中不再生产。这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旧设备的修理，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已丢弃不起旧机器了。

几千年以来，广州的商号一直适应于基于个体利益的市场。而两三年之内共产党把这一切结束了。随之产生的问题不是由于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胃口已超出了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判断。经济过于复杂，不可能完全根据仓促的政治决定重组。控制经济权力过早的成功导致僵化和普遍的不满。政治控制的路线现在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和全社会，但领导人必须设法使之有效运作起来。

叁

适应新秩序



第五章 缓和：右派插曲， 1956—1957 年

长期以来，共产党的干部认识到政治运动之后党重新整合力量是必要的，就像红军在一场战役之后重整其力量一样。进步的观念是“马鞍形”的，“进两步，退一步”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① 经济生活的改造是重要的结构变迁，是以变幻莫测的政治压力和不完善的计划为代价实现的。当地干部预计紧张的工作之后将是一段时间的放松和调整。

然而，他们没预计到社会主义改造产生的困难的严重性，或者是随后来自北京的右倾政策的扩展。社会主义改造中积极干预的精神在接下来的调整中一样突出，调整的目的旨在赢回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精英的积极支持。转变远不止于放松控制，1957 年春，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恳请公开坦率的批评，发起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这段时间在西方被称为“百花运动”。

1956—1957 年事件的发生出乎意料。它们是北京的最高层领导不同意见、争论、不稳定和实验的产物，在广州的政界产生了回应。虽然，对 1955 年所作出的时间安排有争论，但对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方向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但在 1956 年初，当改造已经完成，而新发起的农业和技术长期计划又显得过于急进时，前进的道路就不那么清晰了。结果计划被临时搁置，在 1957 年末引入较温和的目标，但这一过程的所有阶段

^① 试图解释这些有趣的循环，参见施坚雅等：《共产主义中国农村的服从顺序：循环论》，（G. William Skinner and Edward Winckler, “Compliance succession in Rural Communist China: A Cyclical Theory” in Amitai Etzioni, ed. *Complex Organization*, 2n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pp. 410–438.）他们认为，在运动的初期运用正常的呼吁，但为了把运动推到极点，威胁性的制裁是必要的。当威胁性的制裁失去其意义时，则强调物质奖励，直到达成新的正常的吁求。从长期来看，这一轮的暴力可能会下降，正常的吁求可能比回应的要少。关于中国的循环的经济解释，参见亚历山大·C·埃克斯坦：《共产主义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趋势和循环》（Alexander C. Eckstein, “Trends and Cycles in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Trade”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都伴随着争论。领导的不确定性反映在一些基本问题的严重争论上，如：文艺自由的最佳程度，对市场控制的本质，对农村私人企业的容忍度，经济和教育机构间的权力分配。争论是激烈的，因为这些问题是真实的，选择是公开的。

然而，直到1969年，领导人还没有取消1949年到1955年间引入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1956—1957年间所接受的修改意见产生了更大的宽容和灵活性，但它们是用来改善新制度的，而不是取消它。宽容打开了挑战政府的潘多拉盒子，地方官员发现其难以管理，但官员们容忍这些挑战达18个月。一句话，政策是“右”的，当基调再次左转时，它受到谴责。

对于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中国事情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细节没有兴趣，此时的关键在于，集权专制制度下那一线自由之光的命运。而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问题是他们新组织的命运：调整的本质在于使他们的经济更迅速向前发展。从1956年初至1957年中期，他们试图用调整和让步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1957年末，他们尝试用另外的方式。

基层官员的看法：战线过长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地方干部专注于省内经济生活的重组和直接管理。现在，他们要承担成功控制经济的后果。干部在经验、耐性或者对经济工作的兴趣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准备，但他们被调到企业，却要在混乱的组织状态下作出复杂的管理决定。当地党和政府的干部要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认识的情况下尽力监管经济事务。一句话，他们力不从心。

比较有经验的干部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且要对他们下面的新干部负责。根据当时盛行的做法，干部要对他们自己单位的业绩负责。这些干部必须为缺乏训练和经验、有时甚至是文盲的下属承担责任。他们告诉属下的干部要致力于掌握新的工作，又红又专，但他们经常也得自我提高。无论如何，他们得对下属可能造成的任何不当行

为负责。

以前独立的商人现在处在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职位上，被安排和干部们一起工作，但在公私合营的公司和合作社，他们必须接受缺少知识而常常又很傲慢的干部的密切监督。这样的状况使他们丧失了积极主动性和责任感。商人们逐渐认识到不管干部们如何武断、瞎指挥，保持沉默、接受干部的权威对他们会更安全。中国有句老话：“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商人们担心一旦干部们掌握了工作经验，自己很可能被取代，因此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意把诀窍告诉新的管理者。如果商人们保持沉默，新干部就只好作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干部们可能会犯错误，但这不会令太多以前的商人难过。

（当时）干部们基本都表现出对商人和技术人员怀有深深的不信任，这是情有可原的。社会背景、教育经历以及对党的政策忠诚上的鸿沟很自然会使相互间产生缝隙，这在干部们指挥商人进行其以前所做的工作的情形下并不容易弥合。尽管干部们因为文化水平低下、商业经验有限感到落后、不足，但他们认为商人们是道德上有缺陷的奸诈之徒，他们知道党的力量在他们一边。干部们感到有必要表现得自信，以免举棋不定时会令商人们有机可乘。一些人不懂装懂，也有一些干部行为莽撞，因而无法消弭与商人们的隔膜。

不管干部们对以前的资本家保持怎样的自信，但在党和政府的范围内他们行事谨慎。他们对回应信息、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优柔寡断，因为他们认识到无论在商业的敏锐性或政治方向或者两者一起都非常容易犯错误。他们请示上级，检查、再检查，努力避免在生产上犯错误。为了回避责任，他们热衷于汇报各自单位的困难和问题。

因为基层管理机构的扩张，许多事情以前一个人或一个部门就能够处理，改造后要由几个部门来处理。这样的繁琐滋长了民众的反官僚主义情绪，而且在官僚管理者内部，这些情绪最为强烈。以前自己就可以作出决定的管理者现在必须咨询请示其他新成立的单位甚至是下级单位，以执行更加正规化的、由许多单位协调处理问题的程序。一个负责某个单位的管理者现在面对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组织，为其所累，使之更难以对上级的指示迅速作出回应。

市场机制为正式的中央控制计划所取代，这为犯错误和无效率增添了新的可能性。在改造之前，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小企业可以生产产品以满足需求。而一旦产品的生产是根据计划而不是直接的市场要求，生产可能更好地适应长期的生产重点，但却阻止和减少了对资源和需求的反映。在初期，计划不可能非常详尽、非常准确，而是有弹性地包罗所有的产品，由于人员、资金和物资在计划领域的集中，一些较少受重视的产品和原材料几乎完全消失。计划把僵化导入所有单位的运作之中。消费者不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产品，纠正计划不完备的难题，对于负责生产或供给的管理者来说非常麻烦。

而消费者则遇到了新麻烦。由于消费品不太受重视而经常供应短缺，对原材料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导致配给制。1954年开始粮食配给，接着1955年4月实行油和糖的配给。^① 商业企业的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许多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的减少使购物更为不便，这使消费者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到民众对官僚主义的抗议之中。^② 民众的对抗反过来令商业干部头痛，他们的上级曾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老百姓生活的重要性。

在农村地区，虽然经济组织的问题不像城市那么复杂，但粮食作物管理、土地保护及合作社的账簿记录等新项目相当复杂，对“文化水平低”的农村干部形成压力。农村干部不必像城里的干部关心商人那样关心老农，因为他们的技术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农村干部更难以使合作社社员把时间花在合作社的工作劳动上。随着改造而来的对商业活动的严格控制，限制了农民副业、手工业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导致农村家庭生活十分困难。^③ 把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产品生产的农民组成手工业合作社并不容易，为了恢复必需的手工业产品的供应，政府迫于压力于1956年9月在农村重新开放自由市场。一旦这些市场开放，有创业精神的农民有时会发现把时间花在制作手工业产品上比在集体的土地上生产工作更有利可图。许多农民原先被鼓励加入合作社是因为经济上更有利。不用说，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平等获利。一些人是被只要他们想就可以随

① 《南方日报》1955年3月4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16日。

③ 陈云在党的八大上的讲话，见《人民手册》（1957年）。

时离开合作社的说法劝诱而加入的，于是现在一些人提出离开。因此，合作社的领导在管理合作社的经济、引进技术革新、监督政治学习的同时，还要尽力留住这些社员。他们不时被提醒不要采取命令主义，而要亲自参加体力劳动，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高层官员的看法：矛盾

然而不管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念有多模糊，他们相信中国正朝着社会主义迈进，她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大大减少。尽管老百姓不愿直接向干部抱怨，下级不敢直接向上级表示不满，但领导人对民众的情绪很敏感。毕竟他们是以前的革命者，他们的反抗源于不满。

1955年以前物资供应不足、物价高涨，人们可以谴责私人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产品更加稀缺、购物不便，他们要责难政府。随着农民和以前的商人失去独立性，可以理解，他们的不满指向无效率、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和党的严格控制。

对民众批评的敏感为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强化。对毛泽东主义者来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痛斥发生在最不应该的时候。中国的干部刚完成对斯大林著作的学习，运用他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个月内，负责进行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斯大林因为他的过火行为、专制统治和个人崇拜而受到严厉的抨击。《人民日报》本来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对外国的报纸发表回应，但足足等了两个月才就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发表评论，最终对斯大林，特别是他早期的贡献，如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更加支持和赞赏。^①

党的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召开，这是11年来的第一次，它反映了对广大党员愿望的异常警觉。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民主集中制时，更多是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虽然对于个人崇拜的讨论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正上升到更高的高度，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个人崇拜基本上是表示反对的。

^①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956年秋冬，随着波兰和匈牙利骚乱的发生，对民众情绪的警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些事件成为中国党和政府热切关注的焦点。共产主义集团对骚乱的讨论引起了对以牺牲消费品为代价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关注，正如中国正越来越意识到在“一五”计划期间过于重视重工业必须修改，以提高对农业、轻工业和消费品的关注度。中国的领导人对工人士气的在意反映于1956年工资异常增长了14%，中国对匈牙利骚乱的分析中强调了低工资的影响。^①

按共产党的用语，社会的分裂被称为“矛盾”。在1956—1957年期间，中国许多关于“矛盾”的分析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主义者把这篇讲话视为伟大的理论贡献，但它的意义并不怎么在于矛盾原义本身，而在于其直接的政治含义。把现存的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的”，而不是“敌我之间的”，其效果是尽量降低其严重性。这篇讲话表明，尽管最近有些不满，但毛泽东对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忠诚是有信心的，而这信心后来证明是过于乐观了。文章接着提出人民的许多要求是合法的，他们可以公开讨论。因此，应对日益增长的不满的首要方法是尽量满足人民的合法要求。

紧跟毛泽东的领导，地方的高级领导干部积极分析他们当地的矛盾。例如，陶铸在一次关于广东专题的重要讲话中分析有12种主要矛盾，和毛泽东分析的全国所面临的10种主要矛盾几乎一一对应。陶铸以直言闻名，这篇讲话是其最直率的一篇。他认为，在反抗日本的战争期间，人民在家里欢迎士兵，但战争结束时，他们希望士兵离开。同样，既然共产党已经扫平了反动派，那就只有人民和干部之间的内部矛盾。他说，无论哪里，只要有人，就有矛盾。陶铸对广东的社会分裂作出了敏锐的分析，他的建议是，在政府的权力范围内对不满的人作出让步。这些不满和陶铸的建议如下：

（1）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们对他们的生活不满，渴望离开合作社。尽管应该加强计划和领导，但干部应避免对农民过于“命令主义”。

^①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ECMM）no. 81: 22。

(2) 一些工人由于工资低得不合理、宿舍设施不充足、上级过于“命令主义”而感到处于劣势。这些不足应予以纠正。

(3) 失业的工人希望就业。他们应被临时安置到农村。

(4) 完成一定程度学校教育的学生没有进入更高等学院的机会。这样的毕业生许多应给予其就业，到农村担任教师。

(5) 华侨不满过分的限制。应该特许他们拥有一般人难以得到的食品、日用品和房屋。

(6) 盐矿工人、渔民、船民认为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应该给予他们机会争取满意的生活。

(7) 知识分子反对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应该给予他们这些自由。

(8) 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的成员认为被剥夺了有利可图的生计。应该给予他们工作，允许其承担适当的责任。

(9) 退伍军人缺乏适当的工作。只要有可能，应该给予他们工作。如果他们缺乏适当的技能，应该给予他们教育的机会，为工作做准备。

(10) 少数民族的成员感到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条件差。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其干部，应该给予机会提拔到更高的位置。

(11) 老革命根据地地区的居民不满对他们那里的投资额不够高。应该花更多的钱来建设这些地区。

(12) 消费者抱怨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应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①

陶铸满足各部分人民需求的努力代表着一种右倾的政策，他的分析几乎可以轻易地被当作是美国政客大选中的承诺。但他的分析完全与中央当时的政策一致，因为领导人正在努力缓解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攻击的焦点：干部作风

从1956年初至1957年年中，党和政府作出重大努力来处理这些不同领域的不满。这一阶段走走停停，有试验和退缩，有辩论和反驳，但总的来说，大体上代表着对民众的让步。领导人努力改进合作社的效率，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5日。

提高农民总体的收入，克服合作社社员之中的不平等问题。私人土地的规模增加，私人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扩大。物质刺激增加，给予经营人员更大的空间去奖励能干的和努力工作的人。国家支付的一些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而消费物价相当稳定。赋予教师、作家、技术人员等知识分子更大的自由。

在所有解决党和政府脱离群众问题的方案中，干部的作风问题最受关注。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对官员行为的关注并不新鲜。在清朝和后来国民党开始衰败时，官员道德行为腐化一直是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它也是共产党在准备占领这个国家时训练的焦点。

领导人对下级官员道德品质的关注也有其实际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许多群众被连哄带吓地加入了集体，个人的财产实际上已被征用，他们也因此被疏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随着群众组织的萎缩，干部不顾普通群众利益的危险增加了，他们滋生了同样的官僚习气、同样的主观主义、同样贪图自我享受，成了和帝国时代和国民党时代一样完全脱离普通群众的官僚。干部们认为和群众密切商讨花费时间，繁琐恼人，纠缠不清。群众的不满使领导人提高了警惕性，认为这已经发生了。正如一篇关于干部作风的重要声明中所指出的：干部们倾向于“用行政命令处理问题”^①。

1942年，延安一些共产党干部日益骄傲自大，党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1957年，党发起的运动，其路线几乎和1942年的运动完全一样。甚至主题标语也完全一致，要求干部们具有“无产阶级的作风”，避免官僚习气（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现实（主观主义）及卷入官僚派系（宗派主义）。

党关注干部作风有其现实的基础，因为干部的傲慢自大是民众不满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唤起对干部行为不当的关注不仅缓解了民众的道德义愤，遏制了傲慢自大，而且把不满从党转向“犯错误”的干部个人。攻击的目标不是党的政策，而是某些干部的执行。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将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干部作风也是不实在的，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日。

因为问题有更深的根源。官僚主义的滋长所带来的无效率和挫折，像避雷针一样集聚着普通民众的不满，但是，纠正干部作风运动并没有触及官僚结构。因此，运动只是以后续性的行动尽量减少官僚主义，而没有减少过于膨胀的官僚机构，就像一个农民尽力堵住水流，却没有堵住灌溉水泵一样。官员道德训练这一传统的解决方法，不足以解决更深层的问题。

当然，要求干部纠正作风的指示会自上而下传达，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明白，仅有指示不足以教化出美德。1956年末至1957年初，为了加强干部的道德训练，以前偶尔使用的两种方法被更大规模地采用。第一是干部下放，尤其是不曾身为工人或农民的干部要从事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1957年3月，约8000名干部下放到农村。^① 办公室里的干部到全省各地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参加实际体力劳动，正如评论中所说的，这样为他们保持无产阶级本色和工作作风提供了机会。这完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翻版。

第二是干部接受群众系统性的批评。在西方，这一运动被解释为言论自由的胜利。事实上，这一阶段，当局鼓励知识分子更自由地表达，并且努力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但是从5月到6月初“大鸣大放”的目的并不是言论自由，而应该是平息抚慰批评者和改造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起的作用与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群众组织所发挥的一样。较早时候，党利用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检查监督地主、资本家。现在，党取代了地主、资本家而成为掌权人，并不希望党的驯服工具群众组织突然来监督管理者。然而，可以利用小小的刺激和保险的手段，依靠更多敢言而不紧跟党的人、知识分子和杰出的商人来批评干部的作风。

“大鸣大放”，1957年5月1日—6月8日

1956年春，毛泽东用“百花齐放”和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4日。

“百家争鸣”来宣传宽松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①但知识分子和商人因目睹1955年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中党的严厉而不敢直言。直到“大鸣大放”运动全面展开后人们才敢说话。早在4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出现了对即将到来的运动的公开暗示。运动于4月27日自北京发起，很快发展成全国性运动。5月1日，广州发起运动，省委作出详细的布置。^②

运动的发起在行政管理干部中引起了不安，尤其是那些易受到冲击的干部。基层的管理干部和群众的接触比高层干部多，因而比高层干部更易受到批评指责。比较起来，有“命令主义”作风的干部比和群众关系好的干部更易受到指责。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管理干部的职责非常广泛，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免于批评。为了消除高层干部的疑虑，北京宣布“大鸣大放”的目标是1949年以来进入党和政府的新干部。因此，市一级党和政府最高层的老干部感到相对安全。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要求交出其下属予以公开批评，他们忐忑不安地观望着运动的发展。

北京的高层官员被派往各省观察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刘少奇亲自来广州，并于1957年4月10日在省、市级党和政府机关干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③刘少奇在讲话中谨慎而有序地说明了运动的目的，尽量平抚接下来针对干部作风进行抨击的焦虑不安。他举出的广东管理干部劣行的例子非常鲜明，大多数人都同意所涉及的那些人应该受到惩罚。在花县杀死许多抗议在当地建立麻风病院的群众的警察应该受到惩罚；技术学院的干部把最近的毕业生派往北部寒冷地区而没有提供足够衣物应受到适当的纪律处分；一些共青团积极分子把群众当作敌人，用审问的方式在普通群众中调查问题，应该给予纪律处分。^④遵照刘少奇的讲话，广东的领导干部（冯白驹、区梦觉、李坚真、赵紫阳、文敏生、贺希明、张根生）被派往广东的各专区，他们像刘少奇一样，努力减少党内对群

^① 关于文艺界斗争的各个阶段，见莫尔·高德曼：《共产中国的文艺异端》（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id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国教育方面的文献汇编，见史蒂沃·福雷瑟等：《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Stewart Fraser, ed., *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4月23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5月4日。

众公开批评管理干部的抗拒。

在打消干部对群众批评的疑虑的同时，高层领导干部也尽力向群众保证其征求批评是真心诚意的。陶铸在第一届省人民政协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他对十二种矛盾的分析正是为此而作出的。在讲话中，陶铸宣布，公开检查党的“缺点”是为了党的利益，这些缺点若得不到适当的诊断和治疗，是不能自行痊愈的。他保证改进的建议将会受到赞赏，任何人都不必担心因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惩罚。他呼吁群众帮助党诊断其缺陷。^①

然而，群众提出批评意见仍十分谨慎。为了鼓励批评，党支持各领域群众的讨论座谈会。北京中央宣传部的重要官员林默涵来到广州主持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和戏剧家的座谈会。^② 政协之中有许多党外知名人士，为此，从5月3日到12日组织了多场内部座谈会，帮助各民主党派举办讨论会。^③ 此外还为中西医医生、市政府的参事、工程师、教师、省政府中的党外成员、艺术工作者、大学教授、工商业领袖召开了许多次会议。^④ 小型的座谈会集中一起讨论，较大型的座谈会在会议之初党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之后，分成小组。这些精英小组表达各自的不满，然后将其不满和建议的提要提交给大会交流。

尽管党的各级机关循循善诱地鼓励群众提出批评意见，但参与讨论的人还是很犹豫。即使是真正希望得到批评意见，大多数人也指望由其他人来提供这些批评意见。他们想到运动结束之后还得在这些干部的领导之下工作生活，他们明白干部们也是人，他们不会对批评，起码不会对所有公开的批评都能采取善意的态度。既然要求在座谈会上发表批评意见，他们就谈一些空洞无意义的、没有威胁性的批评意见，或者是一般性的任何人都同意的问题。随着运动的展开，他们不仅必须在会议上发表观点看法，而且还要和其他许多学生和市民团体一样都被要求必须写大字报表达不满。很快，大学、学校、办公楼、商店和其他公共建筑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5月3、7、10、12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8、12、17、18、19、21、22、30日，6月1日。

物上都贴满了大字报。

有时，一个座谈会开了好几次才使与会成员谈出真正有意义的批评意见。但到5月底，人们逐渐观察到批评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党绝对严肃认真地希望获得批评意见，批评者不会受到惩罚。这一信念使大家受到鼓舞和振奋，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党正在认真地努力处理他们长期以来所产生的委屈与不满。许多由于党日益严格的控制而感觉被疏远的知识分子突然感到解放了。当他们“唱出”心中的话时，情绪激动，话语由衷，兴奋难抑。6月初，激烈的批评开始出现。一些知识分子要求废除党委制，^① 并且有谣言说某些大学已经废除了党委制。^② 在北京，一些党外成员说，党如果不掌权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完结。一个广州人形容党有两张脸孔：平时像个寡妇，冷漠疏远；政治运动时，一转脸成为嗜血屠夫。^③

在运动之初，高层的官员明确指出批评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党征求对干部作风的批评，而不是针对党的政策。但一旦人们开始自由言论，就不容易分清是执行党的政策，还是容忍批评者的情绪。显然，批评超出了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意图，并且印证了一些地方的党的领导最担心的问题。早在5月底，一些党的官员就希望制止批评，但被告知必须有耐心。^④ 即使那些不担心被批评的党的官员也感到批评有损于党的权威，运动结束之后会削弱党的威信。6月5日，广州举办的6场座谈会都确保由党的最高层冯白驹、区梦觉、朱光、王德等领导。^⑤ 然后，突然根据北京的命令，让“鸣放”戛然而止。

精英反对的本质

那些在“鸣放”中被号召提出批评的人也许可以恰当地叫做“无权的精英”。他们是知识分子和以前的商人，他们有专业知识，并且在公众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0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

⑤ 同上。

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们没有占据实权位置。许多人在政府中有职位，少数人还是党员，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在决策的小圈子之内。他们的不满包括了无数的话题，从小小的怨气到对国家政策的基本思考。一个有进取心的人甚至发现活人和死人之间的矛盾，因为死人占据着位置。^①有些不满抱怨是地方主义性质的，无疑会得到地方有实力的官员相当多的同情。例如，有个人抱怨说，广东建筑业落后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对广州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②这样的批评不会导致大多数当地干部的愤怒，但对北方干部的埋怨则导致这一年早些时候在省党代会上遭到有力的反击。然而，大多数的不满都直接或间接与社会主义改造相关：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过于严厉，^③以及在新的组织结构中把党员置于非党员和管理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之上，置于以前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之上。在某种程度上，不满反映了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党，而非党成员越来越被排斥于决策过程之外。

针对党外干部召开了许多次座谈会，他们虽然被允许在政府中保留很高的职位，但真正的权力日益集中于党委手中。例如，一名党外身份的局长抱怨说，他甚至不知道局务会议上会讨论什么问题，一名党外身份的厅长则说他不获准看发往他所在厅的电报，甚至不准其了解电报的内容。^④省级厅局领导抱怨他们不再在一起收取报告、表达观点看法，因为报告现在通过党的渠道来处理。^⑤他们说他们表达了学习的意愿，但是党不给他们机会。^⑥一名非党员干部需要和一名辅助部门领导电话交谈必须得到其下属的同意，而这名下属并没有权力讨论重要的事项。^⑦在统一战线中工作的人抱怨说，统一战线仅仅是个虚饰。^⑧民主党派中的人则抱怨说他们的党只是个摆设。^⑨一些党外人士承认共产党员对他们很有礼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5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5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7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3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6月8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⑨ 同注⑦。

貌，但抱怨不让他们参与讨论重要的事情。^① 另外一些人还抱怨说，他们不仅被排除在权力范围之外，而且还因警察经常到访而受惊吓。^②

其他一些党外政府干部对就业上的歧视和有利于党员及其亲戚表示不满。^③ 省农业厅被称为“夫人厅”，因为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把他们的夫人安置在那里，从而阻碍了其他干部升迁的机会。^④ 一些干部抱怨说，如果他们单位没能完成工作定额，党员就以降级或解聘威胁他们。^⑤

前商人直言反对所谓的“公方代表”，也就是被派到以前私人公司担任管理职位的干部。一些前商人谨慎而巧妙地抱怨说，因为“代表”们在工人中缺乏影响力和声望，他们不能有效地指导工人，^⑥ 或是在雇用和解聘上没有任何控制权。^⑦ 另外一些不太顾及技巧的人则抱怨说，“公方代表”无经验、无效率、作风专断蛮横，而且会因为拒绝和外人商量而作出错误的决定。正如一名前商人所说的，虽然官方的政策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公私双方要相互监督”，但党支部的干部从来没有和他们召开任何会议去讨论任何问题，他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情况，他如何能够监督？^⑧ 另一名干部承认偶尔也会有党员和他商量，邀请他参加会议，但他指出，会议只是敷衍了事，因为党员已经拿定了主意。^⑨ 有的人抗议说：“许多党员不熟悉他们的工作，但不信任前商人……结果党的干部完不成工作，而商人们完全闲着。干部们越来越瘦，而商人们无事可做……但不管干部们有多忙，他们还是不能做好工作。”^⑩ 一些前商人甚至提出应该取消整个公方代表体制。^⑪

许多商人抱怨说公方代表过于关心政治事务。正如有人所说的：“领导只强调专家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了专家在生产斗争中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8日。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6月5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⑨ 《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

⑩ 《南方日报》1957年5月7日。

⑪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4日。

的作用。”^①一位批评者指出，阶级斗争不仅比生产斗争要强调得多，而且程序也十分神秘，没人知道如何有效地做好自己的工作。^②

一些人指出一些具体的事例说明工厂的联合已经导致效率的损失，因为许多以前有效率的工厂现在被吸收到运作不畅的组织之中。还有其他一些人抱怨说缺少各管理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协调。例如，一位对交通问题提出批评的人士指出轮船、火车、货车公司之间缺少协调。一个公司卸货给另一个公司运输，而后货物却无限期地放置着，而且因为管理干部没有合理定好运输费用，引起大量的混乱，工人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励。^③

许多商人不满意不公平的个人待遇。一些人响应上海商人的抗议要求，认为他们接受财产利息的时间不应该是7年，而应该是20年。^④ 其他一些人则在意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耻辱，要求立即停止支付他们的利息，以便能够“脱帽子”（也就是免于被划为资本家的耻辱）。^⑤ 一些抱怨工资低的人被告知，他们的收入计算将利息包括在内以补充工资，如果他们的利息和工资加在一起考虑，他们的实际收入不会比其他人低。^⑥ 一些人认为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不能确定，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工资计算出来的细节，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不能像工厂中其他工人那样获得免费医疗的待遇。^⑦ 一名商人抗议反对“按阶级划分胃口”，给工人每月粮食28—30斤，而商人只有23—26斤。一位工程师抱怨说每次他的工厂中发生事故时，一些资本家都会受到责难，因而他们中谁也不会受到提拔任用。^⑧ 一些商人还说他们的朋友、商业伙伴被调往广西等偏远的地区，过着低于通常标准的生活。^⑨

在一些较小的手工业合作社，主要的抱怨不是政府派出太多的公方

①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4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6月5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5月31日。

⑧ 同上。

⑨ 同注④。

代表，而是他们工作所得的利润太少，因而不能得到必要的物资和人力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正如一名手工业者所说，因为手工业局拒绝给他们派来任何干部，没有人去理会他们的合作社能否得到必要的原材料。^①

知识分子同样有抱怨有不满，但因为知识分子工作的性质和党对知识分子活动进行监督，所以他们的不满通常集中于缺少自由。作家们抱怨说，如果他们写出了真正的问题，他们会被称为资产阶级。^② 一名作家抱怨说他甚至不能在故事中描述农民、工人和干部的弱点。^③ 而另一名作家在描述一名18岁的青年有点落后思想时，被管理干部告诫，18岁的人是不会有落后思想的。^④ 一名音乐家抱怨说他不能演奏门德尔松的作品，因为门德尔松是资产阶级。^⑤

尽管学术界对许多事情不满，但他们的中心问题是党的干涉。例如，党只在乎当期的成果，而不支持长期的研究。^⑥ 许多教授说提拔任用的依据是政治基础，而不是能力。正如其中一位所指出的：“所谓‘德’的标准是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运动中，真正重要的是大胆勇敢斗争攻击目标的‘德’；至于‘能’的标准，连这也取决于周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年青人’，他们处于某一阶级，但并没有能力判断一个教师的好坏。”^⑦ 许多严厉的谴责是关于共青团的，共青团员主动起来监督教员。一名教授曾不满地说，这些共青团员在政治运动期间以关心教师福利为借口来拜访教师，但一旦他们收集好了材料，就再也不会来登门打扰了。^⑧ 对比起来，知识分子通常比商人们更加大胆直言，他们的谴责更为严厉。一些人愿意接受党，但要求党的权限具体化，以便使他们明白教育者的权利在那里。^⑨ 一些人莽撞地说党没有能力管理大学教育，因为干部们不熟悉他们工作的内容。^⑩ 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许多教授认为管

① 《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1日。

④ 同上。

⑤ 《南方日报》1957年5月14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4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日。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南方日报》1957年6月3日。

理大学的党委制应予以停止。^①

低层知识分子的不满和高层知识分子的不满相类似，但他们的不满通常不太严重。例如，小学教师抱怨说非教学的管理干部没有真正懂得工作；教师的教学负担太重；盲目照搬苏联的教学方法不合适；由于聘用许多能力不够的教师，教学质量标准低下；教材内容变动频繁，教师们跟不上。^②

医生的社会流动性不像商人那么强，甚至很少允许医生开设私人诊所。而那些开了私人诊所的又抱怨说，他们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经常受到骚扰，谋生都有困难。而在公共医院的医生，像其他所有地方的非党员一样，对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表示愤慨。例如，一名医生说，甚至连病人是否应该接受X光检查，也不是一个医学上的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决定，取决于一名非医疗人员身份的干部。^③

短暂的“大鸣大放”的效应是暂时调整了掌权者和权力之外的人之间的平衡。许多党员干部在技术、经济、知识领域取得高层的领导地位之前，权力已牢牢地集中于党手中。党的目的是利用党外专家，但并不信任他们，也不赋予其权力，甚至连入党也不允许。^④技术的决定并不总是根据知识智慧来作出的，加上党外精英不自觉地抵抗党的决定，这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这一时期的政策试图重新获得党外精英更积极的合作。“大鸣大放”部分地恢复了党与党外精英之间权力的平衡，这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党外精英的大胆直言，而是因为管理干部希望在运动中免受批评，而尽力迎合党外精英的要求。

“大鸣大放”期间，党外精英很少提出实际的建议。他们的不满和建议不是反映实际的政策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表达被排斥于权力圈子之外的愤慨与傲气。

运动暂时改变的不仅是党和党外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党内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文化教育领域中受过教育的干部因反对一些较偏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5日，6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7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5月9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4月6日，7月2日。

狭的同志过于僵化的行为而获得提升。在统一战线中工作的、提倡在处理党外干部对他们的“指控”时更加宽容些的干部也如愿以偿。经济领域中工作的、希望对商业和商人作出更多让步的干部战胜了那些强力推进阶级斗争强硬路线的干部；反对北方人渗人的地方主义者也被允许表达出他们的不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积极进攻的强硬路线的支持者和公安干警现在处于守势。在当时流行的左和右、严厉和宽容的辩证矛盾中，右派处于鼎盛期。

广东最高层党的领导也感受到更加温和的政策效应。地方党的权力象征——陶铸比他在广东主政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守势。他向党和人民承认错误。1956年7月，在省党代会和人代会上，他承认自土改以来骄傲自满，并道了歉。他抱歉在推进国家的利益时，没有适当考虑人民的利益；推行的粮食征收额太重，没有支付足够高的粮价，忽视了农副产品，因而导致许多人离开了合作社。^① 陶铸承认错误并不只是要表现出谦虚，而是因为在中国被公开批评不是件小事。记述他在省人代会上讲话的文章的标题是“省长陶铸批评并承认第一届省人代会第四次会议的错误”^②。1957年8月，他意识到他在党和政府事务中的统治地位触犯到地方的敏感性，于是辞去了省长的职务，而更加专注于党的事务。广州人陈郁调任省长。陈郁是1927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此后一直在延安的中央政府和东北工作，此前新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以前游击队时代方方的助手林锵云任副省长。^③

然而，通过总结分析可知，右倾温和只是一个不可能持久的假象。在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的管理干部仍在权力机构之中，但被要求克制使用权力。他们讨厌许多对党的攻击，他们讨厌受到公众批评的羞辱，他们急切盼望有机会反击。6月初，当北京的最高层领导对不断升级的批评产生的威胁发出警告时，地方干部和党的领导人获得了这样的机会。^④

① 《南方日报》1956年8月3、30日。

② 《南方日报》1956年8月5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8月11日。

④ 参见穆福生（音）：《百花凋谢》（Mu Fu-sheng, *The Wither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New York: Praeger, 1963）。

管理干部的恢复

尽管民众认识到领导人真诚希望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但许多人怀疑运动之后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左派”的反击。1957年5月初，最初的指示之一——在执行“大鸣大放”的程序大纲中说：“同时必须注意在恰当的时候，反击右派机会主义分子。”^①到5月末，一些敏锐的地方干部和群众感觉到“左派”的整顿即将到来。例如，5月21日《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宣传“工人”正在保卫工业中的公方代表制。^②几天后，又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5月底推迟到6月底。^③显然，有些事情正在酝酿。6月份的最初几天，批评更加激烈，紧张局面升级。6月9日《南方日报》重印了前一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人们应该被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气氛突然改变。

尽管一些广州的最高层官员在前几天已经知道即将向右派分子发起反击，但甚至连本地的宣传机构对突然的转变也毫无准备，起初的一连几个星期，宣传部门没有他们自己的文章，仅仅是重印《人民日报》中的文章。大多数群众甚至干部都只能焦急地等待进一步的情况。

随着《人民日报》一系列16篇的社论发表，并被地方报纸转载，真正的反击逐步展开。从6月9日开始，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后来每周一篇社论，系列性社论的最后一篇发表于8月17日。系列社论开始解释为什么一些右派分子利用整风运动攻击党，有必要重估他们批评的正确性。第一篇反击文章不是以党的干部署名的，而是以要求右派分子回答和接受批评的“工人”署名。随着运动严重性的升级，右派分子受到批评的不仅是其不正确的理论，还有其不正确的立场，这表明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理。后来由批评家执笔处理各种问题的社论。最后的几篇社论清楚地表明运动必须进行到底，根除反对派。这些社论为集体推进彻底的反右运动提供了理论与指导，运动先是在一般群众中进行，最后发展到

① 《南方日报》1957年5月4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5月27日。

干部和党员自身。

一开始，党并不希望给人以反复的印象，向群众保证“鸣放”期间大胆直言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并解释说对党和干部的许多批评是正确的、有价值的。正如陶铸所指出的，90%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有必要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①批评，然而这不是针对在运动中表达他们观点看法的一般群众，而是利用这一形势攻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②党这样做只是回答了批评者，而不是“压制”他们。^③

表面上讲，“百花齐放”的政策从没结束。这一口号继续被用来形容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样的口号“鸣”、“放”被轻松地用来形容接下来对那些“放”得“不正确”的人的反击，甚至在反击期间还告诉人们继续大胆直言。然而，正如一篇社论所指出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应该批评党，如果他们的观点不正确，应该给予回击。^④这样的说明足以威吓所有潜在的批评者，除非那些人过于狂热而不懂得克制自己。从理论上讲，政策还是同样的，但警告清楚明白。1957年6月8日，对党的批评突然中止。

迅速发展的反右运动的剧烈性驱使许多运动的潜在目标寻求庇护。众所周知，在最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降低了严重性，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我们不能在温室中培育花朵，这样的花朵既不美，也不健康。”他将匈牙利的问题解释为政权当局过于严厉的结果。^⑤事实上，在他较早的讲话中没有什么不平常的东西，但一旦反右运动开始，就有一种危险：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被那些直言反对党的人利用为一个着力点。很快毛泽东讲话的修订版准备在6月18日发表，6月23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后来版本的语调与较早版本完全不同。它警告匈牙利无政府主义的危险，表明对中国民众的严格控制即将到来。随着后来讲话版本的出版，毫无疑问，讲话站在反击的立场上。

反击开始于对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商人和民主党派成员的批评。

①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0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9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9、10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0日。

⑤ 在西方只有部分描述，见《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

在广州，最大的目标是罗翼群。罗翼群是一名著名的民主党派干部，前国民党党员，在“百花齐放”期间曾经最为大胆直言。6月末、7月初，重新召开了和5月份一样的座谈会。5月份和6月初对党的批评被详细认真地记录保存，现在这些建议和批评被重新评估其正确性。

例如，“大鸣大放”期间，工商界座谈会举行了九次会议，第十次会议在6月中旬召开，开始评估较早前会议的正确性。当会议重新召开时，（会议）成员开始学习一些北京对右派分子的批评而没有参照他们自己的评论。^① 接下来，他们开始批评他们自己的副主席，并进一步批评所有其他提出“错误的”批评的人士。^② 其他领域的座谈会也是如法炮制。^③

展开全面的反击计划花了几天时间，但1957年6月19日，就有1 000多名开展运动的干部被召集在一起听取陶铸的关于制定反击右派的组织计划的讲话。^④ 会议之后，《南方日报》开始发表自己的社论，推进运动的开展。^⑤ 这次动员会议之后，随即从华南师范学院开始，推向大学，进行反击。^⑥ 7月1日至7月7日这一周，大学中的运动达到高潮，整个一周都是频密的会议和群众的大字报运动，批评仅仅几周之前大字报运动中发表的许多思想观点。例如，华南师范学院到7月9日张贴了9 000多张新的大字报。^⑦ 小组会之后右派分子被选为斗争对象参加多达5 000多名学生召开的大会。^⑧ 在他们丧尽颜面之后，斗争的对象被送去从事体力劳动。和其他的整风运动一样，自杀的人数无法估计，只是在新闻报道中偶然会提到他们。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之后，7月底召开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揭露右派分子的错误。从7月26日开始，参加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818名代

①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3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4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6、17、20、23、25日，7月2、3、4、6、7、19、26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0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1、22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2、23、24、25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7月9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7月7、10日。

表分成小组批评他们之中的右派分子。^① 8月3日至10日召开一系列大会进一步对最“错误”的批评者进行羞辱。^② 省人代会之后，接着是类似的300多名工商界领袖参加的大会。这次会议也是采取同样的方式：召开小组会议对众多右派分子进行批评，接下来是召开大会对最大的目标进行批斗。^③ 例如一名自傲的中学校长写了一封公开的长篇自白书，承认自己伤害了革命同志，在土改中藏匿财产，受虚荣心支配，同情学生只是虚情假意，他企图利用他所在学校中的位置篡夺党的权力。^④ 在当时的社会中，这些供认的罪状是最不可饶恕的，很少有朋友冒险来看他。羞辱、远离朋友、为社会所隔绝、破碎惨淡的职业前途，这些是一些右派分子难以承受的。7月底，攻击弱化为低调的工作时，许多批评者被降职。

标准的干部策略是采取主动，避免处于受攻击的位置。然而1957年6月初，斗争激烈的批评巨浪已使党处于守势，反革命似乎对党和政府步步进逼。6月底和7月，党以强劲的反击相回应，解除了急迫的威胁，使反对派大败而噤若寒蝉。对于渴望有所变化的批评者来说，党的反击代表着他们希望的破灭，对于党的领导者来说，在一些极端的批评者利用党给予他们进一步自由的宽容（向党进攻）之后，这是恢复秩序的必要的步骤。然而，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成功击败反对派表明党最初采取抚慰宽容的方式处理反对意见的努力的失败。

在反击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百花凋谢”后的两个月内，党解除了敢于直言的非党城市精英所带来的最急迫的威胁。控制的放松也给其他杂草生长的机会，在普通的工人中也发现了严重的问题，但一旦城市中没有权力的精英被迫沉默，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和党自身。

1957年夏、秋，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城市精英中有组织的“大鸣大放”给党带来最严重的问题。而在农村，从来没有有组织的“大鸣大放”。然而这一时期总体上的宽容足以恶

① 《南方日报》1957年8月3、4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8月1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8月13日。

④ 同上。

化合作化的管理问题。1956年集体化完成之后，还没有足够的有能力的农村领导来巩固合作社组织。因为在巩固完成之前又引进了宽容的政策，这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党的干部急于宣传证明农民对合作社基本上是忠诚的，但根据干部的陈说，广东有13万农户脱离了合作社，其中2万户虽经力劝也不愿重返。^①合作社之外的家庭（单干户）虽然受到当地合作社干部和征税官员的歧视对待，但这样的做法力度并不一定足够。

甚至在一些没有正式解散的合作社中，有创意的地方干部作出各种程度去集体化的安排，而在名义上保存“合作社”的名字，保留合作社的工分记录，目的是便于向更高层的干部汇报。基本的做法之一是把合作社的责任分散给家庭（包产到户），但各地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方式，某些地块中某一时期内不同作物的责任被划给个人家庭。结果工作的方式和共产主义之前的“小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即使在私有制之下，播种、移栽、收割也常常是集体的活动。

有时，合作社去集体化起自农民，合作社的领导顺应它只是想避免和农民发生争执；有时则是合作社的领导主动作出安排，欺瞒县里的干部；有时县里的干部非常忙碌，无暇关注去集体化，只要求合作社完成粮食定额。宽容的气氛使希望合作社执行上级指示的县级干部左右为难，因为如果他们对合作社施加压力，很容易被指责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北京和广州的一些领导至少暂时妥协性地接受合作社的这种局面，但其他一些人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社的管理，合理安排土地和劳力，引进新的技术，使剩余劳动力从事更大规模的灌溉和土地开垦工程。

当地合作社中负责完成粮食定额的干部并不那么为去集体化而苦恼，他们苦恼的是合作社的社员不积极投入于集体生产。1956年秋自由市场重新开放后，合作社社员热心投入于自己的自留地和副业生产，^②而不是集体公众的土地，这样的局面令以劝导而不是武力来指挥生产的干部难以控制。正如赵紫阳所指出的：“合作社以外的富裕中农利用管理上的松懈……从事私人的生意、投机、逃税、破坏国家的市场管理……这吸引

^①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不坚定的合作社社员脱离合作社，从事自己的生产。”^① 就是那些没有脱离合作社的社员也因为花更多的时间在私人自留地和私人手工副业上，生产东西在私营市场上销售而忽视集体的责任。^② 不仅一般的农民忽视集体的责任，合作社的领导包括党员目睹有求财心的农民的成功时，自己也有“上升到富裕中农地位、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念头。^③

农民很少像较精明的城市居民那么谨慎，他们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那样受到严密的监督。因此，即使没有组织的运动，这一阶段较多的自由足以产生大量的对粮食征收和合作社的不满之词。农民们不满统购统销以来农村被征收了太多的粮食，农产品的价格太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④ 不满情绪在干部面前得以如此公开地宣泄，而干部们必须宽容地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以促使农民担负起他们的集体责任。一些运动明显要求加强巩固农村集体组织。

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中央完成了反右运动的计划之后，毛泽东亲自宣布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⑤ 广东的运动开始于1957年夏，当时强调的急迫经济任务是：加快粮食收割，完成国家的粮食定额，播种新造作物。^⑥ 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新毕业生被派到农村帮助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当他们抵达时才发现他们的许多工作实际上是帮助收割。^⑦ 收割完成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开始着手他们的主要目标。其目的在总结运动的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不可能使正确的思想转化为合作社的巩固。”^⑧

和两个月来对城市中党外精英的反击和后来党内的反右运动相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那么激烈和富有戏剧性。农村人口众多，如果许多农民受到严厉的打击，那么局面将很难控制，并且，这样的打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8月11日，9月25日。

③ 同注①。

④ 《南方日报》1957年9月12日，10月13、22日。

⑤ 同注①。

⑥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7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3日。

击是否会赢得“农民群众”的支持也是一个疑问。进一步说，农村中缺少城市中那样发达的通讯系统，党在农村的批评不能像在城市那样正式地宣传、传达，因此他们不要求这种广为宣传的反击。在农村的工作整体上非常低调。正如一篇社论中所说的，在城市有反右运动，而在农村，农民“更加支持社会主义”，“很少有反对者”，因而只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毫无疑问，农民和农村的干部听到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心情是轻松的，因为他们知道运动贴上“教育”的标签要比贴上“反”轻得多。在农村，抽象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教育”、“右派”不容易激发群众的热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被宣传为反对“牛鬼蛇神”。^②如同5月份在城市一样，7、8月份也鼓励农民们进行“鸣放”，但反对的目标是“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干部的官僚主义。

1957年7月24日广东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式开始，通过农村党的干部电话会议传达到全省。^③接着是各市和专区的党委书记会议。^④运动的规模规定为在试点地区，5到6周结束。^⑤最后北京指示要求农村的整改在9月中旬公布。^⑥当时广东已经结束了在试点地区的运动，举行大型的全省会议，计划培训10万名乡及乡以上的干部开展9、10月份的运动。^⑦

工作组下到乡村后，开始会见乡村干部和贫农，了解合作社的情况。然后转向工作的中心任务：批评那些损害合作社利益的人。^⑧与在其他任何运动中一样，运动的目的是要让群众参与进来，以便最后群众能站在领导一边。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许多农民认为他们的利益在于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干部们受到指令要让群众参与讨论，但许多干部担心他们这样做不能控制讨论的方向。正如赵紫阳在省党代会上所说的，

① 《南方日报》1957年8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8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8月7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9月21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9月16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9月9、13、14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8月3日。

一些干部“对大多数群众没有信心”。^① 干部们被敦促不要害怕自由讨论。^②

然而，为了对付公开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反对合作社的情绪，采取一些策略是必要的。如果大多数农民受打击，那么就会强化他们对党的工作的抵制。因此，标准化的策略是运动一开始就要分化孤立最激烈的反对者：地主、最富裕的农民和私人投机谋利者（投机倒把分子）。通过有组织的批评，消灭最激烈的潜在批评者之后，才开始大讨论。甚至在讨论刚开始时只允许贫农发言，后来也允许其他人参加讨论。每个合作社在讨论一周左右之后，领导干部开始“解释正确的观点”和“处理具体的问题”，此后那个合作社的运动才结束。^③

在运动升级时，基层干部非常依赖贫农传递信息和公开批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正如赵紫阳所说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农村……最可靠的力量是贫下中农。”^④ 如果不是牲畜、农具和财产被完全征用，富农能更好地驾驭生产，因此，他们能够谋求更多私人利益，而且不会和贫农共享利益。例如，一群富农抱怨说他们的合作社第一年很兴旺，因为收了他们的土地；第二年也不错，因为收了他们的牲畜；现在什么也没得拿了，合作社就干不好。^⑤ 另外一群富农评论说，感谢合作社令他们“有机会遭受与贫农同样的困难”。^⑥ 干部们估计农村人口中有10%是富农、地主，他们希望脱离合作社，30%的贫下中农坚定支持合作社，60%的贫下中农留在合作社只是因为有利可图。^⑦ 承认一些贫农也想脱离合作社有点让人尴尬，但也有现成的解释理由：富农“诱骗他们离社”。^⑧ 虽然一些人被“诱骗”反对合作社，毫无疑问贫农会更愿意支持合作社。他们为外来干部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9月21、23、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8月7日，9月21日。

④ 同注①。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13日。

⑥ 同上。

⑦ 《南方日报》1957年9月15日。

⑧ 同注⑤。

然而，许多干部并不想对农村中最有生产能力的人员进行正面的打击。他们希望贫下中农处在领导和担起责任的关键性位置上，然后利用富农，满足富农要求的努力，中心是提高生产的总水平，使富农在加入合作社时，他们的收入不致受到影响。^①事实上，当时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三年之内，把产量提高到富农的水平。”^②从短期来看，即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也常提醒干部上中农是动摇分子，但不是反革命。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富农也还没有被贴上可恶的“右派分子”的标签。^③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包括说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合作社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今日的生活和解放前生活的对比，讨论的结果毫无疑问是鼓励合作社社员要看到远大的前景，认识到成功的机会要比失败的大得多。

毛主席教导说，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观看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下场是教育运动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一个试点地区，对不曾为人民服务的罪恶地主和最坏的富农进行管制，因而有200多农户重返合作社。^④在另一个点，富农和地主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离开合作社，但合作社社员修筑道路和灌溉沟渠时他们必须给予协助，不允许他们的土地抛荒，政府不负责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物资。^⑤这些制裁措施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伴随着其他的支持手段，使其更难以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市场的开放。1957年上半年，国家在农村征收的粮食大幅度下降，部分是因为上年秋重新开放了市场，投机的农民在自由市场上进行销售。1957年8月，国务院下文加强对开放市场的组织控制，实际上消灭了农村的私人销售。^⑥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这些措施有助于让农民相信留在合作社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1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20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7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8月3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8月25日。

⑥ 《新华半月刊》116. 18: 207-208 (1957年8月9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加强合作社。某地区在运动最后阶段，将注意力转向加强当地党和合作社组织的具体问题。在运动中没有坚定支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当地党员被开除出党，最热烈的支持者在9月初发起的为期两个月的农村党组织运动中获得提拔任用。^① 冬收之后，开始重新整顿党和青年团。运动的一部分就是纯洁队伍，（基层）党组织被告知要开除其党员的3%，青年团要开除8%。^②

在合作社的重组中，干部的精力主要集中于10%—20%的“第三类合作社”。^③ 合作社依其成功的程度不同被划分为一至三类，“第三类合作社”是最不成功的。^④ 党的省级高层领导亲自视察这些“第三类合作社”，^⑤ 并下派更高层的干部和新录用的干部加强对他们的管理。^⑥

在所有的合作社重组完成之后，新干部通过让农民评论合作社的价值、重组的理由、农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来努力巩固新组织。随着“思考”和重组的完成，干部们把目光转向合作社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⑦

党在农村控制“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后续工作充分证明，群众并没有完全领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但运动确实有助于克服党在农村地区权威涣散的状况。领导人当中，甚至一些广东当地的右派分子，也极少准备建议党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放松对农村地区的控制。

城市企业中的问题没有农村那么严重。城市中的合作社和企业较少有分裂的倾向，因为城市的供应网络更为复杂，机器设备更加集中于大型企业，更依赖合适的领导，私人市场的机会更有限。然而仅仅是身处城市这一事实就足以令工人比农民更多地受到5、6月份城市中精英对党的批评的影响。城市中企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质上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规模、更为温和的翻版。其工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对比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情况，为党工作的成功提供基本的理论解释，打击

① 《南方日报》1957年9月4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9月28日、10月15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8月16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9月22、24日，10月3、11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3、25、26、27日，11月1、5日。

资本主义思想，稳固合作社组织。^①到9月12日，城市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全面展开^②，当时中共中央就企业整改运动下发了正式指示。^③10月底运动推广到余下的工厂，^④到11月初，推广到余下的商业企业。^⑤

在知识界，到7月底激烈的辩论已逐步淡化，接着8月份是低调一些的对所有知识分子、学生和教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⑥以降低类似5月底、6月初的情况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在学校，除了像城市、农村那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外，学校还进行了制度革新和课程修改。广东省教育厅指导所有的中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部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接班人”教育。^⑦

1957年夏，政治姿态的改变在党和政府内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均衡，这反映在一系列的新运动之中。5月份、6月份受到攻击的那些人6月8日后处于反击的位置。权力重新回到思想强硬、不顾一切推行党的政策的左派手中。运动针对思想温和的右派分子，他们在实践党的意志时立场不够坚定。

在政策左转之后，反右斗争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但其重点经历了几次变化。在第一阶段，自1957年7月26日开始，根据国务院的指示，^⑧重点是反击春季以来兴盛一时的对党的批评。进行批评的干部受到影响，在各自的单位受到批判，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些受到批判的人被安排到诸如正在建设中的游鱼岗水库这样的工地工作，另外一些人被派往更糟糕的地方进行劳动再教育。最初一轮的反右活动只持续了几个星期，^⑨但它有助于抵消6月8日之前所发表的种种抱怨不满的影响。后来的反右讨论主要集中于地方主义和对群众性生产动员的抵制。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9月12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9月13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4日。

⑥ 《羊城晚报》1957年10月9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7、29日。

⑨ 《南方日报》1957年8月20日。

党没有完全消除政治立场突然强硬所产生的疏离，但它确实在寻求减轻疏离程度的方法。在发起反右运动后不到两周，对杀害抗议麻风病院的村民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被判刑劳改10年，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以此证明用官僚主义压制人民的人还是要受到惩罚的。^① 干部的骄傲自满还会受到批评，并提醒他们要学习工人、农民那样的工作作风。^②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之间也画了一条线。虽然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但他们仍被认为是“人民内部”的，而不是敌人。^③ 对知识分子和商人作了特殊的让步，正是在反右斗争中，1957年10月1日开始出版一份新报纸——《羊城晚报》，以迎合知识分子的兴趣。《羊城晚报》比《南方日报》较少政治色彩，报中包括娱乐、音乐、美术、历史、戏剧和古典文学等内容。^④ 对于知识分子、前商人、民主党派成员及提出批评的人进行新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虽然他们仍因为右派思想受到批评，但也邀请他们出席专门的座谈会，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政府采纳建议，提高受不公平待遇者的收入，为贫困者提供福利帮助，保证他们及其家属有适当的医疗待遇^⑤。这是一个经常的模式：对疏离分子做一些小的让步，而集中精力，盯紧那些会对党和政府进行激烈攻击的可疑分子。

整顿地方主义：海南岛与大辩论

1956—1957年的宽松使以前所有被强力压制的根本性的不满宣泄出来，在党内不可避免地重新激活了地方主义和外来控制的老问题。

这一时段，广东最严重的问题来自海南岛。广东海南岛的地方主义根深蒂固，以致它在土改中被单独搁置下来。渐渐地，外在的权威试图渗入“冯白驹的独立王国”，用外来的干部取代当地的干部，但他们遇到当地有力的抵抗^⑥。1956—1957年的宽松为冯白驹抵制外来者提供了极

①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8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6月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2日。

④ 《羊城晚报》1957年10月1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11、15日。

⑥ 林李明在《上游》杂志上的文章（1958年9月1日），第30—34页。

大的便利。1956年9月第八届党的代表大会期间，他向大会写了封长信，不满广东省委和外来干部干预海南岛的事务。冯白驹的活动决不只限于写信。正如省委书记林李明所指出的：“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195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他们阻挠和分裂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①

1956年12月，海南岛的问题达到高潮。匈牙利事件令广东的地方主义者极为振奋，1956年12月的海南岛事件在广东党内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②就这一事件，后来广东省长正式宣布：“一小撮地方主义者，联合阶级敌人进行武装抗拒，这是阴谋策划篡夺领导权、改变党和政府的组织和领导的一部分。”^③1949年以前，海南岛政府的总部一直是在临高县。361名叛乱分子，主要是被“新干部”取代的前游击队的退伍军人，发起了一场武装进攻，包围了临高县党和政府的办公地点。叛乱分子切断了电话线，收缴了对方的武器，监管了临高县县长，强迫他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的主要要求是重新恢复以前琼崖纵队（冯白驹以前领导的纵队）成员的干部职位。几乎同时，临高县的邻县那大县（儋县）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有238人参与，再次要求恢复以前干部的职位。^④

叛乱分子很快处于武装控制之下，但政府足足用了15个多月才建立了由外来干部控制的可靠的政治组织。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海南岛的问题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注。1956年9月的省委书记会议、1956年12月在海南岛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和1957年2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1957年2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号召批判冯白驹，但当时的宽松环境使对他批判打击受到抵制。在会上，游击队的主要领导、1952年以后一直对于地方主义给予一定程度支持的古大存挥舞地方主义的旗帜，起来支持冯白驹。古大存抱怨说，1955年的镇反运动对南方人不利。他说：“外来干部整当地干部，北方人整南方人。”^⑤冯白驹和古大存走得太远，甚至说，在共产主义之下，广东不会繁荣起来，农民粮食不够吃，

① 林李明在《上游》杂志上的文章（1958年9月1日），第30—34页。

② Wang Tsao-ching 在《上游》杂志上的文章（1958年9月1日），第35—38页。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④ 同注释②。

⑤ 《新华半月刊》no. 19:43—45。《南方日报》1957年12月9、16日。

没有足够的经济作物，外来干部的控制是不民主的。^①

虽然是1957年的海南岛问题使地方主义达到高峰，但其实是在1955—1956年，由于肃反运动使当地遭受的伤害以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广州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地方主义情绪一直高涨。刘少奇在1956年9月的党代会上对广东寄予相当大的希望，他说：“我们必须合理地加快河北、山东的工业发展，华南地区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加快发展。”^②或许是为了增加其实施的可能性，几周之后，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他本身是外地人——获准对中央政府发表公开的批评。在当地的官方报纸上发表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批评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事。这反映了当时宽松的程度，也反映了王德感到他在工作上必须和广州市党和政府内地方主义者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王德说，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广州，而且把电力设备拿到了北方。他个人是反对这样做的。他说，中央政府1955年给予整个广东省城市建设的预算只有600万元，这连广州市都不够。他说，20年前有句话说广州“电灯不明亮，电话不清楚，道路不顺畅，自来水不清纯”，人们觉得现在这句话更真实。“失业率高，工业建设缓慢，副食品供应紧张；因此，群众的反感日益增加。”^③在1957年初，另一件让当地人不快的事是，作为整顿官僚主义的一部分，干部被派到乡下，当地干部更是经常被下派到农村，因为他们能说当地的方言，所以更可能被派到最基层。省长陈郁在担任这个尴尬的新角色，为在广东的外地机关单位辩护时曾说：“一些同志怀疑省委的干部政策有宗派倾向，说省委的干部政策对北方人有利，歧视南方人。”^④

1956年末、1957年初陶铸处于受攻击的位置。“大鸣大放”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讲坛，地方主义者非常喜欢这样的局面。古大存后来被指控在1957年5月做广州的“民主党派”成员工作，怂恿其大胆直言反对外来干部的领导，但其实他们可能不需要多少怂恿。^⑤当他们坦率直言时，所有的深层伤痛都被重新揭开。

① 《新华半月刊》no. 19:43-45,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9、16日。

② 《人民手册》(1957年), 第15—16页。

③ 《广州日报》1956年10月7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⑤ 《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

“大鸣大放”结束之后，作为加强组织纪律的一部分，反对地方主义的路线再次强硬起来。陶铸再次处于攻势。1956年8月省党代会上他曾作出道歉，但1957年夏在韶关专区一次党的会议上，陶铸批评了1956年8月党代会的错误，他说，党代会错误地过分强调农民的利益，忽视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鼓励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①陶铸不再道歉，相反他批评其他人的错误。1957年初，海南的问题只是在省委高层干部中进行正式讨论，对地方主义的路线强硬之后，8月14日，省委公开批判地方主义，并很快传达到全省的各党支部。^②

在发起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中，陶铸很清楚他有邓小平的积极支持。邓小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号召批判地方主义。^③批判的攻势在1957年11月15日至18日的广州市党代会和11月21日至12月5日的广东省党代会上发动，^④批判的手段是“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讨论的历史阶段是1952年，主题是北方人在广东党政机关中的崛起。1952年北方人的接管控制从来没有在党的会议上全面讨论过，现在虽然情绪还很强烈，但大多数南方人能够在原则上承认，为了加强中央有力的控制，派干部到各省去是必要的。因而可以期望重新看待1952年的事件，有助于说服南方的干部认识当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必要性，而使大胆直言、决心坚定的地方主义者接受纪律约束。在“大辩论”中，1952年以来所有熟悉的争辩都重新提了出来：广东进行土改的缓慢，缺乏地方的经验，行动的紧迫使地主在朝鲜战争中没可乘之机。

与此同时，还专门为外地人建立了一个以被南方干部广泛接受的原则为基础的个人事例。陶铸利用广州起义30周年纪念，宣传他个人30年前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叶剑英的长期联系可以追溯到20年代中期，^⑤表明他在当地的革命历史可以追溯到和其他任何南方的革命行动相比。但许多广州干部怀疑他参加广州起义的真实性，这反映了外地干部不被

① 《南方日报》1957年9月9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9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7日，12月8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2、7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11日。

信任的程度。在省党代会的闭幕讲话中，陶铸回应了地方主义者的争辩，他说，外地来的干部应该适应当地的情况，为当地的利益服务，“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不是本地化，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是共产主义化”。^①但在党代会上推出了一个有力的例证说明南下的干部事实上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情况。当地人省长陈郁在党代会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迫于压力说明：“南下干部已经和当地的群众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他们能够正确地反映群众的看法。他们已经本地化。”^②

除了关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必要性和外地干部个人资格的大辩论之外，地方主义者的主力受到公开的批评和监督。最受关注的两个人是古大存和冯白驹，他们仍是广东地方主义的主要人物。古大存和冯白驹被免除了职务，对他们的批评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进行宣传。^③广东的其他领导，连省长陈郁都开始声明支持中央的控制。他们的声明在省、市机关的基层干部中也得到回应。自此，古大存与冯白驹不再有多大的权力，尽管古大存在1966年去世后，他的追随者还试图还他一个清名。

安抚地方主义者的方法之一是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老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不满情绪特别强烈的老游击队根据地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特别的关注。古大存任委员会主席，其他重要的成员包括冯白驹、尹林平^④，还有同时受到批评的地方主义者。

在作出这些让步的同时，省委采取措施巩固对主要的问题地区海南的控制。这时已不必派去“大军”，因为有了更简单、更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了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1957年初，全国性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运动已经开始，到秋季进一步加强。在广东，海南是抵抗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省党代会上，海南的地方主义最后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宣布了海南大规模发展经济的计划。自此，大批干部从广州下放，领导工程建设，顺便检查监督地方主义。省党代会批判地方主义之后不久，多达18万名下放到广东农村的干部被派到海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③ 《广州日报》1958年3月11、13日；《新华半月刊》no. 19。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

南岛。海南岛干部的领导是林李明，^①他在海南游击队历史上是唯一可以和冯白驹相比的人。林李明长期受到省委的认可，是会把省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可靠人物。

地方主义并没有终结，但它再次被置于严格的政治控制之下。1952年，中央政府的旗帜插到了广东余下的地方，到1957年冬，它也插在了海南岛。1958年3月，宣布为期4个月的反对海南地方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林李明在广东省委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推翻地方主义之后海南的新面貌”。^②

浪漫主义情结的终结

在对日本人、国民党、地主和腐朽势力的斗争中，共产党依靠广泛的群众支持，掌握了权力。在最初的几年中，它还保持着很多这样的支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克服落后和腐朽的希望。由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困难和政治管制的紧张，群众支持的力量有较大幅度的消退。1956—1957年的温和化正是用来扭转这种群众和领导相脱离的倾向的。

共产党的领导在谈到党和群众的联系时，并不是简单地用计策使他们更易管理。他们“对群众的爱”，不是具体的个人之爱，尽管对有些领导个人来说，这种爱植根于他们对特别贫困的农民、工人的爱护。具体地说，虽然在职业上完全不同，但领导往往脱离没多少文化、不太聪明、不怎么勤奋努力的工人、农民。为了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诱导群众、利用群众，甚至对群众隐瞒一些实情。然而，他们还保持着对中国穷苦人处境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不是简单的理智上的，而是他们真正同情普通百姓所遭受的苦难，痛恨那些压迫他们的人。虽然这可能是非亲身的、模糊的、遥远而浪漫化的，但“对群众的爱”是真实的。这种情结是有道德和情感的，因为领导们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普通人带来利益。

1957年春达到顶点的自由证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比领导所认识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16日。

^② JPRS (《联合出版研究服务》) 1476-N: 13-23。

到的要大得多。那些了解到真实情况的领导者，痛苦地发现现在许多人看待他们就像他们当初看待压迫者一样。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在国家现代化的同时为人民服务，保持他们的支持。他们希望既有权力又受民众欢迎，但发现这两者不可兼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权力赋予外地来的干部以防止地方的分裂主义；为了支持基本建设而延缓消费，拒绝投资于不符合国家优先领域的地方；强制知识分子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人、农民的实践锻炼；阻止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从农民手中强制征收沉重的粮食定额。这一切产生了太多的不满，以致不容许有一个温和的政策。“大鸣大放”时期的经验教训说明，当时所构筑的中国的政治秩序还不能承受温和政策所释放出的严厉批评和分离倾向。

虽然他们“热爱群众”，但当他们不得不在宽容和维持牢固的政治控制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领导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宽容政策的失败导致了更加严格、不加掩饰的政策取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更少接受咨询，更少人被送去学习班，更多人被送去劳动改造。与说服劝导相随的武力威胁更加表面化。

虽然和群众联系的断裂是政治现实所必需的，但对于制造这一破裂的领导来说是痛苦的，许多干部痛苦失望，因为他们已不能为普通人更多地做些什么。这样的痛苦失望反过来导致了党和政府内部的自责以及指责和反指责。1956年至1957年初的政策旨在重新恢复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浪漫联系，但最后，这种联系为政治秩序所牺牲。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领导人准备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来对待“群众”。

第六章 乌托邦：“大跃进”， 1957—1960年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结束了近两年对基本政策的动摇和辩论，进行了一场具体而终归是乌托邦式的努力，企图通过道德劝说，牺牲奉献和体力劳动来走捷径实现现代化，这些努力在1958年末和1959年通过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积肥垦荒及调整之前的新建设达到高潮。

三中全会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定了调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只是由小规模的管理机关所做的有限度的工作，集中于比较现代的部门。第二个五年计划机关管理大为扩展，旨在加强地方组织，推进整个国家所有社会部门的经济的发展。新的发展方向的经济基础在于经济管理的非中央化，在地方的领导下，从管理机构重新调配人员到“生产前线”，小规模工程项目遍地开花，更多地依靠人力，而不是资本。其政治基础在于增加地方的权威，结合强硬的反右路线，右派被解释为包括所有妨碍新方案的人。其心理基础在于努力激发群众牺牲奉献的精神，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大跃进”。

虽然发展的速度波动曲折，并且后来引进了公社，但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基本的政策方向保持不变。然而“大跃进”并不是在三中全会或其他任何一次会议上全面开始的，它在许多个月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势能。刚开始还比较温和，但到1958年秋已经非常激烈。1958年春末及1958年冬天曾两次试图阻止激进化，调整方案，抑制极端过度。但预言家对灾害的预言是不够的，只有在1960年达到顶峰的灾害本身，才能遏止毛泽东主义者在1957年10月后建立起来的巨大势能。

“大跃进”中所体现的政策源于国际机会、经济困难和政治反应的一个特殊综合。1957年国际上的事件促使中国考虑抓住这一扩大其世界影

响的新机遇。^① 各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起义的成功、纳赛尔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使毛泽东主义者认为敌人处于守势，他们应该采取攻势。苏联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1957年8月26日）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日），使对社会主义阵营优越性的任何怀疑一扫而空。11月，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对苏联的赞扬达到近乎谄媚的边缘。几周以来，广州和全国的报纸每天都有文章热烈称赞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四十周年纪念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以胜利者姿态形容说：“东风压倒了西风。”

中国人在考虑如何利用新的机遇时，他们自然会想到台湾。台湾是中国政府尚未征服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帝国主义干涉”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它的存在阻碍了共产党得到充分的国际承认，为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提供了宣传、间谍及军事基地。1958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共产党希望解放台湾的想法在升级，他们的军队在准备战争，并且开始轰击金门和马祖。迫在眉睫的对台战争的可能性，不仅产生了对经济计划方案的迫切需要，而且激发了爱国热情，这些爱国热情可以转化为不需要物质回报的全情投入的劳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在像广东这样靠近台湾的地区尤为真实。

在经济前线，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希望在1956年、1957年遭到挫折。到1957年初，产生了一种后来领导人形容为对经济表现感到悲观失望的情绪。虽然广东的表现在全国的一般水平之下，但问题和其他地方一样。农业的问题再次成为最关键的问题。^② 1956年末，广东连最低的农业目标也没有达到。^③ 1957年的第一季收割中，全省夏季粮食定额只征收了92.85%，因此秋收时的年度定额比例必须是异常的高。^④ 由于粮食短缺，发展工业作物的地区到1957年底也缩减了^⑤（当

① 关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参见唐纳德·S. 柴哥利亚：《中苏冲突，1956—1961》，（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哈罗德·C. 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主义中国》，（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6）。

②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4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7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5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6日，10月21日，12月8日。

时广东的可耕地只有1 850万亩，而工业作物地区到1957年初扩展到大约400万亩)。由于广东省的工业产出70%以上依赖农业生产的原材料，^①这一削减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从农村大量涌入广州和其他城市的人口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②并且提高了对农村的粮食需求。政府官僚机构的迅速膨胀进一步恶化了基本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1956年工资作了一定的缩减。支出日益增加，以致需要动用资金和物资储备。^③

1957年夏，领导人就经济缺陷的诊断和改善提高建议达成共识。这样的补救方案反映了中央关注地方领导对于过度集中化的不满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即便是更多忠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的北方人也讨厌过度集中的僵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产生的耗费时间的官僚程序。在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对地方主义和地方种族主义发起了批判，同时也分散了一部分权力、资金预算和人员到基层。这是处理不满最常用的方式：一方面加强纪律，另一方面作出让步。

尽管第二个五年计划仍然强调重工业，但也希望地方的合作社要看到轻工业和农业没有被忽视。这一计划更加重视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劳动力是充足的，而资本则不足。国家提倡“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小型的、落后的、地方的，一条是大型的、现代的、国家的。集体化所产生的地方经济结构和被分散化所加强，把地方导向劳动力密集型的项目。支撑“大跃进”的这种经济取向有时被认为是从苏联的模式演变出来的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它更多是对新产生的合作社组织的回应，它把地方领导导向劳动力密集型项目；它是对台湾海峡危机的回应，它为劳动力需求提供了非物质的刺激；它同时也是对苏联模式产生的困难的回应。

1957年秋到1958年秋发生的改变不是上面这一看法，而是宏伟的目标和对生产的专注。1958年春，文敏生代表广东省委讲话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一切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以保证生产为出发点。”^④1957年冬，第一次采用提高产量的新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也恢复了表面上

① 《南方日报》1958年1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7月26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6月28日，7月4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5月14日。

进步的幻觉。现在回顾，很容易发现这些虚幻的东西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外国的分析家都不能作出清楚的判断。共产党的领导是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们已经实现了人们认为不可能的许多成就。所以即使是接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也不能肯定，在激发了爱国热情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智慧与勤劳不能超越关于生产能力的一般看法、判断。

“大跃进”的政治背景在于“大鸣大放”结束之后更强硬的路线。1957年初秋的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许多批评者默然无声，巩固了政治控制的路线，并且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成功不是来自新的让步，而是来自更有力的领导和更强的纪律性。^①在某种程度上，三中全会以前的整顿是防御性的，它弥补了“大鸣大放”所造成的损失。三中全会之后的整顿是前瞻性的，旨在克服对于迫切而又雄心勃勃地扩大地方生产的工作的抵制。伴随着分散化的措施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努力，政治整顿在“大跃进”的准备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跃进准备：纠正右倾保守主义

（中央在）三中全会闭幕几天之后宣布，政治整顿将持续到了1958年7月。^②几周后又宣布将延迟到9月。^③它确实持续到了1958年9月，至此，公社已成立，“大跃进”全面发动。

运动主要是着力于反对那些不愿意提高产量定额的人。报纸上的文章和党的会议上传出消息：整顿必须“克服关于产量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④，“整顿必须适应生产的需要”^⑤。从1957年末至1958年夏，产量的指标经常被提高。因为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干部们抵制提高定额。不管定额多么不合理，他们如何努力工作，只要完不成定额，他们就会有麻烦。每一次定额提高，都要整顿各个政府和经济单位中有抵触情绪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2日。

③ 同注①。

④ 《南方日报》1958年1月7日。

⑤ 《南方日报》1958年2月6日。

的右倾保守主义，然后根据新的目标修改计划。正如省委的通告所说的，这是“一场反对右倾倾向的继续革命、继续斗争”^①。

干部被批评为保守主义，指他们拒绝提高定额，还因为他们固守传统的技术方法，缺乏大胆的想法，不敢尝试新的不熟悉的方法。一些上层来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不太熟悉，对采用新的方法提出建议时，一些人根本不理睬。迷信的农民干部担心重新分配土地、灌溉工程计划、开辟新路和土地垦荒会破坏“风水”。这些“迷信”被批判为右倾保守主义。当被告知要使用化肥时，许多农民不相信化肥有营养成分，还担心化肥可能损坏他们的土地。其他的许多农民仍然不相信大规模群众动员进行的工程的价值，认为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建设新道路没有价值，在土壤不良的地方开垦新地也没有价值。所有这些也被斥为右倾保守主义。

潜在的右派分子中很少有人敢于反抗或者公开抵抗，但他们开始编排事实和数字、总结和材料，证明他们的定额不能提高或者不能大幅度明显提高。一些人要求在产量提高之前上级应该投入必要的大量的物资、资金和人员。虽然他们不敢批评上级领导个人，但一些人警告要警惕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危险。而掌握权力和宣传工具的“左派”则以批评右派的主观主义相回应，指右派分子不了解农村的客观潜力与群众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那些谈到地方特殊的问题难以完成更高的定额的则被告知，问题“不是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右派倾向”^②。

从1957年秋至1958年夏，整顿运动的主旨仍然一样，但随着1958年春有投资资金可供使用，整顿还集中于那些浪费这些资金的人，因而出现了短暂的反浪费和反右倾保守主义的“两反运动”。^③ 尽管那些目光短浅和向上级要求太多的人和以前一样受到批判，但每个单位都要求制订出削减开支的计划。^④ 在负责计划和建设的地方政府部门，运动特别激烈。财政部长李先念在运动开始前夕警告：“在处理所获得的资金时，地方和企业应把它们用在生产和建设上。”^⑤ “两反运动”为实现这一目标

①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6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1月12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3月4日；《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7日。

⑤ 《当代背景》(CB), no. 493: 21.

提供了鼓励和支持。

1957年末和1958年上半年的整顿运用了所有的小会、大会批评的标准化技巧，但一项新的许可提高了运动的效率。作为简化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政府下放了大量的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某些情况下，从工资表中除名的国家干部将可能永远留在农村，这样的命运自然不能合人心意。右派保守分子通常不会明确受到下放到农村的威胁，表面上讲，下到农村是一种荣誉。然而，每个管理单位都有“下放”的定额。右派保守分子经常受到“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批评，^① 由他们的单位挑选他们去和群众一起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整个1958年春整顿运动相当激烈，六七月间党和政府的所有干部经过小组会的思想检查，整顿运动进一步强化。可疑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惩罚，“动摇分子”受到警告，它和“大跃进”的联系非常明确。陶铸在针对右派分子的大会上发言说，他们可以通过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证明他们自己。^② 虽然6、7月间干部们还没有为即将于8月份开始的公社化运动做好准备，但他们已经不准再抵制任何可能的计划。公社成立之后，整顿集中于那些抵抗重组的人。^③

最后证明整顿太成功了。1958年末、1959年年中以及1961—1962年，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及其他一些领导已敢于大胆直言，但整顿运动压制了基层对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方案提出反对或温和化建议。它为“左倾”主观主义方案的执行铺平了道路，而“左倾”方案比右倾保守主义者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

跃进准备：分散化

中国在引入分散化时，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都盛行此风。如在东欧，对经济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基层政府。后来，东欧国家分散更多的权力到企业，采用价格机制。而在中国很少采用价格机制，即使采用，

① 《南方日报》1957年2月5日。

② 新华通讯社（1958年6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97：38。

③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3日。

政治压力也使之无效。^①

1957年秋，三中全会过后不久，广州许多以前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工厂转交给省、市政府。紧随其后，大部分轻工业，甚至一些重工业也交由基层政府管理（军工产品、石油、煤炭、发电厂除外）。中央政府仍然直接管理重要的基本建设、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和原料提取，但小型的项目现在则直接由省、市、县管理。^②事实上，许多以前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企业长期依赖省、市政府配备人员，确定原材料供应地、划拨建设土地、安排职工宿舍、协助安全保卫及提供其他特殊的帮助。然而权力向省、市政府的新转移是真实的，它意味着只要完成了定额，有关工厂的决定可以在广州而不是在北京做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企业确定转移之后通常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因为监督他们的官员就在当地，而不是在北京。

理论上讲，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之后，地方保留更多的财政收入。根据规定，工厂转交给地方政府之后，利润的20%由地方留成，这是第一次^③。有七种税收（印花税、屠宰税、牲口税、城市土地和房地产税、娱乐业税、车船税、利息税）也是第一次由地方提留。^④几个月后，即1958年6月，地方可以保留15%的粮食附加税。^⑤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决定是假的，因为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决定国家预算中次年分配到省的份额来在地方留成的收入中获得补偿。然而，这些措施确实让广东省和广州市略微加强了对自己财政的控制。停止发行国家建设债券以利于地区的建设债券发行的决定，^⑥也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因为即使公债到期，公债所有人也会听从劝说购买新的债券。公债销售实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金融资产。

同时，政府还大大简化了地方报告制度。以前每个企业必须向政府报告12个项目的信息，现在减少到4个，主要有产品的产量、职工总人

① 见德怀特·珀金斯：《共产主义中国的市场控制和计划》，（Dwight Perkins,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② 李先念的讲话，见《当代背景》（CB）no. 493。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8日。

④ 《当代背景》（CB）no. 493。

⑤ 新华通讯社（1958年6月4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92:1-14。

⑥ 新华通讯社（1958年6月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91:1-22。

数、总的工资预算和总的利润，不必再报告总产值、新产品的试制、技术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量、年度职工出勤情况、平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等。^① 并且根据新的规定，每年报告只有一轮，取代以前的两轮。^② 在每一轮中，中央政府下达开展工作的指标，省级政府制订完成指标的计划（市、县依此类推）。在需要两轮汇报的时候，某一年计划最后的制订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这一年上一轮的汇报，每一轮都完成得太仓促以致地方上没有时间根据第一轮的结果为指标作出任何变更建议。事实上，“大跃进”中计划经常变更，在1957年末将两轮缩减成一轮，其意图虽然实在，但对于几年的时间来说也毫无意义。

1957年末，省、市、县对预算进行调整，给予了更大的灵活性。这在1958年也没有被推翻。例如，以前地方政府没有中央政府的特别许可，不能将上年的预算剩余结转到下一年度，但在新的规定中不再要求有这样的许可。^③ 1958年6月，为了刺激生产的积极性，省里获得对税收征收额外的灵活性，没有北京的批准，他们也可以对新产品、试验性生产和启动性生产作出税收方面的让步。^④

不仅权力、资金，而且连人事权也从政府下放到经济单位。195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金融会议上宣布将缩减军事和管理的开支，而增加工农业的资金。^⑤ 作为这一方案的一部分，每一级政府都下放人员到更低一级的政府，基层政府直接派遣人员去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工作。例如，1957年秋，从广东高层下放的18万名干部中，有15万名是执行常规生产任务的。这些人员的分散化不仅削减了预算，而且提高了地方上的竞争水平。因为来自北京以及省、市、县的人员通常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随着他们管理责任和权力的增加，地方上竞争的引入有助于支持地方的管理。

这些分散化措施提高了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制订他们自己完整的地

① 《新建设》1958年8月。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8日。

③ 《当代背景》(CB) no. 493。

④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

⑤ 朱德的讲话，见新华通讯社（1957年12月28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687；

方经济计划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地调整地方的税收以刺激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勘探、开采新的原材料以满足地方工业的需要，建立小型的支持性工厂以满足其他方面的产品需求。而这一切，都少了来自北京的红头文件和干涉的影响。北京保留的一大权力是控制指标：生产的指标和地方政府上交资金的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中央政府仍然对地方保持着很大的压力。

总的来说，增加地区协调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不仅是理智的，而且对于纠正过于中央集权化来说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实践中这也显示出几个明显的缺点。第一，权力的分散和最初的权力集中一样都走过了头，中央不再赋予部级机关协调全国经济所需要的权力和信息。第二，地方政府的部门（工业、商业、金融、交通、通讯、公共卫生、教育）受到北京同系统的技术部门专家的监督，同时更受到地方政府的监督，而地方政府中更多的是通才而不是专家，虽然权力的分散化增加了地方上对整个地区的计划和调整的能力，但权力也集中于地方党的领导的手中，这些人不受专业要求意识的限制。第三，强化了党的全能领导作出不明智的决定的能力。北京不断施加压力，超出现实的可能要求提高定额。因为目标高得不切实际，地方上直到几年后才会有机会作出有意义的计划。

跃进准备：农业生产

1957年11月省委第一次详细讨论广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指标的设定和计划还没有失去控制。因为是“大跃进”，所有描绘1958年轰轰烈烈的工作的口号——“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①，已经很风行。但地方上有节制的计划还没有受到新口号和来自北京的战斗精神的影响。1957年11月份的计划不仅显示出几个月中的保守势头，而且比1956年初的计划的雄心更小。1956年初的计划要求1957年全省的粮食产量达到280亿斤。到1957年12月，可以预见当年的粮食产量显然在250亿斤以下，和1956年几乎持平。1958年的指标只定在265亿斤。1956年初，广东省的领导誓言他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计划”，但在1957年秋，他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们只能以相当肯定的口气承诺他们“肯定能完成定额”。^①

1957年末，全国的计划要求1958年农业生产增长4.7%，工业生产增长8%—10%。^②由于1957年广东的农业严重落后，粮食配给制必须加强，^③农业必须比全国总体更加受到重视。1958年，广东的工业生产要求增加6.6%，粮食生产增加6.1%。^④虽然粮食增长6.1%，需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但和后来的目标相比，这一目标是最低的。

为了发展科技能力支持第二个五年计划，广东成立了广东省科技工作委员会，^⑤派出勘探队寻找广东工业所必需的矿石^⑥和能源^⑦。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可用于生产的资金^⑧，为了缓解管理预算负担，许多干部被下放到生产一线；采取新的措施，男性在60岁退休，白领女性55岁退休，蓝领女性50岁退休，对退休工人一次性付清退休金，这有助于鼓励许多工人提前退休。而地方政府机关常常为了使其预算宽松一些，避免大额的一次性支付款，而简单地让老年人离岗。

此外，还采取措施减轻农村向城市供应粮食的负担。为了鼓励工人不将其家属从农村带进城市，政府向他们保证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可以回乡探亲。^⑨为了降低城市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启用了新的学徒制。如在有数据记录的相当典型的农村县份东莞，每月人均收入从1953年的3.4元上升到1957年的6.9元，^⑩但这和工业中的起点工资还相差很大，一个典型的工人的起点工资在40元左右。旧的学徒制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但1957年末采用的“社会主义的”学徒制给予城市工人头三年的工资几乎不够其生活开支。^⑪城市中起点工资的下降降低了城市的吸引力，因而也降低了从农村地区征收粮食的负担。

① 《南方日报》1956年4月8日，1957年12月7日。

② 《人民日报》1957年9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6日，12月16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6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

⑥ 《羊城晚报》1957年10月9日。

⑦ 同注释④。

⑧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11月1日。

⑨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7、21日。

⑩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6日。

⑪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667:1-23。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为生产的新进展做准备，但在省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最大的准备是在农业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领导人努力避免对农业的资本投入，以利于重工业和建设。到1957年合作社显然没有解决农业的问题，低农业产量妨碍了工业的进步。在“大跃进”中，领导人仍然努力避免将国家的资金投资于农业，他们希望合作社能够利用自有的一些资金来改良农业水利灌溉与垦荒工程以增加产量。^①虽然政府仍然不愿意对农业进行资本投入，但1957年已准备投入大量干部力量和技术指导。^②

1961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发起了一场有组织的全国性的运动“支援农业”，但1961年所采用的全国性的扶助农业的措施，广东在1957年冬至1958年几乎都小规模地采用了。对农业的投入开始是领导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最高层的省委干部开始对农业投入更多的时间，而且农业地区地方党支部的书记明确接到命令要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农业上。^③省、县机关的普通干部被派到农村提供指导，树立在农业中投身劳动的典型榜样。^④1957年5月10日，第一次颁布下放全国性的指示时，强调的是干部的思想整顿，但在1957年秋发起的大规模运动中，口号是“到农村去”^⑤，强调的是生产。11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确，要重新强调生产。陶铸敦促干部到农村去进行生产，就像1955年末去农村进行集体化建设那样。^⑥在某种程度上讲，1957年11月的省党代会可以看作是下放18万名干部去农村的动员。^⑦然而，发起第二场运动让干部留在农村，对他们进行安抚、鼓励也是必要的。此时已有迹象显示到60年代问题会更加严重。1957年，社论中已说：“年青人是我们的下一代……然而年青人不乐意去农村，而想回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2、25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8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⑤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6日；《法规汇编》第八卷，见JPRS（《联合出版研究服务》）no. 14335:40-42。

⑥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1日。

⑦ 《香港文汇报》1957年12月18日。

城。”^①

除了派到农村的干部，驻扎在广东省的军人也帮助收割，^②对水利工程的参与特别多。^③军人通常短期帮助农业生产，但1957年他们投入工作的范围非常之大。广东军人总共劳动约300万人/小时，即每个军人都劳动了一个月。^④如果像所说的那样，每个军人真的劳动了一个月，这意味着那个冬季广东大约动员了10万军队在农村生产劳动。和集体化过程中复员军人取得合作社的领导位置一样，仅1957年前8个月，大约有3万复员军人被安置到广东的农村地区，几乎是平均每个合作社1人。^⑤

政府还打算投入大规模的农业新技术。技术改进的领域被总结为八个字的口号，即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最初是毛泽东在1956年初提出的，并且在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及，^⑥随后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批准并将之编入《广东农业发展三十六条》^⑦。这八个领域所代表的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作物保护、田间管理和工具）。

种子和工具的升级大体上由高层技术人员掌握，而在冬季几个月当中，密植、作物保护、田间管理的活不多。群众在秋天被动员起来积肥、堆肥^⑧，但在冬季，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最有可能促进增加生产的领域：水利工程。

集中精力兴修水利是全国性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一工程在广东特别有前景，因为广东降雨丰沛，土壤肥沃，河网广布，可以通过水利工程克服山区的水源短缺、减少河谷地带洪水的危害。兴修水利的策略和“一五”计划期间有不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集中建设少数耗资巨大的现代工程，这些工程的所在地受益很小。而现在合作社为动员农民提供了组织基础，分散化增加了地方的自主权和人事权，同时也稍微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22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21日，1958年1月18日。

④ 《香港文汇报》1957年12月18日。

⑤ 《南方日报》1956年8月31日。

⑥ 见谭震林：《关于农业的报告》，《南方日报》1957年10月17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2日。

⑧ 《南方日报》1957年9月28日，10月29日。

减轻了地方的税收负担，因此，各地的合作社可以开展一些小型的地方灌溉工程，而在早些时候，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当时人力利用基本上都不充分，但农村在秋收和春播之间人力的利用是特别不充分的。因而无论在哪里，只要是合适的村民都应该动员其在冬季为灌溉工程劳动。

合作社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对水利工程规模有着天然的限制。就像传统上村庄、家庭为用水权而争斗一样，合作社在水利工程上的合作劳动也很不容易，因为工程对于一个合作社的价值比另一个更大。水利工程的变动，如河渠的位置、沟渠的大小、水流的分配大多数都会使一个合作社比另一个合作社得到更大的好处。而在合作社内部，利益的分享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经济的基础。次年合作社合并成为公社为更大规模的工程铺平了道路，但在1957年冬，其中心仍是根据合作社规模来确定水利工程。

1957年10月15日，北京的三中全会结束一周之后，广东省召开了水利工作会议。政府的新水利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灌溉新开垦的土地。1957年广东的可耕地面积是1 850万亩，次年增加到2 000万亩。^① 根据新的方案，右倾保守主义受到批判，政府订立了水利工程的高指标，并相应地制订了计划。广东在这方面是学习河南这个榜样。在河南，农业大跃进的主要发言人谭震林正在测试一项全国性的水利工程。领导人在秋收之前做好计划，以便一旦作物收割完成，工程就开工。^② 县水利局派出技术人员，根据当地的条件和人力资源给合作社提出建议。^③ 一旦秋收完成，群众就被组织起来，首先是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然后是开展劳动。^④ 工程稳步前进，全面展开，直到春播来临。

因为1957年冬农村集体工程的开展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为了保证必要的劳力供应，必须限制私人生产和市场销售的可能。1957年6月曾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6日，12月6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1月9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1月19日；关于一些水利政治，参见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地方政府与中国政治，1955—1958》，（Michael Oksenberg,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55 - 1958*, in Andrew W. Cordier, ed., *Columbia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宣布私人自留地可以扩大到可耕地的5%—10%^①，但到1957年底，为了保证农民能够被动员去进行大型的集体工程，颁布了新规定，将自留地的最大规模降到占可耕地的5%，在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地区降到5%以下。^②

为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地方集体承诺即使产量增加了，1957年底到1960年的粮食征收额也保持不变。这一承诺后来为公社所取消。另一个鼓励积极性的措施是通过“三保证、一奖励”的制度来加强生产队。在这一制度下，通常是原先的小合作社组成合作社中的生产队，要保证给合作社提供一定量的劳动力、资金和生产，而合作社反过来对完成定额的生产队给予物质奖励。这一决定的效果，如同权力从中央政府分散到省一样，给予下级单位——在这里是生产队——更多的自主权，由其决定如何具体完成定额。只要生产队在集体土地上使用了足够的劳力和资金，完成了生产指标，合作社就不再干预生产队的事务。^③

全社会的所有其他部门也都被要求支援农业。交通部门要优先运送供应农业的物资，银行要对合作社的建设工程贷款给予特别支持。^④ 政府的工业部门要生产更多的如化肥、小型农具之类的物资，^⑤ 并且帮助在全省各地建立生产化肥、农药和其他农业所需物资的小型工厂。^⑥

商业部门努力为农村提供必要物资，但这项工作因为同时要防止农民有机会做私人生意而放松集体的责任而复杂化。1957年8月，私营市场实际上已经关闭，农民无法购买到许多必要的消费用品。尽管1961年在更不利的情况下，政府冒着损害集体经济的风险重新开放私有市场，但在1957年它还不愿冒这样的风险。1957年的工作是把正式的国营商业机构推广到农村。政府本身开放了一些市场，特别是三类物资（不列入国家计划的物资）的市场，但这些在规模、数量上有必要的限制。^⑦ 国营

① 肯尼斯·R·沃克：《中国农业的计划》，（Kenneth R. Walker, *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5）。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16、19日。

④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18日。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6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5日。

⑦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商业机构主要关心的不是消费品的供应，而是“生产工具”。省政府的商业分支机构派出了一万多名金融和贸易方面的干部到农村了解情况，确定当地的需求，促进物资通过政府的渠道供应给合作社。^①在公社化之前，供销合作社没有正式从属于普通的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协调得很好。因而这一万多名商业干部的中心任务是安排供销合作社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像化肥这类生产所需物资的供应。^②显然，1961年重新开放私人市场和农村手工业产品市场，是因为农村的商业太复杂、太小、太分散，很难通过正规的商业机构管理，但1957年秋却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这年冬天支援农业的工作被认为是成功的，并且激起了北京、广州的新希望。到1958年2月，已经很清楚，田地里的产出比1957年同期的要好得多。这一成功不仅鼓励了农业，而且为工业的扩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冬季合理的工作非常成功，却培养了日益增加的乐观主义，致使计划远离合理性。

发动：1958年初

“大跃进”就像滚雪球一样以加速度发展。在1966年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广东省委领导被指责在“大跃进”期间抵制北京的命令指示。无论他们在私下怎么评论，也不管他们在党内所做的一切是否拖了后腿，广州的领导人确实对来自北京每一轮雄心勃勃的计划都相应地发动新的宣传，对保守主义进行新批判，制订更高的计划，进行群众动员。

广东省党代会两周之后，对生产目标进行了第一次重要的上调。1957年12月21日广东省委完成了对三十六条的最后一次修改，形成《广东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并于1958年1月初发表。10月份的计划要求一年内生产增加6.6%，^③但12月份的新的十二年方案要求从1955

①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1月9、11日。

③ 《南方日报》1957年10月25日。

年至1962年每年平均增长8%。要求从1955年的平均亩产400斤提高到1962年的700斤，1967年提高到900斤。随着这些粮食产量的增加，用于工业生产的作物播种面积将从700万亩增加到2600万亩。^①这是一个有雄心的计划，但和三周之后1月份会议上所宣布的计划相比，还算是温和的。1958年1月28日发表的修改后的计划，不是要求到1962年提高到亩产700斤，而是到1958年亩产800斤，^②不是从1955年起每年增长8%，而是每年增长26%，许多县被要求在1958年或1959年亩产达到1000斤。^③

广东的工业计划刚开始时较为谨慎，以至于触犯了一些心怀希望的广州干部。1957年12月宣布的是，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手工业产品、化工、造纸、纺织、电解，甚至是钢铁都会有所发展，^④但在五年到十年内，“农业发展仍然是主要的政策”。^⑤虽然工会鼓励当地工人在12月份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上发挥其影响，但加快工业计划的步伐直到1958年1月27日才第一次有些头绪，当时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文件：《关注全省工业生产高潮的迅速兴起，为工业的“大跃进”而奋斗》。在这份文件中，省委宣布：“广东农业生产的高潮已经到来”，“工业生产也要大跃进”。

党最爱用的激励农民加强生产的方法是鼓励他们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而通常激励工人的方法则是鼓励他们要赶上农村的发展。在关于工业的新公告中，工业的目标增加非常之快，要在5年之内使工业产品总值与农产品总值相等。10月的党代会宣布广州的工业对全省的发展非常关键，1958年的工业生产要比1957年增加5.8%。1月份的计划会议上则宣布1958年应增长到12.4%，几天后，广州市委在讨论计划会议时，这一数字从12.4%上升到15%。^⑥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的工业投资约为4.2亿元。^⑦但根据新计划，单1958年一年就要投资2亿

① 《南方日报》1958年1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7年1月28日。

③ 同上。

④ 《人民手册》（1957年），第15—16页。

⑤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7日。

⑥ 《南方日报》1957年1月28日；《广州日报》1957年1月30日。

⑦ 《南方日报》1958年1月1日。

元，其中1.1亿元投资于广州市。^①

2月初，广州长期以来被否决的梦想突然之间得到批准：“广州将在五年内成为一座工业城市。”2月初，在宣传这一新口号时，广州市副市长焦林义宣布1958年的工业生产已不是10天前宣布的增加15%，而是33.2%，五年之内，广州的工业生产翻一倍。^②2月中旬，提出了“苦战三年”的口号，用广东工农业变迁的动人前景来动员工人和农民。各领域召开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开始制订计划来实现这些更加有雄心壮志的目标。^③3月7日，广州市人大开会讨论这些雄心勃勃的新计划。^④

在从1月中旬到3月中旬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整顿运动非常成功。在来自上层的紧张政治压力下，当地的干部同意接受这些远超出他们能力的指标。随着雄心不断迅速膨胀，计划的修改已赶不上定额的修改。新的指标已不再是现实的目标，而是用来动员群众作更大努力的象征和形象宣传。2月9日，计划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广东的工业生产增加一倍，^⑤1周之后提高到三倍，^⑥三周多之后提高到四倍。^⑦1月底制订1958年的工业投资计划是2亿元，在几周激烈的反对浪费的整顿运动之后，宣布1958年的工业投资将达到2.67亿元。^⑧根据官方的全省统计，当时广东的工业总产值大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6%，^⑨1月底计划在5年之内使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⑩但一个月后又宣布要达到60%^⑪，到4月中旬，50%的数字不是在5年，而是在1年之内完成。^⑫

虽然雄心过了头，不过这些计划还是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合理性，但

① 《南方日报》1958年1月30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2月8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7、28日，3月2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日。

⑤ 《南方日报》1958年2月2日。

⑥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6日。

⑦ 《南方日报》1958年3月8日。

⑧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7日。

⑨ 新华社（1958年2月28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26:24。

⑩ 《南方日报》1958年1月28日。

⑪ 新华社（1958年2月28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26:14。

⑫ 《南方日报》1958年4月22日。

它是办公室中产生的主观逻辑，脱离生产第一线的实际情况。管理开支计划降低10%，于是干部和士兵就像朝鲜战争时一样都要捐款，而这次是为化肥厂捐款。每个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都要增加其“公共资金”^①以用于投资。一份指示中命令：“各地要从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从农业合作社的投资、干部的捐款、当地政府财政部门的收入、当地华侨的投资等渠道筹资。”^②

为了扭转城镇中工业的颓势，满足农村的需求，地方各乡镇要发展自己的小型工厂以生产必要的化肥和农具，建立过剩土特产品的加工厂。^③例如，广东省委的模范县番禺县的一个模范乡成立了机器修理厂、小型水泥厂、化肥厂、小型发电厂、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和建筑材料厂。^④全省成立了4家主要的钢厂和近130家钢铁加工厂^⑤，100多个县中几乎每个县一家厂。这次调整巩固之后，每个乡平均约5000人，每个县平均30多万人，这对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对于1958年的中国来说，事实证明这是个乌托邦。

大型的国营企业为他们各自领域内成立的小企业提供指导和帮助。那些在自己的地区发展工厂的农村居民被选送到广州和其他地方更先进的工厂去为他们当地的工厂取经，而广州人又被送到北京、上海、天津。例如，5月初，广东农村地区的近500名“先进工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广州参观相应的工厂，为其家乡创办援助农业的小型工厂取经学习。^⑥

对新技术最有接受能力的年轻人被组织起来给予特别的技术培训，^⑦科学家也被组织起来帮助当地的技术员。^⑧4月份，连每天的报纸上都刊登一些简单的机器如车辆、犁及其他一些农具的图样，供“当地技术员”制造新机器参考使用。

①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5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7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3月30日。

④ 同上。

⑤ 《南方日报》1958年5月14日。

⑥ 《南方日报》1958年5月8日。

⑦ 《南方日报》1958年4月6日。

⑧ 《南方日报》1958年4月16日。

根据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派”的观点，1956—1957年的大多数困难都可归因于领导软弱无力，党和政府的干部应该加强生产前线的领导。在较少变化的时代，管理更多是日常事务，一般的政府官僚程序可以处理大多数事务。但急骤的变化则要求有更多的决定，只有党才有权作出这些决定，因而党的干部要更多地涉及生产前线的日常事务。例如，所有的省级干部一年要用4个月的时间去关心工业、矿业和交通，低层的干部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生产。^①这几年中使用的“又红又专”口号表达着多种不同的含义，但在1958年，它是强调干部要迅速掌握专业知识。^②当时的口号是“一两年内成为专家，三五年内成为内行，五至十年内当工程师（也就是最有技术的技术员）”^③。技术干部和政治干部一起下放。例如，水利工程师要求在农村蹲点三年，也就是毛泽东所号召的“苦战三年”的时间。^④

许多情况下，农村合作社不能吸收所有新来的干部，合作社社员常常不如大量来建议指导他们的外来干部热情。为了帮助生产前线吸收这些干部，国营农场的数量和规模大大扩展。1958年1月6日国务院颁布的新土地法为征收农村土地用于建立这些示范国营农场铺平了道路。^⑤国营农场和农村集体相反，工人们有固定的国家工资。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更为现代的技术，分配到这里的干部通常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这些国营农场大体上是作为农业的试验田和农业、农村手工业、工业及其他新技术发展的示范点。附近合作社的农民被领进来参观接受启发和新技术。

虽然“全民皆兵”运动直到1958年夏末才开始，但今年春天台湾（海峡）危机和军事示范已被广泛用作鼓舞人心的动力。正如一道指示中所说的：“所有的计划都是战斗计划。正如过去我们和敌人作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和大自然作战。”^⑥政府的商业机构和企业被告知，他们是为生产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后勤服务”部门。商店要向忙碌的工厂运输

①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3月3、8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5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6日。

⑤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694:1-12。

⑥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7日。

物资，要延长营业时间去方便工作得很晚的生产者，车辆、摊点要更靠近工人，商业企业要在淡季派出过剩的工人为生产前线服务。^①

每个政府机关部门的工作都重新定位到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服务。每个乡镇都成立一所中学，为生产培训技术人员。^② 教育机构要破除迷信、为普及、推广科学与技术做准备。^③ 政府的财政部门要削减开支、出售地方公债，为生产筹集更多的资金。^④ 公安部门要防止对工业设施的破坏，加强生产纪律。^⑤

宣传媒体也要支持生产，对领导参加生产的示范作用进行宣传。作为其全国性动员的一部分，毛主席两次亲自巡视广州。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访问广州郊区农村，并在视察一块试验田时照相留影。^⑥ 4月份，另一个由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陆定一率领的高层官员代表团来广州参加农具展览。^⑦ 进步的景象可以用来动员群众更加努力工作。例如，作为农村“车辆化”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在3月份几乎每天都刊登制造手推车的蓝图和拥有手推车的生活报道。有史以来，农民们一直是肩挑背扛运送货物，但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使用手推车。这一方案引发了极大的热情。但因为农民被分派去修建供手推车使用的、连接省内每一个乡镇的新路^⑧，他们的热情也有所下降。

初春农业生产前线在水利工程完成之后首先是动员群众深耕，然后是广积肥料。像河南省作为全国的劳动密集型工程的样板地区一样，人口密集的地处韩江口的汕头专区成为广东劳动密集型工程的样板。^⑨ 虽然农业中需要更广泛地利用劳动力，但农业中还是释放出更多的人去从事建筑业和工业。到3月底，广东已经发起355个建设项目，并计划新开工400家中小型工厂。最大的投资投入是通过增加建筑材料、煤炭、冶

① 《南方日报》1958年4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4月22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3月14日。

④ 《南方日报》1958年5月29日。

⑤ 《南方日报》1958年3月3日。

⑥ 《南方日报》1958年5月12、29日。

⑦ 《南方日报》1958年5月4日。

⑧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7日。

⑨ 《南方日报》1958年3月19日。

金、发电厂、化肥，来提高工农业生产的基本能力。^① 7月初，广州的第一家现代化钢厂投产运营。^② 各水电站在春季已经开工。^③ 广东西部的茂名附近在开始开采石油，一条先连接广州，再到湛江的铁路也建了起来。^④

早在1958年3月，已经有大量的指标显示经济平衡正被打乱。物资供应短缺，质量达不到标准。连官方的报纸也承认经济的不平衡，但解释说，前进的道路就在于不断地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有许多迹象显示，许多人怀疑夸张的发展宣言。人民被说成是“落后于工农业的发展”，^⑤ 但如果“人民”落后了，那么可能要问问谁才是先进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图景太过超前，走在了人民和现实的前头。

陶铸清楚三年奋斗的想法直接源于毛主席本人。^⑥ 毛主席的决定依据于一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现实基础。到1957年冬，广州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人们也积极响应满是空想的呼吁。但这些空想太夸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自身比任何批评“大跃进”的外国“评论家”都要清楚。他们谈到主观主义的危险，谈到要“紧扣现实”。那些熟悉、了解共产党工作的人提到成功冲昏了头脑；那些熟悉西方文学的人谈到《堂吉珂德》，当时这本书刚刚悄然地以中文再版。然而，批评家没有力量制止空想家。

地方机会的负担

没有什么比宣布“五年之内广州将成为一座工业城市”更能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了。^⑦ 1958年3月初，市长朱光在广州市第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宣布：“广州人民……已经解决了在五年之内将广州建成社会主义

①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7日。

② 新华通讯社（1958年4月1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55:43-44。

③ 《南方日报》1958年7月2日。

④ 新华通讯社（1958年3月13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785:14。

⑤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6日。

⑥ 《南方日报》1958年2月16日。

⑦ 《南方日报》1958年2月9日。

工业生产城市的问题。”^①几天后，省长陈郁对省委领导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人民是真心拥护的。^②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地方具备了财政能力，使地方主义情绪第一次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释放。和新盛行的地方主义倾向相一致，重要的通告不是由陶铸这样的外地人，而是由陈郁、朱光这些广州人来宣布传达的。

在1958年7月初那个短暂的光荣时刻，地方干部对他们不能完成目标的担心几乎一扫而空。不平常的大丰收之后，广州第一家现代化的钢铁厂开工。5700多名“积极分子”参加了热烈的庆祝大会。省长陈郁、市长朱光、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登台分享喜悦激情。省长陈郁说：“一些同志说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现在我们打破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观点改变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也能做，那也能做。……广州发展工业，潜在的干劲是巨大的。”省长在总结中说：“同志们，广州是一座光荣的城市，广州的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民将把广州建成华南的现代工业城市。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加快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有着英雄的革命精神的广州人民必须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迅速行动起来，努力奋斗。”^③

但把广州建成工业基地的热情并不是广泛的。还有一些私人财产的旧资本家、能够获得海外资金的华侨，不可能像那些没有经济捐献压力的人那样富于热情。许多农民怀疑工业化只是另一个进一步剥削农村改善城市福利的口号。一些普通的城市工人抱怨说，他们不能吃机器。甚至那些亲眼看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公园、新礼堂和其他的市政建筑而分享喜悦的市民也不大为一些他们看不见，也理解不了的小工业项目激动兴奋。但领导人在指示要用“把广州建成工业基地”的口号来“激发广州各阶层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时，^④他们是有底气的。广州人虽有上述保留，但积极响应建设现代工业、现代交通的呼吁，并随时准备为此作出牺牲。

① 《南方日报》1958年3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3月12日，《广州日报》1958年3月13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7月2日。

④ 《广州日报》1959年7月6日。

地方的干部迅速行动起来执行新的理想计划。因为广东 1/3 的工业在广州市，^① 全省工作的重点也就集中在这里。3 月份有 9 400 万元拨款用于 1958 年度的广州建设，这个数字正好是 1957 年的两倍。在一家苧麻加工厂和提炼厂宣告建成时，一家大型钢厂和第二纺织厂正在建设之中。还有一家新的造纸厂、一家塑料厂和一家电解厂在筹建中，所有这些都要求在年内完成。^②

然而，所有这些发展的投资都是由地方来承担。当时主要的口号是“自力更生”，这和 1942 年共产党在延安遭到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后来苏联援助减少时一样。1957 年，广州地方征收上缴上级国库收入 24 900 万元，1958 年预算上缴 23 600 万元，连同上年留下的 800 万元，^③ 下降了约 2%。换句话说，广州对中央政府的负担实际上是一样的，而大量增加的地方投资则完全来源于地方。

广州不仅承担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承担着沉重的管理负担。1957 年末分散化的结果是省级的管理负担大大增加。1958 年 3 月随着新工厂陆续出现，省一级于是将约 54 个工厂下放给广州和各县来管理。^④ 不仅新增的工厂归地方管理，而且还要完成必要的物资、人员供应的任务，而要协调仓促形成的计划即使能做到也是十分艰难的。转调到工业系统中的干部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缺少现代化的设备，中央政府除了施加压力要求有更好的表现之外，并不能提供什么。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得不对那些“错误地认为”“广州缺少工业基础”的人的批判，为什么干部们必须号召对“右倾保守思想……广州落后论……需要依靠外来的援助及类似的悲观主义进行不断的批判”。^⑤

广州人迅速发展工业的梦想以前一直受到经济计划制订者的限制。但在 1958 年春，北京的领导允许地方的设想打破经济计划的束缚。这是广州和广州干部一直等待的机会，但它来得太突然了，没有充分的基础。设想变成了定额，希望变成了负担，当地的干部很快无望地为责任与现

① 《南方日报》1958 年 3 月 31 日。

② 《广州日报》1958 年 3 月 11 日。

③ 同上。

④ 《南方日报》1958 年 3 月 27 日。

⑤ 《南方日报》1958 年 7 月 2 日；《广州日报》1958 年 7 月 5 日。

实所围困，群众不久也发现他们的许多牺牲是徒然的。

现实主义的微光

从3月中旬到6月底这段时间曾出现过一段动荡，期间各级领导中较注重实际的人认真地作了一次尝试以使目标符合现实的可能性，但没有成功。虽然干部们害怕被戴上“右倾保守主义”的帽子，但早在3月22日，《南方日报》社论中告诫说：“我们一定要克服空谈和虚报的恶劣风气。”^①正如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强调集体化后的温和走向，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出现了重新调控动向的端倪。在5月份的党代会中，基本的口号如“大跃进”一再重复，但大会的通告中没有1958年前4个月中随便提出的夸大的承诺。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大跃进”的开始，但更准确地说，应把他的努力视为限制跃进，并使之正规化。“地方工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将会产生我们目前难以预料的许多新问题。……（这些企业）必须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对适当的劳动分工和协调要做出全面的计划安排。必须避免盲目的发展，或自由竞争式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真提高协调和平衡工作的水平……同时，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工业，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有必要坚决反对仅仅追求最新技术设备的倾向。”^②“各级领导必须将革命热情和办实事的精神结合起来。必须不仅能够提出指标，而且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保证指标的实现。一定不能耽于空谈和吹牛。我们提出的目标应该是通过艰苦努力能够达到的。不要轻易宣传或计划那些不能真正实现的，以免挫伤了群众的热情，使保守分子高兴。”^③

刘少奇在北京的讲话发表几天之后，文敏生代表广东省委的讲话反映了来自全国党代会上的新的觉醒。他清楚地说明狂热的发展进步报告是夸大了的。他在报告中指出：1月份广东的100多个县中有37个县产

^① 《南方日报》1958年3月22日。

^② 见罗伯特·鲍威和费正清：《共产党中国（1955—1959）：政策文献与分析》（*Communist China 1955 - 1959; Policy Document with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434）。

^③ 同上，p. 436.

量下降了，2月份是16个县，3月份是13个县。他认为下降是由于从正在进行的项目中分散了太多的技术人员和物资给失败的项目。他要求高层干部亲自去观察了解实际情况，不要接受地方干部乐观的报告。与此同时，在整个5月份，不仅没有动员大会，也没有其他任何类型的大会。他没有放弃使广州成为华南工业基地的目标，但他没有给出实现的日期。他的讲话中充满着提醒和告诫：工业还必须附属于农业；人民的生活不应该忽视；地方上应该认真计算手头上的资金，不要指望上级单位给予资金、人员和设备；资金支出只应从目前的运营经费中开支，投入资本的资金在程序上决不能和日常运作的资金相抵触；因为新机器设备很少，旧的机器设备必须维修；培训技术员的计划应该根据现有的机器设备状况来制订。而这一年较早时期风行一时的狂热目标，文敏生甚至连提也没提。^①

在五六月份短暂的缓行时期，毛泽东主义的任何口号都没有被丢弃，“大跃进”继续进行。群众仍然需要动员，一切事情都要“多、快、好、省”。然而，在这一短暂时期内，那些最狂热的目标受到质疑。干部们鼓励当地人公开讨论困难，^②在这40天内，他们去农村调查实际情况，缩小计划与现实之间差距。^③但最后，国家及地方上较为温和的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新的动向脱离现实的程度，使1958年初夸大的目标看起来也像犯了右倾保守主义错误一样。

乌托邦的尝试：公社，1958年秋

1958年8月，由于可能爆发对台湾的战争，钢铁生产的干劲提高到了狂热的程度。苏联人曾试图在台湾海峡上遏制中国，其标志是赫鲁晓夫和马林洛夫斯基于7月末突然到访北京。广州和其他城市几乎马上发起群众大炼钢铁运动。为了生产较大型的机器，小手工业合作社被合并在一起。新的钢厂成立，大型钢厂向其派出技术顾问。零碎的废金属被

① 《南方日报》1958年5月14日。

② 《南方日报》1958年5月16日。

③ 《南方日报》1958年5月29日。

收集到一起进行熔化，劣质煤炭、木材用来生火。在广州，成千上万的人被动员，用业余时间炼钢。县城里急急忙忙竖起了许多炼钢炉，并要求农村派出强壮的劳力来炼钢。^①

虽然大炼钢铁运动使许多人精疲力竭，扰乱了手工业，无用的废钢浪费了原材料，但另一措施——从农业中抽调人工去大炼钢铁——引起的混乱要大得多。由于土地开垦和其他新的项目工程，这年春天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很严重，随着在秋天大炼钢铁的大规模展开，必须有大量新的劳力资源供给。8月，劳动力短缺更为严重，北京的领导人为了给他们的理想方案注入活力，开始开发两大未用的劳力资源：学生和妇女。

9月1日，陆定一在这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学生劳动的新方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这一用来号召支持运动的原则并不新鲜，新鲜的是缩短课堂教学时间，^②系统引进所有年级学生进行体力劳动的方案。虽然宣传的是劳动的道德价值，但强调的是生产劳动，所有的学生一周之内都要进行许多小时的生产劳动。小学生帮助进行教室内日常的清洁及其他工作，这实际上取消了对维护与服务人员的需求。年纪稍大一点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每周要用几小时在一些小单位制作纸板盒、纸袋、小工具之类的东西，或是帮忙做农杂活。更大的学生一周要用几个小时做正规成年人的劳动。虽说安排的工作尽可能和学生的特点相适应，但许多学生被要求帮助农业生产，特别是在农忙季节。

除了学生，妇女显然是最大的潜在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妇女大多数是忙于整理家庭杂务，这年春末，在河南的郑州和四川的成都，家庭妇女被组织进小型作坊工厂，还有一小部分人负责照看孩子、病人、老年人以及做饭。在短时间内，似乎这样的城市公社的景象将在全中国推广，但可能是由于党内有权力的领导人因担心会扰乱城市经济而提出反对意见，动员城市妇女的运动在其普及到广州和全国大部分地方之前突然停止了。

在农村，让家庭妇女进行生产劳动的想法在河南已经非常彻底地试行了。河南的干旱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抗旱），1957—1958年冬，为了

^① 《南方日报》1958年8月20、24、26日，9月12日，10月9日。

^② 《光明日报》1958年9月17日。

使强壮的妇女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兴修水利工程，工地上搭起了临时的集体食堂。女孩和老年妇女照看孩子、病人和老人，让年轻的妈妈们得以出去工作。为了协调大的工程，提供后勤支持，成立了比合作社大得多的新组织单位。第一次关于河南模式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的公布出自下面的一则1958年8月初毛主席视察河南的报道：

8月6日，毛主席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公社由几个农业合作社合并组成。这是遵照毛主席工、农、商、学、兵应逐步组成大公社，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转过身来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景象。如果全省都像这样，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吴书记说：“只要有了一个，肯定就会有很多。”毛主席表示同意。^①

遵照这篇8月11日的报道，8月17日至30日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省委书记扩大会议。8月29日，政治局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人民公社的基本规定。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著名的社论《人民公社万岁》，很快各地都成立了公社。

即使是“大跃进”最狂热的理想——公社，也还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的，这种逻辑不仅仅是紧急组织人力进行工业生产。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相对落后，1958年初发动的劳动密集型工程项目对技术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就大多数工程而言，关键性的因素不是技术，而是简单的劳动。虽然在广州地区和中国东南部其他地方，传统上也有妇女在田间劳作，但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妇女很少在田间劳动。即使在广州地区也还有余地扩大她们生产劳动的作用，从而让更多的男人去进行工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规模太小，难以开展大型的水利工程或是建立工厂，急需像公社这样更大的新组织单位。

由于合作社（指农业生产者的合作社）不能很好地协调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工业及学校的关系，因而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合

^① 新华通讯社（1958年8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833:1-3。

并到一起进行统一的管理。1956年以来的工资预算已经太多了，1958年要求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很大，资本又非常有限，因此不可能通过工资刺激来充分激励新工人。大量、迅速提高生产力只能依靠非物质刺激，由台湾海峡危机所引发的爱国主义大大加强了这种刺激的力量。由于每个食堂都有自己的土地生产以前由私人自留地生产的蔬菜和其他副食品，因此政府可以消灭常常干扰集体任务完成的私人自留地，这样，农民们除了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之外别无选择。由于许多家庭中没有体格强壮的男人，他们家庭的食物由集体食堂供给。

食堂供应食品，保育员看护孩子，“幸福之家”照顾老人，在群众面前所展现的公社好像是提高改善他们福利的机构。随着集体生活角色的扩展和集体单位规模的扩大，以及以需求为基础供应的物资比例的增加，运动形成一个在理论上相连贯的图景，它可以被宣传为迈向共产主义的进步，这一主题还在积极唤起群众对乌托邦的憧憬。并且，这年夏季的大丰收使食堂可以在刚开张时有充足的分配，因而使高层的干部可以描绘公社的好处，满足了群众的福利。

然而，这样的逻辑是满怀希望的梦想家试图将梦想强加于不易操控的现实的逻辑。它设想群众自愿在精神刺激的基础上从事长时间持续的艰苦劳动；它设想人们会自愿艰苦工作，甚至向上级集体交出自己的私人工具、锅碗瓢盆、桌子、椅子；它设想只要消除了奖励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并大大减少劳动分工，工作就可以完成；^① 它设想热情比实事求是更重要，地方动员比计划或协调更重要；它还设想即使从农业生产中抽调走了许多体格强壮的男人，农业产量仍然能保持。

广州干部的反应是希望和疑虑的混合。大多数人热烈地相信这种迅速的进步真实存在，一些人无疑为这一梦幻所陶醉。另外一些不太乐观的人，认识到宣传脱离了实际，简单地重复着后来被形容为“大空话”之类的东西，但仍然希望比以前进步更大。还有一些人，正如陶铸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在造假数字。一些干部在制造灌注希望而毫无意义的计算。例如，在样板县番禺，通过计算利用食堂每个家庭每天可以节

^①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7日。

约3小时的劳动时间，每天总共可以节约21 960小时，因而可以让1.2万人在金属加工厂搞建设、修理机器、积肥和从事其他项目工程。^①另外一些干部，简单地用“千”、“万”位数来形容数量之大，而毫无说谎造假之感。一些干部担心梦幻最后会破灭，但他们最担心的是要为自己的单位没有完成定额负上责任。但不管有什么样的疑虑、担心，大多数干部都十分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命令，即使不是真心实意，至少表面上如此。

和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的公社运动体现了传统的节日气氛和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节日的特征反映于大规模的集会、庆祝、游行及音乐。例如，广州郊区的一个公社宣布不仅给公社社员及专门的来访者提供食物及茶水，连顺路到访的人也可受惠。^②

9月7日，美国与中国同意会谈，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已经避免了，^③但9月7日后却对战争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宣传，其中包括像“让美国滚出台湾”这样刺眼的标题，这与公社成立准确配合。战斗的精神超出了军队与民兵的战备，军事化的意象弥漫于整个公社化运动。土地上的大军投入到生产战斗之中，商业战线的工人支持前线的生产，许多公社中，军事组织的称谓，如师、营、连，取代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红旗》杂志的社论中对军事化意象的理论根据说得非常明确：“军事化的目的是让人们劳动时有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④当时，号召人们的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军事化，集体化，战斗化和纪律化。”当时所有服务于公社化运动的宣传媒体诸如报纸、短剧、广播、大会、小会之中，高音喇叭最有特色，它不断地向工地上的劳动大军播放指示和军队音乐。

1958年春，要开展向合作社引进新技术的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乡政府之间显然需要更多的协调。1958年3月，广东北部韶关市郊区的樟市的几个合作社和乡政府合并组成“乡联社”，并成立了“生产管理委员会”，一切都在乡党委的领导之下。联社

① 《上游》第3期，见《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

② 新华通讯社（1958年12月23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927:21。

③ 哈罗德·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主义中国》（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6）。

④ 《红旗》1958年第7期，第15页。

第一次在地方的农村地区实行政府和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1958年7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在广东召开的金融干部大会，“樟市联社”在大会上被推举为效仿学习的样板。后来，追溯到3月份“联社”的发端，樟市被宣传为广东的第一个公社。^①

因而，早在这年秋天公社化运动开始之前，某种形式的经济管理和地方农村政府的合并已经在酝酿。然而，它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更大规模地进行群众动员、让劳动力去进行工业生产，直到8月份才出现。9月初，广东的运动着力开始的时候，10万多名干部被迅速组织进培训班学习，以便让他们在组织公社的过程中担任领导，^②几周之内，几万名干部被派到广东各地农村。^③

组织工作涉及建立公社、选拔安排人员、制订新的生产安排、动员群众、成立食堂、安排照看孩子，所有这一切都要在几周之内完成，工作量怎么说都是惊人的。外人或许不知道番禺县（人口276 358人）组成一个单独的公社，^④字面上是遵照执行，实质上是抵制北京组成大公社的命令，但至少它是一种处理组织复杂事务的方法。省级官员很快在番禺公社开展新的项目，然后组织省内其他地方来效仿学习。

几天之内，实际上番禺公社的所有农民都被动员签名要求成立公社。他们的要求得到批准，接着在歌声与口号声中庆祝，并迅速宣布光荣的计划。1959年，每个成年人计划生产12 000斤粮食，消费1 000斤粮食（几乎是常年的两倍）、15斤油、20斤糖、60斤肉、360斤蔬菜、100斤水果。除了给所有人供应粮食之外，每人每年有15元的工资，每7—10天每人都能观看一场电影。拖拉机将逐渐取代体力劳动。在这种种兴奋之中，农民们被动员自愿交出他们的私人自留地，交钱帮助购买拖拉机。^⑤

全国性的运动发起后一个月之内，干部们分散到省内各地组织公社。

① 《香港文汇报》1959年1月13日。

② 新华通讯社（广州，1958年9月1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860:37 - 38。

③ 《人民公社问题解答》（广州，1958年10月）。

④ 《上游》第3期，见《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

⑤ 同上。

每个县随即组织一个示范公社作为县内其他地方的样板。^①到11月初，广东运动开始仅两个月后，报告称98.5%的农民成为790个公社中的社员，这些公社由公社化运动前夕既存的25450个合作社组成。^②经过重新组织，一年之后，宣布全省有1106个公社。^③省内每个县平均有10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大约有3万人。

所有公社都在各自的村庄建立了食堂。例如，在作为样板的番禺公社，人口有276358人，有738个食堂。^④平均每个食堂有375人吃饭。在东莞的虎门公社，陶铸形容它是个典型，这里人口有64767人，有258个食堂（平均每个食堂250人吃饭），还有132所小学。^⑤1958年末，宣布广东农村有20万个食堂，^⑥平均每个公社有20个食堂，每个食堂约有150人吃饭。

刚开始，公社规模一般有以前的区那么大，虽然有一些区被分为两个公社。公社下面一层称为大队或是（在公社的初期）农作物管理区，其一般的规模是新巩固的高级社那么大（1955年的乡一半大小），虽然也有一些高级社进一步加强成为大队（见附录B表12），公社和大队的建立，其效果是不仅加强了县级以下的管理，而且，第一次使县级以下的政府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因而，公社所在地较大的市镇中集中了合作社中选拔的比较能干的干部，以前的区、乡的干部，以及县和专区派下来的干部。公社不仅合并了党和政府的干部，而且还合并了经济管理人员、教师及公共卫生官员，成了各技术部门下派上级干部来改造农村的新总部。像县或市一样，公社有单独的党和行政管理的等级体系，党的干部在公社的行政管理中兼职。这一新的多目的结构一直保持到乌托邦动员运动结束之后，它为省级官员在农村开展运动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

公社以下的次一级机构在名称和规模上差异很大。军事称谓逐步让

① 《南方日报》1959年9月15日。

② 《香港文汇报》1958年11月8日。

③ 《香港文汇报》1959年10月2日。

④ 《上游》第3期，见《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

⑤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日。

⑥ 《香港文汇报》1958年11月11日。

位于标准的民事称谓。有时大公社之下有三层组织：大队、中队和小队。到1961年末，大队通常被称为生产大队，而小队通常被称为生产队。有时，农作物管理区处于大队之上；有时生产队被进一步分成四组，有时是小组或工作组。但通常公社之下主要只有两层：大队和生产队。虽然根据当地社区规模的大小和生产任务的不同会有所改变和调整，但大体上，初级社对应于新的生产队，强化后的高级社对应于新的大队（见附图B表12）。不管名称如何，也不管公社内部有多少层，乡村公社化的结果是把决定权和所有权递交到更高一层。公社一层的干部决定种植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及如何种植。他们分配并出租牲畜、机器给基层去执行计划。

虽然关于生产的决定由公社总部的生产管理委员会作出安排，但生产队通常是实际的生产单位，并负责管理食堂。生产队在组织安排其食堂的自留地（相对于以前的私人自留地）为食堂生产农副产品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生产队还安排照看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的孩子。生产队通常要派出一定量的男性劳力从事公社的工业生产，或是较大的建设工程项目。虽然有指示要求建立老人院，但很少有生产队或公社这样做。公社成立之后，全省范围内只有1550家这样的老人院，容纳了4.4万名老年人，^①这只是老年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

大多数生产队利用当地的一座寺庙，或是其他的公共建筑物来作食堂。如果有必要，还会用一个较大家庭作食堂。由最基层党的组织单位安排任命几个相当值得信任的人充当炊事人员。公社分配一部分夏收粮食给生产队的食堂，其效果是粮食平均分配给公社内所有村庄（或生产队）。生产队通过食堂自留地生产供应蔬菜，偶尔也有通过生产队自己饲养家畜或鱼来供应的鱼、肉。生产队办的保育学校通常只有最基本的功能，由生产队的几名年纪大的妇女在妈妈们生产劳动时照看她们的小孩子。

男人前所未有地被大量调到县城的炼钢炉、公社所在地的新建或新扩建的工厂去工作，或是去开垦土地、兴修灌溉工程。^②虎门公社人口约

^① 《香港大公报》1958年11月8日。

^② 《南方日报》1959年1月14、21日，2月26日。

6万人，约有700名男性工人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去进行工业生产。^①一般来说，这些人由公社将其组织成工作队，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在工地上生活时的定额口粮和零花钱。这些工程由于是仓促组织起来的，有相当大的资本和人力的浪费。大批的苦力搬运成吨的肥料、泥土或水泥。而堤坝不一定有蓄水，开垦的土地即使确实值得播种，也不一定得到播种。

同时妇女和孩子填补了生产队中男人离开后的空缺。事实上尽管男人离开了，生产队仍然被指令进行密植、深耕、积肥。家庭并没有像一些反共产主义者所指控的那样被废除，但的确许多父亲暂时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妇女们更少有时间和她们的孩子在一起。在生产队这一层，基本的生产劳动组织不一定要有太大的变化。在初级社时期，同样的家庭一起劳动，在公社之下，作为生产队的一部分，他们仍在同样的田地上一起劳动。变化最大的是各地虽然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还是被往上抽调，而使当地的工作强度加大。

分配制度比当地的劳动制度发生了更为根本的变化，因为工分不再是分配粮食收成的主要依据。1958年秋，地方上还不清楚将来的粮食收成如何分配，因为来自北京关于迈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声明自相矛盾。如果中国更接近共产主义，那么农民们应该按需分配粮食，但如果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们则应该按劳分配粮食。1958年冬，一般的方案要求分配的部分，通常是30%按劳分配，其余的按需供应，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案，任何一个农民都注意到公社的精神是强调非物质刺激，食堂的供应制和不够严谨的劳动记录使他们明白，更努力地工作也不会比不太卖力的同志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

村民们不仅必须放弃私人的自留地，抽调一定量的强壮男人去其他地方工作，而且还必须放弃所有的个人财产。零碎的金属，包括窗子上的金属及其他的家庭物品都被拿走，以帮助制造新机器。私人的家畜，包括猪、家禽都上交给生产队。为了给食堂提供设施，保证人们没有机会自己做饭，家庭必须放弃其厨房的容器、银器、盘子和桌椅。和以前一样，这一运动对较为富裕的农民不利，他们抱怨说：“这是没收政

^①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6日。

策……就像没收属于地主的财产一样。”^①

公社的动员比以前任何一次乡村的重组更严重地打乱了乡村生活的节奏。合作社分配土地和大农具，改变了当地生产劳动组织的本质，而公社渗入个人的生活，不仅许多家庭中亲人离开了家，而且实际上留下来的人也没有时间来展开他们的私人生活。虽然乌托邦的梦幻理想和较早时期的构想没有多大的不同，但人们不再是通过侥幸、命运、继承，甚至是现代科学和计划而达到乌托邦，乌托邦的关键是体力劳动。领导人试图创造一种新的道德伦理，或者至少是一种新的兴奋点。整个家庭除了在食堂里短暂的两餐时间之外，不少人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地里。一些农民的劳动时间很长，就倒头睡在田地里，在那里过夜。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通过使用大量如此强度的体力劳动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不过，许多省级领导已经预感到他们做得太过火了。

应对最初的农村问题：整顿公社

成立公社的一大难题是合作社的领导对为公社整体的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进行抵触。陶铸形容说这一本位主义的问题非常严重，使公社有成为“空壳”的危险。^② 公社本来是用来克服合作社的分散主义的，但即使是公社中较为强硬的领导也难以劝说基层干部牺牲各自合作社的福利。^③

基本的问题来自拥有比较好的土地和管理的、较为富有的合作社的抵触。因为公社征用以前合作社的牲畜、土地和农用设备，并将其与大部分产品在全公社范围重新平均分配，结果缩小了合作社之间原本存在的相当大的经济差距。^④ 可以理解，那些辛勤劳动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合作社不愿意把他们最近两年的劳动成果分配给其他人。一些人杀掉家禽家畜吃肉，而不愿上交给公社。合作社的干部面对公社化就像富农面对合作化一样，但和富农不同的是，合作社的干部在党内能够有效地代表他

① 《南方日报》1959年10月17日，见《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

②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6日。

③ 《上游》第12期（1959年），见《人民公社万寿无疆》（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

④ 《南方日报》1958年10月25日，见《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

们的利益。公社的领导干部必须解决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哪些土地分给生产队用作食堂自留地，哪些牲畜、农具分给哪些生产队，哪些农具留给个人家庭。来自以前各个不同合作社的公社、大队的领导为他们单位的利益而争斗。在这些非常现实的经济利益之争中，合作社之间的仇视有时正巧为村庄、家族之间传统的敌对仇视所强化。从理论上讲，公社的干部可以通过提高较为贫困的生产队的生活水平，处理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抵触问题，^① 但比较富裕的合作社往往难免有所损失。

农民的士气是公社成功的关键，因为激励制度主要是基于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刺激。公社成立之初，公共粮仓开放供应大量免费的粮食给农民。许多农民充满惊奇，好像他们对生计的担心可以结束了，对那些小孩多并且父母年迈的家庭来说，感觉尤为真切，因为以前合作社的利益严格按照劳动贡献分配，使他们经济上遭受困难。

从一开始，农民们对交出自留地及个人财产焦虑不安，但也许农民们最持久的不满集中于食堂。农民讨厌必须在别人规定的时间去食堂吃不一定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他们抱怨缺少花样变化，食堂开办得没有效率。他们不满干部把饭菜拿回家吃，而他们自己则一定得去食堂。他们还抱怨说炊事人员盗用供应的食物，至少他们给自己的分量太多，这样的不满在食物稀缺的时候影响更大。即使本身并没有放任自己吃喝，炊事人员和在食堂吃饭的普通农民之间也可能产生紧张关系。

虽然事情很小，但这些都是日复一日的烦恼，对于农民来说意义重大。然而，到1958年末或1959年初，对食堂及口粮定额的减少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不满。虽然1958年是个少有的丰收好年成，但由于组织混乱引起秋季征收不足以及新开的食堂过度浪费粮食，口粮定额被迫减少。^②

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问题严重恶化。1958年粮食年产量估计是320亿斤，而1959年上半年估计只有90亿斤。^③ 种植工业用农作物的土地面积的增加，从农业生产中抽调走劳动力，没有适当的奖励，以及农

^① 《南方日报》1959年12月18日；《上游》第1期（1960年），见《人民公社万寿无疆》（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南方日报》1959年1月3日。

^③ 《南方日报》1959年11月10日。

民劳动的意愿逐步减退，都是导致出现1959年那种情况的原因。并且，为了供养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并为农村生产队抽调到水利工程、土地开垦工地上的工人提供额外充足的定额口粮，还进一步从农村拿走更多的粮食。不仅大米短缺，而且正如陶铸在1959年夏承认的那样：“我们没有密切注意副食品的生产。”^①

“大跃进”期间，已习惯于将粮食短缺的原因解释为“自然灾害”，而1959年的确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年成。省级干部已经注意到春播的成绩很差，因而浮夸式的农业成功的谈论在1959年2月突然中止了，但最糟的问题是夏季的洪水，且很可能是由于水利工程上的错误，而加剧了洪水的破坏作用，危机在5月份少有的暴雨和6月初前10天持续大雨之后才到来。6月23日，许多堤坝，特别是东江地区洪水泛滥，需要进行救援。在夏收最繁忙之时，省里在紧急动员的基础上救济灾民，整修堤坝，抽水抗洪。虽然很难对受损的程度作出单独的估算，但共产党所述20万间房屋受损，500万亩农田被毁的数据，^②应该不会偏离事实太远。

除了间接地提到地方干部的疏忽大意之外，广东的报纸没有报道饥荒引起的死亡，但从对广东某些山区的逃亡者持续不断的报道中，可以清楚地获悉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有一些人死于营养不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谴责陶铸时指出在1959—1960年间仅广东西北的一个贫困县就饿死了两万人。^③甚至官方的媒体也承认一些地区物资严重匮乏，1959—1960年在广东的许多地方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如浮肿非常严重。虽然在广州从事生产劳动的成人平均定额口粮一个月超过30斤，但在开平县等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成年人每个月只有15斤或是更少。^④高层的干部很难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因为许多干部在完成定额的压力之下捏造生产数字，为了其捏造不被发现而减少地方的口粮定额。

干部的命令主义是农民不满的另一个焦点。干部们拿走了农民的东西，坚持让农民在食堂吃饭。他们向上级负责，监督农民长时间地劳动，

① 《香港文汇报》1959年10月2日。

②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043;15, 2044;9-11, 2045;18, 2047;1-7, 2049;5-6; 《香港文汇报》1959年10月2日。

③ 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578.

④ 《南方日报》1959年9月18日。

监督老年妇女照看其他人的孩子、年轻的妇女在田地里劳动、年轻的男人在建设工地上，监督所有的农活要按照新的规定来做，而不顾及传统模式和强壮男丁不足的情况。干部们不能用物质刺激来完成这些目标，随着长时间的体力劳作、低定额口粮、缺少自由时间，农民最初的热情很快消失。命令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当农村干部处于不断增加的更高定额压力和农民在没有物质回报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拒绝作出牺牲的两难境地时，命令主义变得更加严重。

农民们很容易表现出他们个人对于上级压力的不满。虽然不可能说清有多少干部由于担心受到袭击而不敢夜晚单独出门，但干部担心害怕的故事是当时口头传说的一部分。同时，当地的干部担心完不成定额或是发现他们捏造报告，上级会惩罚他们。随着信念的逐步削弱，一些干部任意剥夺生产队、大队或公社的资金或粮食供应，这进一步加剧了对他们的批评责难。^①

随着短缺局面的形成及干部们为了完成定额而变得更加命令主义，农民士气急剧下降。到1959年春，不仅定额口粮减少，而且辛勤劳动的农民得到的口粮并不比其懒散的邻居多，生产得多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得到的也不比生产少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得到的多。即使是生产大队理应对那些生产劳动多的人给予更多的奖励，而公社常常没有足够的资金使大队可能这样做。很少有农民愿意尽力劳动，或是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红薯地里劳动的农民藏起他们夜里挖到的红薯；在果园里劳动的农民吃掉他们捡到的果实；在普通的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把农产品递给孩子，让他们跑着拿回家里。不必说，公共的收成受到影响，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城市地区粮食短缺。

对于公社的失败有许多解释，其中大多数是很有几分道理的：运动太仓促了，没有充分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的；上级设定不现实的目标，强迫干部走捷径，一些干部对来自上面的压力反应过度。也许最根本的问题是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改变自然和人类的能力。只适合于较冷气候的新种子播了下土；土地深翻密植而土壤的肥力不足；开垦

^①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6日。

土地，而时间、精力、肥料、灌溉所付的代价得不偿失；党的干部作出决定而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农民们被迫劳动，超出了他们所能忍耐的限度。

一家全国性的杂志刊登出一个破坏自然影响土气的例子，这个例子绝非极端或罕有事件：在一个地方要挖 300 至 500 个坑，在其中装满粪便，准备用作肥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生产劳动，挖了 1 万个左右这样的坑。春雨来了，所有的坑里都积满了水。人们对于把积水从坑里抽出来的工作毫不关心，更没多少兴致把粪肥投入其中。”^① 毛泽东主义者也意识到有问题和混乱，但他们认为艰苦努力得来的进步比这些问题更重要。实际上，他们错了。

在一开始，广州的许多高层干部和北京的一些高层干部一样，试图设法防止过分狂热的夜以继日地工作、身体的过分紧张和设立不现实的目标。公社开始后的几个月中，地方的干部得到指示，允许农民每周休息一天，怀孕的妇女不要过度劳作，身体健康不应忽视。^② 地方干部听取意见，认为人力是有限的，不应耕种太大面积。^③ 然而，1958 年秋，来自上面的言论激起了地方上的热情，大多数地方干部至少参与了运动。

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中央委员反对过分的动员，早在 1958 年 10 月，他们就在北京开会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然而，直到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公社政策的修改才开始影响广州和其他地区。全会之后，这些修改通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农业部和党的农村工作部主办的工作会议传达出来。^④ 公社的决定是以毛泽东的名义传达下来的，而六中全会和 1 月份的农业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刘少奇对于农业政策发表了重要的讲话。^⑤ 1966 年 10 月 24 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公开宣布他曾反对武汉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还揭示出 1959 年 4 月，毛泽东为了反对武汉决议，曾向党委发出一封“指示信”。党的领导干部没有能力阻止毛泽东关于公社的最初过火

① 《中国青年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2120:2-4。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29 日。

③ 新华通讯社（1958 年 11 月 6 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893:22。

④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930:12-16, 1940:17-18, 1953:1-3。

⑤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1924:4-5。

行为，但在武汉，他们可以让乌托邦式的极端化做法温和一些。这些措施是一次短暂的运动，被称为“整顿公社”。

这次运动的精神体现于邓子恢在北京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中，“应该始终谦虚谨慎，避免浮夸的行为，以更真诚、更美好、更认真、更求实的态度做好更多的工作”^①。这与毛泽东后来强调要重视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迥然不同，党的工作会议发布的声明称，虽然要关注意识形态和生活条件，但“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建议干部们“发起迅速的努力，确保农作物管理区（生产队之上的管理单位的另一名称，有时与大队相当）和生产队保持一定量的人力继续进行生产”^②。1959年2月召开的广州市人大会议——林彪、叶剑英和北京的其他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还是喊“大跃进”的口号，但强调较多的是现实主义：告诉地方要集中精力于粮食生产，提倡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③

1958年秋，由于要作出许多决定，地方党组织倾向于取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遵照六中全会的指示，要求制止这种行为。公社党委要成立计划委员会，处理政策问题，而公社管理委员会则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否则，正如指示中所声称的那样，党会被压垮以致不能有效地执行工作。^④

六中全会还在开会时，广东已经开始执行新的政策。1958年12月3日陶铸还在武汉参加六中全会时，他忠实的副手赵紫阳召开了一次全省领导的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赵紫阳清楚地说明公社还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因此，物质的分配不是按需，而是按劳。赵紫阳批评那些人使农民劳作过度，使之精疲力竭，拿走农民的个人财产，为了应急的计划而忽视了正常的工作。他指示必须向人民保证他们的房屋、衣物、家具及个人的储蓄存款应归其私人所有，这一点在较早的通知中没有如此清楚地说明。他指示要允许每个人有8小时的睡眠和4小时的

①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930:12-16。

②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953:1-3。

③ 《南方日报》1959年3月1日。

④ 《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4日。

吃饭时间。虽然食堂没有完全取消，但着手改善其计划，提高其质量，使其置于当地生产队的管理之下的工作已经开展，以保证食堂更加符合生产队社员的需要和愿望。赵紫阳指示食堂必须提供热饭，必须种植足够的蔬菜和饲养足够用来消费的牲畜，公社一定不能拿走食堂自留用地里生产的农产品，食堂供应的食物应该认真计算，要高于最低的日常需求，食堂要保持清洁卫生。虽然所有的干部一定要在食堂吃饭，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农民可以拿他们的定额口粮回家吃。党的干部要帮助群众解决木材、柴炭、猪肉及副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①

广东干部甚至在六中全会结束之前就迅速执行更温和的政策，反映了一种对于消除公社化初级阶段某些极端行为的热望。当时，所有的公社和大多数大队都有了电话，因而通讯比早几年要便捷得多。^②然而，不管他们想向正确的方向走多远，广东的干部都没有越出整顿公社的范畴。他们减轻了其中“过度热心的同志们”的极端化，使公社组织正规化，但他们没有努力消除它。

应对供应问题：统筹全局

城市中最初的问题并不是生产水平的下降，而是由于过于快速的工业扩展、压抑地方的积极性及失范的档案记录所导致的经济计划和供应网络的瓦解。而小手工业合作社和维修合作社合并成国营“工厂”产生了进一步的混乱。这些新“工厂”试图生产制造大型机器，但缺少必要的机械工具，使他们大体上只能手工作业，同时，他们又没有生产其他工厂所需要的手工产品。而招收成千上万的未经训练的市民进行钢铁生产的群众性工作，以及动员群众时轻视商业网络，都进一步加剧了混乱。结果，计划和供应的混乱给广州的经济干部一种对经济活动失控的感觉，而那些要对他们最终的成功负责的党的干部也关注到这种情况。

和农村的家庭不同，在“大跃进”的第一年，城市家庭的生活要舒

^① 《香港大公报》1958年12月6日。

^② 《北京人民邮电》（北京，1959年9月22日），第21页；到1959年9月广东所有的公社和90%的大队都通了电话，50个县可以和公社进行电话会议，88%的公社当天可以收到县里发出的文件。

服得多。可以肯定，那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的人有时确实累得筋疲力尽，但随着前所未有的资金量投放于建设和工业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兴旺，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958年，单单是广州就新增加了10万个工作职位，100多万人利用新的经济发展机会移居到广东的城区。^①年老的工人、妇女和以前失业的青年很快被吸收到新的工作中。1958年末和1959年初，那些有新增加收入的家庭，还可以得到“大跃进”期间已不再大量生产的许多消费用品。^②因而，许多城市居民已在享受他们所追求的新社会的成果。

由于工业、商业的复杂性，不适当的计划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比农业要大得多。几个月之内，许多工厂供应短缺，造成生产中断。一些生产不必要的产品的工厂自豪地宣称超额完成了定额，而消耗了原材料，而另外一些生产必要的产品的工厂却因为缺少同样的原材料而停产。一些新的“工厂”生产不达标的产品，却耗尽了本来可以由大型工厂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所需要的物资供应。由于对交通设施征收的税负过重，产品不一定能够运输到目的地。新的思路在未经充分检验或理解之前就采纳使用，正如赵紫阳所说的：“一些技术手段未经成功检测就盲目推广普及。”^③由于电力供应不充分，即使对消费电力作了限制，工厂也不得不受制于电力额度。生产额度的经常性变化、盲目努力增加产量，下级干部的欺骗、秘密囤积原材料或捏造生产数字，使之很难重建有序的供应网络。随着资金和供应物资的耗尽，投资减少，许多建设中的工程被放弃。^④

在完成1958年初定下的浮夸定额的压力下，干部们经常在未完成定额的情况下就报告已经完成任务。他们计划在下一个时间段努力工作，在上级发现错误之前，弥补短缺的部分。然而，1958年指标一直在不断增加，报告完成了额度的干部事实上在下一个时间段不可能弥补短缺的部分。各级干部都处于不断增加捏造数据直至被上级发现的恶性循环之

① 《南方日报》1959年9月18日。

② 《南方日报》1959年10月2日。

③ 《南方日报》1959年5月27日。

④ 《人民日报》1959年5月24日。

中。上级干部为发现忠诚下属的错误而不安，这些下属往往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指标。

在迅速的变化中，地方曾被寄望在1957年末获得新的权力之后能够协调自身的经济活动，但在各地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随着工业和交通的发展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让地方经济独立的尝试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想法。正如一篇社论中非常轻描淡写地所说的那样：“公社没必要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① 激进的分散化、档案记录的不全面以及精力分散于各方面，使全国的协调与计划处于灾难性的状态。在没有全面计划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的动员在游击队根据地地区可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中，其后果是破坏性的。

1959年2月，曾开展一轮全国性的新工作来重新恢复对计划机关的控制，这至少给地方的经济管理者以一线希望。这些努力在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之中表述得最清楚，它以“全国一盘棋”为标题发起这场运动。社论用最简单合理的措词来比喻问题：“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十个指头同时去捉十个蚤子，很可能他一个也捉不住。蚤子要一个一个地捉。工厂必须一个一个地建。”^②

高层的协调人员，尤其是北京管理经济的部级机关和广东省经济部门里的协调人员要负责保持物资供应、产品和人员的有序流动，满足全国和省内的需要。1959年初的一个短时间内，这些经济官员得以就认真仔细的档案记录、注重技术技巧和可靠的供应网络提出要求。比如，在农业方面，要求至少每个季度要有准确的生产计划。^③

1959年初人们的情绪和1958年9月份时有相当大的不同。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有两种重要的方法。……一种是建立新企业、扩建原有的企业，安装更多的生产设备……另外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种方法中，后者当然更为重要。”^④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在讨论提高劳动

① 《南方日报》1959年1月2日。

② 《人民日报》1959年2月24日。

③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1953: 1-3。

④ 《工人日报》1959年3月25日。

生产率的方法时说：“一种方法是提高人们的劳动热情……这要求形成一种让人们竭尽全力的精神……然而这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是有限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唯一根本的方法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①

遵照新的全国指示，广东的干部可以更直接地处理影响生产的问题。1959年3月7日《南方日报》的社论中说，广州1月份的生产令人不满意，2月份的生产仍然令人不满意。它报道了生产、燃料供应，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的严重困难。长期关注经济事务的省长陈郁说，效率水平低下，劳动力和物资不能很好地协调。社论中告诫，如果现行的趋势持续下去，钢铁、煤炭、水泥、木材和其他基本产品的定额指标将不能完成。^②到5月份，短缺非常严重，干部们宣称，1959年下半年广州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避免浪费、保障供应。^③为改善必需物资的交通运输，^④使农村的市场处于公社的控制之下，^⑤为了有助于缓解供应短缺，^⑥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来发展新的商品交易会。所有的小型钢铁厂都忙于获得他们必需的原材料，而结果，能够生产制造优质钢材的最大型的钢铁厂连所需要的物资也得不到。5月初，省里干部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确定了物资分配重点优先的制度，确保5家最大的钢铁厂有充足的供应。^⑦

这些改善协调的努力有助于缓解混乱的严重性，恢复一些表面的秩序，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没有发挥明显的影响。

1959年秋：跃进的复活

“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文件显示，人们可以从当时发布的宣言、通告的字里行间推断，1959年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大跃进”的进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武汉全会之后，毛泽东“自愿”将国家主席职位让给刘

① 《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

② 《南方日报》1959年3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59年3月12日。

④ 《南方日报》1959年3月7日。

⑤ 新华社通讯社（1959年6月10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2055:19。

⑥ 新华社通讯社（1959年7月1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2070:27-28。

⑦ 《南方日报》1959年5月14日。

少奇，以及紧接着的反对极端主义运动，所有声明没有一个是毛泽东亲自发出的。然而，毛泽东早期的著作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语录仍被引用，以证明“整顿公社”和“统筹全局”是正确的，例如，提醒公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说每个工厂都应该有明确的收支制度和程序。除了在农业会议上作关键性的讲话，对刘少奇的出现及其观点也都作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详细的报道。

1959年夏初，辩论似乎陷于僵局。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的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和彭德怀元帅之间的对峙使辩论达到高潮。在全会结束之前，“右派分子的恶毒攻击”已被击退，毛泽东获胜，随后彭德怀元帅被打倒。这次全会之后，毛泽东主义者重新恢复了“大跃进”。

1966年末，毛泽东指责1959年秋陶铸同其他人一起支持彭德怀，^①这一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表明，陶铸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周旋。在1959年6月《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陶铸认为我们必须避免“右倾保守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然而，红卫兵称陶铸和他在广东省委中的同伙攻击“大跃进”的某些方面也是有根据的。1959年，陶铸曾说：“不管主观活动发挥多么大的作用，亩产也不可能像去年（广东）许多县所提的那样达到3 000斤、5 000斤或10 000斤。……1958年下半年，在某些领域我们走得太快了一点，还没有充分理解客观规律决定发展的速度。……今年一些建设工程要减慢……根据去年的实践判断，广东在现在的条件下，过度发展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是有问题的。广东没有工业基础，一切事情依赖他人的局面应该改变，但也不能一蹴而就。”但陶铸肯定了毛泽东总路线的正确性，他说他自己在1957年向右的方面走得太远，因而广东那一年进步缓慢。^②广州市委也表达了同样的精神，但没有批评过去的政策，市委宣布：“彻底的检查之后，今年钢铁生产的计划更加切合实际。”^③在1959年7月7日至11日的广州市人大会议上，市长朱光也是采取极端与温和之间的中间

① 参见中南组织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广州，1967年1月14日）。

② 《人民日报》1959年6月18日。

③ 《广州日报》1959年7月6日。

路线，他号召关注改善供应工作，但又敦促广东要向前推进。^①

毛泽东在庐山取得胜利之后，政策马上向左转，广东的《南方日报》迅速追随，批判那些试图“一味丑化我们的大跃进”的人。它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唤起热情，抵制这一右倾倾向……一些同志利用所采用的方法要适应地方的特别性为借口，掩盖其‘坐下不动’的态度，错误地称之为走群众路线。如果这样的现象不改变，我们将无法实现继续跃进的目标”^②。和过去一样，政策向左的新推进总是要批评右派分子。但这一次因为领导人希望避免产生像1957年反右运动那样激烈的分化，运动不太猛烈，因而，这次运动没有称之为“反右”运动，仅称之为“反右倾”运动。1959年9月中旬，《南方日报》开始发表一系列的文章，“系统驳斥指向‘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错误言论”。显然，广东的抵制至少不弱于其他地方：“在广东，由于事实上资本主义思想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还由于邻近香港、澳门，受到来自国外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不仅存在，而且形成更大的危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③农村地区的问题特别严重。在农村，这年夏初，私人自留地部分恢复了，食堂解散了，但庐山会议后，这些对农民情绪的让步已被取消。一篇社论理由充分地指责干部们没有“担负起大胆领导的责任……同情右派分子的危险，是目前我们农村工作的主要危险”^④。

恢复“大跃进”的思想准备反映了对“大跃进”的广泛抵制，因为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少有的辩护词句特征。批判右派分子的重要社论中辩解说缺点不是十个指头中的五个，而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社论中说“重工业已经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没有提到1958年那些狂热的数字，为重工业辩护不是因为重工业自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促进轻工业的发展是必要的。社论指右派分子恶意地说“以钢为纲，放弃其他一切”是错误的。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是因为他们“恶毒地把市场供应

①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070:25-28。

② 《南方日报》1959年8月10日。

③ 《南方日报》1959年9月15日。

④ 《南方日报》1959年8月11日。

的问题说成是严重的问题，故意抹黑以动摇我们的信心”^①。省长陈郁说：“有人说大炼钢铁使人民劳累过度，耗空了国库，结果弊大于利。”^②

虽然新的攻势以守为攻，运动仍然滚滚向前。运动在1959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达到高潮，广东省人大召开会议动员当地民众迎接新的高潮。^③ 节制和保留再一次淹没于新一轮的对右倾的批判之中，淹没于新一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伟大、光荣的成就的欣喜若狂的庆祝之中。

1958年秋，“大跃进”之后，群众更加小心谨慎，而对新的热潮，他们不再天真单纯，也更少积极热情。为了克服前一年的过火与错误，毛泽东派领导人修改了他们的计划方案。1958年由小型手工业合作社组成的早熟的国营工厂再度分裂成手工业工场。1959年7月，市长朱光指示“手工业生产应该恢复重建，尽可能快地发展”^④。1959年，为了克服由于废除私营市场和农村劳动力流失到建筑业中所导致的城市粮食短缺，城市居民被组织起来生产他们自己的副食品，尤其是蔬菜和猪肉。^⑤ 在郊区，给各政府机关、工厂、学校划拨了专门的用地，职工、学生可以种植生产他们自己的蔬菜。^⑥ 城市居民热烈响应，因为他们既可以不离开家就完成对他们的劳动要求，又可以在供应短缺时拥有许多自己的农产品。

虽然私人自留地没有全面恢复，但已普遍允许农民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集体没使用的土地上种植农副产品。因而在食堂关闭后他们可以种植属于他们自己的蔬菜。^⑦ 1959年秋也曾有些举动试图消灭这些小块用地，但农民们（保护小块用地）的决心更大，很少干部愿意和他们对立。

在1958年末及1959年初种植了更多工业用途作物的农村地区，到了1959年中期境况特别困难，因为传统的粮食剩余产区已没有多少粮食供应他们。

① 《南方日报》1959年9月15日。

② 《南方日报》1959年10月12日。

③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191:30。

④ 《羊城晚报》1959年7月7日。

⑤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2日。

⑥ 《香港大公报》1959年8月4日。

⑦ 《南方日报》1959年8月10日。

1959年秋，为了弥补粮食短缺，工业用途的农作物再次被牺牲。正如一份秋季种植的指示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扩大开垦耕地来种植粮食。”^①

实际上1957年8月后已被废除的农村市场，在1959年春又逐步恢复，但它们还处于当地党委相当严密的监督之下。^② 允许农村市场存在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平衡不易把握，但1959年9月23日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明确容许比上一年更多的市场化。对这一矛盾有相当明确的表述，即“有自由，但不是混乱无序；有控制，但不是抑制扼杀”^③。

1958年秋，公社初成立的时候，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劳动分工没有充分作出安排，但随着公社积累更多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权力被明确委托给大队和生产队。1959年1月底，陶铸在一篇关于虎门公社的文章中就已宣扬公社、大队、生产队单独账户的三级会计制度的好处，^④不久，这一制度得到北京的正式批准。此后，虽然生产定额仍然由公社认真规定，但公社明确委托更多的权力给大队安排他们自己的活动和财力。总的来说，大型的农业机器仍归公社所有，而大型的农具，如犁、耙1958年是由公社租给大队的，现在归还给大队，而小型的手工工具则归还给生产队。^⑤ 为了激发农民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农用牲畜也相应地下放到下一级单位。

1959年秋可以得到的资金和资源无法和1958年投入到经济中的资金、资源相比。相应地，1959年秋的雄心壮志也不可能像1958年那么高。虽然10月1日的十年大庆仍然有传统的大型游行、欢庆，但已很难恢复1958年的那种情绪。炼钢的高炉不见了，不舍昼夜的奋斗热情消失了。在第二轮浪潮中，不应谴责广州干部过于天真乐观，当时的情绪如同在黑暗中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但随着这所有折中的情况的出现和来自各级管理机关的消极抵制，只有努力保持大众的雄心壮志和“大跃进”的基本方向，才有所谓恢复可言。

① 《南方日报》1959年8月11日。

② 《香港大公报》1959年8月24日。

③ 新华通讯社（1959年9月24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2108:6-9。

④ 《南方日报》1959年2月26日。

⑤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8日。

1960年春，最后的喘息：城市公社

到1960年初，一切已经很清楚，恢复“大跃进”的工作错漏百出，广东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面临着更严重的粮食短缺。领导人尤其关注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因为没有充足的粮食运输到城市，日用消费品也不能抵达农村。广东省的领导正尽力增加城市地区的粮食供应自给的比例。^①

到1960年初，政府还试图用另一套方案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又能保持城市工业的生机活力。城区和城区附近的农村地区被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以便工厂能够生产农村必需的产品，同时有足够的粮食运抵城市。这是在政府高层缺少信息和指导交换能力的情况下，解决城乡交换问题的尝试。在小的市镇和县城，这不会成为大问题，因为附近的农村可以供应市镇，他们易于统一管理。但这种方法在广州实施有比较大的困难，广州要由其管辖的8个县为城区的人口供应充足的粮食。^②在广州郊区，使城乡地区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相对容易，但对广州的有些地方，让居民自己生产粮食很不容易。为此作出了权宜的安排，居民们要走几里路去他们的菜地上劳动，城里也腾出一些土地进行生产。其效应之一是郊区种稻米的水田被附属于城市公社的菜地所取代。例如在广州东城区人口19.4万人，成立了20个街道饲养场，饲养猪、羊、兔，划拨10亩地作鱼塘，100多亩山边荒地种植农作物。^③

结合农业和工业活动，新的管理单位叫做城市公社。城市公社于1958年在少数城市如郑州、成都成立，当时是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直到1960年春，才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在工业方面，它们是小型的街道手工业作坊，处理家庭的及分包的工作以援助工业。和农村公社一样，城市公社也成立了食堂，把妇女从做饭和照看孩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使之在田地或工厂中生产劳动。然而，和农村公社相比，城

①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191:13-15;《南方日报》1960年1月13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3月30日。

③ 《南方日报》1960年4月16日。

市公社的焦点问题不是基础性生产，而是副产品的生产和福利。城市公社的作用在于充分利用了他们自己街道的家庭妇女、失业的成年人和年青人。^①

广州的城市公社运动开始于1960年2月初，越秀区是其他区的样板。^②4月份，运动达到高潮。虽然公社的确开办了一些新的工厂，但公社经营的工业都是些小型的街道手工工场。在其巅峰时期，有3800家公社工厂，职工6.1万人，^③但其中许多人以前已经在手工工场工作。最大的变化是组织安排了新的用地和新的食堂。正如省委所指示的：“在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中，所有的居民……必须加入。每个人民公社必须有一定量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农民，……城市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必须要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④到夏天，实际上所有的广州居民都加入了公社。^⑤广州市越秀区是成立公社的楷模，成为城市公社活动的一个示范。到3月中旬，约有8000人从事街道手工业生产，近8000名儿童由公社保育，9.2万名街道居民在食堂吃饭。^⑥

事实上，1960年初城市公社建立的工厂所做的工业方面的工作很少，大多数是给当地人口提供小手工产品的服务站：修补、改做衣服和鞋子的作坊，以及生产其他的家庭必需品的作坊。^⑦虽然食堂比个人消费会稍微多浪费一些粮食，但食堂至少可以保证大米和粗粮、草根一起搭配使用，因而可以节省并延长大米的供应。

城市公社是为保证养活城市中的人口的权宜之计，但它停留在地方社区经济独立的原始观念上。它对贸易施加地域限制，尽量减少地方分工。它对广东这样一个复杂而相互依赖的社会作了过分的限制，因而不可能持久。它是解决“大跃进”所产生的问题并保存这一理念的最后努力。城市公社的结束没有正式宣布，几个月后，随着粮食短缺的缓解，食堂渐渐消失了，农作物的种植也逐步停止了。只有一些当地的手工工

① 《南方日报》1960年3月20日。

② 同上。

③ 《南方日报》1960年4月27日。

④ 《南方日报》1960年5月3日。

⑤ 《南方日报》1960年8月8日，6月2日。

⑥ 《南方日报》1960年3月20日。

⑦ 同注释③。

场和街道服务站保留了下来。

梦幻的破灭

1958年至1960年的政策，被中国的超级爱国者称颂为毛主席一贯英明正确的体现；而美国的超级爱国者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也许更准确地说，“大跃进”应被视为一个决心坚定的穷国为实践所设想的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捷径而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努力奋斗去实现他们力所不及的目标。当毛泽东主义者认识到梦幻理想脱离现实时，曾号召当地干部用更大的努力来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但他们失败了。

如同许多神化的制度体系一样，在中国，承认政策的错误，不仅会使领导人的正确性受到怀疑，而且会对制度本身的基础形成挑战。私下里，领导人承认局势的严重性，^①但在公开场合，为了避免削弱他们的权力基础，他们想方设法掩饰困难，证明不成功的政策是成功的。虽然，事实上已经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表面上“大跃进”一直到本书编写的时候（1969年）仍未结束，“大跃进”、人民公社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一起，共同组成“三面红旗”。在粮食必须实行更严格的定额供应时，政府声称正是由于公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才有可能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因而避免了更严重的饥荒。没有制造产品可用时，工人们被称赞超额完成了生产，并被提醒要注意质量。炼钢的土高炉明明是失败了，工人却被告知，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不再需要他们了。高炉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生产钢材，而是生产斗争中的“铁人精神”。甚至连陶铸也承认：“报纸没有给读者一种讲真话的感觉。”^②

不管在讨论问题时如何一笔带过，也不管有多少外在的因素可以归咎，残酷的失败事实也不可能掩盖得住。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有一个因素总是奏效。天气不好损坏庄稼时，皇帝会被责为惹了天怒；一个新皇帝登基掌权，这就证明他配享“天命”。虽

^①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00:6-16。

^② 《当代背景》(CB)，no. 645:3。

然今天中国的群众不再相信天命，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气息，然而它被削弱了。“大跃进”失败时，所有的群众运动都不能完全恢复对毛主席的信任，这一基本的事实对以后的政治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大跃进”很快失败了，但可能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它在摧毁妨碍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方面的作用。公社的结构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为农村引进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的先锋。再也没有新的更高的期望被更全面彻底地激发起来，群众再也没有比这更努力地去探索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大跃进”的进程是破坏性的，浪费了人力和资源，但它鼓励革新，甚至更重要的是革新的精神，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不成功的试验放弃了，但对新方法的探索和新成功经验的传播仍在继续。仓促上马后又因缺少资金而放弃的工程项目后来通过更认真仔细的计划恢复重建。“大跃进”之后，毛主席不再神圣而又完美无缺，传统也不再完美无缺。

不管“大跃进”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它也许是中国最后一次认真地实现原始的经济乌托邦的运动。1958—1960年乌托邦手段的失败并没有消除快速突破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但它使一夜之间实现突破的希望破灭。“大跃进”没有使通过群众动员改变农村面貌的努力终止，但它转换了力量平衡，趋向于有节制、谨慎与怀疑的态度，迫使每一个经历过痛苦历程的人降低对自身和对中国的期望的热切程度。

第七章 重建：恢复工作及其后果， 1960—1965 年

到1960年，领导人面临着比1949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混乱。1949年，共产党面对这些困难时，是作为一支新鲜的力量，单纯、缺少经验，但是有力量、有信心。1960年面对这些困难时，他们已经是年老的一群，更有智慧、更加现实，但也深受发展进步的复杂性和痛苦的打击。虽然有这些打击及为实现目标所作的努力失败而产生的内在纷争，但到1960年末，领导人作出大胆的努力恢复经济和政治秩序。在“大跃进”初期激动人心的岁月中，广州本地领导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1960年的危机时节，新的工作牢固地处于党信任的外地干部陶铸、赵紫阳的掌控之下。

1960 年中期：对迫切危机的特别回应

到1960年末，北京发起了一场直截了当的收缩、重组运动，但其实在1960年中期，“大跃进”已经搁浅，已着手动员一切力量应付最迫切的问题。广东和大多数地方一样，问题十分严峻。工厂关闭，或是降低产量勉强运营，在绝望中仍开业的工厂还尽力与公社签订合同以帮助寻求物资供应。^①一群群的农民被派出找煤，由于物资匮乏，小型工厂和普通的家庭耗尽了附近山上的木材。公众道德信念水平总体下降使人们更加自私，滥用公款，公共秩序难以维持。产品的短缺和1958、1959年的加薪使黑市长期繁荣而很难遏制。但最迫切的问题是粮食。早在1954年，广东的干部已自豪地宣称事实上广东已经实现了粮食自给，从那时

^① 《南方日报》1960年1月8日。

起直到“大跃进”，除了1957年之外，干部每年都汇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1960年，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广东还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①

虽然粮食短缺基本上是单一的问题，但它的影响却会向各方面扩散。农民因缺少粮食而缺少在公社田地上劳动生产的动力，有时甚至是缺少体力。政策规定公社必须分配一部分农产品给农民作为劳动奖励，但由于没有剩余产品可分配因而不能激励他们更努力地生产。确实有一些剩余产品的生产队、大队也缺少动力，因为他们被要求给那些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人供应粮食。有时，压力太大的生产队甚至吃掉大部分本应留作种子的粮食，大队或公社的领导不得不要求其他生产队提供种子。许多划给农用大牲畜的饲料粮被人吃掉了，一些牲畜被杀掉以应急。牲畜头数的减少反过来又使天然粪肥短缺。1958年和1959年，新开垦的土地耗尽了肥料供应，而肥料不足又影响农作物的质量。到1960年中期，迫切需要的粮食消费品的短缺使农民和干部不顾指示要求，种植更高比例的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因而减少了工业用途的农作物。1960年，估计全省60%的工业依赖农业生产其原材料，^②因而，工业用途农作物的削减再次影响了工业。

粮食危机的迫切性反映于赵紫阳1960年4月初在关于城乡食堂的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他指示食堂“加工粮食和淀粉……用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的茎、梗、根、叶生产淀粉……食堂必须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田边、地边、河边、路边及垦荒土地旁边的荒地、沼泽地”。食用油和大米是主要的粮食，其供应短缺非常严重，赵紫阳敦促食堂“尽力供应每人每月4两油”。人们“必须采集各种野生油料植物，开辟油料供应之源”。私人自留地已经恢复的地方，赵紫阳敦促他们迅速上交给食堂用来种植蔬菜。^③发达的分配系统防范了普遍的饥荒，但它无法防止普遍的营养不良。

虽然分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显然需要下最大力气的是农业生产。

^① 《南方日报》1960年3月17日。

^② 同上。

^③ 《南方日报》1960年4月3日。

在“大跃进”初期，所有错误的经济估量中，也许最根本的是没有优先重点考虑农业生产。领导人再次将资金与人才集中到更有诱惑力的工业和建设中。1960年，农业失败导致营养不良，工业发展受阻，领导人除了优先重点考虑农业之外，别无选择。在私下里，赵紫阳承认要花5至7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将农业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①但在公开场合，要解释新的重点，就难免意味着集中搞工业走过了头，并且考虑欠周，但赵紫阳尽力平衡各方利害。他说：“1958年以前，广东的政策是把农业放在主要的位置，但在1958年，随着大炼钢铁，事实上工业已经占据了主要位置，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现在再一次明确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对有些同志来说）似乎是动摇徘徊的象征。”赵紫阳接着解释说这不是什么动摇徘徊，政策总是，并且仍然是要发展农业和工业，问题是如何保持最合理的平衡，因为“工业发展的速度比农业快得多，总体工业发展的高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对农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农业的落后已形成明显的对比。因此，目前落后的农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②

1960年3月，中央政府已宣布了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决定。广东省党的干部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执行决定。^③

最急迫的问题是巩固对农村的领导，提高粮食供应水平。^④2月，北京宣布应下放更多的干部到农村，^⑤六级干部会议后，广东采取行动遵照执行。1958—1959年，已有近20万名干部下到农村，^⑥但在1960年他们下放的速度更快。陶铸在对这些新一轮下放的干部的讲话中清楚明白地表示在农村基层的事情没有办好，他说：“我们希望以更快的速度执行我们的指示，但包括公社在内的三级领导干部阶层已经落后了。”陶铸指示，2/3的县党委干部、4/5的县委常委应到公社，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每年至少在那里住7个月，专区一级的干部一年要在农村5个月，省级干部4个月。^⑦从陶铸讲话的5月至7月底这段时间，广东全省近1.9万名

①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85:13-20。

② 《南方日报》1960年7月14日。

③ 《南方日报》1960年3月17日。

④ 赵紫阳关于增加农业产量的指示，见《南方日报》1960年8月31日。

⑤ 《南方日报》1960年2月22日。

⑥ 《南方日报》1960年2月14日。

⑦ 《南方日报》1960年5月19日。

省、地、县三级干部和16万名公社、大队干部已下到生产队。^①

但1960年的夏收、秋种开展得并不好。赵紫阳在秋种结束前的紧急呼吁中承认1960年的进展甚至不如1959年的好。他指示所有假期中的高中、初中学生必须马上下到农村，支援秋种的最后冲刺；所有省内的驻军必须马上行动支援秋种；不仅政府、党委机关的干部，而且工厂、学校中的干部都应该在两天之内大量到农村去。^②几天之后，宣布近97万人去农村支援秋种和移栽。^③后来又宣布这一年中从6月至10月20日，有216.5万人曾下到广东农村，其中23.9万人来自政府机关单位，19万人是城镇中的失业工人，173.5万人来自农村的上层机关单位，他们都被送下去参加体力劳动。^④在这段时间中，青年团^⑤、民兵^⑥和其他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督促人们去农业生产前线。从1月份到9月份，广东的驻军总共投入农村劳动354万人/天。^⑦如果每个士兵完成30天的劳动目标，必须有约12万个士兵参加劳动。

“支援农业”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驱赶城市中多余人口的一种手段。早在1956—1957年，广州已经作出努力遣送过剩人口回农村，而1958—1959年的大炼钢铁和建设城市要求成千上万的新人口。到1960年，因为粮食短缺，迫切需要将城市中所有没有工作的人遣返回农村。这在正常时期已经很难，而要求城市居民回到粮食严重短缺的村社更加困难。1960年中期，在没有能力使众多人口回农村的情况下，省领导尽力让城市人口最起码在农忙季节支援农业。

除了努力减少城市人口之外，政府还向农村地区派出专门的人员，送去化肥、杀虫剂、农机农具、排灌设施、合成塑料、小型农业机器以支援农业。^⑧

显然，农业中的危机不只是暂时的，北京作出政策改变并传达到地

① 《人民日报》1960年7月26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8月3日。

③ 《南方日报》1960年8月8日。

④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15日。

⑤ 《南方日报》1960年7月9日。

⑥ 《南方日报》1960年4月7日。

⑦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9日。

⑧ 《南方日报》1960年7月14日。

方只是时间问题。但在1960年中期，领导人没有发起新的运动或出台新的政策。私人自留地仍然受到严格控制或被消灭，^① 强调物质刺激仍然受到尖锐的反对。^② 广州的领导人只能通过加强农村的领导、控制粮食分配、让更多的人从事粮食生产，尽力用这些临时措施应对目前的危机。

1960年末至1962年：收缩

1960年末，北京给予广东一条新的政策路线及一系列新的运动方案。虽然在1960年末广东已经展开了这些运动，但对运动阐释得最全面最正式的是在196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本质上讲，新的运动包括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收缩和对“小资本主义”的让步。收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当时那一种风格。指示要求有严肃认真而有条不紊的会计和档案记录。检查取代了宣传和动员。但正式地更大幅度地降低目标，重新安排重点，这已超出了当时的做派，而在1959—1960年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这也渐渐被接受了。新的工业削减了，投资和建设明显减少。投资从工业转到农业中。但收缩超出了以前安排的程度，而扩展到组织结构的各个方面。高层的组织结构缩减，更多人员被无限期地下放到农村。在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缩小，更多的权力下放到更低一层。“三大自由”（耕种自留地、经营农副产品、私人市场销售）重新恢复。

与较早时期的政策变化不同，新的政策方案的出台没有群众集会、多姿多彩的游行示威，没有召开大会、激动人心的讲话，也没有高奏凯歌的音乐。雄伟目标的调低没有欢庆的场面，对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次逆转和对错误的认识也没作任何公开告示。许多新的政策是在不公开的会议上平静地甚至是秘密地宣布的。清楚说明基本的收缩方案的基本文件，如《农业六十条》从来没有公开发行。回避推诿是宣布新政策的特征，而北京的领导人自从接管掌权以来从没有如此沮丧，长征以来，他们从没有进行这么大的后退。

虽然有这些托词，但政府当局必须向公众提供基本的政策方案和一

^① 《南方日报》1960年4月3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7月23日。

些合理的说明。陶铸是一个最为敢于直言的人，早在1960年8月，他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在发展国家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利用旧的经济法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当然陶铸不会让他的软肋公开暴露，他马上补充说：“这些残余和法则必须适当使用，绝不允许自由泛滥。”^①然而，他对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后退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1960年10月13日至17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通告中，公开了收缩方案的实质内容。^②

伴随收缩而来的有理智的态度反映于八届九中全会关键性的口号“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中，它成为新路线的象征。指标和定额在公开场合连提也不提了。领导人谈到平衡，但没有人提到进步来自打破平衡的思想。

即使是那些比较保守的技术人员和党的领导，他们虽然承认收缩的必要性，但对再次要求延迟广州成为工业中心的政策也不甚乐意。然而，新政策给广东带来了国家的特殊援助。由于1961年严重的粮食短缺，中央政府打算从对农业的投资中获得最大的短期回报。广东、四川土地极为肥沃，有投资于肥料、电气化、排灌相对较少而使生产迅速扩展的潜力。因而，广东和四川被选择作为新的政策方案中支援农业的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给广东带来不利的因素，相反，收缩却给广东带来了相应的好处。

对广东农业的投资集中于水电站和排灌站，它们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在洪水到来时加速抽水入海。到1961年3月，已经建成或在建的新排灌站有近200座。^③

这些发展伴随着农村的电气化、森林再造及化肥工业的发展，^④到1961年底，广东各地已经建成64家新的化肥厂。^⑤

如同集体化、公社化由思想整顿运动推进一样，公社的分权、“三大

① 《人民日报》1960年8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10月23日、25日、28日。

③ 《人民日报》1961年3月18日。

④ 《南方日报》1961年7月7日，1962年9月30日。

⑤ 《南方日报》1962年1月21日。

自由”的重新恢复同样由思想整顿运动推进。集体化以来，每年冬季农闲季节，地方干部和村庄整顿合作社（后来是公社）组织，用新干部取代无能或不诚实的干部，讨论工作安排和工分制，达成新的决定，这一切都是在当地农村党的干部的指导之下进行。然而1960年冬的整顿运动比其他年份的更为严重，但也还是集中于整顿基层党、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正如尹林平在一份党的杂志上所说的：运动是用来“认真检查党的组织，配合群众运动检查干部，纠正干部的工作作风，检查人民公社”。^①

1960年11月3日北京发布的1960年整改的关键性文献是克服过度“共产风”的十二条：农村工作紧急指标。“十二条”的本质是批评指责地方干部超越了上级指示的精神，把食堂运动推进得太远；征收了太多的私人财产，命令主义；不够关心群众的生活。“如何才能完成定额？”在回答这一问题时，1960年下半年《南方日报》的解释说：“关键在于克服一些干部认为定额越高越好的片面观点。”^②虽然没有具体精确的数字，但许多干部在运动中被撤职。另外一些没有被撤职的干部也受到当地群众公开严厉的批评。

当地干部可能感到他们不再有赢得村民们合作的基础，而省领导显然对当地干部没有遵照他们的指示解决农村问题感到愤怒。陶铸质问：“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干部不能彻底理解党的指导原则和政策，反而做一些蠢事？”^③

在这些反应迟钝的地方干部当中无疑有一些曾对较早期的指示反应过于敏感，但在他们看来，他们因执行政策成了替罪羊，这政策不仅失败了，而且瓦解了他们在村庄中的权威。用一句共产党干部引用的成语说，他们是“弃卒保车”。公社中受到批评的国家干部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做类似的工作，而基层生产队、大队干部则被简单地免职、分配去农业劳动或是自谋生路。这些干部被告知，“你不应该重复一千次‘我问心无愧’”，而应正视后果，正视给党和群众所造成的损失。要“清醒地批评

① 《上游》1960年12月22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10月8日。

③ 《当代背景》no. 645: 2.

自己的缺点、错误，谦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①。一句话，基层干部应该对困难负责，党的政策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应该保持下去。

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批评在村民中受到普遍的支持。不管地方干部如何同情他们的乡亲，他们总是难免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工具。而大多数村民对他们村庄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他们趋向于从个人的关系来看待压迫，责难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干部。正是地方干部拿走了他们的财产，强迫他们在食堂吃饭，监督征收他们的粮食完成国家的定额，督促甚至强迫他们在田地里长时间劳动而奖励甚少或是毫无奖励。可以肯定，村民们对当地干部的批评常常因为友情、血亲、同情的关系而减轻，但是更高层的干部在激发一些村民批评指责“压迫他们的当地干部”时毫无顾忌，正如在十年前激发村民们批评“压迫他们的地主”一样。运动对安抚农民们大有帮助，但它摧毁了基层干部的信念。军人被派进工作组监督政策的执行。^②

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农民们对政府的疏离。在土改中，一般的农民分配到土地和属于“压迫他们的地主”的东西。在1960—1961年冬，农民们的自留地不仅被返还，而且刮“过火的共产风”时被当地干部不恰当地拿走的东西也得到赔偿。锅碗瓢盆、桌椅、小农具、果树，以前食堂和工作组占用的房屋，只要有可能，都归还给原先的物主。如果不能，则对财产所有人的这些财产及大炼钢铁中被拿走的金属物件给予赔偿。对这些措施的热情不可能是无限的，赔偿一般都不充分，即使赔足了，要补偿被征用的东西往往要付更高价钱去重新购置，或者根本买不到。牺牲基层干部和赔偿并不值得庆贺，但它对于缓和农民的不满，取得农民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在恢复农业的所有措施中，对人们心理冲击最大的是重新恢复自留地、重新开放私人自由市场、允许农民保留开荒土地上的收成。早在1960年9月，汕头专区就恢复了自留地，当时宣布“必须允许公社社员保留一些土地私人使用，种植一些家庭的农副产品”。允许私人家庭拥有

^① 《南方日报》1961年2月8日，2月2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23日。

他们自己的自留地、家畜、房前屋后的果树和一些小家具，允许他们接受出售肥料和其他农副产品所获得的现金。^①到12月份，指示全省各地农村恢复约5%的土地作为自留地使用。^②

1959年中期，一些只给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很快被公社重新收回。1960年末、1961年初，虽然农民们希望有自留地，但他们在接受自留地时十分小心谨慎。可以理解，较早前因推行“左”的政策而经历过整改的干部，不愿意执行日后可能被撤销的资产阶级政策。一篇重要的社论中说，一些干部“前怕狼、后怕虎，担心小自由的存在会导致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③。在讨论分配自留地问题时，《南方日报》指出，一些同志“非常担心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农民通常也和干部一样小心谨慎：“公社社员对接受自留地的疑虑没有打消，他们不愿在自留地上种植庄稼……从他们是否采取积极措施在私人自留地上种植各种农作物，可以判断他们是否相信这些政策。”^④即使是那些当年在自留地上种植了庄稼的农民也常常是在庄稼成熟之前就收割了，他们担心这是个骗局，让他们在自留地上辛勤劳动生产的农产品后来被国家征用。在几季农作物收获没有受到干涉之后，农民们才放心地投入到私人自留地上。

对于农副产品和私营市场的疑虑也类似。为了保证完成国家的定额，同时不干涉农民的私人空间，国家用两个方法来界定合法的私人空间。一种方法是限定通过私人资源获取的家庭收入的比例。它宣布家庭20%的收入可以来自耕作自留地、饲养家禽家畜、种植果树、出售肥料、制造小农具及生产农副产品。^⑤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区分哪些产品只能出售给国家，哪些产品可以在私人市场上销售，来界定合法的私人空间。1960年12月，广东省公布了一类产品（中央政府计划中只能销售给国家的基本产品）目录和二类产品（地方政府可以征收以满足其需求的产品）目录。16种产品被划为一类产品：大米、小麦、大豆、玉米、食用油、芝麻油、蔬菜、茶油、棉花、食用糖、甘蔗、橡胶、铜材、皮革、蚕茧和

① 《南方日报》1960年10月12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28日。

③ 同上。

④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23日。

⑤ 《南方日报》1960年10月12日。

丝绸。80种产品被划为二类产品，在满足了国家的需求之后，可以私人出售。^①所有其他的产品（三类产品）可以在农村集贸市场上自由出售，但必要的时候，国家也可以收购三类产品。

不管是产品类别的划分，还是农民可以通过私人手段获取20%的收入的规定，都不是划分合法私人贸易的最合适方法。要监控农民所有的小生意能保证其收入不超过20%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个规定给了当地干部滋扰没有完成集体土地上劳动份额的农民的手段。产品分类的问题是，国家的需求是不可能事先预知的，而且并不总是和产品的分类相对应。地方政府需要产品时，各类国营收购公司不顾产品分类向农民施加压力。一些农民甚至担心如果他们在私人市场上交易买卖会受到指控。因而，新政策出台几个星期之后，政府不得不向他们保证“把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不应该被认为是自发的资本主义行为”^②。

除了在自留地上表现出来的宽大之外，对收缩之后的第一次收成的征收被降到最低，以便使农民看到他们的劳动是有回报的。当产品在一个3万人口的公社内进行几乎完全平均的分配时，农民不能看到辛勤劳动与接受物质奖励之间的直接关系。而当分配下放到大队时，如果大队在完成国家税收定额及大队、生产队的附加税之后，还有剩余分配，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明显看到，一个明确群体的集体劳动及个人工分得到的好处。1961年的第一个收获季节，因为城市居民在上一年已经被组织起来种植自己的农作物，税收和定额都可以定得很低。可以肯定，生产大队还备受压力去完成他们的“保证的生产指标”和定额，^③但他们还被要求不能提取超过收成的3%作为积累资金，不超过3%—5%作为福利资金。^④

单位规模的缩小不仅使农民能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而且有助于他们缩小其政治单位（如生产队、大队等——编者）的规模，使之更易于管理，更加对应于自然市场的区域规模。^⑤毛泽东原先对公社的指示是“一大二公”，

① 《南方日报》1960年12月28日。

② 同上。

③ 《南方日报》1961年6月30日。

④ 《南方日报》1961年6月29日。

⑤ 施坚雅：《市场和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369-399, May 1965）。

而一个典型公社的规模是几个自然市场中心的集合。正如《农业六十条》中所规定的，一个公社应包括一个乡或几个乡。从1958年秋到1963年，全国总体上公社的数量大致增加了两倍，广东公社的数量增加了一倍。1963年初，广东报告，收缩之后大约有1600个公社、2万个大队、44万个生产队。^①

不仅规模上收缩，而且所有权和权力也向组织上的更下一层转移。大农具和大牲畜也从公社转移到大队，大队也顺次将产品分配到生产队。

虽然权威的收缩通常是渐进的、起伏的，但总的来说，它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60年秋，管理农村经济的必要权力下放到大队。^②一般来说，生产大队通过“三包一奖”来管理约20个生产队。^③同样复杂的制度以前也曾在高级社及其下属的生产队之间使用过。简而言之，大队为每个生产队制订生产计划，每个生产队据此保证固定的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固定的生产产出。定额完成的话，生产大队分配物质奖励给生产队。大队借出必要的机械设备、大牲畜以完成计划。生产队是劳动组织单位，但最有能力的领导集中于大队部，他们可以密切监督生产队的工作劳动。这一制度比权力集中于公社能更好地督促生产，但给生产队的空间太小，并且要求有一套复杂的大队、生产队会计账户。一旦计划完成，生产队必须对劳动投入进行优先奖励，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它要求有两套劳动投入的会计账户，一套是根据大队计划的劳动力会计账户，另一套是其他的劳动力会计账户。大队和生产队之间，不仅原先的计划调整而且因天气或特殊情况而做出的调整也要谈判商讨。因而，它要求有更为复杂的会计账户和调整，这超出了农村稳定的状况和农村领导的能力所及。^④

1961年下半年，到1961年12月7—14日省党代会召开时，^⑤这一过于复杂的组织让位于第二次收缩，在这次收缩中，大部分公社的实质性权力从大队下放转移到生产队。^⑥在一些地方，大队还作为基本的单位保

①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2日。

② 《南方日报》1960年9月16日。

③ 《南方日报》1960年10月8日。

④ 关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这些安排详见 John C. Pelzel and K. K. Feng 即将出版的专集。

⑤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2821:11。

⑥ 《南方日报》1962年1月7日。

留了一段时间。^① 为了有更高素质的领导，更有利于控制生产，省领导优先考虑把权力放在大队部，因为生产队的领导相对受教育较少，不大可能非常熟练地起草经济计划。但大队的计划太过复杂、僵化，不利于工作顺利推进。第二次收缩是1962年1月1日社论的主题。在新的行动正式纳入1962年9月颁发的修订版《农业六十条》之前，广东已经开始了广泛的实践。在第二次分散化的过程中，生产队成为基本的会计结算单位，有自己的计划和分配制度。大队设定定额，大队领导协助生产队领导制订他们自己的计划，但让每个生产队管理基本的会计账户，计划大为简化。作为新的收缩的一部分，大多数以前大队出借给生产队的设备成了生产队的财产，但至于哪些机器和大牲畜仍然由大队直接控制，还有一些管理权上的纷争。^② 由于生产队修缮自己的工具设备，大多数决定能自主作出，因而生产队队部成为各种会议较活跃的中心。^③

第二次收缩给当地生产队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然而，大队领导不满产品由生产队占有、利益由生产队分配，他们没有手段保证生产队作出合理的计划，保持高水准。^④ 监督相对有自主权的生产队的问题，是1962年上半年新闻报道和干部会议中经常关心的问题。^⑤ 一方面，大队干部被告知，他们必须鼓励生产队内部群众的民主讨论，让生产队为当地作出代表群众意愿的安排。另一方面，他们要负责监督生产队完成定额，提高落后生产队的水平。^⑥ 虽然大队领导不再直接控制资金的使用，但省领导还是鼓励他们在教育生产队领导制订计划、持有会计账户、监督田间管理、帮助解决所有发生的问题中发挥主要的作用。^⑦ 大队领导控制生产队的方法之一是发挥党和青年团的渠道作用。大多数生产队至少有一名领导是党员或者青年团团员，要服从组织纪律。发挥领导作用的另一个方法是派大队干部去生产队。在这一阶段，通常生产队有一名

① 《南方日报》1964年2月29日。

② 《南方日报》1962年4月8、18日。

③ 《南方日报》1962年1月10、24日。

④ 同上。

⑤ 《南方日报》1962年1月20日。

⑥ 《南方日报》1962年3月21日。

⑦ 《南方日报》1962年6月20日。

“驻队干部”，^① 无论如何大队干部要经常监督生产队的情况。再者，有一个达到适度平衡的问题，因为如果大队干部监督生产队过于严格，他们很容易被指责为自己作出太多的决定，而没有和“群众”充分商量。^②

收缩到生产队这一层给“落后生产队”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成立时，比较富裕的农民不满他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他们的财富。而1961年、1962年的分散化到来时，土地贫瘠的“落后生产队”抱怨新的制度对他们不利。高层的干部再次将精神集中于这些“落后生产队”，试图帮助他们提高水平。^③

虽然有这些问题，但事实证明第二次收缩比第一次在制度上更加可行。虽然生产队的管理可能很落后，但单位的缩小有助于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固定额度的责任适当因而国家征收的要求可以完成。组织的收缩和新的自由对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新的领导获得更多的经验，农民们相信辛勤劳动可以得到奖励，自留地上的产品不会被没收，这些效应随着进一步的丰收而逐步增加。

1960年冬的农村整改运动之后，领导的问题仍然很严重。50年代初，许多最有才干、有文化的年轻人被录用为干部。而那些在早年没有被录用的人通常有一些政治问题，^④ 或者是半文盲。因而，对许多基层干部的批评使农村有些职位持续好几年空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空缺为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所填补，但也发起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成立“农业中学”的运动，训练新的领导，同时，为新的生产队的领导提供培训方案。^⑤ 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生产队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自然的农村领导，回复到富农中的“老农”手中，但这一趋势通过录用贫农来加以平衡。^⑥ 然而，1961年有能力的干部短缺，使领导干部们感到有必要指示在当年的整改运动中宽容对待基层干部。^⑦ 在一项有关农民为什么不想成为干部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人“缺少必要的文

① 《南方日报》1962年3月24日，6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62年3月14、18、21日。

③ 《南方日报》1962年1月28日、2月24日。

④ 《南方日报》1961年9月6日。

⑤ 《南方日报》1962年3月10日。

⑥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5日。

⑦ 《南方日报》1961年12月20日。

化水平”，但也发现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担心“太容易成为罪犯”。^①

大量的城市人下放到农村来“支援农业”，不仅为农村提供了领导人手、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缓解了粮食供应的压力，以及城市中经济收缩之后由于大量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所导致的城市人口道德水平的问题。省领导仓促行动，重新分配成千上万人去农村，给许多农村地区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靠近大城市中心附近的地区。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去贫困的农村，虽然只是职业上的不同，但他们不大尊重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同志。许多农民尊重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但他们的尊敬中夹杂着恐惧和担心，有时还有一些不满和厌烦。在农民看来，比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更坏的是“五类分子”，即小痞子和以前社会上层的失业者，为了缓解城市的负担，这些人几乎是不加分别地下放到农村。他们带来了粮食的问题和管理的问题，因为他们常常无所事事、横行霸道。

即使是城市的学生也不容易为农村所吸收。例如，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县，当地人被批评存在错误认识，比如说，认为“这些孩子连锄头都拿不动，他们能做什么？”而一个农村姑娘得到表扬，因为“她像大姐姐一样，教他们（城里来的学生）如何分辨杂草和庄稼，教他们如何握锄头”^②。需要这样的告诫反映了精明的城市青年和土气的农村兄弟之间的巨大差距。

虽然1961年新的政策路线对农村的影响最大，但对工业、教育、商业也有明显的影响。在工业领域，许多项目有节制而且正规化，对劳动力的物质补偿和对农业一样同时进行，但更加重视会计程序和专业训练。^③比较有经验的工人会因技术和表现而得到奖励。^④“大跃进”初期，由合作社合并组成的国营工厂再次解散为小单位。地方的企业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但他们也不用上缴国家以弥补资金的短缺。^⑤

除了这些对规范性和地方责任的总体关注，还专门为增加直接援助

① 《南方日报》1962年4月6日。

② 《中国青年报》1961年7月27日。

③ 《南方日报》1961年7月25日、8月12日。

④ 《南方日报》1961年11月2日。

⑤ 《南方日报》1961年8月12日。

农业的工业产品的产量做了工作。虽然农业上组织的收缩对农产品的质量影响甚微，但在工业领域，收缩集中于产品质量较差的工厂，因而起到了提高人员和产品标准的效果。收缩对于妇女来说尤其困难，她们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但她们一般还留在城里，而失业的男性与青年则下放到农村。但生产化肥、农具、杀虫剂及其他农村所需要的产品的工厂，人数和规模都在增加。许多工厂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专门关注当地农村人口的需求，并想方设法生产、运输这些产品来满足其需求。^①

在恢复阶段，商业领域的关键性问题是恢复产品供应的有序流动。除了努力提高质量、改善会计水平，急迫的短缺要求下大决心去搜寻物资。技术人员和勘探人员被派下去寻找原材料。^② 例如，1961 年中期，广东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帮助国营企业寻找物资供应。这个公司派人直接去检查原材料产地和仓库。^③ 此外，为了促进物资的流通，商业部门还忙着举办“物资交流会”，把各工厂的销售、采购人员及政府有关部门集中到一起。

教育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工业相类似。比较差的学校被关闭，较差的教师和学生被解雇、开除，从而加强学校管理。^④ 而从国家预算中去掉的其他一些学校则转交给当地合作社、公社、大队，在城市里则转交给街道居委会。如同在延安时代一样，合作社的学校被称为“民办”的，因为它们的资金支持来自地方而不是国家。作为支援农业项目的一部分，学校更多地关注培养专门人才：水土保持、水利工作、森林、农药、化学、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大队、生产队的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⑤ 甚至省里科研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也被组织起来去调查农村的问题，就化肥、杀虫剂、牲畜疾病、电力使用提出建议。^⑥

新政策在学生中引起的问题比工人中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他们对职业前途沮丧失望。即使在工业领域，许多过剩的工人被转移到农业中去，

① 《南方日报》1961 年 5 月 5 日。

② 《南方日报》1961 年 4 月 28 日、5 月 15 日。

③ 《人民日报》1961 年 9 月 6 日。

④ 《南方日报》1961 年 5 月 9 日。

⑤ 《南方日报》1962 年 7 月 4 日。

⑥ 《南方日报》1960 年 12 月 4 日。

但工业机构中的一般工人并没有因收缩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然而在学校方面，毕业后理想的分配大大减少，随着学校的收缩，许多计划继续接受更多教育的学生发现没有学校接收他们。没有上中学的学生一般被分配去从事农业工作，至多是去为农业做准备的学校。^①虽然做了不懈的工作让学生们相信他们在农村大有前途，但前景并不吸引人，特别是由于经济收缩，减少了他们日后能够返回城里的可能性。

在农村，受教育的青年向上流动的传统渠道是进入城市，而现在城市只能吸收一小部分受教育的青年。在农村，政府集中发展“民办的农业中学”、半工半读的学校。^②在“大跃进”初期，也曾努力建立这样的学校为农村提供有技术的人员，但1961年后，它们成为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渠道。虽然这些学校还是比城市中比较好的学校的水平低，但和1958年开始的临时凑合的学校相比，其组织计划要好得多，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上学的学生从来没有脱离过农业生产，因而，也从没有从城里到农村来的学生的心理问题。他们所学的技术在城市里毫无用处，但在农村集体化所产生的新的基层技术、管理的位置上是有用的。事实上，被称为“土专家”的这类人数量上大大扩展，基层的技术人员能够处理诸如会计、农学、水土保持、林业、农药等问题。^③这些发展完全符合支持农业的基本政策，是当时最成功的所在之一，反映了当时学术的适度发展。当然，农村青年比城市青年更愿意接受这些位置。农村不像城市那样闪烁炫目，但有理想的农村青年更愿意成为一名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而不是一名农业劳动力。

社会主义的管理和“资本主义”的让步

人们因饥饿和疲劳所产生的恶劣情绪使之难以重建纪律。农民偷偷地卖粮食给城市居民，有机会接触粮仓和仓库的人进行偷窃，农村居民非法留在城里，贫穷的农村姑娘设法接近能给她粮食的城里男人。在

① 《南方日报》1961年5月9日。

② 《南方日报》1964年10月14日、12月11日。

③ 《南方日报》1961年5月5日。

1959年至1961年，这样的事例很普遍，当地的干部也不能控制他们，虽然他们也并不同情违规者，但也不害怕冒险触犯当地的反应。

至1961年，局势开始稳定，政府当局开始慢慢地重建秩序。但1961年开始的运动让当地干部左右为难。基层干部受到指示要关心群众的意愿，但同时又要对集体经济负责。自留地恢复了，农村市场重新开放，对征用的物资给予赔偿，对极端过度的“共产风”进行批评，这些产生了自“大跃进”以来农民们第一次被动员起来参与讨论的氛围。然而许多农民还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当地干部被告知要“充分发扬民主”，但他们被提醒“包产到户”是错误的，^①而收缩之后这样的想法一直得到民众长期普遍的支持。^②事实上，省里的许多干部也宁愿更进一步允许对资本主义的让步。与此类似，在讨论过度“共产风”行为的过程中，群众的参与也提高了群众可能会批评政策本身的危险。虽然党的控制在一些地方会很严重，但1961年当地农村的控制并不太严格，大胆直言的农民仅受制止或不予理会。

收缩之后，最难解决的管理问题是农民在私人自留地比在集体土地上生产劳动更积极卖力。基于实际贡献的奖励工分制使生产队领导不需重新采用命令主义，就能更容易地激励社员努力劳动。但一有机会，家庭成员还是一定在他们自己的自留地上花上更多的时间，开垦其他的自留地，生产农副产品，出售他们的劳动成果，这还是给了有创业精神的农民更多有利可图的机会。因而，农民更愿意在自己的自留地上使用肥料，包括粪肥，而留给集体土地上的已是数量甚少。虽然生产队的领导被要求督促每个人完成集体的任务，但他们自己同样有通过自留地、市场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从集体项目中获利。而这一切使较高层的领导要保证生产队的领导和普通的生产队社员完成集体责任的问题复杂化。获取私人利益的机会大得足以引起干部们对“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关注。仅仅两年，这些问题就使得控制收紧，但在1961年初，当时省里干部关心的是经济的恢复，鼓励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因而除了相对宽容之外，干部们别无选择。这样的态度不可避

^① 《南方日报》1961年9月6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5月18日。

免地加重了他们维系集体生产的任务。为了保持产量提高而允许自由，为了保证集体生产又限制自由，这样的两难局面是其固有的，广州和农村的干部都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1961—1962年这一阶段有时会被拿来与1956—1957年的“大鸣大放”相比较。它们有相似性：这两者都是在极左时期之后，国家面临困难时出现批评的；这两者都涉及对广泛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从科学、经济到文学批评。然而，1956—1957年，不满集中于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剥夺，政府当局公开征求批评意见；而在1961年，不满并不在于地位被剥夺，而在于误导的政策、压制和饥饿，这些不满对政权的基本合法性提出非常严重的挑战。

1961—1962年，纪律还很严，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满的人自然会陷入麻烦，但也有间接表达批评的方法。人们抱怨粮食短缺，都加上一句：这些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人们陈述解放前的惨状，说比较而言现在的短缺要小得多，但人们进而又历数现在的短缺。人们说，因为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他们乐于作出牺牲，然后详细列举出他们所做的牺牲。在党内，干部们带着没说出口的羡慕讨论南斯拉夫和苏联在经济和思想文化生活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后他们又批评这些方式。

当时一些最激烈的批评和最易为外人所知的是知识分子所写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知识分子没有直接抨击毛泽东和“大跃进”。他们用中国传统讽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批评。作家用历史记录、小说故事、戏剧和理论文章的辛辣讽刺来传递信息。例如，广州的一位学者写道，在唐代表面上似乎和平安宁，但存在皇帝远离农民的危险鸿沟，一些军人想通过战争来获得荣耀，而没有认识到它对国家的危害，品质恶劣的大臣包围着皇帝，而皇帝刚开始还精明能干、品行高尚，渐渐地也变得懈怠、沉湎酒色。^① 另一名教授颂扬秦朝的创始人秦始皇卓越的才干，成功地统一了国家，并创立统一的语言文字，颂扬他把国家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然而后来皇帝走得太远，建功举措太多，他把所有人都弄得疲惫不堪，因而被推翻了。^② 另外一位作家赞扬明朝的大臣海瑞向皇帝抗议对待农民

^① 《南方日报》1962年4月15日。

^② 《羊城晚报》1962年9月7日。

的不公正，海瑞成了和毛主席发生争论的彭德怀的象征。^① 当地的其他一些文艺界领袖径直去海南岛参观海瑞墓。^② 其他一些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对主观主义的危险、头脑发热而脱离现实的做法提出批评。^③ 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这样的讽喻和批评，但真的运用了这种技巧的作者，对于能够理解的读者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义者不满1961—1962年间一些党的领导人串通发表这些抵制“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的辛辣讽刺批评。但还在1961—1962年的时候，毛泽东主义者很难对付这些批评。对于“大跃进”中的过激已经有了普遍的醒悟，回击这些批评只能招来对其更多的注意。显然，毛泽东主义者除了忍受尊严受损、期待在较有利的时机压制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出现之外，别无办法。

思想领域纪律的放松引发批评，同样，商业领域纪律的松散导致黑市出现。搞清“自由市场”与“黑市”之间的区别并不容易，政府本身也不一定能作出明确的区分。高层的官员并不关心法律上的区分，而是关心实际上的黑市。只要不干扰政府的采购，政府官员很少干预黑市，他们甚至不理睬以前的指示。而一旦私人市场影响到政府的采购，官员们就趋向于认为私人市场是“黑市”。为了重建秩序，各地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监督、限制过度的私人市场销售。

私人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严重的关注，因为它促进了投机与黑市网络。控制通胀的方法之一是运用政府的“高价”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政府以高价出售配额产品，但低于黑市价，从而减少或消灭了对配额票证的需求。这样的行动在某些特别的项目上对黑市形成挤压。另一个减少黑市通胀的手段是颁发随工资而发的“工资票证”，因为大多数商品要求票证和现金一起使用，因而投机牟利者无法大量购买，或是单凭这一获利丰厚的交易谋生。随着人们能够买到越来越多的产品，对黑市销售的压力随之减小，但还需要有针对商业投机和投机牟利的持续而

① 《羊城晚报》1961年8月7、31日。

② 《红卫兵小册子》，见《共产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on Communist China*）no. 26:5-7, 13-19. *JPRS*, 1968。

③ 《南方日报》1961年5月10日。

低调的运动和检查，来制约这些趋势。

在宽松时期，也允许消费者表达更多的抱怨和不满。他们可以说诸如家庭日用消费品短缺；^① 虽然红色是共产主义的象征，但没必要所有的笔记本都是红色的；尽管拖拉机是社会主义进步的卓越标志，但睡在全部都印着拖拉机标志的枕头上也没有什么益处。^②

1960年，为了缓解城市消费者急迫的困境，城市服务站作为城市公社的一部分成立了。这些服务站提供诸如缝纫、理发、修鞋、修伞、修理工具之类的服务。^③ 城市公社解散之后，这些服务站还保留了下来。实际上，它们取代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小商店、小商贩和以前执行此类任务的小资产阶级。1963年秋，服务站实现了正规化，与街道办事处、当地派出所相对应，广州正式成立了约60家街道劳动服务站。^④ 在农村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通过供销合作社向农民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从而降低了对私人市场的需求与需求的程度，并缩小了范围。

在所有的领域，收缩的一个结果是提高了年长者及更有经验人员的地位，即使他们曾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倾向。^⑤ 经济处于这样糟糕的状态，尽管与所宣传的信念相背离，但对政治的考虑如阶级背景、意识形态的训练等仍从属于对工作能力的考虑。“大跃进”之初知识贫乏而富有热情、在工作单位中处于控制地位的农村青年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年长的、更有知识的专家，而后者更多地受到资本主义的浸染。

1961年，随着专业能力越来越受重视，党的干部被要求放弃一些在“大跃进”期间获得的在生产前线的领导职位，给管理单位留有更大的余地。例如，《红旗》杂志的一篇重要文章提醒干部：党的作用是指导政策，党员应该避免插手日常管理，充当管家婆的角色。^⑥ 不用说，要求党员适应让他们下面的管理者有更多的自由并不容易。党员干部被迫从指挥日常事务的岗位上撤下来、“大跃进”的失败、基层农村干部的整改，

① 《羊城晚报》1961年11月10日。

② 《羊城晚报》1961年11月1日。

③ 《南方日报》1961年8月12日。

④ 《羊城晚报》1963年9月13日。

⑤ 《南方日报》1961年6月8日。

⑥ 《红旗》第20期，第21—25页（1961年）。

这一切使党难以重新恢复纪律和享有 1958 年以前的忠诚与热爱。情况进一步恶化，因而有必要再一次提醒党的干部最基本的纪律教训。省委控制委员会负责人李坚真在《红旗》杂志上一篇关于广东党的纪律的重要文章中认为，要提醒党员“党的命令是建立于纪律之上，它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大跃进’的新局面下，更加有必要加强对不顾全局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约束……必须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①。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尊重党员的意愿，但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应该服从。这样的说法并不新鲜，但在 1961—1962 年，问题非常严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正是传达这一基本的信息。^②

总之，1961—1962 年的状况引发了新的纪律问题。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对私人经济的让步、对个人自由的让步也产生了管理的难题和领导的纷争，这在当时的政治场景中持续了好几年。

1962 年春：放泄阀

开始于 1960 年末的新政策至少在一年内没有使产量明显提高。同时，情况还很严重，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经济前景都令人沮丧。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群众除了随遇而安、忍受困难局面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但广州地区邻近港澳，因而有额外的机会。

每天只有 50 人可以合法离开中国，进入香港，而广州附近每一个体格强壮的人都可以考虑逃亡的可能。广东南部的大多数居民都可以通过众多返回中国的海外华侨那里知道香港的一些情况。那些有海外亲戚朋友的人，如果能够逃离，可以指望在他们的帮助下创造新的生活。而边界巡查很严，逃亡者要冒被抓回受惩罚或在行动中淹死或被击毙的风险。但许多人成功了，当时的恶劣情况令很多人愿意冒险。

因为许多逃亡者很快在边境双方的政府当局都没有发现的时候混入香港、澳门的居民之中，所以没有准确的逃亡者数字。1960、1961 年，

^① 《南方日报》1960 年 11 月 26 日。

^② 《南方日报》1962 年 6 月 20 日。

逃亡者可能有几万人，但还有更多人移到边境附近，等待机会。那些在边境附近被逮住的人通常被遣送到更遥远的内地，但考虑到当时民众的情绪，且又难以证明他们打算逃离，对他们的惩罚一般都不严重。许多被遣送到内地的人渐渐潜逃回边境附近的农村。

到1962年初，已不再有导致逃亡压力的粮食危机。1960—1961年，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和其他疾病还很严重，但到1961—1962年冬季情况有所缓解。^①然而即将加强控制，特别是对自留地、私人市场的控制的谣言广为流传。1962年春，广东出现严重的干旱之后，处处谣传口粮的定额将再次减少。^②

然而，逃亡最大的压力来自那些被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的人。1961年末、1962年初的户口登记，使人们确信控制肯定要加强，那些分配到农村的人更加难以逃回城市。^③那些被下放到农村的人知道，只有一个城市不会将他们再遣回农村，那就是香港。

虽然对一些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来说，逃亡是勇敢飞向自由的象征，但许多逃亡者逃离时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理由。从1961年底开始加强对黑市的控制之后，许多普通的居民担心受到惩罚，而那些较为招摇的黑市商人感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④许多逃亡者是贫穷的农民，他们希望找到更好的生活来源，但其他一些人则是受到批评的人。许多逃亡者是右派分子，或是感到在大陆没有前途的人。

由于香港之途艰苦而又冒险，老年人倾向于接受命运的安排，留在他们更熟悉的环境。逃亡者大多数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陶铸后来批评让这些人逃离，因为这意味着丧失了急需的劳动力。^⑤残酷的体力劳动的新景象尤其让一些村庄的年轻人失望。虽然不清楚1958—1961年丧失了多少大牲畜，但问题很严重，1962年春，广东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养牛运动。^⑥牛是用作牵引用途的大牲畜，但在耕牛长成之前，通常是用四个年

① 斯坦利·卡诺：《他们为什么逃离：逃亡者的叙述》（Stanley Karnow, "Why They Fled: Refugee Accounts", *Current Scene*, Volume II, no. 22, Hong Kong: Oct. 15, 1963）。

② 《泰晤士报》1962年5月16日（伦敦）。

③ 《中国新闻分析》，no. 422（1962年5月25日）。

④ 《今日世界》（香港：1963年5月1日）第2—3页。

⑤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27:1-9。

⑥ 《南方日报》1962年5月30—31日、8月5日、12月7日。

轻人替代耕牛来拉犁。但他们也难以犁得像牛拉的那么深，事实上，这件事根本就很难做。逃亡者中许多是分配来拉犁的年轻人毫不奇怪。^①

在这个关键点上，一个反常的自然现象加剧了紧张的关系。1962年3月19日早晨，广州发生了44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在中国的传统中，干旱和地震被视为是朝廷丧失统治天命的征兆。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确实会认为地震与天命相关。然而，就像现代非迷信的国家美国也有许多宾馆没有13层一样，像中国这样较迷信的国家，地震强化了许多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他们的世界失衡的象征。对于地震小心谨慎的报道及对于地震自然成因的详细解释反映了政府对于民众情绪的敏感。^②

到1962年4月，边境附近的人数明显增加，这里活跃着逃亡的计划与逃亡的故事。广州的官员的第一个举措是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宣布将从重处罚，^③并宣传香港的恐怖之处。直到五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众传媒才直接提到逃亡者的问题。对问题的处理更加微妙。不久之前，美国宣布削减来自香港的纺织品进口，广州的报纸不仅给予充分的报道，而且讨论它给香港人民经济上带来的困难。^④一篇特写的文章中把台湾描写得非常贫困，^⑤而另一篇文章则形容一群刚返回大陆的海外华侨回国是因为不满国外的状况。^⑥一篇关于香港的特写故事中有穷人夜宿街头的图片，还报道贫困失望的父母不能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一名年轻人因为物质上的穷困而发疯。^⑦这些关于香港、台湾的文章不像有组织宣传运动中出现得那么频繁，但足以引起潜在逃亡者的关注。

1962年4月底，广东的官员突然放松了对边境的控制。中国边境卫兵对抓捕到的潜逃者也没有实行人身限制，只是警告他们香港的可怕，并且鼓励他们留下。^⑧几天之内，三四万居住在边境附近的农民拥入香

① 《今日世界》（1963年5月1日），第2—3页。

② 《羊城晚报》1962年3月19日。

③ 《今日世界》（1963年5月1日），第2—3页。

④ 《羊城晚报》1962年3月20日、4月10日；《南方日报》1962年5月7日。

⑤ 《南方日报》1962年5月2日。

⑥ 《南方日报》1962年5月4日。

⑦ 《羊城晚报》1962年5月8日。

⑧ 同注释①。

港，当消息传到广州时，城市的居民也加入到这一行列。^① 1949年以来，从没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开大陆。^②

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正是要从香港要回那些在逃亡行动中被抓获的人并且拒绝接收已在香港定居的人。4月末，英国政府迅速行动，逮捕了那些在逃亡行动中被抓获的人。从4月末开始，估计有1.5万人逃脱了英国人的抓捕，没有返回，但大约有6万人被逮捕，受到起诉，在几周后被遣返回共产主义中国。^③ 香港政府迅速在现存的栅栏之后竖起了新的铁丝网，对边境实施更严格的控制。^④ 到5月12日，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杜绝了逃亡者逃脱的可能。英国人态度非常严厉的消息在潜在的逃亡者之中传开，而广东政府所做的就是要让英国人的行动广为人知。

在4月份，边境控制的重担一直由广东的干部承担着，许多普通的老百姓对政府政策武断，阻止他们去香港不满。到5月中旬，其责任是“英帝国主义”拒绝让中国人进入香港。

中国人直到4月末才探听到英国人的意图，发现香港政府将采取行动遣返逃亡者，他们才打开闸门。临时放松的结果是放松了控制，放出了一些麻烦分子到边境附近，^⑤ 从而把禁止移民的指责转移给了英国政府。5月22日，中国官员关闭了边境，情况恢复正常。^⑥ 5月29日，广州的报纸《羊城晚报》的早版新闻报道：和香港正常合法的联系将恢复，在香港有合法生意的人可以继续使用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往来。^⑦ 6月1日，几千人集合在广九火车站要求登上去香港的火车。当被拒绝登上火车时，群众躁动起来。^⑧ 训练有素的警察在维持秩序，各级官员用大喇叭敦促群众放弃去香港，并驱散他们。虽然有军队赶到以支援警察，但仍

① 弗兰克·罗伯逊：《逃亡者与军队运动：来自香港的报告》，《中国季刊》1962年7—9月号。（Frank Robertson, "Refugees and Troop Movements: A Report from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no. 11: 111-115）。

② 《纽约时报》1962年5月12日。

③ 《远东经济评论》1963年年报，第82页。

④ 《远东经济评论》1963年年报，第93页。

⑤ 同注释①。

⑥ 《泰晤士报》1962年5月23日。

⑦ 《今日世界》（1963年5月1日），第2—3页。

⑧ 斯坦利·卡诺：《他们为什么逃离：逃亡者的叙述》（Stanley Karnow, "Why They Fled: Refugee Accounts", *Current Scene*, Volume II, no. 22, Hong Kong: Oct. 15, 1963）。

然有两三千人整个下午一直留在那里，晚上，广州市长亲自到场对群众发表讲话。次日早晨，仍留在那里的人被告知，他们可以向售票室申请购票，但一旦他们提出申请，就将被带到收容中心，在那里对他们拘留几天，进行关于香港恶劣的一面的再教育。^① 但几天之后，政府开始重新颁发少量的合法赴香港的许可证和车票，但这一次没有公开宣布或宣扬。6月1日的火车站事件是共产党政府在广州面临的最严重的群众骚动，但它却标志着“大跃进”的失败所引起的严重危机的结束。以后的几个月中，广州的气氛仍然紧张，但在夏季，在对台湾海峡危机面临新的战争行动威胁的宣传中，纪律进一步加强。^② 整个经济危机期间，党和政府的组织稳固，而公共秩序或者也包括公众的乐观情绪，随着收缩后效应逐步体现渐渐恢复了。

激进化与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

1960—1961年的严重危机以一种特有的强有力的方式处理了。但一旦紧急情况结束，人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反思，很明显，在1961—1962年已经感觉得到一种虽然不太激烈，但却是更深层的不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适是由于原先的革命精神已不可避免地减弱了，而1958—1960年的失败却使之大大加剧，它还伴随着对北京领导人的智慧的信赖和对经济进步必然性的信心的下降。这是个恶性循环，在这种新的状况下，普通老百姓对于牺牲奉献号召的响应越来越少，而缺乏这种响应又导致更大的沮丧。^③

1958年以来的事件是不容易从理论上解释的。高度集体化的工作带来了惨痛的失败，而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让步却带来了适度的改善。这些结果使许多人怀疑进步和共产主义是否密不可分。一位作者写道：“有的

① 《今日世界》（1963年5月1日），第2—3页。

② 《南方日报》1962年6—7月处处皆是。

③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见理查德·鲍姆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Richard Baum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 ch'ing: The Social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6）；另见理查德·鲍姆等：《广东公社书目指南》，（Richard Baum, *Bibliographic Guide to Kwangtung Commune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

公社社员把经济情况的改善归为自留地、私人开垦更多的土地、私人农副产品和私人市场。”^① 日益增加的私有化的成功使许多人倡导更大的让步，实行“包产到户”。^②

理论学说难以合理化，组织纪律难以维持。当地的农村干部缺少促使农民放弃有利可图的私人商业活动而到公家土地上劳动的办法。企业中部门及主管局的负责人对较具资产阶级倾向的技术人员作出让步，这又使之难以保持“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的热情，他们一直被教导道：革命是为他们自己。文化教育领域的干部努力赢得知识分子的合作，却难以防范他们超出党的指导路线的含沙射影的批评。

日益增长的悲观与个人主义也影响到干部自身。他们在1958—1960年间英雄式的自我牺牲的失败，以及广州实现工业化还要几十年时间这样的前景使他们把精力转向自己的私人生活。干部们力图避免被下放到农村；如果下放了，就力图避免体力劳动。广州的高层干部和北京的高层干部一样，难以使他们底下的干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个人和部门利益，也难以使他们执行并不真正受群众欢迎的政策。

为了克服群众的惶恐不安情绪，1962年末，奉行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坚决的行动，旨在保持对中国及毛主席本人高度的忠诚，克服私有化及“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倾向。与由真正的信仰者推广开来的早期的运动不同，这场运动的调子空洞却又自我保护，而且自始至终都很尖锐，力图恢复正在褪色、消失的信念。运动没有造成强有力的反响，领导人则继之以连续不断的宣传，这样的宣传在1963年以后几年的公共讨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众传媒、广播中的其他话题实际上都消失了。

当群众满耳充斥对社会主义更加忠诚的号召时，国家的领导人卷入了严重的内部纷争。只有最敏锐的、有政治头脑的老百姓才意识到这场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内部分歧的严重性。对于一名西方学者来说，不可能探清每个领导个人的不同观点，许多有分歧的观点的提出都是有资格限制的。但有可能出现两大主要分歧的倾向，这就是当时

^① 《南方日报》1962年10月21日，11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5月18日。

的报纸经常重申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要依据当时的证据来划定所有的领导人在哪一边比较困难，但到1966年，冲突两极分化，所有的领导人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然而，直到1966年以前，一般的干部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上面的斗争的本质与深度。

两大倾向的本质分歧不是产生于共产党与外人之间，或是党的坚定支持者与知识分子之间，或是党与政府的领导人之间。它是以毛泽东及其他党和军队内部的革命激进派（revolutionary zealots）为一边，与另一边的党内当权派（party bureaucrats）之间的斗争，其中心在北京，但它深深影响到广东所发生的一切。

争论发生在一定限度的范围之内。双方都接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组织的本质，都认为在1962年有必要加强国家及合作经济组织的纪律。双方都承认，为了扩大对工业和建设的投资，有必要优先考虑农业、限制消费；双方都认为干部有必要去“生产前线”帮助重建地方组织，青年知识分子要帮助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水平。

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革命造反派是意识形态纯洁主义者。许多人从事宣传工作，而不在管理岗位上。他们为干部道德的腐化、群众支持的削弱以及摧毁中国以前政府的种种弱点所困扰。为了恢复干部的道德奉献和群众的普遍支持，他们号召激烈抨击日益增长的自私自利的趋势与官僚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党内当权派则是负责组织管理的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为混乱无序和生产下降所困扰，“大跃进”所造成的这一后果已把中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维持有序的管理，适应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能力素质，即使这会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在农村，毛泽东主义者号召贫农参与严厉打击从事私人生意致富的干部和富农，虽然这样做会减少他们的上缴收入，并且有导致骚乱的危险。而党内当权派则希望只批判那些过度自谋私利的人，而不干扰干部和中农对生产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文艺界，毛泽东主义者希望根除那些受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影响的作品，尤其是那些间接的却辛辣讽刺毛主席和“大跃进”的作品，集中精力催生那些激励工人、农民牺牲奉献新主题的现代作品。而党内

当权派则希望保留传统的艺术形式，他们对间接批评主观主义和“大跃进”更为宽容。在学校，毛泽东主义者希望根除那些精英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原因而对知识的追求，以及知识分子对普通工人、农民潜在的优越感。而党内当权派则希望保持高质量的技术训练，同时对贫困的工人、农民给予一些特殊的考虑。

在对外政策上，革命激进派希望把革命斗争推广到全世界，即使要冒与苏联断交的危险；党内当权派则宁愿对苏联作出让步，以保持他们经济上的援助与核保护。在党内，革命激进派希望彻底清除那些从事私人活动获利的人和那些脱离群众的人；而党内当权派则希望避免彻底的政治整改运动，认为这样会进一步分裂党、损坏干部的道德信念。虽然党内当权派并非不同意毛泽东主义者号召的“政治挂帅”，但事实上，他们宁愿更多地注意生产。总之，革命激进派是在迎合群众的情绪，呼吁民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精英主义；而党内当权派则精力集中于建立有效的组织、提高产量。

关键性的冲突斗争的舞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革命激进派希望以有力的运动清除反对派，动员群众，从而增加他们对于党内当权派的威望与权力；而党内当权派则希望钝化其运动的锋芒，将运动引向一场无害的教育运动，遏制极端过度，而不破坏生产和他们自己的组织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毛泽东主义者成功地发布了许多宣言来进一步推进运动，而党内当权派则成功地使这些宣言的效力缓和下来。毛泽东越来越依靠人民解放军帮助传达这些宣传信息，使之成为权力的基础。由于毛泽东掌握着权力，党内当权派被迫作出更多的让步，同时用新的手段来暗中破坏革命激进派的努力。这些冲突持续尖锐化，在1966、1967年达到顶峰，导致了党内的斗争扩大化。

广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国同步展开。1961年初，党的大区局恢复重建，中南局管理约两亿人口。中南局重建时，陶铸被提升为整个中南区的第一书记。红卫兵运动期间，毛泽东主义者称陶铸为两面派，说他和党的总书记、党内当权派这一派的关键性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至深。但他也曾在四野林彪手下服务，解放后在中南局工作，如果没有林彪的支持，他不会提升得如此之快。1967年，陶铸不被信任时，他被指

责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支持党内当权派一派。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所有证据表明，陶铸执行了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事实上，他非常积极果断地跟随毛主席，他下面的中层干部都认为他站在毛泽东主义者一边。但陶铸及其在广州的同志也十分注意保持生产，努力防止阶级斗争妨碍生产。也许，对他最好的形容应是党内当权派这一派中较为紧跟毛泽东的一个。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

1966年10月，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说，1958年后，他已经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负责党的一线的领导工作。但毛主席不满业已形成的局面，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重新回到一线领导。^① 八届十中全会的记录清楚表明毛泽东变得更加活跃，对党的讨论中注入了新的调子。在总结十中全会的正式声明中，基调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在世界上还要持续许多年。1962年9月，声明中所突然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1957年关于矛盾的讲话正好相反。1957年，称矛盾是“人民内部的”，其作用是为了降低矛盾严重性，赞成用和平的解决方法。虽然阶级斗争被解释为外部与内部的矛盾，但1962年号召注意“阶级斗争”，是在大肆宣扬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的严重性，要求更大的战斗性。接着，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斗争。

陶铸是最早表示支持毛主席的一个。1962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1周年的一篇重要讲话中，陶铸宣称支持毛主席是唯一的选择。陶铸为他所犯的错误作了道歉，很明显，错误在于他过去没有在各个都支持毛主席。他说，他已经端正思想，紧紧跟随毛主席。^②

然而，虽然他表示全力支持毛主席，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中，陶铸和当时广州的党的各级组织没有显示出任何追随阶级斗争的迹象。以前在这样的号召之后，会随即召开干部大会、组织工作组，而这一次什么也没发生。当然，肯定会偶尔有广东的领导发表声明表示支持

^① 《读卖新闻》（东京）1967年1月7日。

^② 《南方日报》1962年7月2日。

毛主席的号召。广东省委书记，把红旗插到海南的林李明发表声明说，1961年的成功不是由于“小自由”（自留地、农副产品和市场），而是毛主席和人民公社的原因。^① 赵紫阳说，文学和戏剧应该反映阶级斗争。^② 一篇社论中敦促人们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③

这年冬天，和以往一样，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较为温和。^④ 较为富裕的农民因为花太多的时间在副业上而受到批评，^⑤ 一些干部因为公众土地的耕种面积缩减、生产队的劳动较少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私人的劳作^⑥、建设不必要的建筑物^⑦，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用集体的资金^⑧而受到批评。到1962年底，为了抑制一些过火的行为，一些私人自留地重新上交给了集体^⑨，但这样的行动规模小，广东对此实际没有宣传。和1964年初毛泽东能够更有力地推行他的意图而发起的非常强有力的整改运动相比，这些批评是极为温和的。1962年末，广东受到批评的干部没有受到批判和打击，而是用“忆苦思甜”来教育他们。^⑩ 不仅“小自由”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而且在秋收的时候宣布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使他们可以在“农村集贸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上有更多钱花。^⑪

1962年秋，党内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利用引述毛泽东早期著作的言论来巧妙地批评毛泽东现在发起的运动。例如，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毛泽东在1942年阐述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经济和金融工作的主要政策应该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⑫，这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时所努力追求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相差太远。毛主席在号召全面的

① 《南方日报》1962年10月21日，11月25日。

② 《南方日报》1962年11月10日。

③ 《南方日报》1962年10月14日。

④ 《人民日报》1963年3月30日。

⑤ 同注②。

⑥ 同注②。

⑦ 《南方日报》1962年12月21日。

⑧ 《南方日报》1962年12月25日。

⑨ 《中国新闻分析》no. 454。

⑩ 《人民日报》1963年1月11日。

⑪ 《南方日报》1962年12月1日。

⑫ 北京《香港大公报》1963年2月11日。

政治斗争时，陶铸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及其他一些人在强调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性。正如他们所说的，在50年代初，毛主席曾英明地教导说，在集体化之前搞现代化是错误的，首要的是集体化，然后是经济现代化。既然集体化现在已经完成了，有必要集中精力于经济现代化。^① 毛泽东主义者曾贴切地形容这样利用毛主席的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1963、1964年，随着毛泽东获得更大的支持，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被当作是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但1962年10月18—19日，在执行十中全会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仍然在强调技术改造，^② 实际上没有提到“阶级斗争”，更不用说运动了。虽然“政治挂帅”的提法被接受了，但是要服从“为生产服务”。^③ 总之，广东还没有贯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新年：军队的进入

1963年中国旧历新年的时候，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第一次突然爆发出一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热潮。它主要是由军队发起、推动的。

斯大林在遭遇到党的官员抵制的时候，主要依赖的是秘密警察。中国共产党不想重复党与他们的警察（公安机关）分裂的危险，确保公安机关和控制委员会牢牢地处在各级党委的控制之下，但无论是控制委员会还是公安机关都不是独立的传达命令的环节，信息不通过党就不能从下层传递到最高层。虽然，十中全会之后曾作了一些尝试建立独立的控制委员会，但这没有完全实施。因此，毛泽东无法通过警察独立地对党施加影响，他只有军队和民兵。

1960—1961年，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已经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抵消“大跃进”失败的影响，加强巩固军人对毛主席的敬仰。这种努力在林彪元帅及毛主席看来是非常成功的，它在军队内部培育了忠诚而有纪律的拥护者。因为毛主席没有能够动员党的机构在民众中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理解他应转向军队。

① 《人民日报》1963年1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62年10月21日，10月4日。

③ 《南方日报》1962年11月3日。

几乎是自一开始，红军（The Red Army）就在宣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后军队的政治部仍然在群众生活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来军队为了其内部的目的还保留着规模相当大的政治部，而党则建立了自己的宣传网络。军队的政治部每年有两次接触民众的机会，一次是每年的征兵运动，一次是新年。每年的新年被用来巩固军队和军队驻地的民众的联系。军人被提醒要爱人民，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要去帮助群众进行大型劳动项目；同时老百姓也被提醒驻地军人如何帮助他们，多么英勇地保卫他们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军队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扶养军人的家属及退伍老兵，因而也鼓励老百姓对当地的军人家属、退伍军人及革命烈士的后代表达新年的祝贺慰问及提供物质支持。

1963年1月，中国旧历新年庆祝期间，广东的军队在往常的新年祝贺之外传达出另一个具体的信息。例如，在汕头专区，军队的代表向三千多名干部和“群众”代表发表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十中全会的精神”^①。军队的新年信息还伴之以军队中社会主义教育获得极大成功的系列文章。在军队中，基于毛泽东思想的“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工作作风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工作作风好、完成任务好和身体训练好）运动取得巨大的成功。^②军队的代表在向广州各界的领导讲话时，超出了他们以往新年所传递的信息，强调加强集体的重要性。^③合作社被敦促要依靠贫下中农^④，随着革命激进派掌握权力，这一主题受到更多的关注。

几乎与此同时，《南方日报》发表了来自军队政治部的文章，要求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题，但它还发表了来自党的机关的严肃警告，指出这些运动不应该推进得太过火。例如，一篇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某些地方产量下降，文章中说，不是天气的原因，也不是政治思想

^①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4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2日；关于军队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工作，参见《中国红色军队中的政治》，（Chester Cheng, ed.,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e, 1966）。

^③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7、29日

^④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5日。

的失败，因为已经对思想政治工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生产下降的原因是对生产任务本身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论非常明确：“人们可以看到，为了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农业生产，除了继续进行每一项政治运动以外，也有必要把生产方法的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① 为了清楚地确认这一点，接下来的另一篇社论中批评片面重视政治的干部，说：“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农村干部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仅仅在于有必要关心每项政治运动，甚至不必过问生产方法的问题。”^②

通常，民众的宣传学习材料来自党的宣传部，而1963年新年过后不久，主要的宣传材料来自军队，军队召开了一次为期25天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制订新的计划。^③ 军队发布的第一批主要材料以一个战士的故事为中心。雷锋，不管他是不是一名战士，他过去确实存在，不管他的“日记”有多少是雷锋自己写的，有多少是军队的政治部写的，这并不真正重要。无论如何，这些材料获得军队批准，并且受到广泛的宣传。^④ 雷锋成为革命激进派所希望达到的道德典范：绝对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工作、忠诚于孩子、忠诚于年老的妇女、忠诚于毛主席。运动旨在恢复对毛主席及其正确政策的信念。学雷锋的学习材料的导言要求注意“最基本的文章，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军委的指示、林彪元帅的指示行动办事^⑤”。雷锋高于其他任何人，被形容为“毛主席的好战士”。^⑥

1963年1月末，对雷锋的宣传已经开始，并教导全军2月初要开展学雷锋运动。^⑦ 广东军区随即响应。^⑧ 学雷锋运动之后接着是军队发起的学习其他英雄人物的运动，如王杰、欧阳海、硬骨头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拥有“四好”、“五好”头衔的干部、农民或工人。

① 《南方日报》1963年1月24日。

② 同上。

③ 新华通讯社1963年3月5日。

④ 关于运动的辅助性作品，见文森特·V·金：《共产主义中国的宣传运动》，（Vincent V. King, *Propaganda Campaigns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6）。

⑤ 《南方日报》1963年3月3日。

⑥ 《南方日报》1963年2月14、19日。

⑦ 《南方日报》1963年2月9日。

⑧ 《南方日报》1963年2月14、18日，3月3日。

在群众中的运动从民兵开始。民兵被分为基干民兵（主要由退伍复员军人组成，实际上是准备打仗）和其他的民兵（实际上由所有身强体壮的年轻成年人组成）。民兵在各市、县的武装部领导之下，而武装部又在军队的领导之下。军队很自然也很容易组织其领导下的基干民兵举办专门的学习班，而不必经过地方党委的渠道。通过民兵这个渠道，军队可以直接接触到许多基层干部，他们同时也是基干民兵的成员。这就是军队组织学雷锋运动的途径。^①即使在学雷锋运动之后，民兵代表会议还继续被召集起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军队的领导发挥中心作用。^②军队如何渗透进共青团对于外人来说尚不太清楚，但共青团至少要学习军队关于雷锋的材料。^③

军队进入全国性的政治视野加大了地方党政领导紧跟的压力。例如，广州地方的报纸对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行宣传。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元帅之外，所有后来被批判为抵制毛主席革命意志的重要的党内当权派，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必须参加这次会议，并就学雷锋的重要性表态支持。^④

面对来自军队的这种压力，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够轻易地反对这一强调自我牺牲、热爱好人好事的运动。然后广东的党员干部在追随陶铸赞扬雷锋的同时，提出注意生产问题，^⑤而这一点在军队的通告中较少受到重视。1963年4月19日，学雷锋运动全面展开，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指示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不应忽视插秧，当地的干部被告知，要马上采取措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⑥

然而，党内当权派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表现出他们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往一样，陶铸首先采取行动。1962年12月末，陶铸宣布他正在计划出版《南方日报》农村版，把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一直推广到生产队。^⑦陶铸在中南地区各省发行报纸的农村版，到3月初，

① 《南方日报》1963年2月19日、4月11日、5月14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10月26日、6月11日。

③ 《南方日报》1963年2月12日、3月29日。

④ 《南方日报》1963年3月6、7日。

⑤ 《南方日报》1963年3月11日。

⑥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9日。

⑦ 《南方日报》1963年1月3日。

《南方日报》发行的农村版达到24.3万份。^①

学习军队的榜样，广东党组织开始发起学习运动，但其口气还是强调生产，而不是政治。可以肯定，地方上的党内当权派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但竞赛的是辛勤工作为生产服务。早在1962年11月，就选出了模范工人，表扬他们对生产作出的贡献。1963年春，这场运动推广到农村。4月中旬，省委学习军队的榜样，在农村发起了“五好运动”。它名义上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实际上是另一场强调生产的劳动竞赛运动。^②

1963年12月广州市人大会议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一次强调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必须利用四个牢记（解放前的糟糕恶劣的情形），来激发工人阶级的热情，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以便他们努力工作，在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③ 在用来宣传“五好运动”的材料中甚至没有提到“阶级斗争”。^④

在另外一些材料中提到了阶级斗争，但通常是过去时的。老革命、老农民、老工人被组织起来，告诉年青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苦难生活。^⑤ 约有70万人观看了市政府举办的过去几年中社会主义进步的展览，^⑥ 更多的人观看了小社区举办的展览。^⑦ 回忆阶级斗争和赞扬社会主义的胜利是1963年12月广州市人大会议的主题，^⑧ 也一直是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突出的主题。

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名义下，大量的文章不痛不痒地鼓励人们具有真正的牺牲奉献的精神。例如，《南方日报》的长篇系列文章中提出了“真正的幸福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答案不是来自对个人私利的追求，而是来自对国家的忠诚奉献。^⑨ 偶尔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穿插其中。

① 《南方日报》1963年3月15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7日。

③ 《羊城晚报》1963年12月28日。

④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2日。

⑤ 《南方日报》1963年3月21日、4月4日。

⑥ 《南方日报》196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1963年10月9日。

⑦ 《南方日报》1963年7月11日。

⑧ 同注③。

⑨ 《南方日报》1963年4月21日。

一方面，地方的干部被提醒要符合十中全会的精神，不仅必须有运动，而且要斗争，^①但这些告诫很快就伴随着在大公无私道路上自我提高的运动而来的大量空洞口号而消失了。

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号召进行阶级斗争，足以制止辛辣讽刺批评毛主席和“大跃进”的文章，但并不容易直接反击这些讽刺。直接的回应会让人注意到：这些文章事实上旨在批评毛主席，这不是消除毛主席形象污点的有效方法。革命激进派行动起来，恢复毛主席形象的一个方法是发起使每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并加速，直到“文化大革命”。

党内当权派不能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但他们能够展开工作引用毛主席本人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毛主席著作丰富，可以找到他重视生产的引文，重视党和党的干部的重要性的引文，以及重视团结、诱导而不是打击那些不同阶级背景的人的重要性的引文。另一个策略是使学习毛主席著作形式化，而不认真地理会其内容。1963年中期，赞扬林彪最常见的一句话是他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一篇文章在回应没有全心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责时说：“我们常常说我们一定紧跟党中央、跟随毛主席，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跟随他们呢？……我认为……我们紧跟毛主席不是以一般的方式，我们应该非常紧密地跟随他。”^②党内高层当权派提醒低层干部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而党的低层干部教导群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传达和执行指示的方式，却是形式化多于活学活用。

1963年春，广州干部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也许正好可以用陶铸在1963年3月9日发表的重要讲话来形容：提高农村的文学艺术水平。在避免打击富农的同时，陶铸敦促要依靠贫下中农，因为他们是“农村地区最革命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最接近或者是完全符合革命的利益。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坚决地跟着共产党”。但陶铸并不愿意粉饰美化“大跃进”：“过去我们写公社的优越性，我们总是强调农民有许多东西吃，有印花布衣服穿。这些描写表明，我们对农村的现状缺乏深刻的理解。”他的讲话突出的重点是强调农民对于文学、戏剧的兴趣，

^① 《南方日报》1963年4月27日。

^② 《南方日报》1963年3月15日。

并且敦促广东的作家写出戏剧、故事满足其兴趣。他敦促作家运用农民可以理解的方式写作，写普通人，用热情去写，避免千篇一律、泛泛而谈，改进他们的风格。作家不一定要打击敌人，社会主义的作品也可以颂扬好人。^① 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但算不上号召进行阶级斗争。

1963年5月：最初的戏剧改革

1963年5月，紧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革命激进派在两个方面行动起来：戏剧改革和农村组织的巩固。他们还采取行动就苏联签署禁止核试条约发出警告，并且几周之内发出一系列的信件批评苏联。但这些外交政策对广州的影响甚微。

毛泽东主义者对待艺术的态度本质是缩小其可接受的范围，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的，要“一分为二”，也就是对于非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作品要划分更严格更清楚的界线。如果坏人被写得太有吸引力，或者工人、农民被写得有瑕疵缺陷，作家就应该受到批评。任何描写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故事都被认为是对毛泽东的阶级路线的批评，因为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是号召进行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作家”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想写历史题材，保持历史风格、姿态及音乐的完整性。他们想写个人及家庭的事务、赋予他们的角色更丰富的个性。一些人无疑想参与对官僚作风进行微妙的批评、对异端观点表示更多的同情。一些大胆直言的作家抱怨最近的文艺指导路线方针太严，新的戏剧、故事不可避免地千篇一律、呆板乏味。另外一些作家不加抱怨，只是不创作新的作品。

戏剧改革运动开始于196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会议本质上是号召紧跟毛主席的艺术路线。3月份，也就是北京的会议召开仅两个月之前，陶铸的精力不是集中于阶级斗争，而是集中于向农民推广文化。^② 3月份，王匡（“文化大革命”中广东倒下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和赵紫阳、区梦觉一起自豪地向农村派出剧团，他们还在上演

^①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9日；JPRS，no. 20025:100-119。

^② 同上。

传统的粤剧。^①

但遵照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的精神^②，陶铸、区梦觉和其他一些省委领导迅速行动起来，召开新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从1963年5月21日到31日，400多名广州文艺界的领导参加了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大会。作家们被告知，需要更多现代戏剧题材的作品，文学应该帮助工人、农民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一步深化阶级斗争。^③几个月后，从10月10日至30日，在陶铸、区梦觉的主持指导下，召开了另一次大会，要求深化“十中全会的精神”，推动文艺界的阶级斗争。^④

但这些运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例如在音乐界，音乐家被告知，轻音乐和无害的音乐，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允许的，抒情歌曲和讽刺音乐也能激励人。^⑤陶铸在运动中推进现代粤剧受到北京的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广州，陶铸陪同观看了一场现代粤剧演出。周恩来赞扬了陶铸的努力。^⑥然而陶铸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深入。1963年下半年，广州上演的236出戏剧中只有38部、约11%是现代戏。广东全省的1790场演出中，只有14%是现代戏。^⑦这种努力成绩有限，使得军人很快就取代了党的干部，成为戏剧改革的领导者。^⑧创作现代戏的努力被大量宣传，也确实催生了一些新戏，但它并没有真正削弱传统粤剧的流行或上演。

1964年新年：军队作用的扩大

早在1963年，军人已经开始进入地方政府组织，给予政治指导。^⑨但在1964年中国新年期间，通过“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军人的作用大大扩展。和往常一样，陶铸迅速采取行动。到1964年2月，运动在全

① 《南方日报》1963年3月7日。

②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2292:20。

③ 《南方日报》1963年6月6日。

④ 《南方日报》1963年11月15日；《羊城晚报》1963年11月15日。

⑤ 《南方日报》1963年10月27日。

⑥ 《羊城晚报》1963年12月13日。

⑦ 《南方日报》1964年2月9日。

⑧ 《南方日报》1964年2月20、25日。

⑨ 《人民日报》1964年2月20日。

国范围内全面发动和展开。为了开展运动，2月2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①但在1964年1月25日对先进代表的讲话中，陶铸敦促人们要“学习人民解放军”，要依靠贫下中农，却同时和以往一样，他仍然强调保持生产高潮的重要性。^②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州召开大会推动学习解放军。^③在某种程度上，运动名义上是一种学习竞赛运动，社会上“较为落后”的单位、部门通过不断的“比、学、赶、帮”，向“较为先进”的学习。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敦促地方单位和军队进行比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多么落后。例如，敦促地方单位承认在工作作风朴素、参与群众活动、认真彻底学习毛主席著作及参与体力劳动等重要事情上，军队走在了前头。^④

到1964年，陶铸比全国的许多政治领导人更尽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教育。1965年1月，他大胆的工作得到回报，被提升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在1964年初军队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时，陶铸写了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章——《人民公社在向前进》，文章本质上是为当时组成的人民公社辩护。他引用列宁的话说：“小农的重塑、整个心理和习惯的改造是几代人的任务。”也就是说，改变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陶铸认为公社化初期由于缺少经验所致的错误已逐步纠正，现在生产队作为管理的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因为集体化已经完成，摆在前面的任务是机械化、电气化，以及生产制造化肥、农药。陶铸说：“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基础日益巩固……（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措施、政策……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他们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已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陶铸没有直接批评军队，事实上他连提也没提军队。^⑤

军队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文艺方面。1964年初，军队的政治部开始施加压力，1964年2月5日，1000多人在广州集会庆祝广东派出剧团到农村去的伟大成就。^⑥然而5天之后，广东文学、戏剧界的这些努力由于现

① 新华通讯社1963年3月5日。

② 《南方日报》1964年1月26日。

③ 《南方日报》1964年2月12、25日。

④ 《人民日报》1964年2月24日。

⑤ 《南方日报》1964年2月29日；另见：《红旗》第4期（1964年2月26日）。

⑥ 《南方日报》1964年2月6日。

代戏剧的“声音非常微弱”、广东没有执行文艺改革，而没能逃脱严厉的批评。^①几周之内，军队政治部的剧团取代了广东地方的剧团面向民众上演新戏。招呼一群北京的要人观看、欣赏军队的剧团在广州表演使陶铸处于尴尬的境地。^②对广东文艺界的严厉批评及军队政治部作用的扩大是对创作新剧的鞭策。1963年底，只有38部现代戏上演，到1964年9月，已有了83部。^③

1964年，在军队于农历新年有力地介入后，一篇当地的文章承认，模范英雄人物更多是根据生产领域的成绩，而不是从政治领域中选拔出来的。文章宣称，虽然学习模范英雄人物的运动已进行了一年多，但现在才第一次不再是严格的经济运动，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④

然而，即使如此，将这些竞赛运动引向政治的工作也受到顽强的抵制。重点还是很大程度上放在经济上的学习竞赛上，^⑤特别是在“学上海”运动中。^⑥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城市之一，当时所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和思想意识，而是生产能力。先进的工人从广州被派到上海，^⑦然后，广东其他地方的工人则被派到广州学习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大会上，当时所有人都被鼓励改造思想、学习解放军，而那些参加大会的人则被告知要“集中一切精力于生产之上，一切为了生产”。^⑧

然而，学习解放军运动导致了一个权力上的突破，对党内当权派比对军队指示、文学、戏剧的传播造成更大的威胁。十中全会之后不久，经济单位中的民兵被派去参加专门学习会，^⑨退伍军人被安置到经济单位之中。^⑩例如，1964年初，在商业领域中，曾报道说：“去年以来，党和政府转业了大量的军队干部到基层商业部门工作，这些干部已经熟练地

① 《南方日报》1964年2月9日。

② 《南方日报》1964年2月20、25日。

③ 《南方日报》1964年9月5日。

④ 《人民日报》1964年3月6日。

⑤ 新华通讯社1964年4月24日。

⑥ 《当代背景》(CB) no. 731; URS, 35:101。

⑦ 《羊城晚报》1963年11月28日、12月11日。

⑧ 《南方日报》1964年5月24日。

⑨ 《南方日报》1962年12月25日。

⑩ 《南方日报》1964年7月21日。

学会了如何工作。”1964年初，这样的工作大为扩展，指示非常明确：“所有转业到商业部门的军队干部在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上必须起到带头作用。”^①所有的商业和金融单位都要成立政治部，由军队配备人员。^②新近退伍的军人在党的机构中地位上升，并且向较早前退伍的军人发出呼吁，试图建立起支持的基础。^③此外，金融和贸易部门还派出其他人员在军队政治指导员的指导下进行短期的政治工作学习培训。^④在一次全广东金融、贸易系统的广州军队政治部负责同志大会上，传达了军队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⑤

越南紧张状态的升级很自然也很容易增强了军队和民兵在民众组织中的作用。北部湾事件之后不久，1964年8月23日，广东大约有30万名民兵进入了训练营。^⑥从8月25日至9月6日，省级干部开会推进金融、商业系统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⑦

军队的政治部还扩大其在其他组织的权力。与商业和金融领域一样，在工业和交通领域也成立了新的政治部，其人员由军队派出。^⑧广东省军区为县级及农村干部提供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工作培训，传授军队的经验，传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价值意义。^⑨专业人员如医生、护士被派出去向军队学习。^⑩由于军队人员的这一新用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进比以前更强劲有力。

1962年后，毛泽东主义者试图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像中央在广东进行土改那样的成功。正如土改是建立中央政府控制的工具一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建立毛泽东主义者控制的工具。然而，党内当权派组织完善，遍及全国，事实证明，和10年前的广东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人相比，1962年他们是更强有力的对手。

① 《人民日报》1964年2月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4年6月7日。

③ 《南方日报》1964年7月21日。

④ 广州广播电台1964年4月24日。

⑤ 《南方日报》1964年4月12、14日。

⑥ 《南方日报》1964年8月24日。

⑦ 《南方日报》1964年9月7日。

⑧ 新华通讯社1964年4月3日。

⑨ 《南方日报》1964年4月17日。

⑩ 广州广播电台1964年5月23日。

毛泽东主义者显然希望迫使党内当权派批判、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他们和潜在的支持者隔离开来的地方干部。他们明显希望来自军队、新近退伍的军人、民兵、贫下中农协会的压力，结合要害位置的基层党组织的官员的批评，迫使主要的党内当权派屈服。而反过来，它又强化了他们的抵制。

毛泽东主义者成立由外来者领导的政治部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努力绕过并削弱他们的权力。因为抵制过于强烈，毛泽东主义者孤立主要的反对派、赢得中间分子的工作并不成功。1966年，毛泽东主义者被迫发起了规模更大的运动，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运用了非常不正规的手段，来打倒党内主要的对手。

1963年起：农村的“四清”运动

村级以上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希望下级接受并完成更高生产额度的水平。个人主义被视为敌人，因为它把精力和资源消耗于不是国家计划上的小手工业和消费品项目上，对此他们没有负责任。处理过度个人主义的主要方法除了宣传为集体牺牲奉献的美德之外，还要派干部纠正下面的错误倾向。在运动之初，就有干部被专门派去那些在完成集体责任方面落后的生产队和大队。

省里的干部没有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因为它会有损于其“下放”的下级的士气，而且还会增加留下来的人员的工作负担。基层的干部也清醒地认识到上级下来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为了让他们恭维上级工作好。他们希望上级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免职，使之受到羞辱和惩罚。下到基层的干部不太熟悉当地的情况，由于担心会削弱他们自身的权威、有损于生产，甚或会强化当地的抵制，他们不愿意把对当地干部的批评搞得过火。他们发现避免触动当地的情绪会更好过些。并且，他们同情当地农民的困境，因为担心进一步影响农民的积极性，降低其生活水平，而不愿意限制其私人活动。高层派下来的干部宁愿在基层消磨时间，并尽快重返高层。

和土改时期一样，北京的外来干部比当地干部更加着力推进运动向纵深发展。1963年5月20日，中央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指示，标题为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决议（草案）”，^①这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前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文件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草拟的。这个文件中清楚指出，毛主席不满意十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展。文件号召进行一次“四清”运动，批判打击账目、仓库、工分和物资管理中的违规行为。“前十条”要求学习河北的榜样，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河北早在1960年就成立了这样的协会，领导那些更加忠诚于集体的人和外来者合作，批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和干部。^②

由于担心农村的混乱，广东省的领导希望确保贫下中农协会还在当地党组织的指导之下运作。即使在1963年5月之前，广东的干部已经在压力下更多地利用贫下中农，但到这时他们还没有成立任何协会。省里颁发了一道通知，鼓动当地干部依靠贫下中农，但也引用了毛泽东1955年的讲话，说利用下中农的生产能力非常重要。^③陶铸在提到贫下中农协会的想法时，仅仅是建议偶尔有几次贫农代表的会议，^④这和毛主席想要的将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相差很远。

文件传达几天之后，1963年5月，广东省的领导干部宣布要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基层的干部被告知，这些协会不应该只是简单的马虎了事。^⑤地方上的党内当权派在成立这些协会方面作了让步，但他们还在作出各种努力来保证使之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虽然这些协会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攻击的，^⑥但广东省当局的指示非常明确，贫下中农协会要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些协会要在促进生产上起带头作用。^⑦在广东的指示中，协会不仅要进行打击批评，而且要“团结”中农，^⑧也就是对待比较富裕的农民采取宽大的立场。在“四清”运动认真开始之前，贫下中农协会的成员只不过是生产队干部的助手，协助解决生产、分配和福

①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决议（草案）》。

② 同上。

③ 《南方日报》1963年4月6日。

④ 《南方日报》1963年4月19日。

⑤ 《南方日报》1963年5月25日。

⑥ 《南方日报》1963年5月28日。

⑦ 同注⑤。

⑧ 同注⑥。

利方面的问题。甚至在运动开始之后，只有在一些试点地区，在外来的高层工作组的指导下，这些协会才对当地干部形成威胁。^①

在尽力避免这场政治运动的破坏性的工作中，一份来自北京的新文件对地方党内当权派帮助很大。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② 1963年9月颁布。这是两个被称为“后十条”的文件的初版，其修订版在1964年9月颁发。根据后来官方宣布的资料，1963年9月的文件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颁发的。^③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及其拥护者指责“后十条”完全背离了“前十条”，但背离得很巧妙。

“后十条”初版一开始就宣称，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前十条”中的总方向更加具体，但当时在定义解释具体的指示时，削弱了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及“前十条”中所传达的阶级斗争的精神。它指示，对那些走个人主义路线的人应该给予“说服和教育”，而且只有最严重的情况下才给予“适当的批评”。甚至没有用“斗争”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应如何处理这些严重的情况。事实上，它说得很清楚，不要有大型的斗争会，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应该因为他们的反抗而野蛮地给他们“戴帽子”。矛盾应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富裕的农民如果依靠集体，就不应该被划为富农，也不应该仅仅简单地因为一个人大致的政治态度而将其划为富农。虽然有贫下中农协会，但其成员首先必须“受教育、有纪律”，它应该明确地服从于当地党的干部。^④ 这不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有力的运动的意图，但对于那些渴望避免一场不顾后果、可能会妨碍生产的运动的地方党委官员来说，它肯定是受欢迎的文件。1963年12月21日至29日，在广州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1000多名代表，包括各县农业局局长和农业技术培训机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讨论的焦点是农业生产和引进技术改进的方法。会议的报告中甚至没有提到阶级斗争。^⑤

① 《今日世界》第296期（1964年）。

②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963年9月）。

③ 《北京周报》1967年12月1日、11—19日。

④ 同上。

⑤ 《南方日报》1964年1月19、21日。

1964年夏初，刘少奇访问广州，情况似乎很平静。然而，到夏末，局势已经变化。随着“四清”超出试点及军队政治部、民兵及贫农协会开展活动，^①紧张局势升级。每个公社至少有一名干部负责管理民兵的活动，他主要对军队负责，而不是对当地公社党委负责。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军队政治部的发言人对民兵发表讲话。^②基于民兵中的退伍军人不像一般的农民那样害怕地方干部，^③因为如果有冲突，可以指望民兵及公社总部的上级支持，这些上级鼓动他们成为贫下中农协会中的积极分子。由于许多退伍军人对他们从军队中退伍时没有被安置到更高的位置上而非常失望，他们愿意担任贫下中农协会领导的角色，领导对更多从事私人活动的干部进行批评。在1963年9月对民兵工作的指示中，已告诉民兵要参加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④1964年中期后，随着华南地区中国人日益卷入越南战争的危险增加，地方民兵组织很自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但在军事上做准备，而且还要为受到美国袭击时打游击战争做思想上的准备。^⑤

随着这些新的组织基础的建立，反对个人主义的运动第一次更多地针对干部自身。通常，基层干部的模范行为被认为是克服农民过度自私的关键所在。如果基层干部花更多的时间在私人自留地和市场销售，而不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如果他们仅仅因为是行政管理领导，而不是在土地上劳动就给自己记上许多工分，或者，如果利用大队的手工产品和销售作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源泉，那么，就不可能指望他们下面的农民全心全意投入集体的生产。到1963年，这些问题非常普遍，因而，“四清”运动的焦点集中于基层干部。“四清”工作组由外来的高层干部组成，1963年底派出，1964年初到达地方干部问题特别严重的试点地区。在前往村庄之前，工作组成员对地方干部的记录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他们到村庄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赢得其信任。许多村民不愿意批评地方干部，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在以前的工作组离开村庄后，地方

① 《南方日报》1964年7月25日、9月15、24日。

② 《问题与研究》第2卷，第1期，第44页。

③ 《羊城晚报》1966年2月3日。

④ 《怎样当了民兵》（北京），1963年9月。

⑤ 《南方日报》1964年11月8日。

干部是如何对待批评者的。外来的工作组要让农民相信他们不必担心批评错误的干部，通常这要用去几个月的工夫。虽然当时进行批评的情绪必须首先通过批判熟悉的对象——四类分子来酝酿准备，但最后，在试点地区80%的地方干部受到批判。

虽然运动超出了试点地区，但也不是都那么激烈。虽然有在城市中要进行新的“三反”、“五反”运动，农村中要进行第二次土改的恐怖谣言，但有些地区仍几乎没有为运动所触动。来自上面的自相矛盾的命令在地方上产生了混乱，地方的干部自然会追随他们上级的领导。但在有些地方如中山县，运动非常紧张，很快扩大到少数试点之外。^①

然而，在大部分地方，运动进展缓慢，不仅是因为从试点推进到更广大的地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还因为党的高层领导的抵制。到1964年秋末，基层干部被警告要接受贫下中农协会的批评。^② 贫下中农协会被组织进大队以上的更高层，因而给予地方协会批判地方干部以有力的支持。然而，与此同时，高层干部和党的普通干部有时会成功地暗中阻挠运动。

到1964年末，省委的主要领导下到试点推进运动，他们所到的地方运动非常激烈。例如在由陶铸前往领导运动的花县这样的小地方，陶铸后来被指要为二十多名当地干部的死负责。^③

1965年1月，北京用更激进的文件“二十三条”取代了“后十条”。这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批判的焦点从农村的个人主义转向抵制号召阶级斗争的党的机关。党内“四清”的四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与清组织。^④ 批判斗争的新焦点现在非常清楚：是从农村到广州、到中央自身党的各级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干部要证明自己清白的新压力，在农村引发了一场更为严厉的运动。贫下中农协会召开新的会议，到1965年6月省级会议时达到顶峰，并且有广东军队的大量领导参与其中。^⑤ 从军队介入之初，军队在指导地方事务的活动中从没有发挥过像现

①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1966年1月27日。

② 《南方日报》1964年9月7日，10月11、14日，11月2日。

③ 《当代背景》第824期：《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578:28。

④ 《南方日报》1964年12月26日。

⑤ 《南方日报》1965年2月10日、4月20日；《羊城晚报》1965年6月15日。

在那么积极的作用。^① 广东省的党领导不仅使农村的运动激进化，而且在1965年8月，他们还发起了另一场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②

显然，在1965年末和1969年初，比起其他省份的领导人，陶铸更加大力推进运动的发展，因为在1966年春，广东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人民日报》的一系列文章宣传它的成功经验。^③ 虽然，运动在广东的许多地方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到1966年中期，大多数村庄仍然没有被触动，因为北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抨击更高层的党的领导干部，使他们得以幸免，至少暂时如此。

信念与实践的分离

根据毛主席著作的主要阐释者陈伯达的说法，毛主席的伟大成就之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道德信条，而在共产党统治的初年，许多人的行动是基于相信中国、相信群众的利益、相信未来。

到20世纪60年代初，道德信条已不再那么强有力了。党的领导人陷于复杂的个人的责任网络之中，这让他们比最初被分配到指定的地方时，更难以实现国家的目标。由于繁荣兴旺似乎越来越遥远，地方干部不太乐于为未来作出牺牲，他们更加倾向于考虑自己个人的生活。1960年冬，农村干部由于在“共产风”中做得太过火而受到村民的抨击，他们的接替者不太愿意、有时害怕会因为取悦上级而忽略了当地的情绪。地方党委官员对制度的掌握更有把握，通常会一方面向上级的命令低头屈服，口头上顺应其意愿，而另一方面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对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的让步削弱了对集体的忠诚。对办公室、学校、工厂追求工作质量的让步削弱了阶级路线。而对文化、知识及工作习惯正规化的强调，使资产阶级、地主家庭的孩子获益，而损害了农民孩子的利益。学生凭借考试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对生产更多的工人进行奖励鼓励了

① 广州广播电台1965年7月28日。

② 赵紫阳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1966年8月）。

③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3日—7月9日随处可见。

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这使干部和技术人员脱离了群众。这种分离削弱了“政治挂帅”和普通工人、农民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要保持因对现实妥协而正在被削弱的信念。它努力传授道德信念、灌输对集体的忠诚、高唱工作和工人至高无上，而社会结构却产生相反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淹没于道德信条之中，淹没于道德英雄的榜样之中，淹没于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对公共事业忠诚的文章之中。虽然一些干部由于道德缺陷受到批评，甚至被打倒，但是奖励仍然是依据业绩表现而不是道德品质来进行分配的。

可以肯定，毛泽东主义者努力执行他们的道德准则。干部和年青人被下派到农村去纠正他们的道德缺陷，改进他们和群众的联系。贫穷的农民被动员起来去抨击较富裕的农民和为自己谋利益的干部。遵守纪律的军人被安置到政府部门工作，以遏止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年青人——“接班的一代”被派下去检查农村的账簿，发起了狂暴的运动“下放”和打倒“四类分子”。几年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主义还在蔓延，“文化大革命”由此发起。重建工作需要让资本主义作出让步，虽然对信念进行神圣化与宣传，但其影响并没有被清除。

对信念的神圣化没有比对毛泽东的崇拜的上升更明显的了。和西方的政治领导人相比，毛泽东所担当的角色总是高高在上的、半神圣的。他不在广播或电视中发表讲话，新闻报纸也不披露他的个性或私人生活的细节。在电影上看到他时，他只是向崇拜他的群众挥手。他的动机从不被公开提问或者是分析。他总是值得学习的典范。他的政策总是正确的。“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神圣性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是由于他做了很多工作去抬升自己，另一方面是由党内当权派做工作把他抬高到君王般的地位。因而，一旦登上宝座，尽管他自己脱离了日常的决策，他的名字还可以起到促进国家团结的作用。1958年，但更明显是在1962年后，毛泽东被比作太阳和星星。发明家、体育明星宣称他们获得成功是读了他的著作。他的著作不仅要读，而且要牢记。他不只是个领导人，而更是神。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对待他像对待“一位既往的先人”。

中国的领导人总是强调人的因素、个人道德的重要性。在三年困难

时期之后，领导人大力恢复群众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及对于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宣传信念的新工作克服不了经济发展和人员组织上棘手的现实问题。学习保持了理想，而这些理想成了神圣化、仪式化的东西，脱离了日常生活。

第八章 政治复兴主义， 1966—1968年2月

从1965年9月的中央会议开始，毛泽东拥护者和党内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迅速升级到顶峰。1966年5月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之突然显现在公共领域。经过大约两年，在运动结束之前，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党内政治斗争。但毛泽东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思考，而不只是维护其晚年的权力。他想要他的继承者忠于他和他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变革的理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党内斗争，而且是一次关系到政治正统的激进理想主义的复活。

主要参与者的策略

和斯大林在他的党内大清洗不同，毛泽东没有杀掉他的主要反对者，而是把他们监管起来，使他们受到羞辱。他没有依靠秘密警察，而是依靠军人和群众组织。虽然他秘密免除了反对派的职务，但他很快进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和大字报运动。总之，毛泽东比斯大林更关心群众的情绪，更希望他们参与到对反对派的批判谴责之中。

以前群众参与过整改运动，但目标人数很少，运动可以有秩序、有计划地进行管理。在1966—1968年的大动乱中，受害者人数众多，不可能依靠党来指导运动。为了指导运动，毛泽东主义者必须成立特别的秘密组织，从军队、民兵和某些群众组织中挑选人员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层面，由北京的“文化革命小组”领导。由于群众动员会涉及许多人，毛泽东的对手也有办法制造混乱、削弱运动效果。毛泽东主义者在努力把他们的信息传达给群众的时候，愿意忍受一定的混乱，但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限制攻击的范围。就像1949年、1950年那样，毛泽东主义者依靠年轻人把消息传达给群众。在大字报、小册子、大会和小

组会上，年轻人有助于激发群众对党内“资本主义叛徒”和“修正主义者”进行攻击的情绪。刚开始，指示非常模糊，以至于年轻人必须自己作出基本的判断。渐渐地，官方的媒体即使有时较省略，但更加具体地提到攻击的目标。大多数时间里，在官方的媒体中，刘少奇只是被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当权派”，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被叫做“广州的谭震林”。到运动结束时，对打倒的对象和对他们的严厉惩处已作出决定，官方的报纸准确地说明谁应该受到批判及为什么。

党委官员一方无法与军队中的毛泽东主义者相比，他们也不可能希望赢得群众的支持直接批判毛泽东。他们没有控制广播电台或官方的报纸去直接而有力地抵制毛泽东主义者。他们运用权势不强的人的传统技巧进行抵制，使反对派中产生混乱、渗透并组织群众组织、撤销放弃计划方案、制造混乱、进行破坏，并且在字面上遵照毛泽东主义者的指示，然后夸大其词，他们使群众对毛泽东主义者的工作产生反感。正如毛泽东主义者所抱怨的：他们的对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群众组织由处于学龄阶段的红卫兵及社会各界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组成，他们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当各种力量受到操控去赢得他们支持的时候，群众团体也顺势加以利用来关照他们自己的利益，使他们显著提升到权力的更高层。群众组织的成员包罗万象，从穿便衣的有纪律的军人、富有经验的党的领导、复员退伍军人、理想主义的青年到心怀不满的工人、自私的青年、流氓帮派都在利用这些机会。通常他们是在工作或学习的所在地组织起来的，但所有这些完全不同的团体彼此间建立了联系，或是响应上级的指示，更主要是对其扩展权力的机会作出反应。

群众团体代表各种不同的地方利益，受到北京不同派别的领导人的支持。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所有群众团体都声称他们是毛主席及其方针原则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声称站在群众的一边、革命的一边、“左派”的一边。他们批判他们的对手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右派分子、假左派、阶级敌人、国民党的同伙或工具。他们的宣传中有经验丰富的干部深思熟虑的声明，也有涉世未深的青年随随便便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声明，年青人对他们所做的超出毛主席于革命定义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准确的概念。

在毛泽东主义者鼓动斗争的时期，群众团体利用手边的工具进行打斗。有时他们抢劫军队和民兵的武器库，或是受到某些军队首长的默许拿走军队的武器，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他们所能找到的可以用来进行肉搏战的工具。他们放火，破坏火车，占领公共汽车，进行帮派战斗。正如一份公告中所说的，他们利用“手榴弹、自制手枪、地雷、雷管、硫酸、666杀虫剂、链鞭、匕首、砍刀、日式长矛、切菜刀和其他致命的武器”。^①

军队的武装力量并不统一，尤其是在1967年初，重要的党委官员受到批判之后。但在1966年秋，军队为红卫兵提供关键性的后勤支持。北京的军人曾招待过上百万名到首都的红卫兵，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宿和他们串联到全国各地的交通。军官担任较大规模红卫兵组织的政委或顾问。在情况变得太混乱时，军队开进关键性的工业领域、公共设施及交通、通讯中心，防止破坏，维持或恢复其功能。1967年初之后，军队更深地卷入地方事务的管理之中。1967年秋，军队的领导人成为核心，其周围是重组后的党和行政管理单位。总的来说，军人纪律严明，除非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交通、通讯的全面崩溃，都处于红卫兵团体组织的直接战斗之外。一开始，地方军队的干部难以判断决定支持哪些团体，但渐渐地，他们较倾向于有能力维护秩序和有正确意识形态的团体。甚至在1967年春、夏，他们接到北京支持革命派的指示时，也想方设法表达这些倾向。

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多数农民，努力保持在斗争之外。当号召他们参加会议时，他们就参加，当号召他们讲话时，他们就讲话，但都根据他们对当时力量平衡的估计及他们谨慎的本能来行事。当他们的财产受到到处游荡的红卫兵组织或从事掠夺抢劫的流氓侵犯时，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忙于他们自己手头的事务，尽量避免有触犯任何团体，尤其是他们附近的团体的言行。

毛泽东主义者处于是尽力推动批判、冒面临混乱的风险，还是平息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3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48:7-10。

批判、维持秩序的两难选择中。随着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毛泽东主义者制造了更多的反对派，因而更加混乱。随着他们开始稳定地方的行政管理，限制打击批判，权力趋于下放到许多以前的掌权者及他们的下属中不相信毛泽东主义者乌托邦理想的人手中。毛泽东主义者对这一两难局面的基本回应是随着批判的潮流而采取行动。他们发起强有力的打击批判，直至推到混乱的边缘，然后作出让步、重建秩序，等待新的机会扩大打击。打击批判和让步的起落并不单纯是认真计划的结果。决策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北京权力在派系间的转换，以及各省对打击批判的抵制。

在广州，这些基本的策略和全国是一样的，但广州每年举办两次国际商品交易会，对广州对于混乱的容忍度构成了额外的限制。从4月15日到5月15日，10月15日到11月15日，广州当局必须维持足够的稳定，以防止对参加交易会的外国来访者造成意外事件。1967年秋，局势非常混乱，交易会的开幕不得不比平时推迟一个月。除了这次之外，交易会按正常时间举行时，军队布满全城。

虽然，从1966年到1968年2月这一时期是混乱的，但广州所发生的事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如下几部分：红卫兵的发动（1966年8—11月）；冲击党的首脑机关（1966年12月—1967年1月）；过渡到军管（1967年2—5月）；群众武斗（1967年夏）；最初的政治重建（1967年9月—1968年2月）。^①

1966年秋：红卫兵的发动

根据周恩来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16日在北京发起。1966年5、6月间，批判打击的中心在北京，目标是北京市党委和教育、文化领域的国家领导人。但在响应要在党内批判打击掌权者这一公布的目标时，广州党的领导人变得紧张起来。在广州，党的领导人对这一压力的回应是尽力推进在本地的学校研究北京的反面例子的运动。

^① 在1967年中期，广州的毛泽东拥护者是这样划分阶段的：1966年7—10月：红卫兵的组织；1966年11月—1967年2月：当权派得胜；1967年3月15—4月15日：“恶风”吹；4月15日后：革命力量成长。《共产中国文摘》（*Communist China Digest, CCD*）no. 192:69-76。

然而，在夏季，广州党的领导人面临的压力比其他地方的领导人的压力要小，因为6月1日在北京的人事洗牌中，林彪信任的老伙伴陶铸得到提升，被召到北京，很快成为直接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全中国第四号人物，因而，开创了广东领导的一个光荣时期。但这种光荣为焦虑所冲淡，并且事实证明这种光荣是短命的。陶铸带着中南局两位书记王任重、张平化及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还有陶铸自己的妻子、广州市委书记曾志去了北京。^①凭着所有这些在北京的忠实同志，陶铸信任的追随者赵紫阳充满了希望。

6月初，陶铸到北京担任新的职务，他指导由党派出的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虽然陶铸和他在北京的同伴比许多党内当权派更像一个毛泽东主义者，但陶铸仍然受到来自毛泽东及其妻子江青直接领导下的“左派”的强大压力，去更快、更有力地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他们的政治对立面。陶铸和他的伙伴从北京派出党的工作组，尽力让运动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在更极端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手中，这些人在军队的政治部中和江青的工作关系密切。党的工作组进行强有力的运动，一方面批判打击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以前的许多次运动的牺牲品；同时批判打击那些不太正派、好斗的“左派”，他们试图从党内当权派手中篡夺权力。由于他们试图避开这场激烈运动中的革命者，后来党的工作组被指控为形式上的“左派”、实质上的右派。他们从5月底到7月末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冒险的“左派”分子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后来这被指责为“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

好战的毛泽东主义者如江青不满党的工作组妨碍了他们战斗性最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本人也对工作组不满，5月底、6月初，他鼓励北京地区主要的红卫兵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北京，在江青的鼓动下，革命青年——大多数是军事院校的学生，或是地方院校中高级军官的子女，开始同较为保守的青年们展开战斗，后者通常是由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领导的。到7月底，这些斗争大体上还限于北京。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10月2日；《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3月，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578: 23-32。

8月初，毛泽东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1962年秋以来的第一次。江青后来承认毛泽东主义者未能指挥大多数中央委员，但在这次全会上许多党的高级干部缺席，坐在他们位置上的是“军队的同志”和“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包办了这次全会。由于要采取行动发起针对党内高级当权派的运动，毛泽东向年青人寻求支持，他们是中国群众中最革命的、最有效的宣传员。8月中旬十一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并且邀请其他的革命青年来北京。根据共产党官方的估计，在接下来的4个月中，大约有1100万名革命青年来到北京，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毛泽东一宣布在北京组织红卫兵，广州许多显然没受多少监管的当地青年，想证明他们是革命的。他们开始戴上标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色的军队臂章，走上街头分享光荣，并且参与到他们有所怨恨不满的各级干部的批判之中。

虽然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上升，但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仍处于非常大的压力之下。陶铸打电话给赵紫阳，敦促他采取有力的行动，以免受各种事件的冲击而被打倒。^①他还进一步敦促赵紫阳要保持党对学校中的青年革命者的控制。^②赵紫阳争分夺秒，8月19日，陶铸忠实的同志区梦觉在广州召开红卫兵大会。^③广州的红卫兵在党的领导下采取行动，捣毁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文化的象征及“四旧”（旧意识、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的象征。他们拆毁路牌、门牌和庙宇的塑像，取而代之以歌颂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标志。他们在报栏和公共建筑上张贴大字报，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旧风俗的残余。在街上，海外华侨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服饰或是长头发而被召去问话。任何人被发现穿戴着有外国或资产阶级品位的服装都有在街上遭受红卫兵拖打的危险。许多知识分子被指责为受到外国或资产阶级的影响，因而在家中挨打或被带到斗争会上。《羊城晚报》当时还在党的指导之下，将其名字更换为《红卫报》。当地党的领导人重视陶铸的建议，他们采取行动，保持对红卫兵

① 《当代背景》(CB), no. 824:47; 《共产中国文摘》(CCD) no. 191: 68-71。

② 《中国新闻分析》(CNA), no. 724 (1968年9月6日)。

③ 《羊城晚报》1966年8月19日。

运动的控制。

当地的许多市民讨厌任何红卫兵组织的侵犯,但比起外来的组织,他们更喜欢广州人的红卫兵组织,然而,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不能指望当地人在没有大量外来支援的情况下能有效地顶住当地党组织的压力。因而,毛泽东主义者决心派外来者到广州。当地党的领导人如赵紫阳,即使本来也是外来者,极力但也可以理解地鼓动地方抵制新一轮外来者的情绪,因为外来者威胁着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到9月,从北京派出的大量的红卫兵到达广州,^①但党的领导人还掌握着权力。9、10月份,广州党的领导人指控反对他们的革命者是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作为简化行政管理、减少官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是符合毛泽东主义者的心意的,当地党的领导干部把革命的反对派派往农村,为国家服务。^②香港的一份共产主义报纸的一位编辑后来报道说,在这一时期,陶铸通过尽量减少派到广东的红卫兵的数量帮助广州当地党的领导人。^③

1966年12月—1967年1月:冲击党的首脑机关

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的领导人被指控为“舍车保帅”。^④虽然努力保帅,但广州主要的领导干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到11月初,估计有几十万名从外地来的红卫兵进入广州。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之后,陶铸意识到他和他的同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建议赵紫阳作自我检查。赵紫阳上交了一份自我检查,以预防11月4日更激烈的批判。^⑤11月7日,陶铸本人在北京受到大字报的批判,其详细内容是由上海而不是广州的革命者提供的。到11月20日,广州到处都是批判陶铸的大字报。^⑥1966年11月,外来的红卫兵绕过广州党委面

① 《中国新闻分析》(CNA) no. 724。

②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617; 20-21。

③ 刘粤声:《赤色屠场边缘》,《“中央”日报》(台北)1967年3月17—18日。

④ 虽然在1966年初秋广州主要的党政官员没有受到攻击,但宣传系统中的一些马前卒被牺牲。《羊城晚报》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负责人柯麟、广州市政府文化局负责人华嘉是最初受到冲击的重要领导人物。攻击很快扩展到中南宣传部负责人王匡和他的妻子,她当时是广东广播电台负责人。

⑤ URS, 卷52, no. 7-8 (合订本)。

⑥ 《人民日报》1967年9月11日。

对全广州的干部，用他们的笔记本、录音机鼓动当地干部造陶铸的反，收集在整个运动中可以用来动员广州的公众舆论反对陶铸的信息。^①

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卫兵拥入广州、越来越多的当地学生加入其中，斗争变得更为激烈。12月中旬，相互敌对的帮派在街头发生冲突。12月13日，24个单位宣布他们封闭了陶铸及其在广州的同志的喉舌《红卫兵新闻》。^②到12月末，激进的红卫兵的权力迅速上升，赵紫阳和其他在广州的党的领导干部在公开的大会上连续几天受到批判。^③

1967年1月4日，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称陶铸为反革命两面派。次日，广州的公告栏中张贴着反对陶铸的标语口号。陶铸统管广州长达16年，却成了可能是广州历史上针对政治人物最激烈的运动的对象。随着1966年12月26日和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在工人中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号召，“炮打”党内当权派的“司令部”。“革命造反派”（成年的工人和干部）加入到学生之中冲击当地党和政府的首脑机关。

1月16日，广州2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省革联”发出紧急通知，准备夺权。1967年1月22日，前党的领导干部向“省革联”交出了他们办公室的印章，^④但“省革联”本身并没有得到北京的正式批准。1月25日，更为保守一点的“造反派”组织占领了公安机关。陶铸和广州的党的主要领导人被监管、拘押起来，在大动乱期间，他们一直在那里。一般干部都认为，他们不必太害怕无知的青年，从长远来看是需要他们去工作的，但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因而他们允许青年们留在办公室里。因此，他们在军人和他们自己的人员中的激进造反派的压力下开始长达几个月、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批评运动，运动刚开始比较混乱、组织性差，但后来就比较彻底和系统化了。这使他们不太重要的工作停顿下来，暂时放弃了地方党组会议，这实际上使他们不可能扶持他们选择的群众组织，哪怕是间接的。

① URS, 卷52, no. 7-8 (合订本)。

② URS, 卷52, no. 7-8 (合订本)。

③ 《大陆半月刊》，no. 45（香港，1966年）；王乔天（音）：《我是一个红卫兵》（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所”1967年）。

④ 《南方日报》1967年2月24日。

1967年2—5月：过渡到军管

一旦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被拘押起来，主要的斗争已不再是他们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许多不同的学校、工厂、机关都成立了群众组织，但到1967年1月，所有这些群众组织都和两大松散的联盟有联系。

虽然这两大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和他们下面的一些次一级团体的名称都有变化，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这两大基本的联盟一直存在。从广义上讲，他们可以说成是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由“省革联”演变而来，正式名称是“工革联”——工人革命大联合，一般称作“红旗派”。^①第二个联盟，比较保守，正式的名称是“工革会”——工人革命委员会，一般称为“东风派”。周恩来到访之后，这些名称成了正式的名称。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组织团体进行宣传、巡逻、收集反对派的信息、提供后勤服务。

虽然不可能获得准确的数字和全面的所有附属组织的名单及其随时势而发生的变化，但最主要的和激进的省革联有关的组织团体如下：

(1) “八一战斗团”，1967年1月成立，1967年3月1日被宣布为非法，1967年8月恢复并宣布无罪，但1967年9月后再次受到严格控制。^②其核心由退伍复员军人组成，但也包括工人和中学生。

(2) 红旗派，大体上以各中学、大学为中心，尤其是中山大学。^③

(3) 下乡知青造反司令部，由不满被分配到农村的学生组成。

(4) 红色司令部，是学校教师组织许多红旗团体和中心的一个核心。^④

(5) 广州批陶联卫，在1967年1月该组织很活跃，从1967年7月11日至9月13日，该组织是用来批判党的领导人的，但还用来作为建立

①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208:7-16。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7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010:10；《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0月1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096:1-8；URS，卷53，no. 3。

③ 《当代背景》(CB)，no. 861。

④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19:1-5。

广泛政治结构的基础。^①

(6) 红警司，1967年夏末成立，是批判广州卫戍司令部的基地。^②

(7) 中南局联络总部，1967年夏其联络尤其活跃。^③

(8) 省直机关红旗，低层干部。

(9) 广州铁路工人司令部，铁路劳工。

(10) 广州第三司令部，体育学生。

与较保守的“东风派”有联系的主要附属组织如下：

(1) 春雷，战斗者的组织，通常有铁路系统的干部、技术工人，在1967年夏尤其活跃。^④

(2) 东方红派，在1967年夏尤其活跃。^⑤

(3) 地区总部，主要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及一些退伍军人和学生。^⑥

(4) 红色工人总部，主要是产业工人。^⑦

(5) 主义兵，中学生（通常是干部子弟）。^⑧

(6) 省直机关联合总部，省、市干部。^⑨

(7) 第一红总部，体育学生。

(8) 工人纠察队，工人组织，在军队的指导下，1967年末开始变得活跃。^⑩

(9) 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大多数是公社民兵，1967年2月后尤为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64:1-8；《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4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57:1-5。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9月6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273:6-13。

③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130:5-13；《共产党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no. 22:4-7，JPRS，1968。

④ 《当代背景》（CB）no. 861；《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9月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044:1-7；《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1月2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20:5-13。

⑤ 《中国新闻分析》（CNA），no. 727:5。

⑥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04:1-15；《南方日报》，1967年2月24日。

⑦ 同上。

⑧ 《当代背景》no. 861；《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21:1-6；《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22:4-6。

⑨ 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⑩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04:1-15。

突出。^①

1月22日夺权的省革联的成员,大多不是广州人,许多人是退伍军人。^②当他们的反对派指控他们为假左派搞假夺权时,省革联的成员进行自卫,说他们已经真正打倒了地方党的领导人,他们(地方党的领导人)只是假冒自封在幕后掌权。^③后来批评省革联的理由变了,1967年秋,北京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激进的“5·16小组”领导人受到怀疑之后,广州的省革联被指控为这一组织的工具。^④无论如何,到2月初,在1月末夺得主动权的激进分子面对着来自反对派联盟及广州军队越来越大的压力。

1月末,党的首脑机关被夺权后,当时军队还没有参与斗争,但军队被号召维护秩序、支持革命派。虽然省革联受到一些自1964年以来从军队政治部退役的政委相当大的支持,但显然他们没有得到广州卫戍司令部、广州军区及他们在北京的盟友的支持,他们没有严格控制他们的反对派。2月8日,出于对军队的愤怒,省革联的成员袭击了广州军区司令部。^⑤

2、3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大都出现保守派对1月夺权过火行为的反击。2月8日后,省革联的出版物中发出了自卫的腔调。省革联声称坚定跟随毛主席。2月17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黑云压城”。^⑥同一天,较保守的派别也发表文章号召批判省革联,这显示它从来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⑦经过2月20日的大冲突,2月21日,权力从激进派滑落到较保守的派别的手中。在他们主要的报纸中,保守派吹嘘,政权到2月21日才发生真正的变化,因为党原先的领导人仍然继续掌权,只有2

① 《共产中国文摘》(CCD), no. 192:69-76。

② 《红卫兵小册子》,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096:1-8。

③ 《共产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 no. 15:74-82, 1968年。

④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1日),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264:1-8。

⑤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11日),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30:5-13; 《红卫兵小册子》,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248:1-3。

⑥ 《共产中国文摘》(CCD), no. 187:107-110。

⑦ 关于1月22日—2月21日这段时间的其他报道, 参见《广州红卫兵》第14期(1967年2月10日); 《广州日报》(1967年2月16日); 《红卫兵出版物样本》(Samples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卷11, JPRS (1967年8月8日);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3900:3-4。关于旅游者对当时广州的印象, 见 Suzanne Gaye 在《华盛顿邮报》1967年2月5日的文章。

月21日之后才有了真正的变化。^①到2月25日，北京命令地方的民兵维持广东的秩序，广州军队的干部已经获得了恢复秩序的权力和手段。

广州军区的干部采取行动支持保守派管理地方事务，加强对省革联中激进的反对派的控制。2月28日，激进分子在“八一战斗团”的领导下冲击广州军区司令部。^②此后，军方有力地镇压了“八一战斗团”，关押了其几千名成员。^③军方直接对过度激进主义作出了批判。3月15日，在公开大规模的宣传中，军管委正式建立了对广州的军事管制。^④而后，军队开进重要的工厂，维持稳定，减少过度的派别武斗。^⑤军队没有正式参与派别斗争，但事实上，保守派是在军队的管制下兴旺起来的。当地的激进派毫不动摇地批判“广州的谭震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

夏季，全国激进分子的权力再度上升，他们称这一时期为“二、三月份的黑风”。军队已经被作为革命的样板，但广州和其他地方军队的领导人负责维持秩序时，他们压制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寻求较有经验和能力的干部的帮助，以维持秩序，保证生产。但显然也有危险，新的管理和过去的没有很大的区别。1967年春，江青有了某些正当的理由指控军队的领导人镇压革命者。

1967年夏：群众武斗

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希望在军队维持基本的秩序的同时，年轻的革命者继续打击地方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4月6日，在江青领导下的北京的激进分子得到一份指示，告诉军队的领导人要给革命者更多支持。这个指示还明确限定了军队坚决有力干涉派别纷争的权力。4月15日至18日，为了保证广州交易会顺利举办，周恩来到

① 《南方日报》1967年2月24日。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8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57:4。

③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7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10:1-10；《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0月15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96:1-8。

④ 《纽约时报》1967年3月15日，第1版。

⑤ David Oancia 在《纽约时报》1967年3月21日的文章。

广州，传达了新的指示精神。在支持黄永胜的同时，他赞扬了较为激进的“红旗派”，批评了较为保守的“东风派”。革命者欢欣鼓舞，准备再次推动斗争，但受到限制直到5月中旬春季交易会结束。^①接下来的就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最混乱无序的夏季。

被解除约束后，激进分子打破1月底以来的沉寂，又开始痛斥广州的主要领导。他们利用反对陶铸和其他广州领导人的运动作为联络所有主要政治、经济团体的手段，建立组织。他们试图羞辱陶铸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并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和陶铸联系在一起，理由是黄永胜也是中南局的党委书记。激进分子还试图推翻2月份军队镇压之后对他们以前的一些同志进行批判和拘押的裁决。^②这些争执随着夏初派系斗争的逐步升级而持续。

随着权力相对转移到激进派一边，基层干部不太愿意批评他们以前的领导，而年青的造反派则更愿意参加到对仓库、商店的袭击和抢掠之中，以寻求武器和物资。北京支持者的鼓动以及地方军队不得不显示出的克制使激进分子受到鼓舞，他们采取行动巩固他们的群众组织。例如，6月30日，他们成立了广东高等院校红卫兵筹备大会。^③

6月末，“红旗派”与较为保守的派别之间的冲突迅速升级，7月20日武汉事件之后，冲突还进一步升级。在这次事件中，王力和其他从北京派出加强各军区领导人纪律的激进分子，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强行拘留。江青和北京的其他一些人利用这次事件进一步钳制军区的领导人，而这时许多地方军区领导开始进一步抵制江青所鼓动的激进的群众组织。

广州的事件与武汉事件密切相连。北京方面一开始批判陈再道，在广州与王力、关锋有联系的激进分子就开始抨击黄永胜为广州当地的陈再道。7月23日，“春雷战士”，至少是在军区默默的帮助下和他们的对手——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的战斗。到7月29日，在“红

① 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②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64：1—8。

③ 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旗派”的正式支持下，当地的激进分子在鼓吹“揪出军内一小撮”。^①广州军区内部的一些持异见分子，到1967年末在一直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相焯的领导下加入了红警司，利用红警司为基地，攻击广州军区，“揪出”军区领导人中的“一小撮”。帮派之间进行伏击、街头巷战，袭击对方的总部。他们攻击仓库寻找武器，袭击交通中心，用卡车和公共汽车来运送他们的人。^②

当地的武斗持续加剧，一直到8月中旬周恩来正式支持恢复在春季军队镇压期间曾被宣布为非法的“八一战斗团”。来自12个省30多个组织的几千名退伍军人造反派集中于中山大学，站在激进群众组织一边参加武斗。^③有好几次，激进分子冲击广州军区的部门，或是冲击广州卫戍部队。^④双方都对冲突及冤情进行宣传，以煽起将来打斗的热情。^⑤

随着广州地区冲突的加剧，铁路运输中断，粮食短缺。建筑物被包围、冲击，内部设施被焚毁。许多条路线的公共汽车服务中止，人们去工作得长距离步行。因为武斗和流氓恶棍已经超出了警察的控制能力，人们不敢夜晚外出。在学生活跃分子的主要总部——中山大学，学生红卫兵组织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冲突。虽然外人不可能估计到冲突的总规模，但有关红卫兵的第一手资料显示，在广州有好几万人参与武斗，几千人受伤，几百人死亡。

随着全国范围内混乱的加剧，铁路运输严重紊乱，广播电台关闭，一些公共设施被毁。正因为如此，江青所谓支持“真正革命者”的命令遭到反对和严重的武装抵制，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义者回过头来让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30:5-13。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26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61:1-6；《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64:1-8；《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9月13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73:6-13。

③ 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④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4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57:1-9；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⑤ 关于这些武装袭击的一些记述，见《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6月23日），《共产中国文摘》（CCD）no. 191:62-67；《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6月9日、8月21日），《共产中国文摘》（CCD），no. 191:68-85；《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9月21日），见《共产中国文摘》（CCD），no. 194:144-147；《新南方》1967年7月15日；《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9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74:7-11；《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9月13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75:1-11。

步于对秩序的需求。他们除了缩小、减轻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打击范围和程度之外，别无选择。8月末、9月初，毛泽东视察了几个省，鼓励革命者与军方合作，维持秩序。江青为她过于强硬的路线作了检讨，在北京的其他主要激进路线支持者王力、关锋被清洗。

9月初，伴随着控制混乱局势的重新努力，广州军区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干预冲突，控制武斗分子。大量的军队从外地进入，士兵在街道上巡逻。^①9月1日，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曾在广州武斗的各红卫兵帮派的成员，敦促他们返回当地的单位，停止武斗。根据北京9月5日的命令，次日，广州战斗团中的外来退伍老兵被解散。^②从9月12日开始，临时军管会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接着10月12日和28日的命令要求收缴武器，学生回到他们各自的单位，保证赦免那些受到错误指控的干部。^③不用说，仅仅发布命令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太多人的职业受到威胁，军队没有得到明确授权进行干预，用武力收回武器。

1967年9月—1968年2月：最初的政治重建

恢复政治秩序的问题与1949年所遇到的不相上下。以前的敌我之间的裂痕必须修复，而关于军事人员、合需要的旧干部、年青的革命者要结成同盟的指示和1949年的情况尤其相似。当地干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在于建立新的组织结构，以及选择那些可以和军队合作、应该会对北京新的领导忠诚的人。他们必须设法保证过去的干部重新回来工作时不会受到打击。担任领导职务的军人必须掌握执行民政工作必需的细节。可以肯定，社会没有像1949年那么混乱，但在1949年，大部分青年革命者职业前景光明，而在1967年，他们中的大多数被从城市派到农村。

平息事态的第一次努力开始后，混乱仍持续了约6周，交易会从10月15日推迟到11月15日，可见混乱的程度。为了尽力在广州武斗各派之间达成某些协议，周恩来几次会见各派的上京头目。11月初，他们同

① 《纽约时报》1968年9月18日。

② *URS*，卷52，第7—8期（合订本）。

③ 《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no. 617:12—54。

意达成和平的十二点决定。^①交易会如同往常一样举行，但外国人被限制在城中的某些地区活动，大量军队在街道上巡查。

在从1966年末开始的混乱时期，一些政府部门继续处理日常事务，大多数工厂和商业机构继续运营。但在1966年底，党实质上已停止发挥作用，不能作出新的决定。在1967年秋，新的管理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级党委。毛泽东原先的意图，正如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是在1967年1月夺权之后在各地迅速成立革命机关，但条件不成熟。有几个省在1967年春成立了激进的革命委员会，但广东直到秋季才打算成立新的管理领导小组。军管委继续填补临时空白，直到1967年11月9日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委会”，为正式成立省革委会铺平了道路。^②革命委员会是军队领导、老干部、革命者组成的“三结合”。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于1967年末、1968年初，主要的领导权在军队，军队人员在革委会中占大多数。省革委会负责领导省内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它很快发展了一小批官员协助其履行职能。

在一段时间中，新的省革委会筹委会选出市、专区、县的革委会管理其各自的区域。市革委会进而从广州市各工厂、学校、政府单位、商业企业中选拔领导人员组成各自的革委会。而每个革委会又考察其成员，留用那些经考核对领导足够忠诚的干部，以及从以前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录用的最有前景的青年革命者。

（革委会的成员）一旦经审查被判别为基本忠诚，就会被组织进各级内容广泛的教育学习班，简化一点看，它与1949年接管之后的学习运动相类似。^③最初的审查甄别使学习班的成员至少有一点最起码的保证，可以和不同派别的人在一起学习，不必担心他们会受到指控、羞辱或惩罚。当然，学习的主题之一是毛泽东的著作，但重点和1966年末、1967年初

^① 11月2日的协议，见《共产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no. 5, pp. 44-48, *JPRS*, 1968. 关于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人为准备交易会而平息事态的努力，见11月3日对周恩来的报道，《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no. 611:12-18；《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1月4日），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no. 613:6-10；《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80:1-8；《共产中国文摘》（*CCD*），no. 194:155-162。

^② 广州电台，1967年11月4日上午10时。

^③ 新华通讯社1968年1月2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07:22-23；《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06:1-3。

不同。在1966年末,基本的信息是敢于造反,但在1967年末则是克服自私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被认为是自私。批判修正主义不仅是批判刘少奇,而且包括地方单位中任何可能对刘少奇和其他高层党内当权派过于同情的人。

10月,80名最高层的干部从北京短期学习回来之后,213名准备在省、市革委会中担任主要职务的领导干部被组织起来进行学习。这次学习班于10月24日在广州以前的党校开课,持续了一个月。^①12月21日,约700名其他干部,其中约有400人来自军队,300人来自广州主要的两大联盟,被选派去北京进行专门的学习。^②那些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则由军队人员负责组织学习班。许多基层干部从他们正式的单位中抽调出来,用5—7天的时间,参加专门的学习班。^③

在通过学习努力愈合裂痕的同时,还为建立工人、学生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进行了范围更广的工作。其策略是将某个工作单位中所有不同派别的人联合组成一个新的联盟,由他们选出代表。10月27日,敦促组成这样的联盟的主要通告颁布。^④到12月,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各部门的1000多家单位已组成这样的联盟,其中包括90%的大型工厂、71%的中型工厂和48%的公共机构。^⑤

即使军队的领导人是彻底革命、彻底忠于毛主席的,但他们在负责一个单位时,不可避免地要像以前党的领导人一样,转而支持最有能力做工作的人。正如1950年选拔政府工作人员时游击队输了一样,在1967年,年青的革命者在总体上输给了有经验的干部。正如1950年游击队老兵的抱怨一样,“红旗派”的激进分子不满在新的联盟中、在新的革命委员会中受到严重的歧视。^⑥

不得不放弃斗争而在新体制下没有得到好处的革命者尽可能地进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1月2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099:14-15。

^② *URS*,卷51,第2期(1968年4月5日)。

^③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1月4日),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no.613:6-10。

^④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0月9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092:13-14。

^⑤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098:4-7;《南方日报》1967年12月30日。

^⑥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208:7-16。

抵制。一些人藏起武器，试图和新的领导人讨价还价，在放弃之前，提高他们的地位。另外一些明显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希望的人则继续扰乱交通和经济活动。例如，1968年1月22日，在纪念1967年1月22日造反、夺权时，和原来的省革联有某种程度联系的约两万人参与了对一个保守派群众组织总部的袭击。^①

由于革命组织人数众多，当局不可能当即对他们全部进行镇压。许多革命造反派一直受到牵制，直到1968年中期新的运动发起，激进革命者的领导闵一帆和其他领导人才被镇压下去，这些人曾和北京的王力、关锋联系非常密切。^②

虽然斗争没有停止，但到1968年2月21日武力夺权一周年之际，可以判断局势已相当稳定，较长期的机构——广东省革委会和广州市革委会取代了筹委会。和往常一样，一个重要的公告之后，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被动员上街，参加庆祝。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厌烦了群众游行示威，但常设委员会的成立，带来了可能结束前两年混乱的新希望，市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③

在政治重建的最初阶段，激起最强烈情绪的关键性问题，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人事的问题。实际上，所有的人事问题都在要求或反对推翻原先的裁决的战斗口号中重新开始。要做的人事调整几乎是无限多的。实际上，在1949—1966年的各次运动中受到指控的每个人都可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声明：他受到党的领导的错误指控。较早时期受到打击的受害者都是最积极的批评党内掌权者的批评家。那些在1966年春、秋作为“四清”运动一部分而受到批判以及“文化革命”最初阶段受到批判的人可以声称，他们受到批评正是由于他们在抨击党内掌权者（错误做法）方向作出了正确的努力。在1966—1967年冲突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站在他们一边，一些以前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的人被一派或另一派释放出来。在1967年末，他们的命运必须有个决定，其中许多人可以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28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32:9-15。

②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257:1-5；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在《华盛顿邮报》1968年9月7日的文章。

③ 《北京周报》第9期，第5—6页（1968年3月1日）。

声称他们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公正地判刑。虽然较难用合适的意识形态术语来为受到革命派批判的党的领导人和其他干部辩护,但事实上许多革委会愿意考虑让他们回到一些领导岗位上。^①

总的来说,人事政策避免推翻1966年以前的裁决;对那些在“文化革命”后受到党内的当权者批判的人,从5月16日开始重新进行审查甄别,以允许对新领导表示忠诚、对过去进行自我批评的大多数干部继续留下;对革命造反派也给予宽容,除非他们继续进一步制造混乱。^②但每个单位最后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这带来了许多个人的考虑。由于决定常常是仓促作出的,即使在作出决定之后也还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因为和以前的敌人的联盟不一定可靠,也因为难以预测多少人会调整到新的岗位上。例如,以前的“红旗派”遭到几乎清一色是由以前的“东风派”组成的工人纠察队成员的清算或围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经济抵制的政治策略

虽然中国的老百姓被鼓励在小集体中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由于长期接受权威的传统,表达自己的利益附带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耻辱标志,加上错误的态度所受到的惩罚的严重性,他们都不轻易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在1966—1967年,权威机构受到抨击,群众组织中的当地民众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由于政治事务的大范围保密,一般的民众不太了解总的政策问题,而只会不满眼前的个人生计问题。可以肯定,他们加入哪一派依据的是过去的友情或敌意,每个学校、工厂都有两大主要的群众组织。不过,总的来说,那些认为自相对受到剥夺的,加入了更为激进的革命派,而那些与现状有更大利益关联的人则站在较为保守的一边。

1967年陶铸对广东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分析仍然和十年前的分析一

^① 省市革委会的人员名单及其组织机构,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60:4-8;《当代背景》(CB), no. 863:42-43。

^② 关于推翻裁决的一些材料,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85:1-9, no. 4204:1-15, no. 4208:7-16;《当代背景》(CB) no. 861;《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617;《共产党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 no. 25, JPRS, 1968。

样恰当中肯。陶铸列举的主要的不满原因是：（1）和城市人相比，农民不满他们的生存状态，因而想离开合作社；（2）由于相对较差的职业环境，一些工人感到处于劣势；（3）失业的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不满。（4）那些不能继续求学的学生被派到农村，感到沮丧泄气；（5）退伍军人因为缺少民用技术，难以获得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于是也不满意。

在群众组织中，学生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由于学校在1966年春被关闭，过了一年、有的是两年后才重新开门，学生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到群众组织中，用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作为其总部。大多数学生属于较激进的组织——“红旗派”。

学生的不满集中在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有限，总是被迫去农村。农村除了原始的自然条件外，被送到农村的青年远离亲友，没有工资，没有地位，没有安全感，也不像国家系统雇用的那些人那样有未来前景。一些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不太受农村青年的欢迎，工分比农民少，真正体验到了入不敷出的难处。^①学生们不能正当合理、直截了当地表达对下放到农村的不满，但他们可以就在农村三年后可以返回城市的承诺不兑现而不满。他们可以抱怨受到那些把他们下放到农村的有私心的人政治上的迫害，以及在农村受到那些监管他们的人政治上的迫害。^②

学生们所选择的目标往往是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体现。附近的派出所、党委所在地是他们最中意的目标，因为那儿负责驱赶无业的城市青年去农村。城市的工作分配办公室也是他们最中意的目标，因为他们安排了许多青年去农村，虽然有一些学生似乎是想获得新的安排分配，而不是袭击他们。另一个目标是户口登记部门。学生在下放到农村时，城市户口登记被取消，给他们返回城市增添了额外的障碍，他们对此不满，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些人在农村而保留着城市户口登记的，也不满下放的时间太长，例如，在1967年5月一次大型集会上，学生红卫兵对他们在农村三年之后本该返回城市而不能返回表示不满。这一要求遭到官方的拒绝，因为他们不可能保证城市中有足够的工作，也遭到其他一些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1月10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098:10-14。

^② URS，卷50，第3期（1968年1月9日）。

红卫兵的拒绝，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被下放到农村代替那些回城的人。^①事实上，最激烈的战斗不是在红卫兵与党政干部之间，而是在红卫兵组织之间，他们或是有利益上的争夺，或是受到有利益争夺的上级的支持。

广州的党政干部只能通过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把他们送回到农村、采取强制手段让他们留在当地等方式来结束红卫兵的骚乱。党委领导成为较早时将青年下放到农村的替罪羊，但由于城市中缺少就业机会，革委会除了再次将他们送回农村之外，也别无选择。如果党政干部们取消了青年们的城市户口，要让他们下农村会有麻烦，但如果保留年轻人的城市户口，让他们留在农村就会更麻烦。这两个方法都用了，但无论哪一个都无法避免潜在的问题。

因为“文化革命”使许多年青人集中在城里，问题更加尖锐化。估计每年广州地区大约有10万名学生从中学毕业。1967年春，党政干部们不得不努力安置将在1966年和1967年毕业的留在广州当红卫兵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下放到农村，为等待入学的其他学生腾出位置。^②1967年夏学生返回的难处在1967年10月8日得到显现，中央政府命令三千多名不顾命令逗留在广州不去农村的青年立即下乡。一个月之后，当地的党政干部称已成功地将这些犯错青年的三分之二送回到农村。^③1968年夏，决定本应在1967年春毕业的学生当作1968年的毕业生来安排工作。虽然党政干部们希望允许他们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宣布许多大学和高等技术院校的毕业生将被分配到合作社或农村组织中去，而一般情况下这些毕业生是根据统一的分配计划，分配在国家系统，拿国家工资的。^④

虽然群众组织成员中大多数是学生，但复员退伍军人在其中起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参与了最严重的武斗。一些最激进帮派的领导是从军队政治部退役、在民政组织的政治部中担任关键职位的干部。从1964年开

① 《当代情景》(Current Scene)卷6,第5期(1968年3月15日),第19页。

②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210:13-15。

③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080:1-8。

④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4221:1-4。

始，他们一直是毛泽东主义者重组民政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甚至在“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是许多党员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和北京江青的派系有密切的联系，还通过军队的政治部进行工作。虽然只有一些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有生平资料记录，但有几个最突出的激进分子的领导人明显符合这一类，如：田明、相炜、车学藻、王世林。^①

许多参加群众组织的退伍军人可能和军队的政治部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1955—1956年退伍复员的大多数军人在新成立的集体企业和农村中找到了有前景的新工作，但那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退伍的军人难以找到相应的机会。许多退伍军人抱怨地方干部没有给他们好的工作，或是没有给他们的家属适当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军事技能使他们成为最好战的武斗团体的骨干，如“八一战斗团”。^②

与学生相比，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上都更难压制退伍军人，但从1967年夏天开始，退伍军人被告知不得彼此联络，要留在自己的工作单位。1968年，军队和警察联手围捕那些继续抵抗的人，那些拒绝放弃武斗的人被视为反革命处理。^③

大多数激进群众组织中的工人是合同制工人、按日计酬的工人、来自农村地区的季节性雇工和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不享有与国家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临时性的工人比工厂工人工资低，没有工作保障和其他附加的福利待遇。例如，城市干部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尽量使公社负责其在农闲季节进入城镇而又没有足够收入自给的社员的福利。至少是自1957年以来，所有这些非正式的工人一直是令城市当局头痛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尽力使这些无业的、就业不充分的城里人回到农村。一些公共企业偶尔需要他们的服务，而即使是这类非正式的工作也为这些工人抵制回农村提供了手段。在1961—1964年对私人贸易较宽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比国家职工还富裕，直到

①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33:7-9; no. 4134:8; no. 4274:1-3。

② URS, 卷53, 第3期(1968年10月8日);《红卫兵小册子》,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no. 4096:1-8。

③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8月23日),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262:1-8; URS, 卷53, 第3期(1968年10月8日);《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3月13日), 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71:14-27。

后来管制严后才有所改变。虽然这些非正式的工人和合作社社员大部分成功地逃出了农村,但他们还是因为正式的工厂工人享有比自己好得多的条件而抱怨。国家的收缩政策使所有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那些曾经享有过国家雇用福利利益的人重被剥夺的感觉尤为强烈。

各个非正式工人的群体都乐于加入较激进的群众组织。例如,在铁路工人中,从事建筑的帮派和苦力袭击办公室工作人员、工程师和在国家系统中有正式工作的管理人员。为公共汽车服务的勤务人员袭击有正式国家工资的公共汽车驾驶人员。在码头工作的苦力劳工袭击办公室和船上的工作较稳定的人员。小合作社的工人袭击干部,因为干部限制他们的物资供应、销售和物价。

自相矛盾的是,这些非正式的工人虽然更加革命,但比正式的国家职工有更严重的经济主义错误。尽管他们不满歧视他们的党政干部的“经济主义”,却免不了比拿薪水的职工更加关心经济状况和他们服务的报酬。再者,像刘少奇这样的党内当权派已成为这些非正式工人问题的替罪羊,但新的革委会掌权后,虽然曾许诺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但也只能说目前暂时无法作根本的改变。^① 国家缺少资金为所有这些非正式工人提供正式工资和保障。

1966年中期,在北京的高层党政领导人受到批评时,他们一些最亲密的还在掌权的支持者,支持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攻击那些参与打倒他们后台的人。例如,闵一帆过去确实曾和彭真、刘少奇领导下的共产党华北局有联系,后来广东省革委会指控他是最主要的造反派领袖。^② 许多陶铸最亲密的追随者,如张根生也同样卷入,成为幕后主要的造反派领导人。^③

保守的群众组织大体上由农民、工人、干部组成,他们努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反对外来入侵。当红卫兵动员进攻、在农村地区搞串联或是

^①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2月),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29:1-4;《红卫兵小册子》(1967年1月1日),见《中国大陆杂志选》(SCMM) no. 616:21-28;《当代情景》(Current Scene),卷6,第5期(1958年3月15日);《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208:7-17。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11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30:5-13;《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12:6-12。

^③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26:1-20。

流氓帮派进入工厂、农村时，当地组织就会起来进行自卫。有时，如在1967年夏天，村民们像以往动乱时代一样自己组织自卫武装。

所有这些抵制都源于没有实现的期望。抵抗者感到与相应的人比较受到了剥夺。没有长期固定工作的职工与国家体系中职工相比觉得相对受到剥夺；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与在几年前在城市中获得提升的知识青年相比觉得相对受到剥夺；学生也觉得受到剥夺，因为他们不能像他们的学长们那样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是在城里找到满意的工作；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评的人与在政治运动中挺过来、相对没有受到伤害的人相比，也觉得受到了剥夺。

这些剥夺感背后的原因是1960年以后经济机会的收缩。虽然供养人口的能力与人口的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但经济机会没有与上升的期望同步。在50年代初期与中期，新的、满意的机会膨胀非常迅速，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这让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产生了不合理的高度期望。“大跃进”之后，不仅年青人没有机会，而且一些国家职工也随着收缩下岗失业。国家职工几乎都是相对年轻的人，没有什么人会很快退休。因而，年轻人没有机会升迁，除非一些年纪大的人从国家机关中被排挤出去。这样的基本事实使代与代之间的冲突非同一般的激烈。

1961年，第一次进行收缩时，许多年青人被下放到农村三年，同时指望在此期间城市中会形成新的机会。虽然1962年以后经济恢复并继续增长，但其扩展速度不能给所有这些下放到农村的人提供满意的就业机会。

在50年代中期，实际上所有的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都有机会继续进一步的教育。随着基层学生人数的大大增加，各级毕业生中有机会继续受教育的比例明显减少。虽然缺少准确的人口数据，但1949年后，随着共产党带来的新的稳定，出现了一个婴儿潮，到60年代中期，这次婴儿潮中出生的青年正达到进入中学、大学的年龄，而当时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最少。

城市中吸收劳动力的问题对于青少年和老年人来说非常尖锐。在农村，年纪很小和很大的人一般来说都能找到些事做，但在城市地区，随着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及1956年后就业的正规化，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机会较少。1956年以前，老年人可以经营自己的小店铺，年青人可以在

家里或其他的企业中做一些非正式的工作，而1956年后，随着就业的正规化，对于18岁以下的青少年，哪怕他们没有登记入学，机会也比较少。1965年中期，广东当局利用美国轰炸机可能从越南来袭击华南城市的威胁遣送了许多年青人、老年人及家属去农村。^①然而，此后就很难让他们留在农村，要送更多的年青人、老年人去那里就更难了。

虽然1959年后机会减少，但教育的大幅度进步产生了更高的期望。过去，识字的人一般不从事平常的体力劳动，而现在绝大多数的广州年青人都识字，也就没人准备接受卑下的工作，如苦力或农业工人。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经济不可能吸收大量的人从事技术的或白领的工作。在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中，相对被剥夺的问题不至于那么严重，如果期望被调整下来，并且有相当的持续性，那么，年青人会根据机会来形成期望。然而，激起极大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及变化不定的政治、经济局势，持续不断地激起不可能实现的高度期望。

地方主义的复活

当对陶铸、赵紫阳及党的其他重要人物的有组织批判开始时，地方主义者是干部中最积极最热情地加入到批判之中的人。一些干部是出于担心害怕或机会主义的因素而愿意批判党组织，而地方主义者可以说是热情而真诚地去做这件事的。虽然先在1952年，然后是1957年，最主要的地方主义者已从实权位置上被撤下来，但党和政府的干部中普通成员的多数总是广东本地人，他们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地方主义。

1966—1967年期间，地方主义者的领导人是尹林平。尹林平是江西人，是江西苏维埃的成员，曾被委任为东江游击纵队的政委，原本可以指望其代表中央的利益。由于他自己1949年后在党内的前途与游击队关系非常密切，因而开始是被派来进行监督的，但他逐渐转而认同地方主义者的动机，并因为地方主义而在1957年受到批评。然而，1957年古大存、冯白驹被批判之后，他被看作是温和的地方主义者，有助于省委团

^① 香港《星岛日报》1965年7月28—30日，8月2日、19日。

结地方主义者并取得他们的支持。1957年后，他成为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在全省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建立了一个实质性的支持基础。^①

1966年中期，尹林平还没有将自己和其他省级党的领导人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他正在指导广州国家机关中的“文化革命”。然而，到1967年1月，省的领导已经很清楚将被取代，尹林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批判。在1967年1月的夺权中，后来被说成是1月从党的领导手中夺权的幕后领导人闵一帆，已经与尹林平和其他地方主义者联合起来。^②

1967年2月初，仍然与省革联联手的尹林平成为新领导小组的新秘书处会议召集人。到2月14日，他意识到省革联将失去权力，于是策划就新的掌权人作出某种调整，但他从没有得到军队的大力支持。1967年2月25日，省革联刚刚失去权力之后，尹林平向全省人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强烈要求给地方主义的平反，尤其是给1966年11月4日去世的古大存平反。然而，到3月5日，军区司令部通知尹林平，他不在新的临时权力机关——临时生产指挥部之列。由于遭到新的军队当局的排斥，尹林平召开了一次地方主义秘密会议，参加者大多是他的朋友，在40年代担任各游击部队的领导。他们在一起构建了四个地区军队和一个政治组织的概貌，为希望重新夺回权力的地方主义者订下框架结构。虽然尹林平已明确地失去了权力，但到1967年4月15—18日周恩来访问广州时，他还没有受到正式的批判。当时，尹林平呼吁给予地方主义者更多的权力，但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在后来的运动中，尹林平被多次抄家，他的追随者四散以逃避抓捕。尹林平自己先被公安干警拘捕，而后放在广州卫戍司令部看管。当时，他的追随者就像多年前反对日本人和国民党时一样进入地下活动。1967年夏，随着激进主义的复活及对军队的攻击，尹林平再一次获得更多的特权。例如，1967年6月末，尹林平获准参与在群众组织内辩论反对林李明。林李明是来自海南岛的省级党的领导人，他受到地方主义情绪的浸染最少。1967年8月末，尹林平是倡导

^① 《红卫兵小册子》，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07；《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22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32:1-8。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11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30:11；《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no. 4126:1-20。

揪出军队内部一小撮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之一。9月初, 军队的权力再次巩固, 尹林平的一些追随者再次进入地下, 并强烈要求必要时进行游击战争。^①

1968年, 地方主义者既没有像游击队时代反抗日本人和国民党时的期望, 也没有像1952年以前那样进入高层。由于共产党对农村的控制远远强于他们的前任, 游击队缺少必要的行动自由来获得能起显著作用的追随。与1952年和1957年相比, 当时一些不太极端的地方主义者, 即便在地方主义受抨击之后, 仍然留任作为统治联盟的一部分。而到今天(1969年), 没有一名地方主义的领导人能成为省革委会的成员。可以肯定, 被迫改变立场的地方主义者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途径, 试图为地方主义领导人平反, 但都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② 然而, 虽然此时表现不力, 但地方主义仍然是强有力的潜在势力, 因为广东干部中的一般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地方主义, 它可能再次成为对抗外来权威的活跃的中心。它受到了控制, 但没有被摧毁。

今后的任务

自从1968年2月21日省革委会成立以来, 它所面临的客观的任务虽然没有1949年新的统治者所面临的那么重大, 但其本质上是一样的。军事领导必须维持临时的控制, 同时重组、重建政治机关。军队的领导人必须继续安抚权威削弱时活跃起来的异议分子, 愈合内战时加剧的敌意。他们必须重新审查人员, 清退那些不可靠的人, 重新训练有前途的年轻人。他们必须恢复经济的秩序, 准备新的多年计划。但今天, 他们面对这些任务时, 虽然更有智慧、更有经验, 但更少乐观、更少理想主义、更不愿意牺牲。

^① 关于尹林平和地方游击队的各种记述, 参见:《红卫兵小册子》,《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07:1-9;《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2月11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33:15-17;《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26:1-20;《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3月18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62:1-8;《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5月1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88:5-7。

^② 《红卫兵小册子》(1968年1月22日),《中国大陆报纸概览》(SCMP) no. 4132:1-8;《红卫兵小册子》,《共产中国译丛》(Translations from Communist China), no. 25, JPRS, 1968。

在政府内部，过去的政府机关必须重建，要投入大量的军队转业人员。过大的办公人员规模要削减，并且要根据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和毛泽东主义者或党内当权派的联系来重新审定。组织结构要重新调整。那些没有价值的人必须另行安排，大多数是派到农村。

1968年和1949年一样，党的建设比政府行政机关的发展要慢，因为迫切性不大，但对忠诚的要求更高。由于太多的党的机关的忠诚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军队和革委会内部的党组织将成为重新审定党内人员组成的核心。他们必须决定哪些党员要清退、警告、留用或提升。根据毛泽东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精神，这些领导人必须录用、培养新的党员。

在经济领域，从当时的政策来看，几乎没有作根本变化的余地。即使是革命造反派也不愿意攻击基本的经济组织。虽然像“四清”时一样，还要为加强集体组织、消灭过多的自留地和私人市场而做工作，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完全废除这些私人领域。现在必须努力帮助那些临时性的、合同制的工人，但国家没有能力把他们安置在国家机构的正式位置上，还要继续驱赶城市中的非生产性人员回到农村。技术实验和新的操作方法的传播还要继续。就所需的新政策来说，最急需的是要有新的工程项目如土地垦荒、水利工程来吸收城市中释放出来的过多的人力。

教育政策是最麻烦的问题之一。迫切要克服的问题是学生不愿意回到他们刚刚批判过的教师领导下的学校，教师也不愿意给曾批判他们传授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们讲授仍在受到批判、修订的课程。但从长远来看，基本的问题是降低学生的期望，使他们愿意接受毕业时对他们开放的工业、农业中的低级职位。当局已经宣布打算让城市的学校置于工厂更大的控制之下，农村的学校置于普通农民更大的控制之下，以防止教育者重新控制学校，而给予一种使他们的毕业生不准备接受其可能从事的岗位的教育。为了执行这样的政策，领导人将必须使许多学生从更高质量训练的学院转到教育质量较低的边工作、边学习的计划方案上。不愿意接受教育预期下降的学生会被集中送回农村。

在党重建和教育政策施行之后，军队必须像在50年代初那样脱离出

来。虽然这一进程还没有公开讨论，但很可能会采取20世纪50年代早期同样的形式：军人逐渐转业进入民众的生活，军队则逐渐从民众的生活中退出，转移到更严格的军事任务中去。但现在对于退伍军人来说，合意的机会较少，除非他们在退伍时取代其他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北京发起的政治复兴主义的努力，旨在纯洁政治机体，保证革命的接班人拥有毛泽东主义的理想。更有纪律的军人和纯洁的革命者取代纪律性稍逊的党员干部。一群幻想破灭的干部被取代，但新的一群干部正重蹈从前失去革命纯洁性的覆辙。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随着权威的削弱，学生、工人、退伍军人获得了机会来表达他们热情和造反精神。但最后，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自己不满意的生活状态。政治复兴主义不过是暂时的，因为缺少经济、政治的基础来支持它。

第九章 对社会的政治征服

共产党在广东所做的许多事情在逻辑上遵循了解放以前的趋势，可能任何能够维持和平的政府都是这样做的。共产党扩大了市政府，而市政府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扩大；共产党建立了强有力的党组织，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在俄国人的指导下已形成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共产党扩大了公共教育，这主要建基于20世纪初的传教士学校、政府实验学校；他们引进了彻底的思想训练，而思想训练一直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他们试图使广州人的地方主义臣服于国家主义，而这是在进一步深化孙中山、蒋介石的工作；他们扩大了交通、通讯和公共设施，这是在继续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时代的建设；他们在农业技术、灌溉及工业上取得了进步，而这是建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私人 and 国民党的工作之上；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心，吸引着富裕海外华侨的资本，和清朝时期广州传统的贸易方式一样，在特殊的贸易季节（半年一次的广州交易会），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但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允许其和政府支持的外贸公司做一定量的生意。

虽然有这些连续性，但共产党在这头20年中实现了根本性的制度突破。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建成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不管以上章节中所描写的运动——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其具体的目的如何，这一切都强化了政治体系重组社会的能力。

在这些统治的初期，日益强化的政治体系被置于经济的现代化之前。中国共产党所承继的这样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甚至比苏联更落后，他们首先的目标是形成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行政管理机构的迅速增长反映在现实中，到1960年，农村32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公社、

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全省近100万人是共产党党员。(参见附录B表3、表4)

政治机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政府不仅深入到企业,而且深入到地方的宗族、村庄、行会和地方团体,而这些组织以前实质上是享有自治的。即使是这些自然的社会团体也被政府重组为标准化的政治、经济取向的组织结构,其领导人基本上不是由当地组织,而是由外人选出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增长第一次使群众进入政治领域。虽然,群众受领导、被动员,但作为公民,个人的政治作用比1949年以前要重要得多。他不仅作为宣传机器的对象参与公共的讨论,而且还可以进入大大扩大的或是全新的公园、体育馆、博物馆、展览厅、游泳池、图书馆和礼堂。礼仪和以前一样,总是那么重要,但他们不再与节气的变化、地位差别的保持或是对祖先的敬畏相对应,而是通过庆祝共产党、红军或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成立来提高公民的责任感。

在这头20年中,人民生活的基本变化不是来自经济上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组织的变化。虽然已经形成了小规模产业无产阶级,许多乡村由于通路和通电而发生了变化,但在最初的这些年中,广东的职业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的人比从事现代工业的人要多得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小的单位合并成了较大的组织。广州和其他城市市民生活的变化,较少来自技术的发展,而更多来自秩序的重建、政府资助的房屋、政府的粮食配给、社会主义改造和市民进入小团体组织。

较大一些的集镇和城市一样,其变化是由于政治组织的原因。它们成为公社的所在地,重组农村的行政管理中心。它们成为党的领导、农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宣传员、教师和公共卫生人员的总部,它们为农村生活带来了比以往要多的组织和指导。甚至市场也是由党和公社的干部组织、管理。

也许在广东没有什么地方像农村那样发生全面的变化。农民不再花时间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的工作是作为生产队生产的一部分。除了根本的组织变化,新的指示和来自城市的、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人员的

投入带来了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生活的步伐。同样，在这最初的年份中，是重组而不是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最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有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但对社会的政治渗透较少通过武力，而更多是通过说服和宣传来实现。通过相对较少斗争而获得独立的新国家的公民不会如此深入地卷入国家的奋斗。而在中国，通过抗日战争、内战和土改，老百姓深深地卷入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因而他们对来自上级的呼吁更为敏感。虽然改造中国的愿望撞击着许多人的心弦，但这是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所作的动员，这些人控制了有影响的宣传网络，传达消息、唤起回应。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利用了一般民众对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以及在动乱年代谋求自我利益的自私的地方精英的深刻的疏离感。共产党又鼓动对外国人的仇恨，外国人成为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替罪羊。最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激起了人们多年的希望，希望他们的政府足够强大，能维持秩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论毛主席会是什么，他是这一希望的象征，是人民自愿为公众利益而牺牲的象征，是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象征。正是这一希望比其他任何东西所起的作用更大，使强大的政治组织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他们已经发动了交通、通讯上的“资产阶级改造”及经济的合理化运动。他们优先发展和投资于基本建设。尤其在人口的增长不会吃掉潜在的资本投资的情况下，他们的制度有能力在将来实现相当大的经济增长。

但更快的增长受到了与政治制度快速发展以及对实现增长的愿望的鼓动几乎与生俱来的问题的抑制。结构本身增长太快，而它又是笨重不灵、没有效率的。标准化的程序并不总是能够适应地方的情况。由于教育水平低下，最初官僚组织中必须配备的许多人员训练不足、眼光狭隘、技术能力有限。聚集来自广泛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员，比在更小的、较同质的国家或较发达的国家更易于产生社会的紧张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分裂，而在较发达的国家，通过大众传媒及教育机构已形成广泛统一的文化基础。官僚机构膨胀太快，使北京难以维持对一般人员的纪律约束。

合理指导经济活动的的能力不像动员能力及实现快速的经济突破的乐观主义发展那么快。共产党的领导在优先发展某些农作物和物资的生产

时，不经意地忽略了维持人民生活及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辅助作物和物资。他们试图通过县城所在地的行政管理中心和公社总部来控制乡村的经济活动，干扰自然的市场模式。他们动员生产队种植新的品种、开垦新的土地、从事新的工业，但这些努力往往并不与经济现实相符。他们试图剥夺地方社区的许多权力以致难以实现地方经济的整合。他们试图剥夺以前的商人的许多权力以致效率受到损失。他们把许多资源从商业转移到工业上，供应系统被打乱。他们迅速增加了教育的能力，而学生的志向远远超过了经济所能吸收他们的能力。

最后，毛泽东主义者不得不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妥协。政治雄心和经济现实越来越贴近，不仅是因为理智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增强了，处理经济问题的组织改善了，而且也因为宏伟目标降低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看作是为了保持生机勃勃的革命理想和改造中国的乐观主义的一次尝试，而它的结束则标志着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时代的终结。但随着中国更清醒地看待现实，进入一个更克制的时期，还要谨记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变革的雄心还在。

这些作为早年变革的动力、魅力巨大的革命领导人现在正步入晚年，或已失去权力。在北京，毛主席已接近他的暮年。在广州，古大存业已去世，其他游击队的领导人方方、冯白驹、尹林平已被较缺少魅力、较少有机会展现其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人所取代。甚至连陶铸、赵紫阳，这些1952年后在广州建立北京权威的、伟大的权力铸造者，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也失去了权力，他们的继任者不仅个人的魅力不足，而且因为权力分散了，个人首创的机会有限，英雄无用武之地。广州早年这些伟大的领导者协助建立了一个已将他们抛在身后的组织，而他们留给广州的是一个远远超越过去的新的管理结构。正如共产党所说的：他们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附录 A：朱光《广州好》（50 首）

一

广州好，
城古越千年。
饱阅沧桑消劫烬，
缅怀缔造接前贤，
山立五羊仙。

二

广州好，
反帝百年名。
城北平英扬义帜，
虎门焚毒抗夷兵，
独立血来争。

三

广州好，
三月吊黄花。
七二英雄溅碧血，
万千豪俊拔龙牙，
辛亥耀光华。

四

广州好，
越秀更娇妍。

俯瞰烟霞穷变化，
仰观林翠有无间，
碑写碧云天。

五

广州好，
黄埔涌波涛。
北伐雄师钢铸骨，
工农从此识刀枪，
八一树红旄。

六

广州好，
工运著威声。
省港红潮寒鬼胆，
沙基射杀岂能平，
教我工农盟。

七

广州好，
革命好摇篮。
农运雄风摧旧阙，
回天基力出高坛，
旭日万民看。

八

广州好，
追忆红花岗。
血荐轩辕垂万古，
松涛陵上问穹苍，

血谊永难忘。

九

广州好，
追忆红花岗。
故垒依稀寻战迹，
头颅愧戴鬓沾霜，
晨起舞朝阳。

十

广州好，
我问白云山。
南国擎天成砥柱，
松林泉唱晓霞丹，
何日摘星还。

十一

广州好，
凭眺越王台。
千里江山来眼底，
十年生息入诗来，
云海一天开。

十二

广州好，
镇海有高楼。
极目风云堪识势，
骋怀禾黍乐丰收，
何事问王侯。

十三

广州好，
 花塔插云头。
 六祖色空留塑像，
 东坡来去唱南陬，
 诃树啸千秋。

十四

广州好，
 忆旧访流花。
 桥畔象山迎盛日，
 湖开新翠舞朝霞，
 春色遍天涯。

十五

广州好，
 新景满昌华^①。
 十里藕花芳沁远，
 千株荔枝道边遮，
 路断七香车。

十六

广州好，
 东浦出东湖。
 红雨浥堤滋弱柳，
 碧波荡艇耀明珠，
 高下若平芜。

① “昌华”，南汉时期的统治者刘龔曾建“昌华苑”，地点在荔湾一带，今荔湾区仍有昌华街。

十七

广州好，
夜泛荔枝湾。
击楫飞觞惊鹭宿，
啖虾啜粥乐余闲，
月冷放歌还。

十八

广州好，
晓港辟公园。
傍水依山亭阁起，
猗猗绿竹万千竿，
邻接古泉门^①。

十九

广州好，
过海踏花行。
花地素馨连紫陌，
杨桃清脆味乡情，
尧日照天晴。

二十

广州好，
晚照石门天。
绿树青山霞绛染，
蜃楼明月海潮喧，
唤我不归船。

^① 古泉门，清末广州名画家居廉，字古泉。对岭南画派有贡献，高奇峰、高剑父是其弟子。

二十一

广州好，
月上试凭栏。
银汉繁星燎夜宇，
珠江渔火照明澜，
俯仰几回看。

二十二

广州好，
夏夜放中流。
渔唱激湍胸底阔，
海云舒卷弄飞舟，
更喜月如钩。

二十三

广州好，
水暖任沉浮。
海角荔堤垂柳岸，
弄潮人喜向东流，
洄溯自忘忧。

二十四

广州好，
茶室且清宜。
名点山泉常品赏，
楼头风月约相知，
共话太平时。

二十五

广州好，

佳饌世傳聞。
宰割烹調夸妙手，
飛潛動植味奇芬，
龍虎會風雲。

二十六

廣州好，
人物競風流。
五子^①三家^②留傲骨，
海山^③岳雪^④剩荒丘，
今日勝前儔。

二十七

廣州好，
花木四時春。
旖旎繁英堆錦綉，
繽紛香蕊落衣巾，
只是為勞人。

二十八

廣州好，
端午賽龍舟。
急鼓千捶船競發，
萬橈齊舉浪低頭，
屈子不需愁。

① “五子”，指明洪武年間廣東詩人孫蕡、王佐、李德、黃哲、趙介在廣州結“南園詩社”，為廣東有詩社之始。

② “三家”，指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

③ “海山”，清道光年間鹽商潘仕成在荔灣建“海山仙館”藏書樓。

④ “岳雪”，清末鹽商孔廣陶在廣州南關建“岳雪樓”藏書。

二十九

广州好，
乞巧乞姻缘。
巧艺年年祈夙愿，
钟情红粉总堪怜，
今日得团圆。

三十

广州好，
花市百花开。
除夕东风花共醉，
芬芳盈掬挈春回，
曙色破天来。

三十一

广州好，
元夕看花灯。
街落银河城不夜，
鱼龙凤鹤竞飞腾，
火树满天升。

三十二

广州好，
踏翠上萝峰。
公社桃梅红十里，
文山诗翰^①有遗踪，
小立听晨钟。

① “文山诗翰”，萝岗洞玉岩书院藏有木刻文天祥自书诗。

三十三

广州好，
宜雨又宜晴。
蔬果桑麻繁种植，
农林渔牧共经营，
丽日有深情。

三十四

广州好，
钢厂灿红霞。
烟突嵯峨穿翠幕，
铁流沸腾出丹葩，
不见日西斜。

三十五

广州好，
百艺斗环奇。
牙刻木雕陶作好，
拷绸麻织绣华蕤，
创造属工师。

三十六

广州好，
珠海跨长虹。
络绎人车飞跃过，
涛呼今已伏蛟龙，
浩荡又东风。

三十七

广州好，

侨伯构新村。
去国饱尝漂泊苦，
回乡今喜物华春，
美景乐天伦。

三十八

广州好，
粤剧放光华。
文茂^①英风存粉墨，
汉卿妙笔泻珠玑，
绝唱蝶双飞。

三十九

广州好，
红马艺名扬。
谢宝高风维正义，
窦娥冤血断人肠，
警世是歌场。

四十

广州好，
南国奏佳音。
试马春郊龙夺锦，
行云流水鸟投林，
击鼓说雄心。

四十一

广州好，

① “文茂”，清代粤剧艺人。

画派创新姿。
锦绣岭南收笔底，
天风春睡出高师，
多少画中诗。

四十二

广州好，
弈道冠群伦。
北战南征奉将帜，
车飞马跃炮如神，
国手数官璘。

四十三

广州好，
体育惠同群。
人健国强情焕发，
容陈戚蔡^①冠全军，
大任岂斯文。

四十四

广州好，
科学早昌明。
辈出英才多卓荦，
青年意气莽纵横，
百氏正争鸣。

四十五

广州好，

^① 容陈戚蔡，指新中国第一个世界锦标赛冠军容国团（乒乓球）、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人陈镜开（举重）、第一个打破游泳纪录的戚烈云、第一次打破全国撑竿跳高纪录的蔡艺墅。

业绩展华丰。
 灿烂琳琅多品类，
 声光电化创工农，
 计日达高峰。

四十六

广州好，
 路树列飞鹏。
 万棵紫荆扬彩蝶，
 千行绿树缀明灯，
 影动月初升。

四十七

广州好，
 人道木棉雄。
 落叶开花飞火凤，
 参天擎日舞丹龙，
 三月正春风。

四十八

广州好，
 美德看今朝。
 秀丽^①全公扑烈火，
 英雄无我逼青霄，
 风格立高标。

四十九

广州好，

① “秀丽”，广州何济公制药厂青年女工向秀丽，1959年1月救火牺牲。

解放十春秋。
苦难已随流水去，
繁华事业仗群谋，
与众乐淹留。

五十

广州好，
四海亦为家。
并举高飞同跃进，
上游远瞩事无涯，
日日望京华。

附录 B：表格

表 1：广州城市人口

年份	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ⁱ
1938	1 022 000 ^a	—	—
1948	1 414 000 ^a	—	—
1949 年 12 月	1 172 000 ^b	—	—
1950 年 1 月	1 211 000 ^c	—	—
1951 年 1 月	1 300 000 ^c	—	—
1952 年 1 月	1 416 000 ^c	36.7	9.2
1953 年 1 月	1 518 000 ^c	41.8	7.9
1953 年中	1 599 000 ^a	—	—
1954 年 1 月	1 626 000 ^c	43.7	7.2
1955 年 8 月	1 706 000 ^c	39.5	7.0
1955 年 10 月	1 717 000 ^b	39.0	6.8
1957 年 1 月	1 650 000 ^d	—	—
1957 年中	1 789 000 ^c	—	—
1957 年底	1 820 000 ^f	—	—
1958 年中	1 867 000 ^a	—	—
1959 年 2 月	2 004 762 ^e	—	—
1965 年 10 月	3 100 000 ^h	—	—

数据来源：1938、1948、1953 年的年中数据来自人口普查报告；其他数据来自广州

市政府的家庭人口登记证明，因此只能作为实际人数的近似值。尤其在1956年以后，因为体制的偏见，许多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却不能登记城市户口，以促使他们上山下乡。（1965年的人口数显然包括了这类人。）

a. 见莫利斯·B. 尤曼（Morris B. Ullman）：《中国大陆的城市：1953和1958年》（*Cities of Mainland China: 1953 and 1958*），第P-95系列，第36页，华盛顿特区：美国商业部人口统计署，1961年（Washington, D. C. : Bureau of Censu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61）。

b.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30日。

e. 《南方日报》1955年12月13日。当时，除Chu区以外，广州所属各区的注册人口是1 106 794人（《南方日报》1951年1月16日）。Chu区约有45 000人（《南方日报》1950年6月28日），因此，当时的总人口约有1 150 000人。注册人口不包括暂住居民和罪犯。

d. 香港《大公报》1957年1月1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1448：23号。人口的减少表明大量人口在集体化时期被发送到农村。到1956年3月约有100 000广州城市居民去了农村（《南方日报》1956年3月27日）。

e. 《广州日报》1957年11月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1676：39-40号。据此，1953—1956年人口年平均增长53 113人。1953—1955年三年时间，约有294 000人从乡下迁到城市。

f. 香港《文汇报》1958年2月9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1714：24号。此外，1958年初，约有320 000城郊居民转为广州市辖区居民。在对1965年的人口估计中也应包括这批居民。

g. 《广州：城市、经济，迈向社会主义》（*Canton: The City, Economy, and March Toward Socialism*），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第16369号。

h. 香港《虎报》（*Tiger Standard*，1965年10月18日），来自广州市政府公告。

i. 来自Pressat Roland，“La Population de la Chine et son économie”，载《人口》（*Population*, vol. 13, no. 4），1958年10—12月，第572—573页。再版于约翰·S. 艾德（John S. Aird）：《中国大陆人口的规模、增长和成分》（*The Size, Growth, and Com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a*）第P-19系列，第15号，第40页，华盛顿特区：美国商业部人口统计署，1961年。

表 2：广东省人口估计

年份	人口
1953	36 740 000
1954	37 475 000
1955	38 225 000
1956	39 030 000
1957	39 810 000
1958	40 615 000
1959	41 425 000
1960	42 250 000
1961	43 090 000
1962	43 945 000
1963	44 815 000
1964	45 700 000

数据来源：1953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见约翰·S·艾德：《中国大陆人口的规模、增长和成分》。1954—1964 年的人口数是按年增长率 2% 推算而来（根据《南方日报》1957 年 8 月 12 日的一项公告，广东省人口年增长 700 000 到 800 000 人）。在政府官员的讲话中，提到的人口似乎比上述推算要少，但总是语焉不详。例如，在 1958 年，政府官员提到广东人口为 38 000 000；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官员们在好几年都说广东的人口是 40 000 000。

表3：干 部

干部的类型	人数
集体化前专区及其以下的干部 ^a （1954年）	
专区干部	40 000
县及县以下干部 （包括当时92个县、800多个区及12 000个乡）	100 000 ^b
公社化后的乡村干部（1960年） ^c	
公社干部	100 000
大队干部	300 000
生产队干部	600 000
农村总人口	30 000 000
广州市的干部	
1954年1月	40 000 ^d
1957年11月	66 000 ^e

a. 《南方日报》1954年1月4日。

b. 无法进行细分，但其中约49 000人是79个县（不包括海南岛）的县级干部（《南方日报》1953年12月13日）。

c. 《南方日报》1960年11月3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2415：4号。

d. 《南方日报》1954年1月4日。

e. 《南方日报》1957年12月2日。当时，其中有15 153名干部在广州的党政部门工作（《南方日报》1957年8月7日）。

表 4: 共产党员

时间	人数	基层单位
广东省		
1949 年	40 000 ^a	4 000 ^d
1954 年底	200 000 ^b	—
1955 年 6 月	240 000 ^c	—
1956 年 6 月	350 000 ^d	—
1957 年 12 月	500 000 ^e	—
1959 年 9 月	740 000 ^f	49 900 ^f
1961 年 12 月	907 000 ^g	—
广州市		
1949 年	100	—
1959 年 9 月	60 000 ^h	3 000 ^h

a. 《南方日报》1959 年 9 月 28 日,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第 2130: 11 - 14 号。据此, 在广东接管前游击队单位 (pre-takeover guerrilla units) 约有 20 000 名党员, 分散于大约 2 000 个支部。

b. 从 1956 年 6 月的推测数据减去 1954 年底到 1956 年 6 月的新党员数 (148 000)。参见《南方日报》1956 年 7 月 2 日。

c. 《当代背景》第 411: 27 号。此时, 广东省党员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0.7%, 低于其他任何地方。1955 年 7 月 1 日, 约有 83 000 名农村党员 (《南方日报》1955 年 7 月 1 日)。到 1955 年 10 月, 约有 100 000 名农村党员 (《南方日报》1955 年 10 月 11 日)。

d. 根据省党代会代表数计算而来。每个省每 500 名党员可有一位代表, 广东省有 699 名代表 (《南方日报》1956 年 5 月 4 日至 6 日)。

e. 《南方日报》1957 年 12 月 9 日。当时约有 22 000 个农村党支部 (《南方日报》1957 年 12 月 8 日)。1957 年底至 1959 年 3 月又有 230 000 位新党员 (《南方日报》1959 年 9 月 28 日,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第 2130: 11 - 14 号), 其中 160 000 位来自农村地区 (《南方日报》1959 年 5 月 28 日)。

f. 《南方日报》1959 年 9 月 28 日,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第 2130: 11 - 14 号。此时广东省党员所占人口比例约为 1.9% (《南方日报》1959 年 10 月 1 日,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第 2152: 33 - 41 号)。1959 年 7 月 1 日, 广东省有 710 000 名党员 (《广州日报》1959 年 7 月 2 日)。

g. 《南方日报》1961 年 12 月 17 日, 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第 2821: 11 号。

h. 《广州日报》1959 年 9 月 27 日。

表 5：共青团员

时间	团员人数	基层单位
广东省		
1953 年底	304 000 ^a	
1955 年 5 月	485 000 ^a	20 000 ^b
1957 年 12 月		22 000（广东农村） ^b
广州市		
1959 年 4 月	60 000 ^c	

a. 《南方日报》1955 年 5 月 4 日。

b. 《南方日报》1957 年 12 月 8 日。

c. 《南方日报》1959 年 4 月 12 日，见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第 3491-D 号。

表 6：广州市区重组

原有的区^a

太平、黄沙、惠福、海幢、永汉、沙面、长寿、三元、东山、陈塘、小北、东堤、逢源、前鉴、芳村、大东、洪德、蒙圣、沥滘、西禅、靖海、狮山、沙河、珠江、德宣、南岸、新洲

此外还有广州市郊区的 61 个农业乡村

1950 年 6 月 24 日的重组^b（巩固和加强控制）

原有的 21 个区合并为 9 个

区	人口
长寿	151 458
惠福	133 698
永汉	126 155
太平	116 147
越秀	111 244
荔湾	64 960
珠江	44 802
河南	135 514

(续上表)

大东	71 911
郊区人口	186 545
沙面	1 903
	—
总共	1 144 533

郊区基本不变 (增加了一个: 西村)

西村、沙河、沥滘、三元、新洲、石牌、芳村、沙面 (外事中心, 作为一个特殊官署, 而不是一个区而存在)

1951 年 10 月 28 日的重组^c (在郊区土改之后)

9 个中区保持不变

7 个郊区合并成 4 个:

芳村 (不变)、新滘 (从新洲到沥滘)、白云 (从石牌、沙河到三元里一部分)、西村 (从西村到三元里一部分)

1952 年 9 月 24 日的重组^d (进一步巩固)

9 个中区合并成 6 个:

东区 (包括大东的一部分、永汉和白云)

中区 (包括太平和永汉、惠福、大东、荔湾的一部分)

西区 (包括长寿、荔湾的大部分及西村的一部分)

北区 (包括越秀及永汉、惠福、大东、西村的一部分)

河南 (珠江南岸, 河南及新洲的一部分)

珠江 (包括所有水上人家)

郊区除增加了黄埔外, 保持不变^e。

1958 年农村地区的合并^f

番禺县加入了广州市, 市区的总面积从 382 平方公里增加到约 700 平方公里 (人口增加超过 30 万)。

（续上表）

花县的一部分加入到广州市，市区所辖的总面积增加到 1 261 平方公里。

虽然增加了 17 个乡，但没有迹象显示市区进行了重组。

1960 年 8 月 6 日的重组^b（将工业区和城郊农村地区结合起来，使合作社亦工亦农）^h

东区重新命名为东山区（增加了农村地区）

河南重新命名为海珠区（增加了农村地区）

西区重新命名为荔湾区（增加了农村地区）

北区重新命名为越秀区（增加了农村地区）

郊区也进行了重组，每一个都有城区和农村地区。黄埔、江村、芳村、花县、从化现在也是市区的一部分。

注：本表依据多种材料编制，或许会有其他的重组因资料不详未能列入。

a. 后国民党时期的划分，见《广州大观》（广州，1948 年）；新中国成立初的划分，参见《南方日报》1950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2 日。

b. 郊区居民人口数据来自《南方日报》1951 年 4 月 3 日，其他人口数据来自《南方日报》1950 年 6 月 28 日。由于城市是一个包括城乡的整体，所以人口总数无法精确。表格所列是各区所能找到的唯一人口数据。《南方日报》1950 年 6 月 24 日列出了各区名单。

c. 《南方日报》1951 年 10 月 28 日。

d. 《南方日报》1952 年 9 月 26 日。

e. 根据《南方日报》1953 年 6 月 8 日所载，这些郊区包括 55 个乡。

f. 《广东旅行手册》（香港：中国旅游公司，1958 年），第 1 页；莫利斯·B. 尤曼（Morris B. Ullman）：《中国大陆的城市：1953 和 1958 年》（*Cities of Mainland China: 1953 and 1958*），第 P-95 系列，华盛顿特区：美国商业部人口统计署，1961 年。

g. 《南方日报》1960 年 8 月 6 日。

h. 许可城市接管周围农村地区的国家制度出台之后。参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 2101：5-6 号。

表 7: 党政代表大会

会 议	日 期
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大会	1950 年 1 月 10 日
第二届大会	1950 年 4 月 14 日
第三届大会	1950 年 11 月 4—9 日
第四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1 年 4 月 1 日
第二次会议	1951 年 8 月 24—27 日
第三次会议	1952 年 1 月 31 日
第四次会议	1952 年 6 月 14—15 日
第五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2 年 12 月 5 日
第二次会议	1953 年 2 月 25—26 日
第六届大会	1954 年 1 月 10—14 日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4 年 7 月 23—31 日
第二次会议	1955 年 1 月 16—19 日
第三次会议	1955 年 12 月 7—11 日
第四次会议	1956 年 4 月 2 日开幕
第二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6 年 11 月 20—28 日
第二次会议	1957 年 4 月 20 日开幕
第三次会议	1957 年 12 月 11—15 日
第四次会议	1958 年 3 月 7—10 日
第三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8 年 5 月 25—29 日
第二次会议	—
第三次会议	1959 年 7 月 7—11 日

(续上表)

会 议	日 期
第四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0年11月29—12月3日
第二次会议	1961年10月12—13日
第三次会议	1962年5月21—28日
第五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2年12月20—25日
第二次会议	1963年6月26—29日
第三次会议	1963年12月23—27日
第四次会议	1964年8月29—31日
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大会	1950年10月5—16日
第二届大会	1951年9月3—22日
第三届大会	—
第四届大会	—
第五届大会	1952年12月30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4年8月1—14日
第二次会议	1955年2月1—6日
第三次会议	1955年11月27日—12月2日
第四次会议	1956年7月25日—8月4日
第五次会议	1956年12月26—31日
第六次会议	1957年7月25日—8月10日
第二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8年9月20—27日
第二次会议	1959年10月4—11日
第三次会议	1960年11月28日—12月3日
第四次会议	1961年11月23—29日

(续上表)

会 议	日 期
第三届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3 年 12 月 23—27 日
第二次会议	1964 年 9 月 11—17 日
广州市党代会	
第七届党代会	
第三次会议	1952 年 9 月
第四次会议	1954 年 5 月 25 日—6 月 4 日
第五次会议	1955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4 日
第八届党代会	
第一次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6 年 6 月 13—23 日
全会	1957 年 11 月 15—18 日
第二次会议	1959 年 4 月 12 日开幕
广东省党代会	
第七届党代会	
第一次大会 (华南)	1953 年 10 月 3—24 日
第二次大会	1955 年 9 月 5—14 日
第八届党代会	
第一次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56 年 7 月 10—23 日
第二次会议	1957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5 日
第三次会议	1959 年 2 月 17—25 日
第二次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61 年 12 月 7—14 日
第二次会议	1964 年 7 月 9—24 日

表 8：广东省粮食年产量（单位：10 亿斤）

年份	产量
1949	16.0 ^a
1952	18.9 ^a
1953	17.8 ^b
1954	21.0 ^a
1955	20.8 ^b
1956	24.0 ^a
1957	24.5 ^c
1958	32.0 ^d

a. 《南方日报》1957 年 11 月 17 日。

b. 《南方日报》1955 年 10 月 25 日，见联合研究服务处（vol. 1, no. 28）。

c. 《南方日报》1958 年 12 月 7 日。

d. 《南方日报》1959 年 9 月 15 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 2120：31 号。

表 9：广州市工业总产值（单位：百万元）

年份	产值
1950	260 ^a
1952	385 ^a
1953	445 ^b
1954	578 ^c
1955	660 ^d
1956	840 ^d
1957	1 220 ^a
1958	2 160 ^a

a. 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第 16369 号，广州。

b. 广州中国新闻服务处（Canton China News Service），1954 年 12 月 31 日，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 962：28-29 号。

c. 香港《文汇报》1955 年 11 月 25 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 1179 号。

d.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第 1451：23-25 号。

表 10: 广州市就业状况

工商业就业状况		
年份 (12 月)	就业人数	
1952	239 678	
1954	263 298	
1955	275 000	
1956	310 000	
1957	720 000	

工商业就业状况 (1954 年底) ^a		
企业类型	企业数	职工人数
工厂		
公有制	—	36 365
私有制	4 295	62 130
商业企业		
公有制	—	27 346
私有制	76 342	136 457
		—
		263 298

a. 数据来自《南方日报》1955 年 12 月 12 日。

表 11: 广东省非农职工就业状况

就业单位类型	人数
国营工业企业	430 000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130 000
国营手工业企业	80 000
合作手工业企业	600 000
国营商业企业	67 000
合作商业企业	425 000
学校人员	170 000
干部 (管理类)	500 000

数据来源: 学校教职员工数来自《南方日报》1957 年 11 月 21 日; 其他数据来自《南方日报》1957 年 8 月 18 日。

表 12：农村管理单位数目（广东省）^a

时间	区	乡	高级社	低级社
1951 年 8 月	609	4 000	—	—
1954 年 1 月	800 +	12 000	—	—
1956 年 1 月	900 +	10 000 +	—	132 000 ^b
1957 年 1 月	940	13 318	—	—
1957 年 12 月	—	—	47 500	—
1958 年 1 月	464	5 771	—	—
1958 年中期	—	—	25 450	—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1958 年末	790		—	200 000
1959 年末	1 106		—	—
1960 年末	1 065		19 300	198 000
1963 年 4 月	1 600		20 000	440 000
1965 年 8 月	1 724	—	—	—

a. 1958 年，241 个地方机构被划分为镇，约有 3 000 个地方机构被认为是市镇。见《当代背景》，第 529 号。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 年），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第 DC-389 号。

b. 这里只占农村人口的 80%。因此，如果另外 20% 的人口加入相应规模的合作社，则应有 165 000 个低级合作社。

附录 C: 资料来源缩写

CB, Current Background.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当代背景》,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CCD, Communist China Digest, A JPRS translation series. (《共产中国文摘》, 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

CNA, China News Analysis, Hong Kong. (《中国新闻分析》, 香港)

ECMM, 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zines,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中国大陆杂志摘要》,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GMRB *Guang ming ri-bao* (《光明日报》)

HKDGB *Dagong bao, Hong kong* (香港《大公报》)

HKWHB *Wen-hui bao, Hong kong* (香港《文汇报》)

HSB *Hua-shang bao* (《华声报》)

HQ *Hong qi (Red Flag)* (《红旗》杂志)

JPRS,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U. S.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美国政府商务部联合出版研究服务处

KC *Kwang chow ri-bao* (《广州日报》)

NCNA *New china News Agency* (新中国新闻局)

NF *Nan-fang ri-bao* (《南方日报》)

RMRB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SCMM, 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zines,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中国大陆杂志选》,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SCMP,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U. S. Consulate, Hong Kong. (《中国大陆报纸概览》,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URS, Union Research Service. Hong Kong (联合研究服务处, 香港)

YC Yang-cheng wan-bo (《羊城晚报》)

人地名对照表

Chan-chiang	湛江	Fang Fang	方方
Chang Chih-tung	张之洞	Fang Shih-san	方十三
Chang Fa-k'uei	张发奎	Feng Pai-chü	冯白驹
Chang Ken-sheng	张根生	Fo-shan	佛山
Chang P'ing-hua	张平化		
Chang-shih	樟市	Hai-lu-feng	海陆丰
Chang Yün-i	张云逸	Hai-nan	海南
Ch'ang-ch'un	长春	Hak ka	客家
Chao K'uang-yin	赵匡胤	Hang-chou	杭州
Chao Tzu-yang	赵紫阳	Hankow	汉口
Ch'ao-chou	潮州	Hao Chung-shih	郝中士
Ch'en Chi-t'ang	陈济棠	Ho Hsi-ming	贺希明
Ch'en Chih-fang	陈志方	Ho Wei	何伟
Ch'en Chiung -ming	陈炯明	Hsi-ts'un	西村
Ch'en Po-ta	陈伯达	Hsin-hsiang	新乡
Ch'en Tu-hsiu	陈独秀	Hsin-hui	新会
Ch'en Yü	陈郁	Hsing-ning	兴宁
Cheng-chou	郑州	Hsü Kuang-p'ing	许广平
Ch'eng-tu	成都	Hu Feng	胡风
Chi	姬	Hu Han-min	胡汉民
Ch'i-li-ying	七里营	Hu-men	虎门
Chiang Ch'ing	江青	Hua Hsin	花县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Huang Yung-sheng	黄永胜
Chiang-men	江门	Hui-chou	惠州

Chiao Lin-i	焦林义	Hung Hsiu'ch'üan	洪秀全
Chieh-yang	揭 阳		
Ch'ien Ying	钱 瑛	Jouchi	柔 济
Ch'in Mu	秦 牧		
Ch'üung-yai	琼 崖	K'ai-p'ing	开 平
Chou En-lai	周恩来	K'ang Sheng	康 生
Chou Yang	周 扬	K'ang Yu-wei	康有为
Chu Ku-huai	朱谷怀	Kao Kang	高 岗
Chu Kuang	朱 光	K'o Lin	柯 麟
Ch'ü-chiang	曲 江	Ku Kuan-hsien	古关圣
Ch'üan-chou	泉 州	Ku Ta-ts'un	古大存
Chuang	壮	Kwangchow	广 州
En-p'ing	恩 平		
Lei Feng	雷 锋	Pei-tai-ho	北戴河
Li	黎	P'eng Chen	彭 真
Li Chien-chen	李坚真	P'eng P'ai	彭 湃
Li Fan-fu	李凡夫	P'eng Te'huai	彭德怀
Li Fu-ch'un	李富春	Punti (Pen-ti)	本 地
Li Hsien-nien	李先念		
Li Hsüeh-feng	李雪峰	San-shui	三 水
Liang Ch'i-ch'ao	梁启超	Shameen (Sha-mien)	沙 面
Liang Hsiang	梁 湘	Shao-kuan	韶 关
Liao Lu-yen	廖鲁言	Sheng ying	圣 婴
Lin Ch'iang-yün	林锵云	Shih-ch'i	石 岐
Lin-kao	临 高	Shun-te	顺 德
Lin Li-ming	林李明	Ssu-i	四 邑
Lin Mo-han	林默涵	Sun K'o	孙 科
Lin Piao	林 彪		
Lin Tse-shu	林则徐	T'ai-shan	台 山
Ling-nan	岭 南		

Liu Shao-ch'i	刘少奇	T'an Chen-lin	谭震林
Lo I-ch'ün	罗翼群	T'an Cheng	谭政
Lo Jui-ch'ing	罗瑞卿	T'an Cheng-wen	谭政文
Lu-shan	庐山	Tanka	唐家
Lu Ting-i	陆定一	T'ao Chu	陶铸
Lung-ch'uan	龙川	Teng Hsiao-p'ing	邓小平
		Teng Tzu-hui	邓子恢
Ma Chün	马骏	Tseng Chih	曾志
Mao-ming	茂名	Tseng Sheng	曾生
Mao Tse-tung	毛泽东	Tso Hung-t'ao	左洪涛
Mei	梅	Tu Jun-sheng	杜润生
Miao	苗	Tung-kuan	东莞
		T'ung-yung	通用
Nan Fang	南方	Wu Chin-nan	伍晋南
Nan-hai	南海	Wu-chou	梧州
Na-ta	那大	Wu Kuang	武光
Ou Meng-chüeh	区梦觉	Yang Ch'i	杨奇
Ou-yang Hai	欧阳海	Yao	瑶
Ou-yang Shan	欧阳山	Yeh Chien. ying	叶剑英
		Yen Fu	严复
P'an-yü	番禺	Yenching	燕京
		Yin Lin-p'ing	尹林平
Wang Jen-chung	王任重	Yu-yü-kang	游鱼岗
Wang K'uang	王匡	Yüeh	越
Wang Te	王德	Yüeh-hsiu	越秀
Wen Min. sheng	文敏生	Yung Wen-t'ao	雍文涛
Whampoa	黄埔		
Wu Chih-p'u	吴芝圃		

名词术语对照表

- ba Kwangchow jian cheng Hua Nan
gong ye ji di 把广州建成华南
工业基地 (make Canton into the
industrial base of South Chian)
- ba zi xian fa 八字宪法 (Eight
Point Charter for Agriculture)
- bao chan dao hu 包产到户 (de-
centralizing co-op responsibility to
the household)
- bao gong bao chan, chao e jiang li
包工包产, 超额奖励 (guaran-
tee labor supply and production,
and receive rewards for surpassing
quotas)
- bao jia 保甲 (mutual responsibili-
ty group for civil obedience)
- bao xi dui 报喜队 (announcing
good news teams)
- ben wei zhu yi 本位主义 (unit-
ism)
- bi xue gan bang 比学赶帮 (com-
paring, studying, catching up,
and helping)
- chun lei 春雷 (Spring Thunder, a
Red Guard group)
- da dui 大队 (brigade, lit., "the
big team")
- da ming da fang 大鸣大放 ("Big
Contending and Blooming",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 dan gan hu 单干户 (households
outside cooperatives)
- di qu zong bu 地区总部 (district
headquarters, Cultural Revolu-
tion)
- dui 队 (team)
- fa gui hui bian 法规汇编 (Com-
pendiu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na])
- feng shui 风水 (lit., "wind and
water"; [a system of supersti-
tious beliefs])
- ganbu 干部 (cadre)

- gong shang ye zhe 工商业者
(people engaged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 gong ye zheng ce qi shi tiao 工业政策七十条 (Seventy Articles on Industry)
- hang ye 行业 (a given line of work)
- he li he fa 合理合法 (according to law and order)
- he li hua 合理化 (rationalize)
- hu zhu zu 互助组 (mutual aid teams)
- jiao liu hui 交流会 (trade fair)
- jie dao lao dong fu wu zhan 街道劳动服务站 (street labor service stations)
- jie yue jian cha wei yuan hui 节约检查委员会 (Austerity Inspection Committee)
- jing ying guan li wei yuan hui 经营管理委员会 (Management Council)
- jiu cha dui 纠察队 (People's Disciplinary Teams; [temporary organizations for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 ju she gan bu 驻社干部 (cadre resident in a co-op or commune)
- jue wu 觉悟 (consciousness or enlightenment)
- Jun shi guan zhi wei yuan hui 军事管制委员会 (Military Affairs Control Commission)
- ku kan 骨干 (backbone, rank and file)
- Kwangchow bu dui 广州部队 (Canton army garrison)
- li jia 里甲 (mutual responsibility group for tax collections [imperial China])
- lian she 联社 (united co-op or commune)
- nan xia gong zuo tuan 南下工作团 (Southbound Work Regiment)
- nei hang 内行 (a specialist, lit., "insider")
- niu gui sha shen 牛鬼蛇神 ([campaign against] demons and monsters, lit., "cow devils and snake spirits")
- nong cun gong zuo jin ji zhi biao 农村工作紧急指标 (urgent directive on rural work)
- nong cun ren min gong she tiao li cao

- an 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
(Sixty Articles on Agriculture,
Draft)
- pai chu suo 派出所 (local police
stations)
- san bao dian 三宝殿 (Most Treas-
ured Temple)
- san ding 三定 (“Three Fixes”;
[buying, selling, and produc-
tion])
- shao gou shao xiao 少购少销
(purchase less, sell less)
- she hui zhu yi gai zao 社会主义改
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 sheng chan dui 生产队 (produc-
tion team)
- sheng ge lian 省革联 (Provincial
Alliance of Revolutionaries)
- shi zheng gong suo 市政工所
(Municipal Office, predecessor
to Canton government)
- su qing an cang fan ge ming 肃清
暗藏反革命 ([abbreviated *su
fan*]) Campaign to Wipe out
Hidden Counterrevolutionaries
- tong chou jian gu, quan mian an pai
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 (con-
sider all sides, unify prepara-
tions, and bring order to the
whole program)
- tu ba lu 土八路 (irregulars, lit.,
“local Eighth Route Army”)
- tu shui fei zhong mi bao quan ju 土
水肥种密保权具 (soil, water,
fertilizer, seeds, closeplanting,
crop protection, field manage-
ment, and tools. [The Eight
Point Charter for Agriculture])
- tu zhuan jia 土专家 (local spe-
cialists)
- tui she gui 退社鬼 (cooperative-
leaving devils)
- wu tong guan xi 五同关系 (five
kind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 xia fang 下放 (downward transfer
[to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 xian qu xiang 县区乡 (the [three
level] county, district, town-
ship)
- xiang 乡 (township)
- xiao dui 小队 (small team)
- xun lian ban 训练班 (rotating
training classes)
- yi ganzi cha dao di 一竿子插到底

(“The flagpole is thrust to the bottom”)	team)
you min 游民 (rootless remnants)	zhong yang guan yu mu qian nong cun gong zuo zhong ruo gan wen ti de jue ding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Central Committee directive on some current problems in rural work-“The Early Ten Points”)
you zu zhi you ji hua 有组织有计划 (well organized and planned)	
zao fan lian wei 造反联委 (United Revolutionar Rebellion Committee)	zhuang ye gong si 专业公司 (specialized company)
zheng gui hua 正规化 (regularize)	zi ben jia 资本家 (capitalists)
zhi bu 支部 (party branch)	zi li geng sheng 自力更生 (self-reliance)
zhi du hua 制度化 (systematize)	zu 组 (groups)
zhong dui 中队 (the middle-sized	

- Bu dao de hong qi* 不倒的红旗
 “Canton Sobieto Seifu” 广州苏维埃政府
 “Chi se tu zai chang bian yuan” 赤色屠场边缘
Ch’u Chi’iu-pai 瞿秋白
Cong ren-min gong-she-kan gong-chan zhu-yi 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

Da gong bao 大公报
Da-lu ban-yue kan 大陆半月刊
Di-li zhi-shi 地理知识

Er-er wan-bao 二二晚报

Fa gui hui bian 法规汇编

Gong-ren ri-bao 工人日报
Guang ming ri-bao 光明日报

Hai Lu Feng nong-min yun-dong 海陆丰农民运动

Hong Kong zhong-sheng ri-bao 香港钟声日报

Hong qi 红旗
Hong-se bao-dong 红色暴动
Hua-nan di-qu jing-ji di-li 华南地区经济地理

Hua-nan ge-ming shi-ji 华南革命事迹
- Hua-qiao ri-bao* 华侨日报
Huang Yen-p’ei 黄炎培

Jin-ri shi-jie 今日世界

Kanton shi 广东史
Ke-jia yan-jiu tao-lun 客家研究讨论
Kwangtung de jie fang 广东的解放
Kwangtung jing-ji di-li 广东经济地理

Kwangtung lu-xing shou-ce 广东旅行手册

Kwangtung si shi ge nong-ye he zuo-she 广东四十个农业合作社

Ku K’o-chung 古克中
“Kwangchow bao-dong yi-yi yu jiao-xun” 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
Kwangchow da guan 广州大观
Kwangchow dong-fang hong 广州东方红

Kwangchow hong-se 广州红色
Kwangchow hong-wei-bing 广州红卫兵

Kwangchow ri-bao 广州日报
Kwangchow shi shi-zheng bao-gao hui-kan 广州市市政报告汇刊

Kwangchow zhi-nan 广州指南

Liang Jen-ts’ai 梁仁彩

- Liu Yueh-sheng* 刘粤声
Lo Hsiang-lin 罗香林
- Nan-fang ri-bao* 南方日报
Nan-fang zhou-bao 南方周报
Nan Shina nenkan 南支那年鉴
- Qun-zhong* 群众
- Ren-min gong-she wan-shou wu-jiang*
 民公社万寿无疆
Ren-min gong-she wen-ti jie-da 人
 民公社问题解答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Ren-min shou-ce 人民手册
Ren-min you-dian 人民邮电
- Sorenbo to Shina Manshu no kyōsan*
undō 苏联邦与支那满洲的共
 产运动
shang you 上游
Shi-nian lai cai zheng zi liao 十年
 来财政资料
Sun Ching-chih 孙敬之
- Wang Ch'ao-t'ien* 王朝天
Wei Chin-fei 魏今非
Wen hui bao 文汇报
Wo shi yi-ge hong-wei-bing 我是一
 个红卫兵
- Xin-hua ban-yue kan* 新华半月刊
Xin-hua yue-bao 新华月报
Xin jian-she 新建设
Xin na-han zhan bao 新呐喊战报
Xin nan-fang 新南方
Xing Dao ri-bao 星岛日报
- Yang-cheng wan-bao* 羊城晚报
Yang Hsiang-k'uei 杨向奎
Yi-sui zhi Kwangchow shi 一岁之
 广州市
Yomiuri shimbun 读卖新闻
You lao gai dui yuan dao ji ji fen zi
 由劳改队员到积极分子
- Zen-yang dang le min bing* 怎样当
 了民兵
Zhen bao 真报
Zheng bao 正报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nong-cun she-hui zhu-yi jiao-yu
yun-dong zhong yi-xie ju ti zheng-
ce de gui-ding cao-an 中共中
 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Zhong-guo ge-ming yu gong-chan-*
dang”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Zhong-guo nong-min 中国农民
Zhong-guo qing-nian bao 中国青年
 报

Zhong-guo xian-dai ge-ming yun-
dong shi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Zhong-guo xian-dai ge-ming yun-
dong gu-shi 中国现代革命运
动故事

Zhong-nan zu zhi bu, Mao Tse-tung
si-xiang hong-wei-bing 中南组

织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Zhong-yang guan-yu mu-qian nong-
cun gong-zuo zhong you guan
wen-ti de jue-ding cao-an 中央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有关问题
的决定（草案）

Zhong-yang ri-bao “中央日报”

译 后

二十年与十年——傅高义与广东研究

傅高义教授是当今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对当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刻而持久的观察与研究，傅先生不仅学识深厚渊博，而且广结善缘，加上哈佛大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傅先生对当代中、美、日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也有独到的影响力，在中国和日本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傅高义教授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始于他对当代广东的关注。作为美国最有名望的中国通之一，他首先是一个广东通。傅先生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另一本是《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79—1988）》。前者讲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最初的二十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和人民对这种新制度的适应；后者是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十年，但言近旨远，实际上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制度形态的转变。一个二十年、一个十年，基本勾画了新中国的两种不同的制度格局。

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之一，中美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态。但美国希望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况和变化，并着手开展对当代中国的研究，1955年底，哈佛大学成立了东亚研究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费正清。傅高义当时是哈佛年轻学者中的翘楚，他在日本研究上的成绩显示出他的研究才干，并因此受到器重。中国毕竟是东亚地区一个无法忽视的大国，20世纪60年代初，傅高义学术兴趣开始转向中国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他选择了广东。他在香港隔岸而观，收集图书、报刊资料，对从广东到香港的人进行访谈。他读完了到当时为止广东方面出版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

州日报》、广东省委的杂志《上游》等。虽然他不能实地到广东，但他已经非常贴近广东，凭借良好的学术训练、敏锐的分析能力，他可以真切感受到广东和中国的变化。

196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傅高义的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从1949年到1968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完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结束还有十年，但并不妨碍抽取这一段进行分析。傅高义的分析处理方法是将其分为建立新秩序和适应新秩序，这是这部著作的主题。从1949年到1968年的二十年间，中国经历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从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宗旨就是要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傅高义的基本判断是：在这头二十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过去的黑市、通胀结束了，赌博、卖淫、鸦片消失了；官员有一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这是公共道德的基础。经济领域统一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它使专业领域的工作更协调，为工业产品的标准化铺平了道路；在农村，个人耕作的结束和新的管理方式有利于根据土地的状况和对农产品的需求作出更合理的安排，新的品种和技术可以更有效地推广传播，便利开展整修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开垦土地等等。在经济事务之外，集体合作组织在消灭文盲、推广公共卫生等活动中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党通过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进步。

另一方面，在这二十年中，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政治指挥经济。在这二十年中，人民生活的基本变化不是来自经济上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组织的变化。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广东的职业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在城市，市民生活的变化，不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由于秩序的重建。合作化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改革生产关系，提

高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产量，但并没有达到目的；“大跃进”是失败的，几乎危及政府执政的威信和合法性；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摧垮务实政策和主张务实的领导人，竭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傅高义教授断言：“最后，经济结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不满意的生活状态。政治复兴主义（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暂时的，因为缺少经济、政治的基础来支持它。”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不得不进行变革的理由。这是傅先生1969年的结论，是符合唯物论的，可惜当时中国忽视了。十年后中国自己重新作出了选择。中国的变化证实了他当时的判断。

由于广东地方的特殊性，这本书还有一个次一级的主题：广东的地方主义问题。后来，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对20世纪50、60年代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决定也符合傅先生当时的判断。

傅高义教授是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末，他对广东研究的旨趣不是书写历史，而是关注现实。近四十年的时间流逝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了历史，同时也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作品。虽然，社会科学不能算是精确的科学，但独立的研究和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确实是有其科学性和价值的。

傅教授的作品虽然是在中美隔绝的冷战时代完成的，但傅教授确实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思维。他后来曾说过，他不可能像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那样，只报道中国积极的一面，也应该说明他所了解的消极的一面，这是一个学者应该有的求实和求真的立场。

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198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又一次推出傅高义教授关于广东的另一部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79—1988）》。傅先生以大家手笔为我们阐述了这个变革的十年，这部书一出版随即有了中文译本，不必多谈。傅先生关于广东的两部著作，一个二十年，一个十年，一个建设、巩固，一个改革、开放，时代不同，主题不同，但在精神上是契合的，这反映了时代的起承转合。

最后，至诚感谢我的朋友韦东念先生、学友赵泓，还有广东人民出

版社的倪腊松先生。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习期间，傅高义教授给我很多的启发、教诲、机会和帮助，对译文中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高申鹏

2005年10月 波士顿